

# 北京文博

文丛

北京市文物局 主办



北京燕山出版社  
BEIJING YANSHAN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北京文博文丛·2016·第3辑 / 祁庆国主编. —北京: 北京燕山出版社, 2016.11

ISBN 978-7-5402-4251-0

I. ①北… II. ①祁… III. ①文物工作 - 北京市 - 文集 ②博物馆 - 工作 - 北京市 - 文集

IV. ①G269.271-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271719号



**北京文博文丛·2016·第3辑**

出版发行: 北京燕山出版社有限公司

社 址: 北京市西城区陶然亭路53号 100054

责任编辑: 王梦楠 葛瑞娟

版式设计: 肖 晓

印 刷: 北京画中画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mm × 1092mm 1/16

印 张: 8

字 数: 181千字

版 次: 2016年11月第1版

印 次: 2016年11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02-4251-0

定 价: 15.00元

# 北京文博



2016年第3辑（总85期）

## 特约专稿

- 1 北京西山历史文化掠影  
尹钧科

## 北京史地

- 11 破“壬辰多水”论  
于德源
- 14 北京西山八大处史迹述略  
陈 康
- 27 京西皇姑寺历史沿革考  
苗天娥
- 38 北京房山孔水洞金代摩崖题记新考  
马 奎

## 文物研究

- 45 太行山东麓地区汉代城址调查简报  
徐 超
- 54 白塔寺藏文款明代释迦牟尼铜镀金造像年代及风格初探  
孙 涛
- 62 首都博物馆藏慈寿寺及永安寿塔发现造像初步研究  
刘 丞
- 70 谈非物质文化遗产京西太平鼓的保护  
魏宇澄

## 考古研究

- 76 圆明园遗址公园大宫门区域考古发掘简报  
北京市文物研究所

主办单位：北京市文物局

编辑出版：北京市文物局图书资料中心

《北京文博》编辑部

科学出版社文物考古分社

网址：<http://www.bjmuseumnet.org>

邮箱：[bjwb1995@126.com](mailto:bjwb1995@126.com)

## 博物馆研究

- 88 首都博物馆存储系统架构研究  
王 萌
- 95 银盐黑白历史底片的数字影像采集方法  
董 帅

## 文物保护

- 101 周经《荷塘芦雁图轴》隐含信息分析研究  
武望婷 潘 宁 彭森森 侯妙乐 马 燕 任静怡

## 文献资料

- 109 景行行止话师缘（三）  
姜舜源
- 112 读《文物背后的抗战故事》有感  
吴梦麟
- 116 一部深入浅出、雅俗共赏的博物馆学著作  
——《博物馆变迁：博物馆历史与功能读本》评介  
尤 李
- 119 北京市文物局2016年二季度文博事业大事记

### 《北京文博》编辑委员会

顾 问：李学勤 吕济民

主 任：宿 白

副主任：舒小峰 孔繁峙 王世仁

曹子西 齐 心 马希桂

编委会委员：（以姓氏笔画为序）

于 平 王 丹 王 岗 王丹江

王玉伟 王有泉 王培伍 王清林

卢迎红 田淑芳 白 岩 向德春

刘素凯 刘超英 齐东发 关战修

许 伟 许立华 杨玉莲 杨曙光

李 晨 李建平 肖元春 吴志友

吴梦麟 何 沛 何小平 沈其顺

宋大川 张德华 范 军 赵建明

哈 骏 侯兆年 侯 明 郝志群

徐 丽 徐 明 高小龙 高凯军

郭 豹 郭小凌 姬脉利 崔国民

葛英会 谭烈飞 薛 俭

## 声明

为适应我国信息化建设，扩大本辑刊及作者知识信息交流渠道，本辑刊已被《中国学术期刊网络出版总库》及CNKI系列数据库收录，作者文章著作权使用费与本辑刊稿酬一次性给付。免费提供作者文章引用统计分析资料。如作者不同意文章被收录，请在来稿时向本辑刊声明，本辑刊将做适当处理。

主 编：祁庆国

执行主编：韩建识

编辑部主任：高智伟

本辑编辑：韩建识 陈 倩

高智伟 康乃瑶 侯海洋

特约编辑：孙 莉 雷 英

# Beijing Cultural Relics and Museums

No. 3, 2016

## SPECIAL CONTRIBUTION

- 1 Glimpse of the Historical Culture of the Xishan in Beijing  
by Yin Junke

## HISTORY AND GEOGRAPHY OF BEIJING

- 11 Breaking the Theory of More Water in the Year of Renchen  
by Yu Deyuan
- 14 A Brief Account of the Historical Sites of Beijing Xi Shan Badachu  
by Chen Kang
- 27 Study on the Historical Evolution of the Huanggusi Temple in the West of  
Beijing  
by Miao Tian'e
- 38 A New Textual Research on Cliff Inscriptions of the Jin Dynasty in  
Kongshuidong, Fangshan, Beijing  
by Ma Lei

## CULTURAL RELICS RESEARCH

- 45 Brief Report on Investigation of City Sites of Han Dynasty in the Area of the  
Eastern Foot of Taihang Mountain  
by Xu Chao
- 54 Tentative Studies on the Age and Style of the Sakyamuni Gilded Bronze  
Statue of Ming Dynasty with Tibetan Inscriptions Collected in the White  
Pagoda Temple  
by Sun Tao
- 62 Tentative Research of the Statue Found in the Yongan Pagoda and Cishou  
Temple Collected in the Capital Museum  
by Liu Cheng
- 70 On the Protection for the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of Jingxi Taipinggu  
by Wei Yucheng

Organizer: Beijing Municipal Administration  
Bureau of Cultural Heritage  
Edited and Published by the Editorial Department  
of Beijing Wen Bo, Book and Data Centre, Beijing  
Municipal Administration Bureau Of Cultural  
Heritage, Cultural Relics and Archaeology Branch,  
Science Press  
URL: <http://www.bjmuseumnet.org>  
E-mail: [bjwb1995@126.com](mailto:bjwb1995@126.com)

## ARCHAEOLOGICAL RESEARCH

- 76 Brief Report on Archaeological Excavation of Great Palace Gate of Yuanmingyuan Ruins Park  
by Beijing Cultural Relics Research Institute

## MUSEOLOGY RESEARCH

- 88 Research of the Architecture of the Storage System of the Capital Museum  
by Wang Meng
- 95 Digital Image Acquisition Method of the Silver Salt Black and White History Film  
by Dong Shuai

## CULTURAL RELICS PROTECTION

- 101 Analysis and Research on Implied Information of *Lotus Pond and Lu Yan Figure Axis*  
by Wu Wangting, Pan Ning, Peng Miaomiao, Hou Miaole, Ma Yan, Ren Jingyi

## DOCUMENTS AND MATERIALS

- 109 The Teacher's Noble Virtues Worthy of Great Respect to Speak the Fate of Teacher and Student(Part III)  
by Jiang Shunyuan
- 112 Feelings after Reading *Stories of Anti - Japanese War behind the Cultural Relics*  
by Wu Menglin
- 116 A Museology Works with Profundity and an Easy-to-understand Approach and Suit both Refined and Popular Taste: Review of *Museums in Motion:An Introduction to the History and Functions of Museums*  
by You Li
- 119 Chronicle of Events Concerning Cultural Relics and Museums of the Beijing Municipal Administration Bureau of Cultural Heritage (2nd Quarter of 2016)

## Editorial Board of *Beijing Wenbo*

Advisors: Li Xueqin, Li Jimin

Chairman: Su Bai

Vice-chairmen:

Shu Xiaofeng, Kong Fanzhi, Wang Shiren,

Cao Zixi, Qi Xin, Ma Xigui

Members:

Yu Ping, Wang Dan, Wang Gang,

Wang Danjiang, Wang Yuwei, Wang Youquan,

Wang Peiwu, Wang Qinglin, Lu Yinghong,

Tian Shufang, Bai Yan, Xiang Dechun, Liu Sukai,

Liu Chaoying, Qi Dongfa, Guan Zhanxiu, Xu Wei,

Xu Lihua, Yang Yulian, Yang Shuguang,

Li Chen, Li Jianping, Xiao Yuanchun, Wu Zhiyou,

Wu Menglin, He Pei, He Xiaoping, Shen Qishun,

Song Dachuan, Zhang Dehua, Fan Jun,

Zhao Jianming, Ha Jun, Hou Zhaonian, Hou Ming,

Xi Zhiqun, Xu Li, Xu Ming, Gao Xiaolong,

Gao Kaijun, Guo Bao, Guo Xiaoling, Ji Maili,

Cui Guomin, Ge Yinghui, Tan Liefei, Xue Jian

Editor-in-chief: Qi Qingguo

Executive Editor: Han Jianshi

Director of the Editorial Office: Gao Zhiwei

Managing Editors of this Volume:

Han Jianshi, Chen Qian, Gao Zhiwei, Kang Naiyao

Hou Haiyang

Contributing Editor: Sun Li, Lei Ying

# 北京西山历史文化掠影

尹钧科

对于北京西山，古人多有论评。例如，明代沈榜在《宛署杂记·山川》一节中说：“西山，在（宛平）县西三十里。旧记：太行山首始河内，北至幽州，第八陔在燕，强形钜势，争奇拥翠，云从星拱于皇都之右。每大雪初霁，千峰万壑，积素凝华，若图画然，为京师八景之一，曰西山霁雪。”清代吴长元在《宸垣识略·形胜》一篇中说：“西山内接太行，外属诸边，磅礴数千里，林麓苍莽，溪涧镂错，其物产甚饶，古称神皋奥区也。卢沟、琉璃、胡良三河，山水所洩，多归其中。其水皆藻绿异常，风日荡漾，水叶递映，倚阑流览，令人欣然欲赋。”民国初期林传甲在《大中华京兆地理志·西山》一章中说：“西山横挡京兆区域之西，自京师望之，苍莽郁葱，虎卧龙蹲，烟开雾合，水泉流衍，物产滋丰。有庙宇五百处之多。宛平县西诸山，近者卑者，便与登眺。一泉一石，皆为名胜。远者深者，亦易瞻仰。西山大利，全在煤田，以供京师烟火百万之炊爨。森林果树之饶，犹为尽兴也。”北京西山之胜、之奇、之美、之饶，通过前代学者留下的笔墨文字，可知可叹矣！正如康熙《宛平县志》所说：“西山，（北京）城西三十里。发脉于太行，拱护京邑。层峦积翠，叠峰环青。梵宇琳宫，何止千百。春夏之交，晴云碧树，花气鸟声，秋则乱叶飘丹，冬则积雪凝素，帝里大观，莫是为最。”

但是古人所说的西山，范围较小，界限也模糊不清，大体是就门头沟区、石

景山区、海淀区的山地而言的。我认为北京西山的范围应该明确地界定，南起拒马河、北到居庸关这之间的山地，都应是北京西山，行政范围涉及房山区西部、门头沟区全部、丰台区西部、石景山区西北部、海淀区西部、昌平区西部。

的确，北京西山有许多诱人神往、令人陶醉之处，历史文化积淀极其深厚，值得称道，值得游往。现分十个方面对西山历史文化择要介绍如下。

## 一、北京西山的古人类

早在20世纪20年代，国内外的考古学家在房山县（区）周口店龙骨山的洞穴中，首先发现了距今约五六十万年的古人类骨骼化石，被命名为“北京人”。之后，于1930年又在龙骨山顶部洞穴中发现了距今约两万年的古人类骨骼化石，被命名为“山顶洞人”。1973年，考古学家又在龙骨山东南角的新洞中发现距今约十万年的古人类骨骼化石，被命名为“新洞人”。从周口店龙骨山已发现的“北京人”“新洞人”“山顶洞人”的古人类骨骼化石来看，这里在五六十万年前至两万年前的漫长历史岁月里，是旧石器时代古人类连续生息繁衍的地方，具有重大科学意义。1961年，周口店北京猿人遗址被公布为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不仅在房山周口店地区的洞穴中发现旧石器时代的人类遗存，在门头沟区的前桑峪村、王平村、灰峪村、燕家台、珠

窝、齐家庄、西胡林等地，也曾发现属于旧石器时代的古人类股骨化石或动物骨骼化石及一些石器。1966年在门头沟区参加农村“四清”运动的北京大学地质地理系的学生于东胡林村附近的黄土台地，首先发现了古人类骨骼化石，后经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北京市文物研究所、门头沟区文物管理所等单位考古人员分头或联合多次进行考古发掘，不仅发现了多具人骨化石以及墓群、灰坑、石器、陶器、骨器、蚌器等，还发现了用螺壳、骨骼制作的项链、手镯等装饰品。在这里生活居住的古人类被命名为“东胡林人”，属于新石器时代早期的古人类，距今10000~9000年。“东胡林人”遗址的发现和发掘成果，填补了北京地区新石器时代古人类发现的空白，对于研究华北地区的环境变迁以及人地关系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此外，在房山区镇江营、丁家洼，门头沟区大东宫，昌平区马坊、雪山等地，也都发现属于新石器时代的文化遗址，并出土了一些文物。

可以说，从五六十万年前到五六千年前的史前时期，在北京西山中生息繁衍的古人类就没有间断过。他们都是中华民族的祖先。

## 二、北京西山的古道路

道路，不论在平原上还是山区，都是人们在漫长的历史岁月里，通过南来北往、西去东回的交往中踏辟出来的。通观地理形势，古代进出北京西山的道路，从南向北数，主要有如下的几条：一是从房山区的张坊进山，沿着拒马河谷，经十渡至蒲洼等地。二是从房山区坨里进山，循着大石河谷，经河北、长操、霞云岭等，可到大安山及涑水野三坡等地。三是从门头沟区的石门营进山，经苛萝坨、秋坡等地，可去戒台寺、潭柘寺等。四是从门头

沟区大峪进山，循着门头沟经官厅、千军台等，可至大安山、雁翅等地。五是从门头沟区三家店入山，循着永定河谷，经军庄、担礼、安家庄等地至雁翅，然后路分三条，一条往北经大村至昌平西部山区；一条西北行，经珠窝、沿河城至河北怀来、涿鹿等地；一条向西南，经军饷、斋堂、清水，可至燕家台、齐家庄、黄塔以及涑水县野三坡等地。六是从昌平区高崖口入山，向南可至妙峰山，向西可至长城、镇边城等地。七是从昌平区白羊城、兴隆口或响潭入山，西北行出长城，可至怀来县各地。昌平境内的这几条山路，在明代常常是蒙古军进出长城侵扰北京地区的通道。

除了上述几条西山古道外，北京西山古道还有很多，或长或短、或宽或狭、或纵或横地通联交织成西山中的古道网。通过这些古道，山区出产的煤炭、矿物、石材、果品等运出山区，供应北京城及平原地区居民的消费。而北京城等生产的工业和手工业产品以及平原地区生产、存储的粮食，则运进山区，供应山区驻军及百姓的生活需求。这样一来，天长日久，北京西山的古道日益突显出来。特别是因为驮运煤炭，一队队的骡马铁蹄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在古道的石面上踏出了一串串深深的、光滑的蹄窝。这些蹄窝在默默地为后人诉说着西山古道的感人故事。

## 三、北京西山的采煤业

北京西山蕴藏着丰富的煤炭资源。我于1965年10月至1966年6月初，作为北京大学地质地理系的一名研究生，曾被派到门头沟区军饷公社灵水大队参加农村“四清”运动。当时都睡在炕上，炕前有一个大的地炉，冬天烧煤取暖。有一天，煤烧完了，怎么办呢？在本村一青年人带领下，我们几个“四清”工作队队员一人背着一个背篓，拿着镐头，到村外不远的山上去挖煤，很快就挖了几背篓，背着回来

了。北京西山煤炭资源之丰富，由此可以想见。西山的煤炭主要形成于地质时代的古生代晚期的石炭纪、二叠纪和中生代的三叠纪、侏罗纪地层中，距今已有二三亿年。

北京西山的煤炭何时开始开采？没有明文记载，难以说清楚。在山西大同地区的汉墓中已有煤块出土，说明我国的煤炭开采历史悠久。《水经注·如浑水》说：“火山水注之。水发火山东溪，东北流出山。山有石炭，火之，热同樵炭也。”按，如浑水即今山西大同地区的御河，说明在永定河上游流域煤炭的开采利用已有一千五百年以上。在门头沟区龙泉务的辽代瓷窑遗址中，已发现烧煤遗迹，说明至少在辽代西山的煤已有开采利用。清末缪荃孙从明《永乐大典》中抄出的《顺天府志》，该书于“宛平县·土产”目下记载：“煤炭出城西七十里大峪山，有黑煤洞三十余所，土人恒采取为业。尝操锤凿穴道，篝火裸身而入，蛇行鼠伏，至深入十数里始得之，乃负载而出。或遇崩压，则随隕于穴。故其玷污憔悴，无复人形。然乡民藉此衣食，终不舍也。其用胜于然（燃）薪，人赖利焉。又西南五十里桃花沟有白煤十余里。”这段生动具体地叙说西山采煤人的从业形象及遭遇，有力地说明在元明时期，西山的采煤业已大有发展，并形成一定的规模，成为从业人家的生活依靠。

清末以来，随着近现代工业、铁路交通及居民生活等的需要，京西煤炭资源的开采不断向更广阔的地域和更深层的煤层发展，所以西山的煤矿在门头沟区和房山区西北部迅速增多，形成赫赫有名的京西矿务局。今后，随着日益重视环境保护与环境改善，以煤为燃料与能源的局面将逐渐被弱化，北京西山的采煤业也必将日趋衰落。

#### 四、北京西山的古寺庙

本文开篇在引述康熙《宛平县志》

文字时，说西山“梵宇琳宫何止千百”，而《大中华京兆地理志》说西山“有庙宇五百处之多”。这样的说法，似乎会让人产生有些夸张之疑。其实，一点也不夸张。

一般认为佛教传入幽州地区是在西晋时期。西晋时幽州地区出现了最早的一座佛寺，名叫嘉福寺，后改名潭柘寺，故历史上民间流传着“先有潭柘寺，后有幽州城”的说法。北魏酈道元在《水经注·圣水》篇中说：“水出（上谷）郡之西南圣水谷，东南流，径大防岭（今称大房山）之东首。山下有石穴，东北洞开，高广四五丈，入穴转更崇深，穴中有水。《耆旧传》言：昔有沙门释惠弥者，好精物隐，尝篝火寻之，傍水入穴三里有余，穴分为二……”按大防岭东首山下的石穴就是现在有名的孔水洞。从《水经注》的这段记载中人们得知，早在北魏时就有些佛门僧侣在西山地区活动。海淀区车耳营村的北魏太和中雕制的花岗岩质的佛像，也有力地说明这一点。

在隋、唐之世，西山就渐有一部分寺庙，如房山区的云居寺、万佛堂，石景山区尸陀林（证果寺前身）、大觉寺（香界寺前身）、承恩寺、龙泉寺（灵光寺前身）；海淀区的兜率寺（卧佛寺前身），门头沟区的聚慧寺（戒台寺前身）、仰山栖隐寺、灵严寺、灵岳寺、会聚寺（西峰寺前身）等，都或先或后地创建于隋、唐之世。

辽、金、元时期，北京西山的宗教事业进一步兴盛起来，新建了更多的佛刹寺庙。例如，房山区的灵严禅寺（辽称谷积山院）、永寿寺、大房山灵峰寺，石景山区的大悲寺、双泉寺，海淀区的清水院、上方寺、碧云寺、龙泉寺、功德寺，门头沟区的龙岩寺、静明寺、白瀑寺、双林寺、崇化寺、洪智寺、宝峰寺等。

明代是北京西山佛刹寺庙大发展的时期。《宛署杂记》卷20载明嘉靖中官任左都御史、时以博学、好议论著称的王廷相，在《西山行》诗中云：“西山

三百七十寺，正德年中内臣作。华缘海会走都人，碧构珠林照城郭。忆昔武王倦机务，金马门前有权竖。卖官何止金为堂，通贿能令鬼上树。六边将帅多奴贱，未挂兵符先见面。文官细琐不值钱，镇守监枪动千万。熏天气焰侔天子，嘘之者生啐即死。眼前变故如掌翻，有贿方能保无事。南海明珠不足尚，西域珊瑚斗寻丈。九州珍宝集京都，遂使私门敌内帑。人间富贵尔所有，不虑生前虑死后。高坟大井拟王侯，假藉佛宫垂不朽。凿山九仞平如席，殿阁翬飞照云日。已请至尊亲赐额，更为诸僧求护勅。东林画壁千步廊，西林莲台七宝妆。南庵日月低浮图，北寺虹霓垂石梁。金银何算委沟壑，夜夜中天生宝光。释迦释迦尔亨会，慈悲反受豪华累。土木横起西山妖，忍见苍生日憔悴。”这首诗深刻揭露了明中后期朝政的腐败，突出表现在太监们的权势太大，金钱太多，他们“不虑生前虑死后”，争相创建或重修寺庙，以致“西山三百七十寺，正德年中内臣作”。所以，在北京西山现存的佛刹寺庙中，以明代创建或重修的最多。如石景山区的福惠寺、法海寺、灵光寺、证果寺、双泉寺、承恩寺、广禧寺、大慈寺、翠云庵，海淀区的弘教寺、宝藏寺、遗光寺、普照寺、兴善禅寺、褒贤寺、莲花寺、西竺寺、妙觉寺、黑龙潭龙王庙，门头沟区的大悲庵（天泉寺前身）、峰口庵、吉祥庵、宝林寺、万寿禅寺（戒台寺），丰台区西部的福生寺等。

有清一代，北京西山的寺庙进一步增多或翻新。例如石景山区的长安寺、灵光寺、三山庵、大悲寺、香界寺、证果寺、皇姑寺、承恩寺、慈善寺、兴隆寺、龙泉寺、永济寺、万泉寺、大慈寺，海淀区的碧云寺、大觉寺、十方普觉寺、实胜寺、静福寺、普照寺、遗光寺、宝藏寺、兴善禅寺，等等。

总之，从西晋出现嘉福寺开始，北京西山寺庙经过千余年的发展，至明清时达到高潮，数量最多、规模最大、景象最

盛。清末及民国间，北京西山寺庙处于衰落状态，许多寺庙毁坏，只留下遗址或相关的碑刻。现在，北京西山仍存的寺庙作为历史文化遗产得到各级政府的高度重视和有效保护，有的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如房山区的云居寺，门头沟区的潭柘寺、戒台寺，石景山区的法海寺、承恩寺，海淀区的碧云寺、卧佛寺、大觉寺等；有的被列为市级文物保护单位，如石景山区八大处的一些寺庙。有的则被列为区级文物保护单位，如石景山区的双泉寺、皇姑寺、龙泉寺等。

此外，明、清时期西方的传教士进入北京西山从事传教活动，并修建教堂。在门头沟区的后桑峪、张家铺、曹各庄等地都有清代建的天主教堂。

在谈到北京西山的古寺庙时，不能不说一说妙峰山的庙会。妙峰山在门头沟区东北部边界，山北即昌平区高崖口镇属地。山的主峰海拔1290.7米，是北京西山东部山区的最高峰。明代的一些太监集资在该山主峰下一处台地上建了一座碧霞元君庙，初名天仙庙，俗称娘娘庙，因清初香火很盛，而改称金顶娘娘庙，成为我国北方“泰山娘娘”的信仰中心和民间宗教活动的中心。清末民初，妙峰山金顶娘娘庙的庙会日益兴盛。每年四月，自初一至月中，来自四面八方、远及百里之外的进香者，络绎不绝，主要从四条山路即南道（由三家店行）、中道（由大觉寺行）、中北道（由北安河行）、北道（由聂各庄行）涌向妙峰山。人们“盘旋而上，势如绕螺。前者可见后者之顶，后者可见前者之足。自始迄终，继昼以夜，人无停趾，香无断烟。”这是当时人对妙峰山娘娘庙庙会胜景的描述。1925年，中国大史学家、民俗学开创者燕京大学顾颉刚教授等，以极大的热情亲自考察了妙峰山娘娘庙香会，考察结果结集，以《妙峰山》为题出版。从此，京西妙峰山更加成为海内外学者和人们关注的圣地，获得了“中国民俗学发源地”的殊荣。

## 五、北京西山的古村落

村落就是村庄，是从事农耕人们的居住地。中国自古是以农业立国的国家，农民是人口的主体。因此，中国的村落的发展历史悠久，北京地区也不例外。

据我国的历史传说，是炎帝神农氏始创农业。大量的新石器时代考古成果证明，大约在七八千年前甚或更早，农业生产活动就已在我国广泛出现，在一些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的发掘中，出土大批石磨盘、石磨棒、石斧、石凿、石铲、陶器以及陶质猪头、羊头和粟、稻等粮食遗存，就是无可辩驳的证据。既然新石器时代农业生产已经出现，那么，从事农业生产的人们所居住的村庄也就随之形成。在北京西山地区，已发现多处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如在房山区的镇江营、丁家洼、檀木港，门头沟区的东胡林、大东宫、卧龙岗，海淀区的苏家坨等地，都发现有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换句话说，在这些地方或附近大约五六千年前或七八千年前就已有村落出现。

据房山云居寺石经题记得知，大房山东麓的一些村落如甘池、南郑、北郑、尚乐（上洛）、独树、张坊等村庄，在唐代都已有了。石景山区的庞村也见于唐代墓志。后经辽、金、元时期的发展，西山中的古村落就更多了，有的已成为著名的旅游景点。例如：

门头沟区的爨底下村，因村北有名为爨里安口的峡谷要塞，村居其南，故名爨底下。村落建在向阳山坡上，房舍院落层层升高，错落有致，建筑古朴别致，整个村庄形同扇面，颇有山村特色。村中的一株古松、两株古槐展现出该村的古气。改革开放后成为北京郊区最早出名的古村落旅游点，已入选第一批中国历史文化名村。

同区的灵水村，四面环山，站在南山上俯瞰，村形如同一只灵龟。该村的灵泉禅寺据说建于汉代，可见该村之古老。不但古老，而且文风兴盛，有“举人村”

之称。在明清科举时代，该村出过22位举人，2位进士，10余名国子监监生。民国初年，6人毕业于燕京大学。这在封建社会时代的农村中是罕见的奇迹。该村入选第二批国家级历史文化名村。

同区的牛战村，应称“牛站”。《元史·兵志四·站赤》记载：中书省所辖腹里各路站赤，除陆站175处，水站21处外，还有“牛站”2处，牛306只，车60辆。”所谓“牛站”，当是在山区因道路狭窄、曲折、起伏，不便骑马往来，故设牛站，用老牛拉破车的形式以通驿传。从门头沟区（元属宛平县）斋堂、清水、军饷等地经沿河口到塞外是一条重要古道，在这条道路上设置牛站是情理之中的事。后来牛站演变成“牛战”。

房山区十渡村，在区境南部拒马河北岸。因从张坊沿拒马河上行，要在这里第十次蹚水渡河，村因以得名。辽已成村，村坐落在河畔阶地上，大致呈三角形。村南卧龙山中有一巨大“佛”字。1943年八路军六战士在村北老帽山阻击战中同日寇英勇搏斗，最后弹尽粮绝，宁死不屈，跳崖就义，事迹颇同电影中的狼牙山五壮士。这里秀丽的自然山水远近闻名，是著名的旅游地。

除了上文几个典型例证外，在西山之中还有许多古老村庄，如门头沟区的火村、法城、柏峪、琉璃渠等，就不一一详谈了。

## 六、北京西山的古陵寝

北京西山，有山有水，是风水宝地；又离京城不远，所以有些帝王、官员以及其他名人死后便在西山建立陵墓。这是北京西山多有古陵寝的重要原因。

首先，金王朝的帝王陵设在良乡县（今属房山区）西的大房山云峰寺下。《金史·海陵纪》云：贞元三年三月乙卯，“命以大房山云峰寺为山陵，建行宫其麓”。同年五月乙卯，“命判大宗正事

（完颜）京等如上京（在今黑龙江省阿城），奉迁太祖、太宗梓宫。丙寅，如大房山，营山陵”。六月乙未，“命右丞相仆散师恭、大宗正丞胡拔鲁如上京，奉迁山陵及迎永寿宫皇太后”。八月甲申，大房山皇陵及行宫工程“启土，赐役夫，人绢一匹”。十月己卯，太祖、太宗的“梓宫至中都，以大安殿为丕承殿，安置。……丁酉，大房山行宫成，名曰磐宁”。十一月乙巳朔（初一日），太祖、太宗的“梓宫发丕承殿。戊申（初四日），“山陵礼成”，即以礼安葬太祖、太宗梓宫完毕。甲寅（初十日），“诏内外大小职官覃迁一重”（当即提升一级）。从此，大房山东麓有了金室皇陵。

《大金国志校证·陵寝制度》记载：“国初，祖宗止葬于护国林之东（在上京），逮海陵徙燕，始令司天台卜地于燕山之四围，岁余，方得良乡县西五十里大洪谷曰龙城寺，峰峦秀出，林木隐映，真筑陵之处。遂迁祖宗于此，唯熙宗葬于山阴，盖以刑余遂不入陵。”据《日下旧闻考》卷一三二，金太祖完颜旻之陵曰睿陵（一曰泰陵），太宗完颜晟之陵曰恭陵（一曰豫陵），熙宗完颜亶之陵曰思陵，睿宗（世宗父）完颜宗辅之陵曰景陵，显宗（章宗父）完颜允恭之陵曰裕陵，世宗完颜雍之陵曰兴陵，章宗完颜璟之陵曰道陵。这些金室皇陵都在大房山大洪谷。虽然陵区是海陵王完颜亮所创建，但完颜亮死后却葬于山陵西南四十里，离皇陵区较远。《金史·礼志八》记载：金世宗大定二十一年（1181年），“敕封山陵地大房山神为保陵公”。《金史·地理志》于“中都路·涿州·奉先县”条下记载：“大定二十九年置万宁县以奉山陵，明昌二年更今名。有房山、龙泉河、磐宁宫。”奉先县就是后来房山县的前身。金章宗之所以创修卢沟石桥，其原由之一是便于金帝前往大房山谒陵。

明天启年间，金陵被毁坏。《日下旧闻考》卷一三二所载清康熙皇帝《御制金太

祖世宗陵碑文》云：“惟金朝房山二陵，当我师克取辽阳，故明惑形家之说，谓我朝发祥渤海，气脉相关。天启元年，罢金陵祭祀；二年，拆毁山陵，剷断地脉。三年，又建关庙于其地，为压胜之术。从来国运之兴衰，关乎主德之善否。上天降鉴，惟德是与。有德者昌，无德者亡，于山陵风水原无关涉。有明末造，政乱国危，天命已去。其时之君臣，昏庸迷谬，罔知改图，不思修德勤民，挽回天意，乃轻信虚诞之言，移咎于异代陵寝，肆行摧毁。”清康熙、乾隆年间曾对金陵进行过适度修复，但被毁的景象仍到处可见。

明正统十四年（1449年）八月，明英宗朱祁镇亲率大军北征瓦剌，出居庸关，西至大同。在师还的路上，于土木堡被瓦剌军包围，经过激战，明军损失惨重，正统皇帝也被瓦剌俘虏北去，史称“土木之变”。《明史·英宗前纪》记载，“土木之变”发生后，“京师闻败，群臣聚哭于朝，侍讲徐理请南迁，兵部侍郎于谦不可”，朝中斗争激烈。同年九月，郕王朱祁钰即位，遥尊正统帝为“太上皇”，并定年号“景泰”。景泰元年（1450年）八月，正统帝被放回，入居南宫。景泰七年（1456年）底，景泰帝患病，不能正常主持朝政。转年（1457年）正月，在武清侯石亨、副都御史徐有贞等人的谋划下，“太上皇”复辟，建元“天顺”，将景泰帝废为郕王，迁居西内，不久死去。虽然景泰帝作为明朝一代皇帝，在昌平明皇陵区已营建寿陵，但被毁未得享受，而是以一个亲王的身份别葬于西山，其陵墓在今海淀区玉泉山北金山口，东距林业科学研究院不远。这是比较特殊的一个封建帝王陵墓。在金山口一带，除了明景泰陵之外，还有一些明代帝王妃子之墓。

北京西山除了金陵、景泰陵这两处封建帝王陵墓之外，还有许多历史上不同朝代的达官显宦、社会名流的墓葬。例如，石景山区广宁村的明广宁伯墓，模式口的明宣城伯墓、李童墓、田义墓，潭峪

村的明李荣墓、莫英墓，金王府的明泾简王墓，西下庄的明永宁长公主墓等。海淀区苏家坨镇七王坟西的清代醇亲王奕譞的园寝，香山街道向阳新村的明成化帝长子墓，东沟村西的梁启超墓，正黄旗村西的佟麟阁墓，碧云寺北的刘天华墓，卧佛寺前的孙传芳墓，北辛村的熊希龄墓等。门头沟区的斋堂辽墓，珠窝金墓，大峪村的元墓，宝林寺的明墓，陇驾庄的清墓，永定镇邓家坡的清克勤敬亲王庆惠墓，栗园庄的谭鑫培墓等。房山区二站村的唐贾岛墓，上万村金墓，青龙湖镇常乐寺村东的姚广孝墓，磁家务的清庄亲王墓，甘池村东的清敬谨亲王墓等。需要说明，这里所列举的历代达官显贵、社会名流的墓葬，仅仅是其中的一小部分，还有更多的墓葬因篇幅所限，只能在此从略了。

## 七、北京西山的村戏

戏剧，在我国有悠久的发展历史，早在宋、元时期就已达到很高的水平。例如，元代大都人关汉卿就是著名的戏剧家，曾编写杂剧60余种，与同时代也工戏曲的马致远、郑光祖、白朴三人被誉为“四大家”。后经明、清以至现在的发展，我国的戏剧益加繁荣，京剧、豫剧、评剧、越剧、吕剧、沪剧、粤剧、川剧、河北梆子等众多剧种，可谓百花齐放，百鸟争鸣，涌现出大批著名演员，成为中华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这里所谓的“西山的村戏”，是指活跃在北京西山中民间的戏曲娱乐形式。据谭怀孟著《京西戏曲杂谈》，早在明末就有人称村戏为“花戏”，意思是戏曲多种多样，品类繁杂。就门头沟地区来说，曾有过河北老调、山梆子、柏峪燕歌、苇子水秧歌、蹦蹦戏、评剧、皮影戏、河北梆子、文明戏9种村戏，现在只存在山梆子、柏峪燕歌、苇子水秧歌、蹦蹦戏4种。其中，柏峪燕歌、燕家台梆子、田寺梆子、西斋堂梆子、苇子水秧歌、淤白蹦

蹦蹦戏等，是门头沟区最具特色、最有代表性的村戏。门头沟的村戏内容大都反映神话、爱情、婚变、抗争、军事等方面的故事。

唱戏就要有戏台、戏楼。一般地说，各村的戏台、戏楼都建在村内不同神庙山门的对面，这样就使民间的祭神活动与唱戏娱乐同兴起来，相得便利。一个村要搭建戏台或戏楼是全村的公益之事，所以村里不管大人孩子都会自觉地为之出力，哪怕只是递一块砖、搬一块石头，大家都会主动地干，这已成为各村的风气习俗。由于门头沟的村戏较普遍，所以戏台、戏楼也比较多，几乎大一点儿的村庄都有。圈门窑神庙戏楼，东斋堂关帝庙戏台，灵水南海火龙王庙戏台，沿河城老君堂戏台，张家庄龙王庙戏台，马栏观音寺戏台，大村娘娘庙戏台，小龙门龙王殿戏台，李家庄药王庙戏台，柏峪老爷庙戏台，燕家台五道庙戏台，西胡林九圣庙戏台，田庄清茶山娘娘庙戏台，琉璃渠关帝庙戏台等，尤为著名（但后五处戏台已毁）。例如圈门窑神大戏楼，创建于明代，是京西规模最大的戏楼，台中悬挂着清道光年间制作的黑底金字大匾“歌舞升平”。旧传每年腊月十七日是“窑神爷”的生日，因为门头沟地区煤窑较多，所以，这一天要举办盛大庆贺“窑神爷”生日的活动，由各窑主摊钱，唱戏三天。转年正月十五日，则是大祭窑神之日，各村便请花会和戏班子演出，连续三天，笙歌不断，热闹非凡。门城地区还有庆瑞戏园、西辛房戏园、艺园戏院、春和戏院、全家福、和平路戏园、团结剧院、国民剧院等，都是民国年间修建的，是京西戏剧艺人的重要活动舞台。

在京西的戏班中，“京都六和班”原称“斋堂六和班”，在清末及民国间是名气最大的京西戏班，主要唱“山梆子”，又称“大戏”，能演出全套杨家将、三国戏及水浒传。不仅在当地及石景山、顺义、通县、昌平等地演出，还远到河北涿鹿、怀来、涑水、赤城等地演出，甚至名

扬皇宫，“京都六和班”就是咸丰皇帝的题名。

## 八、大安山行宫和玉河县

《旧五代史·僭伪列传二》记载：“（刘）仁恭嘯傲蓟门（即今北京城的前身蓟城），志意盈满，师道士王若讷，祈长生羽化之道。幽州西有名山曰大安山，仁恭乃于其上盛饰馆宇，僭拟宫掖，聚室女艳妇，穷极侈丽。又招聚缙黄，合仙丹，讲求法要。又以埴泥作钱，令部内行使，尽敛铜钱于大安山巅，凿穴以藏之，藏毕即杀匠石以灭其口。又禁江表茶商，自撷山中草叶为茶，以邀厚利。改山名为大恩山。”按，大安山在今房山区北部，北与门头沟区接壤。为了供应大安山的需要，刘仁恭便将蓟县西部划出，另设一个县，名曰玉河县，属幽州。至辽代则属南京道析津府。《辽史·地理志四》记载：“玉河县，本泉山地。刘仁恭于大安山创宫观，师炼丹羽化之术于方士王若讷，因割蓟县分置，以供给之。在京西四十里。户一千。”金代废玉河县，其地并入宛平县。那么，五代时刘仁恭始设、辽代仍存的玉河县，其治所在哪里？

《辽史》只说“在京西四十里”，但不及具体位置。关于玉河县城所在，文献古籍中多有记述，例如，《大元混一方輿胜览》卷上有云：“玉河城，宛平南二十五里。”按，这里的“南”当为“西”之误。

明《永乐大典》本《顺天府志》于“宛平县·古迹”部分有云：“玉河城，城在（北京）城西南三十五里，故老相传金章宗游幸宿顿之所，因立县曰玉河。今遗址尚存。”按，这里根据故老相传说是金章宗时立玉河县，误。

《读史方輿纪要》卷十一云：“玉河废县在（顺天）府西四十里。本蓟县地，五代时刘仁恭置。《辽志》：‘仁恭于大安山创宫观，师炼丹羽化之术于方士王若

讷，因分蓟县置此县以供给之。’辽亦为玉河县。今废。”

《光绪顺天府志·地理志九·村镇一》在记述宛平县村庄时，谓（宛平）治西“三十五里古城村，亦呼城子村，或曰《方輿纪要》所谓玉河废县在（顺天）府西四十里者，当即近此”。按，这里所说的古城村是指石景山区的古城。

总之，元、明、清时，人们对玉河县每有议论。现在，也有一些学者关注和探索玉河县所在，最著名的是原首都博物馆馆长、文物考古学家赵其昌先生。1983年，他撰写了《辽代玉河县考》一文，发表在《北京史苑》第一辑，后收入其文集《京华集》中。文中明确地说：“今天北京门头沟区的城子村，就是当年玉河县城旧址。”此外，也有人认为石景山区的古城村应是玉河县治所。

对于玉河县治所在门头沟区城子村或石景山区古城村的观点，我想还有进一步研究的必要。从各方面分析，我认为玉河县城在今门头沟区东南隅永定镇的东、西辛秤处更合乎实际。理由有三：

首先，东、西辛秤二村，本是东、西新城。《宛署杂记》卷五在记述宛平县西部的村庄时说：“石景山左径八里曰曹各庄，又二里曰冯村，又三里曰上安村（今作上岸），又五里曰新城，又三里曰卧龙岗，又三里曰小园村，又三里曰石门营，……”《光绪顺天府志·地理志九·村镇一》也说，宛平县西“四十三里新城村，张家庄，四十四里栗远园、卧龙岗，四十五里小园村、上岸村，四十七里石门营”。按，这些村名除“新城”之外，其他仍在沿用，都在门头沟区永定镇。与这些村名临近的现有“东、西辛秤”二村，毫无疑问，“辛秤”就是“新城”，音同而字异。这说明在今东、西辛秤村处应有一座城址。

其次，《日下旧闻考》卷九五引《国门近游录》云：“过长店冈而西有县村，疑即古玉河县故址。”按，这里所说的

“长店冈”应该就是卧龙岗，其西不远便是“东、西辛秤（城）村”，曾称“县村”。所以，《国门近游录》的作者怀疑这里就是玉河县故址。当然，《国门近游录》也提到“唐时幽州管内尚有广平县，亦分蓟县置者。所谓县村，究未定何县也”。我想，视石景山区之“古城”或门头沟区之“城子”为唐广平县故址，则名、实更符合。

再者，刘仁恭置设玉河县是为了供应大安山。大安山在今房山区北部。从前往大安山的交通道路状况考虑，玉河县在东、西辛秤（城）处也较为合理，因为由此向西南，穿过今丰台区西部、房山区东北部的低山丘陵，即到今房山区磁家务，然后循圣水（今大石河）而上，便到达大安山，路顺易行。如果玉河县在门头沟区的城子，向西南到大安山需要翻越几座高山，路险难行。

根据如上理由，我主张玉河县治所应在东、西辛秤二村处。

## 九、中国地质科学的摇篮

地质学是研究形成地球的物质和地壳构造，以探讨地球的形成和发展的一门科学，是近代兴起的重要学科之一。虽然我国古代的学者在学术论述中也涉及地质学，如宋代沈括在《梦溪笔谈》中就有17条涉及地质学及矿物学，但是，现代意义上的我国地质科学还是近现代才兴起的。1912年，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实业部矿物司设地质科，科长是我国近现代地质事业的奠基人章鸿钊。章鸿钊先生于1914年夏带领学生在八达岭一带进行地质调查实习，留下了在北京西山地区踏勘地质的足迹。1916年，中华民国政府农商部地质调查所组织13名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的地质专业学生为毕业实习到北京西山进行地质考察和绘制地质图。其中，高才生叶良辅将这次实习成果编写成具有重要科学意义的地质著作，名曰《北京西山地质志》，可以

说这是我国第一部区域地质志。这部地质学专著不仅领先搞清了北京西山的岩石、地层、地质构造、矿产等，而且确立了某些地质时代的标准地层，坚实地奠定了北京西山地质研究的基础。

凡是学过中国地质学的人都知道，上元古界（按元古界是地层系统的第二个界，又称元古代，约延续了六亿年，这个地质时代已有大量含碳的岩石形成，后期地层中已见有低等生物化石，有一套标准地层，称为“青白口系”，就是以门头沟区青白口村附近出露的典型地层命名的。在青白口系地层中，又分为“下马岭组”“南大岭组”“窑坡组”“龙门组”“九龙山组”“髻髻山组”等不同的地层剖面，这些低一层次的标准地层剖面，也都是以它们所在的附近门头沟区一些村落命名的。

当地球发育进入新生代的第四纪（已延续约一百万年，现在仍属第四纪），地壳和动植物界已具有现代的样子，而且人类登上了地球发展史的舞台。第四纪不仅经历过多次冰川期，而且出现黄土堆积，形成黄土地层。黄土是砂粒、黏土和少量方解石的混合物，呈浅黄色或黄褐色。我国的黄土高原是世界有名的黄土地带，有的地方的黄土层厚度达二三百米。黄土地层的标准剖面在北京西山中门头沟区的马兰村，被地质地貌学家命名为“马兰黄土”。马兰黄土广泛分布于我国华北和西北地区。

此外，石景山区东北部有晚三叠纪的地层，以杏石口一带的地层最典型，被命名“杏石口组”。

可以说，北京西山是我国近现代地质科学诞生地和成长的摇篮。

## 十、北京西山的革命光辉

北京西山，群峰连绵，山间谷地多多，古道条条，自古是兵家用武之地。早在5000多年前，中华民族的始祖黄帝便与

炎帝战于西山之后的阪泉之野、涿鹿之野，经过多次激战，最后黄帝战胜炎帝，又擒杀蚩尤，于是建都涿鹿（在今河北怀来县东南五十里之古城）。在其后的岁月里，由于民族间的交争，有些朝代如北齐、隋、明等，都曾在西山多处修筑长城和城堡，在门头沟区、昌平区西部山中都有长城，门头沟区有东斋堂城、沿河城，昌平区有长峪城、白羊城等。这些城堡都曾是历史上驻军之地。

中国共产党早期就在北京西山中开展革命活动。今门头沟区的上清水、东斋堂、青白口、田庄、门头沟、军庄、大村等地，都曾是中国共产党的早期开展革命活动之地。

1937年7月7日，日寇在卢沟桥宛平城对中国驻军发动进攻，史称“卢沟桥事变”，又称“七七事变”，这标志着中华民族的全民族的抗日战争开始了。在八年抗日战争和相继的三年解放战争时期，北京西山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武装力量的重要根据地。

1938年春，八路军将领邓华率一一五师一部挺进北京西山斋堂地区，建立平西抗日民主政权。同年5月，八路军将领宋时轮率一二〇师一部到斋堂川，与邓华部会师，组成八路军第四纵队，在平西、冀北对日寇开展游击战。1939年初，八路军一二〇师副师长萧克、马辉也率部来到斋堂川，成立冀热察挺进军，挺进军司令部曾驻斋堂、马栏、黄塔等地。可以说，北京西山曾是八路军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的核心地区。在这里有着许多可歌可泣的抗日

故事，特别是长期战斗在平西的老七团。据门头沟区委编的《八路军·冀热察挺进军》一书的记载：“1942年，日本侵略者对我抗日根据地实行惨无人道的‘三光’政策，七团奉命在平西根据地粉碎敌人的扫荡和破坏，展开反蚕食、反封锁的全面斗争。通过组织武工队和发动群众，采取长途奔袭、里应外合、化装巧袭、长期围困等灵活机动的游击战术，拔除敌蚕食据点，袭击敌运输车队，在游击运动中消灭敌有生力量。由于七团的四处出击，使敌伪大为恐慌，不得不撤出据点，许多伪军人心动摇，有的还倒戈反正。”

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北京西山的山前山后曾是平津战役的重要战场。北京西山的解放军、党组织和广大人民群众为北平的和平解放做出了重要贡献。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这首令全中国人振奋和自豪的歌，就诞生在北京西山中，具体地说，是诞生在今房山区霞云岭乡的堂上村。1943年秋天，年仅19岁的晋察冀边区群众剧社成员曹火星满怀对中国共产党的热爱和抗日激情，在堂上村创作了这首中国男女老少都会唱的歌曲。在2016年7月4日的《北京晚报》上，刊登了题为《霞云岭响起的礼赞》一文，介绍了《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这首歌曲的诞生过程。这首著名歌曲的诞生是北京西山革命活动的光辉事例。

（作者为北京市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

# 破“壬辰多水”论

于德源

2012年是中国农历的壬辰年，这年北京的暴雨、山洪、泥石流灾害最为严重。这场特大暴雨全市平均降雨量170毫米，城区平均降雨量215毫米。房山区河北镇降雨量460毫米。受灾面积1.6万平方公里，受灾人口190万人。道路、桥梁、水利工程多处受损。民房多处倒塌，几百辆汽车损失严重。7月21日白天至22日凌晨，北京城遭遇自1951年有气象记录以来最凶猛、最持久的一次强暴雨，城内多条路段积水严重，房山区等北京郊区县引发严重泥石流，灾情惨重，后经确认北京境内有数十人在此次暴雨中遇难。

关于北京7·21特大暴雨成因，气象专家的观点是：河套气旋暖锋触发不稳定能量释放，在北京地区产生强对流系统，形成中尺度对流复合体，使得降水强度成倍加强，是北京地区产生特大暴雨的主要原因。东南气流中地形抬升作用对降水有增幅作用，北京7·21暴雨是多种因素叠加所致<sup>①</sup>。

然而，正当人们为这场严重灾害遭受的损失感到沉痛，北京市政府为了灾后恢复正常的生产秩序和生活秩序全力以赴的时候，社会上却冒出了“壬辰多水”的说法。北京某家报纸在采访新闻中写道：“某先生告诉记者，早在清朝康熙五十二年阴历六月，有一天外面正下着大雨，康熙皇帝触景生情，对身边的大臣说，‘昔年壬辰年、癸巳年，应多大雨。’当年正好是壬辰年，转年则是癸巳年。又过3天，雨还继续下，康熙对身边的人又举了

几个例子，说顺治十年癸巳年，北京地区雨大成灾；万历二十二年壬辰年，大雨；明朝成化九年癸巳年，北京地区也是大雨。康熙举的3个例子在《清实录》上都有记载。某先生当时正在做北京市科学规划办公室的一个课题（按，是3个人的合作课题）——北京历史灾害研究，康熙皇帝的这番话引起他的重视，于是他把秦始皇以来一直到现在，按照60年一个甲子的规律，总结出2000多年里大概有37个甲子，然后从各种史书中找壬辰、癸巳年期间的天气情况，结果显示在这两年中发生水灾的概率高达80%以上。也就是说，在北京历史上，只要逢壬辰、癸巳年，80%以上都是雨水成灾。这个概率是很高的。2012年就是壬辰年，明年就是癸巳年，所以我在1996年的文章中就明确的预报了这一点。”这位先生引用的《清实录》原文是这样的：“昔言壬辰、癸巳年应多雨……朕记太祖皇帝时壬辰年涝，世祖皇帝癸巳年大涝，京城内房屋倾颓。明成化时癸巳年涝，城内水满，民皆避居于长安门前后，水至长安门，复移居端门前。”其实，这条史料本身就有问题，清太祖是努尔哈赤的庙号，壬辰年是明万历二十年（1592年），是努尔哈赤拥父祖十三副遗甲举兵后的第10年，当时所据还只不过是建州（今吉林通化、集安）一带，因此所谓“太祖皇帝时壬辰年涝”与北京地区根本无关。《明实录》中，这一年北京地区也没有关于洪涝灾害的记载。世祖皇帝是清顺治皇帝的庙号，癸巳年是顺治十年

(1653年)，这年六月以后北京确实发生了洪涝灾害，但是在这年的春季北京同时也还发生了严重的春旱，应该是旱涝兼作年。明成化癸巳年是明宪宗成化九年（1473年），这年北京地区并没有洪涝灾害的记载。真正发生巨大洪涝灾害的是在成化六年（庚寅，1470年）。康熙皇帝述及的当时北京城内情况和明代史书记载的成化六年北京城内情况大致相同，但成化六年既不是壬辰也不是癸巳。由于这年的灾害后果一直持续到成化十一年（乙未，1475年），可以肯定是康熙皇帝在说史时出现了错误，史官据圣言而录，当然不会去订正皇帝的错误。但就是这样一条错误百出的史料却被这位先生认为是可靠的依据，并说自辽、金至今共有18轮壬辰、癸巳年，除辽、金3轮不见水灾记载外，其余15轮中水灾占83.33%，也就是12个壬辰、癸巳年，可见应验率之高。因此，大胆预报下一轮的壬辰、癸巳年即2012年、2013年将是多雨水大的年份。其实，北京地区受季风的影响，旱涝往往同在一年，即以这位先生说的顺治十年来说，《清实录》记载：“顺治十年四月壬子，谕内三院：‘今年三春不雨，入夏亢旱，农民失业……著顺天府官督率所属竭诚祈祷。’[又]谕内外法司各衙门：‘朕念上年京师畿辅水潦为灾，夏秋俱歉，米价日贵。今三春不雨，入夏犹旱。’”只是这年六月以后才大雨绵绵，以致淫雨成灾：“闰六月庚辰，谕内三院：‘兹者淫雨匝月，岁事甚忧。都城内外，积水成渠，房舍颓坏，薪桂米珠……甚者倾压致死。’礼部奏言：‘淫雨不止，房屋倾塌，田禾淹没，请行顺天府祈晴。’”<sup>②</sup>在这位先生自己参加撰写的《北京历史灾害研究》中，其在“清代北京旱灾简要年表”里也把顺治十年列为“重旱”，而在“清代北京水灾简表”又把这同一年列为“特大水灾”。可见这应该是水旱交替年。过去这位先生曾说他统计过15轮壬辰、癸巳年，但笔者统计的结果，其中至少元、

明、清11轮壬辰、癸巳年中就有5轮是水旱交替年，2轮是单纯旱年，2轮无灾年，1轮灾种不详年，单纯洪涝只有1轮。如果将水旱兼作年归计入旱年计算，则旱年占64.64%；如果将水旱兼作年归计入洪涝年计算，则洪涝年占54.55%。像这样的数字游戏能算做科学研究的态度吗？更何况《清实录》除了仅有的关于这句话的记载之外，其他各朝各代的官、私记载中都没有相似的说法，而且就是康熙皇帝说这句话时的五十二年（癸巳，1713年），北京也并没有发生水灾，他自己也认为只是一种可能而已。笔者这样说，并非凭空臆测。因为在君权神授的观念下，只有帝王才能够直接得到上天传达的意志。所以如果真的有“壬辰多水”，洪水泛滥的信念，清王朝必定会订立制度，在这两个年份举行祈禳，就如预测将出现日食一样，但事实上并没有。况且，遍阅浩瀚大清历朝实录，除此一处之外，再无第二句，那么何以数百年之后，这么一句话却被今人拣起来作为千古不易的信条，并据以作出多年的预测来了？只因为康熙皇帝的一句“昔言”，再加上赶巧的2012年（壬辰）的北京特大暴雨，就对此更加坚信不疑？这无疑是错误的。须知，无论是在自然发展还是社会发展的过程中，都是存在着人们一时无法解释的偶然现象，这正是朴素唯心主义产生的原因。几千年来，占卜术之所以得以存在，绵绵不绝，其原因也就在于此。算命先生的预测一旦偶然和事实沾上了边，那自然就被深信不疑，至于其他那么多不沾边的事情就都有意或无意的置之脑后了。我们要知道，自然灾害的发生是多种自然因素相互作用的综合结果。而且，各个灾害系统之间和灾害系统与环境系统之间都存在相互作用的关系，尤其是相互诱发、加强的关系。那种认为灾害发生周期就像转盘似的循环的观点是极为有害的，误己误人。

诚然，科学研究确实可以做出预测，但那要付出艰巨的努力，要有正确的

方法，要舍得花笨功夫，仅靠道听途说或一叶障目都会出笑话。就以从秦始皇以来的2000年来说，所谓壬辰、癸巳年多水，那又是以什么地方的降雨为标准呢？如果说是今北京地区的话，那么史书中关于今北京地区气象灾害可是从西汉才有记载的。如果说是以各个时期的帝王所在都城的降雨为标准的话，那又不免陷入君权神授的泥潭。著名气象学家竺可桢先生的学生张丕远先生曾说过，竺老在阅读大量中国史籍和地方志时曾有一个印象，即中国大陆往往北方旱时，南方涝；南方旱时，北方涝。但因为没有找到合理的解释，所以也只是提出这个现象。他并没有由此就下结论，北方旱时南方就一定涝，反之亦然。笔者认为，这才是真正科学、严谨的态度。可是在科学史上，有成就的科学家在某个问题上出笑话的也不罕见。例如，牛顿就因为找不出地球自转的原因而转向神学，认为是上帝给了地球一脚造成的。我国著名的一位科学家，也曾从增加农作物光合作用可以增加产量的角度出发，仅用计算尺推演了一下就得出可以亩产万斤的结论。可是他却忘记了一个基本的事实，一万斤粮食需要种多少庄稼，区区一亩地插得下这么多庄稼的植株吗？

我们说“壬辰、癸巳多水”的说法荒谬，还在于它的出处并不是人们多年以来出于生活经验的积累而形成的民谚。民谚如“八月十五云遮月，正月十五雪打灯”等，虽然也十有八九不应验，但毕竟源于人们的生活和人们对于自然的观察。可是“壬辰、癸巳多水”却是出于阴阳学的五行学说，纯粹是占卜术的无稽之谈。按照五行的说法天干“壬”在五行中属水，且为江河湖海之水，为大水。地支辰龙在五

行中属土，在四大墓库（辰、戌、丑、未）中属水的墓库。既然壬本身是水，又遇辰龙水库，因此就认为壬辰应当是大水肆虐之年。所谓墓库，顾名思义就是坟墓与仓库，原为萨满教（按，这里说的萨满教是指原始社会时期的萨满教，不是指清代萨满教）占卜时的星象名词。至于癸巳，阴阳五行中天干之癸属阴之水，地支之巳属阴之火，是水火相克。所谓相克也是五行学说术语，指金、木、水、火、土五种物质之间互相制约和排斥的关系。因为壬辰在属相中是龙年，所以又因此有壬辰水龙年的说法，说什么辰是龙年，所以壬辰是壬骑龙背，称水龙年。然而，实际上在民间“水龙年”是被称为水旺之年，在民俗中是寓意“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并没有“多水”一说。至于把“壬辰、癸巳多水”和《易经》强拉硬扯，更是无知可笑，《周易》根本与此不沾边，翻遍《周易》也找不到与此相关的词句和思想。

对于“壬辰多水”的观点，笔者之所以要一再批驳，就是因为这样的错误如果仅仅是个人的一个小小的失误也就罢了，可是一而再、再而三地不加思考地向社会广为宣传，若被执政者采纳，那危害就难以想象了。亩产万斤就是一个例子。

①孟雪峰等：《河套气旋发展东移与北京7·21暴雨的关系》，《气象》2013年第12期。

②《清圣祖实录》卷二百五十五，康熙五十二年六月己丑。

（作者为北京市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

# 北京西山八大处史迹述略

陈 康

北京是世界文化古都，它的大文化是由诸多文化元素：永定河文化、运河文化、长城文化和西山文化构成的。北京西山被称为“太行之首”，它“内接太行，外属诸边”，自西南至东北环拥京城，连峰叠嶂，绵延数百里，山间“林麓苍莽，溪涧缕错”，展现出它的雄奇和秀美，形成了“右拥太行，北枕居庸”之势，西山又兼“其物产甚饶，古称神皋奥区也”。故古人称“西山，神京右臂，太行山第八陔，图经亦名小清凉”<sup>①</sup>，足见其所处位置对北京城之至关重要。

北京西山又有西山和小西山之分，八大处位于小西山的中心地带，这里是“山势至此，冈垅盘回，风气郁积，有林木泉源之胜，无市廛轮鞅之喧，实藏真之福地，栖禅之幽境。”<sup>②</sup>在八大处的三山间，佛寺林立，晨钟暮鼓、梵呗声声，俨然是一个佛国世界。

## 一、清凉佛界四平台

八大处的文化也是由诸多文化构成的，其一，佛教文化成为了它的主体文化，是因为八大处因佛教而兴盛，追溯八大处的历史，最早可到隋仁寿（601~604）中，相传：有卢师自江南驾一叶扁舟循永定河溯流而上，曰“船止则止，船至崖下止，遂崖居。”<sup>③</sup>兴建了八大处地区的第一座寺院——尸陀林，八大处是佛教圣地，悠悠千余载，历久变迁，几经兴废，有记载的寺庙三十六处，今完

整保存下来的有八处佛寺。

民国时有位学者田树藩（1885~1966）曾言道：“八大处因八刹而得名，实则此地名四平台，游人重古迹，来者意在八刹，故以八大处名之，而略本地之名。”<sup>④</sup>田树藩认为，八大处名字是外来的游人所起，逐渐四平台被遗忘了，反倒是八大处（的名）叫响了，成为远近闻名的一处胜景。而四平台村名由来，则是因传昔日四平台村有一石台，台面如桌，曾有十六才子在此席地赋诗，故当地人称四平台。

八大处之名源于“三山八刹”，在今八大处名出现之前，明代曾称为“八佛社”。灵光寺塔院内20世纪70年代尚有多座僧塔，原有古镜禅师塔，塔上额曰“示现沙门灵光堂上第二代住山，八佛社主古镜禅师明和尚寿塔”，可视古镜为八大处八处佛寺之主（图一）。清代还有“八大禅处”“八大刹”之称，成书于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震钧著《天咫偶闻》中有“八大处”条曰“翠微山、四平



图一 古镜禅师塔塔额

台，八大刹所在也。八刹者，长安东居西山之麓，为初地也，寺左缘山而上，不一里则灵光寺也。寺最得地，且点缀亦佳，游者多宿此，再上，北为大悲寺，西为三山庵，皆不甚宏。又上，则龙泉寺，门外蹬道曲折，长松蔽日。寺中水一池，泉声铿锵，龙所潜也。寺后轩阁随山为高下，可远瞩。又上半里，为香界寺，山之主刹。凡殿阁五层，蹬数百级，无平地矣。又上里许为宝珠洞，则至顶。洞前有敞榭，一目千里，共七刹也。下山越洞而北，山之半有证果寺，即碧（秘）摩（魔）岩也。面对峭壁，下俯绝涧。西山最佳处。寺亦兼奥如旷如之致，为八刹最。”<sup>⑤</sup>

综上所述，无论何时，什么名称，八大处的历史都与“八”和佛教有关，可见此地早已有八处寺院的说法。但今天所说的八大处之名，则要晚至民国中期方才逐渐统一，最早是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出版的马芷庠著《北平旅行指南》和田树藩著《西山名胜记》中载有“西山八大处”和“八大处”一节，稍晚成书的《故都变迁纪略》于民国三十年（1941年）出版，书中说“循万安山山趾而南，有卢师山与平坡山，亦名翠微山并峙，诸寺鳞次，以八刹最有名，故俗称八大处。”

实际上八大处远不止今天仅存的八座寺院，从历代的史料来看，八大处在历史上先后建有至少四十二处寺庙，明万历年间的诗人冯有经作《嘉禧寺山楼》，诗云“峰峰开丹碧，四十二兰若”之句。清人查嗣琛《杏石口》诗也有此说：“金碧四十二，苍茫一万重；乱云遮不断，来去是晨钟。”

明代的八佛社与今天所说的八大处八处寺庙不完全吻合，明代时翠微寺与灵光寺并立；而宝珠洞则是建于清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元代所建大天源延圣寺在元朝时是作为一座皇家家庙，因此寺院的规模是有严格的规定，明洪武八年（1375年）毁于颍川侯傅有德，明代称“……

有寺，曰卢师寺，正统十一年，更名清凉”<sup>⑥</sup>。清时仍存在，据云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八国联军炮轰灵光寺时殃及到清凉寺，被夷为平地。从目前已经清理的遗址来看，它有完整的院墙，寺院四角俱建有角楼，原有寺院基础保存完整，从目前筹备修复的清凉寺规模来看，堪称为八大处的第九处寺院。

八大处是世界佛教的圣地，是因为在八大处二处灵光寺招仙塔内供奉有释迦牟尼灵牙一颗，相传释迦牟尼在拘尸那迦城（今印度迦夏）“荼毗佛身时，全身悉为细粒之舍利，其一分之牙齿不损，现形在灰烬中，是云佛牙舍利。”<sup>⑦</sup>佛牙是南北朝时由高僧法显从西域于阗带来中国的，从法显携佛牙入中国到辽咸雍七年（1071年）瘞入招仙塔前，其间有600年，它的流转过程大约是：

公元5世纪法显回国后，秘藏佛牙15年，至齐永明七年（489年）献于定林上寺。隋灭陈后，豫章王杨暕自扬州持佛牙入京（长安），至唐僖宗因避黄巢而携佛牙奔蜀，孟知祥献于后唐明宗李亶，佛牙由蜀入洛（今洛阳）。后晋时僧可肇携佛牙由洛到汴（今开封）。契丹攻陷汴京，佛牙被胁裹北上，因辽太宗薨于栾城（今河北栾城），法物星散，后为北汉所得，由僧善慧保存。宋灭北汉时，流入燕京（今北京），为辽皇室所得。辽咸雍七年八月，置佛骨（牙）于招仙浮图，据清于敏中考证：

“寺后有塔，十层八棱，俗称画像千佛塔，绕塔基有铁灯龕十六座。”<sup>⑧</sup>（图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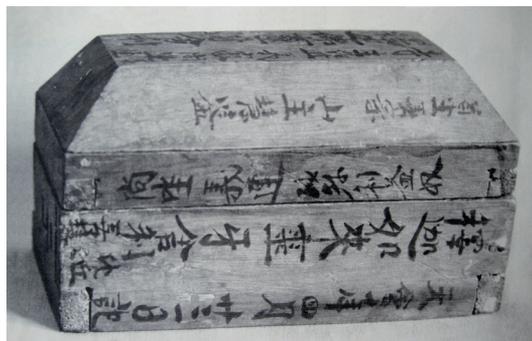
清光绪二十六年因义和团



图二 辽招仙浮图塔

在灵光寺设坛，八国联军炸毁招仙塔，翌年，僧人在收拾残塔基时，于瓦砾中获得一石函，石函内有一盞顶式沉香木盒，木盒各面都有墨书题记，其中最重要的是“释迦佛灵牙舍利，天会七年四月廿三日 善慧书”。天会七年（963年）为北汉睿宗年号。同时出土的还有一石露盘，上刻“大奈（辽）国尚父令公承（丞）相大王燕国太夫人郑氏造，咸雍七年八月日工毕。”（图三、图四）

西山八大处自卢师“一苇渡江”，创建尸陀林以来，八大处便与佛教结下了不解之缘。在现存八刹中，隋建尸陀林在唐代时易名为感应寺，久居八大处的田树藩先生在《西山名胜记》中说：“寺在唐以前，曰‘尸陀林’。唐天宝八载始建寺，曰‘感应’。”明代改名证果寺



图三 辽天会七年灵牙舍利



图四 辽代石露盘

（图五）；唐肃宗乾元元年建六处平坡大觉寺（香界寺，图六）；建于唐代宗大历元年（766年）有二处龙泉寺（灵光寺，图七）；三处三圣庵建于金代天德



图五 西山证果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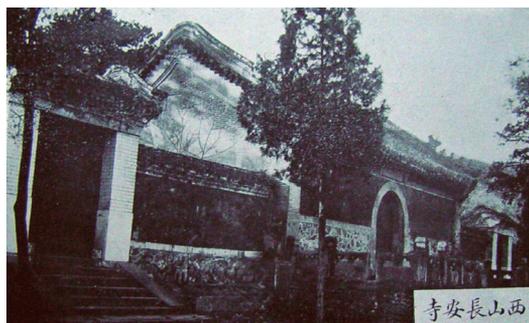
图六 西山香界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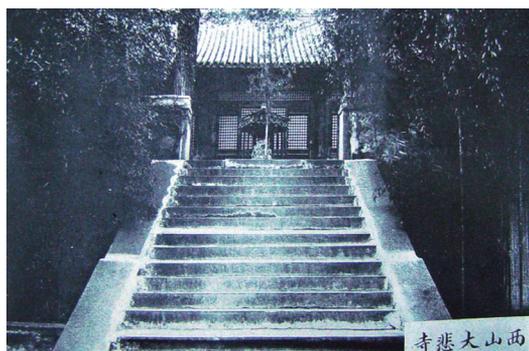
图七 西山重兴寺



图八 西山三圣庵



图九 西山长安寺



图一〇 西山大悲寺



图一一 西山龙王堂



图一二 西山宝珠洞

三年（1151年）（图八）；明代所建的有：一处的长安寺肇建于明弘治十七年（1504年），初名善应寺（图九）；四处大悲寺（图

一〇）、五处龙王堂（图一一）；七处宝珠洞建于清乾隆四十六年（1780年）（图一二）。其他有规模的寺庙尚有：元代所建的大天源延圣寺，明代的嘉禧寺、宏德寺、洪福寺、福惠寺、何家庵、狮云庵，清建的韬光庵等。

古人云“天下名山僧占多”，八大处也不例外，八刹的历史悠久，历代高僧如云，金代有曹洞宗的道崇、通圆懿公；明代有临济宗古镜明公；清代南山律宗第五世上教宣荣。贤首宗（华严宗）有：海岫桂芳、达天通理、圣安、法安等。

八大处的高僧通晓佛法，达天通理大师在三山庵潜心著书，有《楞严指掌注疏》，其徒心兴作有《山居揆要》《五经会要》《八识规矩摘要》三部佛学著作，称为“翠微三要”。圣感寺霁仑超永著有《五灯全书》。

其二，明代姚广孝就八大处说过：“平坡最幽胜，真学佛者所宜居，好游之士所必至也。”八大处所处为西山余脉的小西山，为西山的褶皱山地，构成八大处的三山，其地质构造是由石英岩和砂岩构成，历经千万年的自然侵蚀、地理地貌变迁，形成了今天的峰峦突兀、怪石嶙峋的地形，在距今二二百万年的西山第四纪冰川期作用下，造成了八大处被流水切割的低山凹地，今天在五处龙王堂和六处香界寺之间还留存有第四纪的“冰川漂砾”。八大处之东、西、北三面有翠微、虎头、青龙三山环峙，南向是一望无际的阡陌桑田，形成了“青龙、白虎保翠微”之势。

八大处三山形胜景自天成，有四时不同天、十步不同景的奇幻之妙。民国时弃官经商、退隐的田树藩久居八大处，对它的神韵有深刻的感受，他醉心于翠微的林泉溪谷，品味四时的如画美景，他认为“（八大处是）盖有山而无刹，则牛山濯濯，无古迹可观矣；若徒有山有刹而无林泉之美，是只有古迹而无风景。惟此处既有三山，复有八刹，……八刹之外，尚有十二景，有画意，有诗情，其足以令人心

神愉快者，较之游览八刹古迹，犹有特殊之风趣焉。”<sup>⑨</sup>八大处的十二景涵盖了三山的四时八节之风韵：一日三刻的晓日、夕照、夜月任人体味。十二景有：绝顶远眺、春山杏林、翠峰云断、卢师夕照、烟雨鹃声、雨后山洪、水谷流泉、高林晓日、五桥夜月，深秋红叶、虎峰叠翠、层峦晴雪。

## 二、帝王驻蹕三山间

八大处在西山中“峰峦峭异，林壑秀美，梵刹若棋布星罗，晨香夕灯，钟鼓之声相接，梵呗之韵相连<sup>⑩</sup>，其景色幽美，梵刹星罗，闻名遐迩，以致成为帝王的游息之地，最早可追溯到辽道宗时，咸雍七年供奉佛牙的招仙塔建成后，“咸雍七年八月辛巳，置佛(牙)于招仙浮图，罢猎，禁屠杀”<sup>⑪</sup>。可见，此地辽晚期已经成为了皇家的佛门禁地了。

当八大处再次受到皇家青睐时，已经到了元代。作为草原游牧民族的蒙古人，仿北宋建神御殿的做法，有在寺院建帝后御容的习俗，《宋史》载“景德四年二月，诏西京建太祖神御殿。”元在大都城内的大圣寿万安寺内也建有神御殿，供奉的是元朝帝后御容画像。

从泰定帝起，“泰定三年二月丙申，建显宗神御殿于卢师寺，赐额曰大天源延寿寺，敕以金书西番字藏经”。显宗名甘麻刺，封为晋国国王，为泰定帝也孙铁木耳的父亲，他在成宗大德六年(1302年)去世，英宗遇弑，也孙铁木耳即位，是为泰定帝，他追尊甘麻刺为光圣仁孝皇帝，庙号显宗，并在八大处的大天源延寿寺的神御殿内供奉显宗御容，并改名为承华殿。著名的政治家、文学家王恽(1228~1304)作过承华殿诗三首。其一《题显宗承华殿墨戏》云：

“大青小青雨龙种，承华墨戏真人。  
春思欲见升平事，立仗归来不动尘。”  
寺中又供奉有明宗御容，明宗孛儿只

斤·和世㻋(1300~1329)是武宗长子，文宗之兄，其在位仅八个月，是元代诸帝中在位最短的皇帝。至元六年(1340年)顺帝在八大处建明宗神御殿，“至元六年四月诏大天源延寿寺之明宗神御殿碑。”此碑是由元朝著名文学家、书法家揭傒斯(1274~1344)所撰。从泰定三年至至元六年(1326~1340)八大处有十几年时间，成为了元代皇帝重要的活动场所，泰定帝、文宗、惠宗曾多次到大天源延寿寺祭拜先帝御容，从史籍记载来看，有：

(1)“泰定四年冬十月癸卯，命帝师作佛事于大天源延寿寺。”<sup>⑫</sup>

(2)“(天历二年十一月丙辰八不沙皇后)请为明宗资冥福，命帝师率群僧作佛事七日于大天源延寿寺”<sup>⑬</sup>。八大处的历史上，大天源延圣寺是三山诸寺中规模最大，有二十四院之称。

明代帝王与石景山的关系密切，表现在明代帝王祭祀八大处的大小青龙上。

《古今图书集成》中收罗了很多各地关于大小青龙的传说，山西五台山的青龙传说与八大处的大小青龙传说相似，青龙显灵，最初出自唐天宝年间，但北京八大处的青龙传说有根有据，西山八大处久有大小青龙行雨的传说，在八大处八处证果寺山门外有神潭阿耨达池，“龙潭在卢师山，深广丈许，上有巨石覆之，其下深不可测，有大青、小青二龙潜于此。二龙出则云气随之。岁旱，祷雨辄应，历代相传，俱有封号，立庙于潭上，岁时祭祀。”<sup>⑭</sup>(图一三)

明代时，朝廷礼部已正式将大小青龙神祀典纳入国家的祭祀仪式中，正式名称为“大小青龙神，祭祀北京西山卢师山尸陀林秘魔崖龙潭大小青龙。”

洪熙改元时，仁宗曾亲自召证果寺主持福海进宫，询问大小青龙之事。“洪熙元年二月乙卯，以久旱得雨，封大青龙为弘济大青龙神，小青龙为灵显小青龙神。”仁宗并特颁祭文曰：“朕倦倦念犹悯黎庶，今东作之初，雨泽不降……，以



图一三 证果寺龙潭“阿耨达流”石刻

祈甘露，神之福民，功恒赫。”到宣德时，于宣德二年（1427年）再加封大青龙为辅国广泽善行真功宣德济民大青龙王。小青龙为佐国溥泽积行崇功施德利民小青龙王。”宣德七年（1432年）三月，以久不雨，遣顺天府尹李庸祭大小青龙之神，其文曰：“今春已暮，农务方舆，而雨泽未降，宿麦不滋，朕为生民，夙夜在怀，特用祭告，惟神明彰感通，早霈甘澍，以慰民矣。”<sup>⑤</sup>英宗正统九年（1444年）夏四月，雨泽愆期，遣太师英国公张辅祭告于寺观城隍及大小青龙神曰：“朕忧念民艰，靡皇宇处，特遣祭告，尚祈神化昭彰，早降甘澍，以慰民主。”<sup>⑥</sup>

大清自顺治入关，定都北京，有十帝，其中四帝曾登临此山，康熙在位时至少曾来过八大处有十次之多，关于康熙亲临此山，他曾亲撰碑文中披露过“朕万几有暇，七校偶过，省耕省敛，时驻蹕于斯山。”<sup>⑦</sup>此碑刻于康熙十七年（1678年），康熙时年二十四岁，即康熙登基第十七年时，他已经有七次到过八大处了。

西山八大处是北京西山的组成部分，海淀境内的西山，在清代成为了皇家园林范围，建有三山五园，康熙对近在咫尺，位于小西山的八大处情有独钟，他在《御制圣感寺碑文》中说翠微山是“北极神京，西山胜地”。康熙年间在六处

香界寺左建有行宫院，行宫院是一处幽静的院落，北侧为敞轩，是康熙、乾隆帝后听戏、观舞、品茗、赏月之所。康熙所题“敬佛”碑由来，在八大处有一个著名的传说：某年，康熙下榻香界寺时，一日清晨，在院内散步时，突然脚下一软，跪倒于地，便命人掘地，果然掘出一碑，碑上刻“大悲菩萨自传真像”（图一四），便亲笔书写了“敬佛”二字，今此碑仍矗立在香界寺院内（图一五）。

乾隆以一个政治家的雄才大略，认识到西山对于北京城之重要性。

他也曾八次来山赏景，初游是在乾隆十二年（1747年），便写下了长达500字的《六月朔日自香山游圣感寺诸胜，即景成诗得五十韵》，堪称鸿篇巨制。他在八大处留下的御诗、题匾、撰碑、墨宝甚多，乾隆游八大处诗散见于《日下旧闻



图一四 大悲菩萨像



图一五 香界寺康熙帝御笔“敬佛”

考》《畿辅通志》《西山名胜记》等。

嘉庆在嘉庆二十一年（1816年）也曾诣八大处，作御制诗《丙子季春游香界寺遂至静宜园作》云：“省耕清蹕旋，观河咏时迈；乘黄陟崇冈，路便游香界……”御笔诗作刻于康熙“敬佛”碑碑侧。

至于溥仪来游山时，已经是民国十三年（1924年）了，距冯玉祥派鹿钟麟驱逐溥仪“请出紫禁城”仅在两个月前，溥仪是宣统三年（1911年）十二月二十五日退位的，但从1912年到1924年仍在紫禁城内过着不是皇帝的皇帝生活。因此在游山时，他的身份只是早已退位的皇帝，一介平民身份。有关溥仪游山的详情，在其师傅庄士敦的《紫禁城的黄昏》一书中有详尽的记述：“1924年8月，我陪他第一次到山里游玩，他参观了位于西山山路上的八大处寺庙群，其中一处是他伟大的祖先乾隆皇帝喜欢去的地方。”庄士敦所说溥仪参观的“乾隆皇帝喜欢去的地方”，就是六处香界寺的乾隆行宫院，陪同溥仪一起游山的有“皇后”婉容、“皇贵妃”文

秀、庄士敦、荣源和绍英等人。

灵光寺招仙塔旁有金鱼池，池中有亭翼然，名曰“水心”。金鱼池久负盛名，在咸丰初，便放养金鲤，池中有慈禧赐封神鱼一尾，历来被传为佳话，相传某年慈禧游山，一日慈禧在灵光寺时，驻足金鱼池旁，见池中锦鲤在阳光下发出五彩斑斓的光彩，如彩锦一般穿梭嬉戏，不觉神往，看着高兴，便封池中那尾最大的锦鲤为神鱼，锦鲤颇通人性，竟然围着慈禧转圈，慈禧当即摘下赤金耳环，赏给了锦鲤。

### 三、文苑英华翠微风

八大处作为一座文化之山，秀丽山色陶冶了文人的情怀，同时，文人们也培育出八大处丰厚的文化底蕴，八大处的神韵是诗人们发现的。诗词、美文、楹联这三种传统的文学形式，构成了八大处文化的三要素，绽放出灿烂、炫目的光彩。文人关注八大处，与帝王青睐八大处有密切关系，目前已知流传下来最早的是金代的翰林修撰、同知制誥黄华山主王庭筠之子王万庆所作的《中都觉山清泠、洊至、清甘泉记》诗。据明永乐大典本《顺天府志》载：“觉山，山在城西三十里，按旧志：山上有觉山寺，寺西有三泉：曰清泠、曰洊至、曰清甘。”金翰林修撰王庭筠子万庆撰《三泉记》有曰：“觉山与北之平坡、东之卢师三山相距咫尺，鼎足然，觉山寺为最胜。”王万庆是元初人，金代翰林王庭筠之子。

元代时因皇家在卢师山建大天源延寿寺神御殿，蒙元皇帝每年都要来此作佛事，满朝百官随驾前往，王恽曾随泰定帝祭拜显宗，作过三首诗。明朝时的八大处已经逐渐演变为京郊的游息之地，姚广孝、郭正域、李时勉、王直、李梦阳、何景明、冯有经等都留下了大量的诗作。

清代的诗坛在中国古代文化史上是最鼎盛的时期，尤其是康乾以来的文坛群星



图一六 香界寺乾隆御笔诗

荟萃，此时的八大处犹如是一座大舞台，这个时代诗坛的巨星几乎都登上过这个舞台，在此闪耀出夺目的光彩，这些诗人被后人称为“八大处诗人”，领衔者是康熙和乾隆，康熙、乾隆都曾多次登山，他们与慧灯古梅禅师结下深厚友情，慧灯在乾隆十三年（1748年）受乾隆诏见，乾隆帝赠《御制赠古梅诗》：“最欣净室才方丈，恰称禅僧号古梅。”乾隆为香界寺行宫院敞厅御笔题诗：

“西山至此更无山，故是以当结局处。南临平野千里余，北鲜林峦蔽太素……”的木制大匾悬于敞厅中。另有：《己巳请和游香界寺诸胜四首》《癸酉新秋游宝珠、香界诸胜，即景得二十韵》《冬日游香界寺》等诗作，乾隆戊辰（乾隆十三年）乾隆所作御笔诗三首，其一有：“极顶何来洞穴深？仙风吹送八琅音。个中疑有天龙护，时作人间六月霖。”分别以“八琅音”“天花”“轩斋”来突出宝珠洞所在为“听声、观景、佳处的三绝，乾隆三首诗刻于七处宝珠洞牌楼前北侧石壁上（图一六）。

清代的诗人中有号称“西山第一诗人”的宝廷，有在词坛绽放出绚烂光彩的“男中成容若”的大词人纳兰性德，有

“女中太清春”的顾太清，还有朱彝尊、王士禛、龚自珍、秀堃、汪笑依、樊增祥、翁同龢、陈宝琛等。

纳兰性德于康熙十七年随驾八大处行宫小憩，陪康熙同登宝珠洞，写下了《望海潮·宝珠洞》一词，有“汉陵风雨，寒烟衰草，江山满目兴亡。白日空山，夜深清唳，算来别是凄凉，往事最堪伤，想铜驼仓陌，金谷风光。几处离宫，至今童子牧牛羊”之句。

与纳兰齐名的女词人顾太清（1799～1872），正名西林太清，满洲西林觉罗氏，甘肃巡抚鄂昌孙女。太清与荣纯亲王永琪之孙奕绘（1799～1838）自小倾慕，又通好诗词唱和，而终成伉俪。奕绘于道光十五年（1835年）自请解职后，二人便寄情于山水，遍游西山。道光十六年（1836年）奕绘和太清同游八大处，二人共得诗九首，在顾太清《天游阁集》卷三中收录了八大处诗：《夜行翠微山麓遂宿龙泉庵》《次日游秘魔崖》《归路过灵光寺看古藤老松》三首。奕绘的《明善堂文集》卷十一有《由黑龙潭至香界寺》《夜宿翠微山龙泉庵》《晓起携儿女探龙口，饮泉水》《遂探秘魔崖，读觉罗雨舲崇恩芝岩庆阳及其内人题诗》《饭后过三山

庵、灵光寺》《出山，小坐长安寺后台》六首。

宝廷（1840~1890）是郑亲王济尔哈朗的八世孙，他在年少时，曾随父于八大处灵光寺读书，后又数次还居灵光寺，他对八大处充满了感情，是八大处强烈的“发烧友”。宝廷于同治十一年（1872年）作过《西山记游行》诗一首，长达2921字，堪称诗作中的长篇巨制，体兼游记、古赋而用之。他晚年时隐居八大处，钟情于三山的山水林泉，写诗无数。宝廷不仅自己爱八大处，也带动了一批跟题的诗友，堪称为“宝廷团队”。在这个诗友集体里，以翁同龢、陈宝琛与宝廷的地位及诗才最为显赫，他们被诗人王赓称为“三贤”，在王赓的《今传是楼诗话》书中云：秘魔崖题诗，只有宝廷、翁同龢、陈宝琛三位前贤的诗章值得留存。宝廷在清代诗坛中地位崇高，可与纳兰性德齐名，被称为“满族第一诗人”。他所撰咏八大处的诗都收录在《偶斋诗草》中。

宝廷在《西山记游行》中说自己“读书灵光寺，遯迹四年余。奉几奉杖日游览，山幽水秀良堪娱”。比作自己的童年是最快乐时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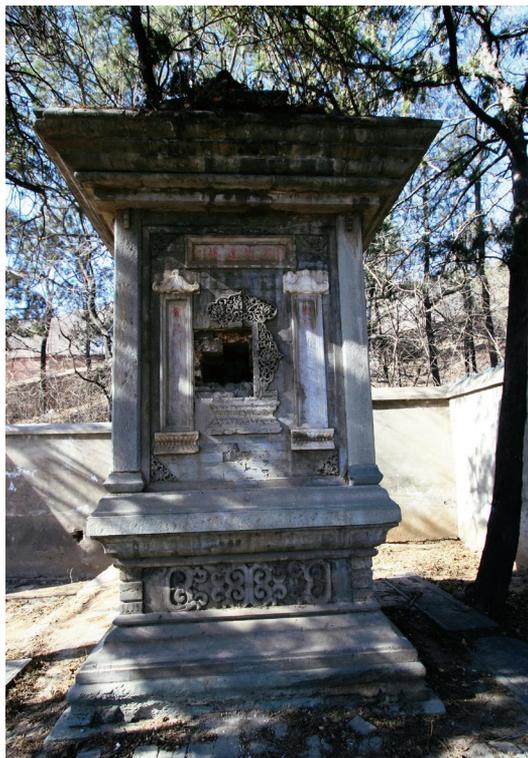
八大处还有两处著名的文化史迹：  
①二处灵光寺西韬光庵、归来庵，这里有清末民初以来达官显贵留下的墨宝。  
②八处证果寺秘魔崖题壁诗，秘魔崖题壁诗今已不存，经过文史研究者的求索和考证，可以引证出几百年来至少有上百名作者在题诗壁题书过上万首的诗。但这处题诗壁的历史还要追溯到元代，目前已知最早的是范德机《赏秘魔崖》诗，因为秘魔崖的环境清幽，又有卢师伏青龙的传奇故事，所以历代文人骚客到此无不感慨万分，诗兴大发，以清末民初时最多，著名的有汪笑侬（德克金）、樊增祥、崇恩、宝廷和他的诗友：宗韶、志润、育琛、林纾等。《西山名胜记》用了3/4的篇幅梳理出秘魔崖题壁诗，收录了清末民初的18首诗。

除了大量的碑文外，曹广端的《游圣感寺记》提到了康熙皇帝与桂芳和尚的友情，曹广端是桂芳私交很好的朋友。在赞美八大处的文章中，当数龚自珍《说京师翠微山》写得最好，通篇仅500余字，不仅写出了八大处的美，更以翠微山的松，暗喻自己的情操，以龙泉庵的四松与苏州邓尉山四松并列，言道：“邓尉之松放，翠微之松肃；邓尉之松古之逸，翠微之松古之直，邓尉之松，殆不知天地为何物。翠微之松，天地间不可无是松者也。”<sup>⑧</sup>今“翠微四松”仅余卧游阁一株了。

对联也是八大处文化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八大处的对联有三类：①僧联；②楹联；③对联。这些在历史上逐渐形成的联语，文化内涵深厚，语言典雅。

八大处是佛教圣地，历代各寺的高僧众多，八大处有多处塔院：长安寺塔院、海山塔院、灵光寺“灵庙窳堵坡塔院”、福惠寺狮子窳塔院等。长安寺塔院有僧塔两处：一是“贤首宗三十二世惠月承公老和尚”塔，额曰“窳堵遗规”，联语“空华开落归真谛，智果圆成证涅槃。”（图一七）书题为太子太傅董诰；一为“钦命万寿寺方丈、弥勒院开山、传贤首宗三十一世上量下周观公和尚之塔”，额为“常寂光中”，联曰“现身于恒沙劫中，证果在菩提树下。”灵光寺塔院有“香界堂上传贤宗三十二世慧安成公和尚愿幢”，横额“不生不灭”，联为“偶来东土居香界，此去西方认故庐”。又“钦定僧录司印堂，觉生寺主持，贤首宗三十二世崇理鉴公和尚愿幢”，额题“当机普应”，联曰“妙心常寂光无量，净土重来信有徵。”另有一塔额“寂无常照”，联云“寿徵极乐无央数，幻窳婆娑九十秋。”福惠寺狮子窳塔院的八角形门洞，上石额为光绪壬辰（光绪十八年，1892年）冬月，龄昌敬题门联云“三生慧石无量净，万古灵风窳堵坡。”

楹联，八大处历史上各处寺院的殿堂都有楹联，多为君臣、名人书题，有禅



图一七 长安寺佛塔

联、咏景联、用典联。如：灵光寺大悲殿联云“积善有徵受德之佑，笃心自守与道合符”；三山庵敞轩为长白舒穆鲁氏作“远水近山澄雾色，清风明月净禅心”；大悲寺药师殿联“不动道场，东方成丘壑；琉璃世界，西向现弥陀”；龙泉庵大雄宝殿联“佛德巍巍丽中天之杲日，慈风荡荡振大地之春雷”，为乾隆四十年（1775年）文士所题。

写景的佳联当数：灵光寺翠隐池中“冷心亭”柱联“松风荷月畜泉漱，青石白云为枕屏。”为民国岭南谭学裴所题；龙泉庵听泉小榭联“当户老松生夕漱，满山红叶入新诗”、香界寺大乘门联语“一竿竹影敲明月，半榻松风卧白云”、藏经楼院门联“万叠树山当户列，一林修竹绕溪声”极佳。

证果寺方丈院“寻僧有意来莲舍，送客无心过虎溪”联，用了“莲舍”和“虎溪”两个典故，让人回味无穷。

清末民初以来，八大处成为有权势

的贵胄、失意的官吏、退隐的将军以及文人、学者风云际会的地方，灵光寺归来庵原有七副旧联，端方所撰门联“篋有三山记，胸藏五岳图”对仗工稳，气概非凡。铁保的“较量人世无穷乐，罗列人间未有书”、刘福姚的“岩姿壑籁有神会，郢雨湘烟来画图”的文辞优美，词句灵动。宝熙有“天半朱霞，云中白鹤；山间明月，江上清风”构思精巧，意境高雅。

#### 四、波云诡谲的历史见证

第二次鸦片战争后，中国的国门洞开，各国纷纷在北京开设公使馆，洋人得以常驻北京，距紫禁城近在咫尺的东交民巷成为了洋人的使馆区。由于北京的夏天暑热异常，外国人有避暑的习惯，西山一带自然风貌，自然成为了洋人首选的避暑地，据美国驻华公使康格的夫人萨拉·康格在信中说：“康格公使是于1898年由驻巴西公使改任驻华公使，他们是经日本长崎乘“多尔克”号轮船抵达中国的。康格夫人说，美国是各国使馆中率先在八大处租房改做避暑的，之后，各国使馆、各种外国机构纷纷仿效，来此租房、建别墅，美国公使馆租的是三山庵，因此康格夫人常住八大处，由此还见证了光绪二十六年“八国联军”入侵北京的史实。

久负盛名的招仙塔800余年来，矗立在群山环抱的翠微山中，高大挺拔，明清以来，八大处开辟为游览地，招仙塔已成为了游人登塔赏景的绝佳处，留下了很多赞美的诗文，如清人汪文柏《西山记游》“翠波疑积雪，林表映斜曛。影倒遥悬崖，尖高欲刺云……”的诗句。

由于招仙塔于光绪二十六年早已毁于“八国联军”的炮火，关于辽塔的形制，今天的人只能从文献、史料来考证，最早见于清于敏中《日下旧闻考》，于敏中说招仙塔十层，百年来，他的说法引起了后代学者对它的误判，清道光中河道总督完颜麟庆《鸿雪因缘图记》中有“灵光指



图一八 招仙塔残塔塔基上的模印佛塔

径”插图，可见200年前灵光寺、翠微寺及招仙塔的实际位置。麟庆也称“（招仙塔）十层八棱”，其实有误，中国佛塔层数均为单数，未有十层之数的塔，根据招仙塔被毁之前外国人所摄老照片来看，也均见于十三层八棱，为辽密檐式塔，所谓“画像千佛塔”，今可见于残塔基上辽塔砖上皆有模印佛塔图案（图一八）。

在仲芳氏《庚子记事》一书中提到“（八月）二十四日，哄传西山灵光寺与末（磨）石口三家店一带，团民哨聚甚众，势亟张焰。今日各国洋兵连夜出城甚多，谅往迎剿也。”又据同仁堂刘辅庭的《同仁堂光绪庚子日记》记述“光绪二十六年八月二十六日，闻洋兵发往京西，抓捕拳民至四平台灵光寺。先有德兵攻打不利，后有美兵自山后攻打，一扫而光，打死拳民不少……”

英国人乔治·林奇在《文明的交锋》（*THE WAR OF THE CIVILIZATIONS*）书中有一个章节“扫荡西山”专门提到“炮毁八大处”一事：“下面有一座寺庙，寺内有座白色宝塔和汉白玉平台阶梯……就在第二天，复仇的基督徒就用炸药将寺庙炸成了废墟”<sup>①</sup>。

美国人L. C. 阿灵顿的《寻找老北京》（*IN SEARCH OF OLD PEKING*）提到了炸

毁招仙塔的是英国军队中的印度廓尔喀部队<sup>②</sup>。

招仙塔在被联军炸毁后，圣安和尚募资修复灵光寺，并保护了招仙塔残塔基，民国时还在塔基上建有咸雍亭，徐世昌题写的“咸雍亭”亭匾（图一九、图二〇）。

清末民初的八大处除洋人在此租房、建别业外，失意的达官显贵、官员、军阀、企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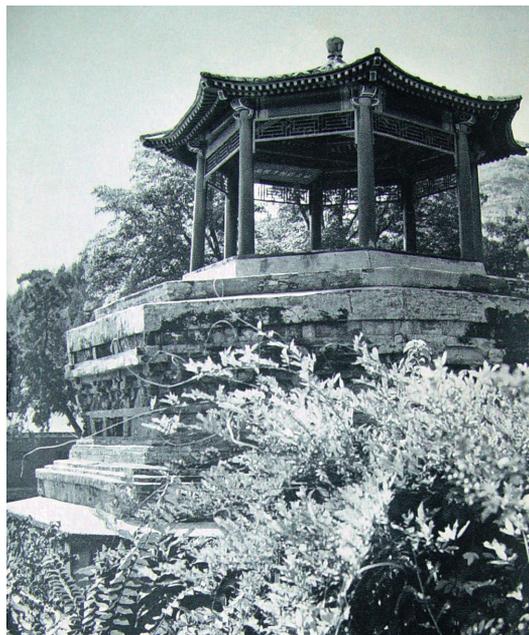
家、银行家、名人、学者也都纷纷仿效，在八大处先后建有40座别墅，这在北京某一地方集中建有如此多的别墅实属罕见，《西山名胜记》载：“当国都南迁后，平市萧条，以至何以西山别墅日渐增多，推其原因，约有数端。”田树藩先生总结了原因：“因交通便利，商贾显宦，厌倦城市喧嚣，皆欲置一别墅，时来山中以换空气。”

这些别墅大多建于抗战爆发之前的民国时期，别墅的主人多是在民国跌宕起伏的政局背景下，因各种原因来到八大处兴建别墅，如：王氏别墅主人王金钰，再如：赵庆华因1929年赵四小姐（赵一荻）偷赴沈阳与张学良同居，酿成了轰动一时的新闻，为此，赵庆华连续登报，断绝与其关系之后，弃官经商，在八大处开设西山饭店。又徐鼐霖是徐世昌总统府的顾问，在徐下台后，徐鼐霖也同时退出政界，1920年后，在八大处建造了“潜庐别墅”，并由徐世昌题写了“潜庐”二字。

《西山名胜记》记录了当时已建成的27座及未建成或尚未动工的7座别墅的详细资料，但田树藩先生的记录有诸多的谬误：①虞氏别墅：“不祥主人名字”，查《故都变迁纪略》记“虞氏别墅为虞和卿别墅。”②洪氏别墅：“在



图一九 招仙塔塔基



图二〇 残塔塔基上的威雍亭

刘氏之西，名字未详。”《故都变迁纪略》载“洪氏别墅为洪铸生别墅”，洪镛，字铸生，抗战后在汪伪政府考试院任秘书长。③友山园：“主人路氏，不祥名字”，查路氏乃为与李大钊一起就义的民主革命先驱路友于，《北京英烈传》第二集载：路友于就义后，灵柩暂厝长春寺，四年后才移葬八大处，别墅名应为“友于园”。④袁氏别墅：“为某煤矿经理袁悌庵之别墅”，袁悌庵正确名为袁涤庵，名翼，为北票煤矿经理。⑤孙氏别墅：《西山名胜记》云“为中孚银行董事长前交通次长孙壮甫之别墅”，查文献记载“中孚银行”及

“交通次长”名录中并无孙壮甫其人，实孙壮甫乃孙多钰（1882~1951），字章甫，别墅是孙多钰于民国二十三年（1934年）在八大处兴建的。⑥钟氏别墅：“未详主人名字，或云教会人钟君赐”，实别墅主人为钟毓，曾任伪满黑龙省省长。⑦钱氏别墅：“为前北京财政部次长钱俊骥”，查《北洋政府职官年表》中“各部次长年表”载：“财政部次长有钱方轼，字俊葵。”⑧陈氏别墅：“在钱氏之上……主人为陈贯一”，按八大处档案载“陈道元（即陈道一），于1923年与长安寺僧人化尘签订合同，用现洋壹仟捌佰元典该寺地二十五亩，使用期为四十年。”据考证，陈贯一应为陈陶遗，号道一。⑨冯氏别墅：“闻其主人系为河间冯氏”，冯氏系民国副总统兼代总统冯国璋，直隶河间人。⑩唐质夫地：田树藩著书时尚未建别墅，建成后名为唐家花园，查《民国人物大辞典》中有唐在礼，字执夫，为交通部护路军总司令，并无唐质夫其人。

其他还有未直称姓名的：①兰溪别墅主人：“其主人为西山饭店店东赵谿隐”，赵谿隐本名赵庆华，号谿隐，曾任交通部次长，是张学良终身伴侣赵四小姐赵一荻的父亲。②曹润田墅地基：曹润田即曹汝霖，字润田，“五四运动”的重要人物。③陈字琴地基：为陈銮，字字琴，建成后的别墅为陈氏别墅。④王氏别墅：“为王孟群之别墅”，王孟群乃大汉奸王荫泰，曾任汪伪华北政务委员会委员长职。

另外还有《西山名胜记》中没有记载的别墅5座：潜庐别墅（徐鼐霖）、上官（上官云相）别墅、曹氏别墅（曹文明）、李氏别墅（李墨阁）、李家花园（李先涛）陈氏别墅（《八大处调查报告》称：陈调元别墅在西山饭店西上坡，他是被称为民国第一涉外大案“临城火车大劫案”的重要参与者）。目前保存最好的有：孙氏别墅（孙文耀）、刘氏别墅（刘哲）。

## 五、余论

千年八大处的文化，今天得以发扬，在八大处规划的总体设计上，核心主区依托的是四平台及其两端“八”字形山脉。突出了以“四平八稳”为主题的布局。在老景区的东部营造出一个以古四平台村为中心的新景区，主要是：重建清凉寺及附属姚家寺与塔；建造新佛牙塔，突出原有三山八刹十二景，形成“两线三塔三门洞”的新局面。

①（清）吴长元：《宸垣识略·形胜》，北京古籍出版社，1983年，第3页。

②《御制重修灵光寺碑》，（明）成化十五年十一月初二日。

③⑥（明）刘侗、于奕正：《帝京景物略·西山》上》，北京古籍出版社，1983年，第271页。

④田树藩：《西山名胜记·八大处三山》，中华书局，1935年，第1页。

⑤（清）震钧：《天咫偶闻》，北京古籍出版社，1982年，第198页。

⑦丁福保：《佛学大词典》，文物出版社，1984年，第580页。

⑧（清）于敏中等：《日下旧闻考》卷一百四，北京古籍出版社，1981年，第1722页。

⑨田树藩：《西山名胜记·八大处十二景》，中华书局，1935年，第36页。

⑩《修建慧云禅林记》，清康熙六十年（1721年）五月吉旦立，古豫章临川除僮释界弘达。

⑪《辽史·道宗本纪》，中华书局，2016年，第307页。

⑫《元史·泰定帝纪二》，中华书局，1976年，第682页。

⑬《元史·文宗二》，中华书局，1976年，744页。

⑭《畿辅通志》卷二一，商务印书馆，1934年，第5805页。

⑮《明实录》宣德七年三月。

⑯《明实录》正统九年夏四月。

⑰《御制圣感寺碑文》，康熙十七年。

⑱《龚自珍全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75年，第133页。

⑲[英]乔治·林奇：《文明的交锋》，1901年，第67页。

⑳[美]L. C. 阿灵顿著，赵晓阳译，《古都旧影：65年前外国人眼中的老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1999年，第182页。

（作者为石景山区文化委员会干部）

# 京西皇姑寺历史沿革考

苗天娥

皇姑寺为北京市文物保护单位，位于石景山区西黄村，是昔日通往八大处的必经之所，是今日西山文化带上的“闪亮珍珠”。皇姑寺从明代创建至今已存在了五个多世纪之久，格局虽不完整，然而寺庙源流起伏跌宕，曲折离奇，与明清皇家宫廷的关系十分密切，在当时京西一带影响非常大，所起作用也很特殊，属于名闻遐迩的大庙。因此研究皇姑寺的发展轨迹及其历史地位很有必要，本文主要从皇姑寺遗留下来的两口铜钟、数通石碑以及两块石额，辅以文献记载，剖析并展现皇姑寺的历史沿革和发展脉络，以期抛砖引玉。

## 一、一口铜钟揭开皇姑寺的前身

据多部地方史志记载，皇姑寺建于明天顺年间，官方称敕赐顺天保明寺，简称保明寺，民间俗称皇姑寺。清初毁于大火，康熙五十年（1711年）重修，改称敕建显应寺，简称显应寺。初建时的规制是坐北朝南，四进院落，中轴线上依次为山门殿、天王殿、观音殿、老祖殿、药师殿，东西两侧有配殿、耳房等，香火极盛。清至民国曾有庙会。现存观音殿、老祖殿、西配殿、东过街楼和西阁楼，破损严重，已非原貌。

探究皇姑寺的历史必须从明英宗谈起。英宗为明朝第六位皇帝，他的帝王生活大起大落、悲喜参半，极富戏剧性和传奇色彩，是明朝皇帝中唯一有两个年号的天子：冲龄登基，年号正统，执政十四

年；己巳北征，土木之战，沦为阶下囚；放归南宫，软禁七载，名为太上皇；夺门之变，再度复辟，重坐金銮殿。在他短短的一生中，“土木之变”是他生命的转折点，而对皇姑寺来说恰恰是个前奏曲，正是这一重大历史事件改变了英宗皇帝的命运，同时也成了揭开皇姑寺神秘面纱的金钥匙。

《帝京景物略》记载：“皇姑寺，英宗睿皇帝复辟建也。正统八年（按：应为正统十四年），驾出紫荆关，亲征也先。陕西吕尼，迎驾谏行，曰：‘不利。’上怒，叱武士交捶，尼跌坐以逝。及蒙尘虏营，数数见尼，娓娓有所说，时时授上饼饵。驾返，居南宫，数数见尼，娓娓有所说。复辟后，诏封皇姑，建寺，赐额曰‘顺天保明寺’。或曰：隐也，如云明保天顺焉。后殿祀姑肉身，跌坐愁容，一媼也。万历初年，像未饰以金，顶犹热尔。姑着绣帽，制自宫中。殿悬天顺手敕三道，廊绘己巳北征之图。今寺尼皆发，裹巾，缙方袍，男子揖。”<sup>①</sup>

此段引文讲述了皇姑寺创建的由来：正统十四年（1449年），蒙古也先率军南侵，英宗在太监王振的鼓动挟持下仓促御驾亲征。尼姑吕氏拦住英宗的车驾，苦苦劝阻，谏言出师不利。英宗大怒，令军士抽打、驱逐吕氏，大军继续北征。在随后的与蒙古军队的交战中，王振刚愎自用、指挥失误，明军节节败退，土木堡一役，全军覆没，英宗被俘。沦为阶下囚的英宗身在北方荒漠中，想起吕尼的劝阻追悔莫

及，睡梦中时常听到吕尼在哭泣，有时还送来饭食，规劝皇上珍重，苦尽甘来，日后还会吉星高照、龙登九五。果然，一年后英宗还朝，尊为太上皇。经过了七年的软禁生活，再度当上了皇帝，感念吕氏当年的拦阻护驾之功，下诏敕封其为皇姑，在黄村建立皇姑寺，亲赐寺额“顺天保明寺”，甚至有的人还将寺额倒过来念，仿佛真有保佑天顺皇帝的意思，民间俗称皇姑寺。

毋庸讳言，《帝京景物略》里的个别说法是从民间传说来的，与史实有出入，如皇姑寺始建、吕尼逝世、敕赐顺天保明寺、正统皇帝出征也先等年代问题，早有景爱先生撰文做了纠正和推断，这篇论文为后学进一步研究皇姑寺历史沿革提供了不少启示。他从皇姑寺碑文考证出皇姑寺建于正统年间，而不是天顺年间；吕尼死于弘治二年（1489年）四月，而不是在谏阻时被英宗手下士兵捶死；明英宗出征也先不是在正统八年（1443年），而是在正统十四年；敕赐顺天保明寺的额不是出自明英宗，可能出自明宪宗，等等<sup>②</sup>。

即便如此，我们不能否认《帝京景物略》的重要史料价值。它成书于崇祯八年（1635年），两位作者刘侗、于奕正为了此书的真实性、翔实性，经常实地考察，走遍了京城的山山水水，为明代人记录本朝历史，大部分记载来源可信度高。因此上述记载中的三道天顺手敕、《己巳北征图》、寺尼带发修行等描述应是当时的实际情形，也表明皇姑确实和皇家关系非同一般，非一般寺庙可比拟。现存于大钟寺博物馆的两口皇姑寺历史上留下来的铜钟，可以从侧面佐证该书的一些说法还是真实可信的。

《帝京景物略》中没有提到皇姑寺的前身、具体建造年代，倒是现存大钟寺博物馆的黄村寺钟为我们提供了一丝线索。黄村寺钟，初铸于大明天顺六年（1462年），奉懿旨重造于大明嘉靖十二年（1533年）三月二十一日，钟体

高118.8厘米，钮高32.7厘米，口径97厘米，重516千克。青铜材质。蒲牢钟钮，龙头相背，龙身缠绕，栩栩如生。钟肩饰莲瓣花纹十二朵。钟腰处三道弦纹将钟分为上下两部分，钟上部牌位铭文为：“章圣慈仁皇太后，永淳长公主，庄奉夫人邢氏。”钟款识为：“大明天顺六年夏月吉日铸造洪钟一口于黄村寺。”钟体上下各有八个矩形钟栏，上部第一个钟栏内是：“大悲观世音殿永远，常住供养吉祥如意者。上报四恩，下资三宥。一切有情，同圆种智。”第二个钟栏内是：“皇图永固，帝道遐昌，佛日增辉，法轮常转。风调雨顺，国泰民安，五谷丰登，天下太平。”第三个钟栏内是：“大明嘉靖十二年三月二十一日奉懿旨重造。敕赐顺天保明寺。住持善聪，管事法连、法缘、法伦。”接下一牌位内是：“昭圣康惠慈寿皇太后。”第四个钟栏内是：“太师昌国公张，夫人周氏。建昌侯张，夫人崔氏。锦衣卫指挥张，夫人穆氏。”钟下部只有一个钟栏内有铭文：“司礼监太监王政。内官监太监刘洪、崔淮、傅浚、何禄、荆聚、杨茂。御马监太监孟升。锦衣卫千户黄秀。信官韩景。”<sup>③</sup>

这口铜钟向我们传递了至少三个信息：①保明寺之名、皇姑寺之名均出现于天顺六年之后，此前这个寺庙一直叫黄村寺，保明寺是在黄村寺的基础上扩建和改名的，皇姑寺是保明寺的民间俗称，出现应该同步或稍晚。②此钟既是以两位太后为首的皇亲国戚和以司礼监太监为首的中贵们出资铸造的功德钟，又是希望国泰民安、五谷丰登的祈福钟，暗示了这口铜钟所在寺院的背景非同寻常，与皇室关系非常密切。③此钟奉懿旨重新翻铸于毁佛佞道的嘉靖皇帝在位期间，必有隐情，这一点将在后文进一步剖析。

其他明清典籍也有类似记载，可以作为佐证：

《长安客话》记载皇姑寺：“自平坡东转，望都城，平沙数十里。中经黄

村，有保明寺，是女道尼焚修处。寺建自吕姑。吕陕人，云游此。正统间，驾出御虏，姑逆驾谏阻不听。及蒙尘虏营，上常恍惚见姑阴相呵护，皆有词说。后复辟，念之，封为御妹，建寺赐额。故又称皇姑寺云。自后凡贵家女缙髡皆居其中。有寺人司户，人不易入。”<sup>④</sup>

《日下旧闻考》记载：“宛平县西黄村有敕赐保明寺，寺中尼吕氏，陕人。正统间，驾出关，尼送驾苦谏，不听。及上还轍复辟，念之，乃建寺赐额，人称为皇姑寺。”<sup>⑤</sup>

《京城古迹考》记载：“显应寺，臣按通志，寺在黄村，俗呼皇姑寺。明正统八年（按：应为正统十四年），驾亲征也先，陕西吕尼，叩马谏而死。及复辟，肉身不毁，乃塑而建寺焉。赐额保明寺。”<sup>⑥</sup>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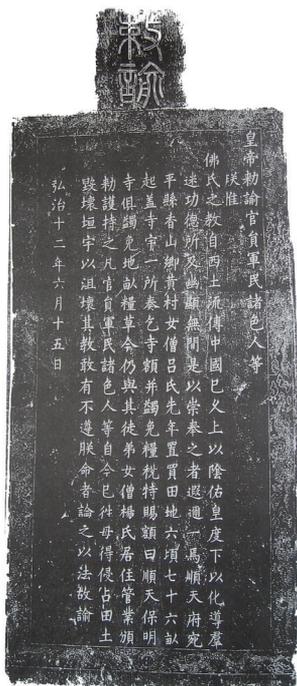
凡此种种，都陈述了一个事实：皇姑寺前身为非常普通的黄村寺，只是因为吕尼在正统十四年劝驾不要出兵和随后暗中保佑明英宗等种种事迹，英宗复辟后出于感恩，于天顺六年夏天之后在原有黄村寺寺庙基础上扩建成顺天保明寺，赐额，封为御妹（皇姑），而后民间才出现了皇姑寺的俗称。

## 二、宪宗、孝宗接连颁旨护持皇姑寺

孝宗是英宗的孙子，于成化二十三年（1487年）即位，以“孝”治天下，对乃祖、乃父留下的诸样事务，均加以继承，蠲免皇姑寺钱粮就是最典型的一个例子，而且还树立圣旨碑，可见其对祖先的敬重。碑文如下：

皇帝敕谕官员军民诸色人等：

朕惟佛氏之教，自西土流传中国已久，上以阴佑皇度，下以化导群迷，功德所及，幽显无间，是以崇奉之者，遐迹一焉。顺天府宛平县香山乡黄村女僧吕氏，先年置买田地六顷七十六亩，起盖寺宇一



图一 明弘治十二年（1499年）敕谕皇姑寺碑

所，奏乞寺额，并蠲免粮税。特赐额曰顺天保明寺，俱蠲免地亩、粮草。今仍与其徒弟女僧杨氏居住管业，颁敕护持之。凡官员军民诸色人等，自今以往，毋得侵占田土，毁坏垣宇，以沮坏其教。敢有不遵朕命者，论之以法。故谕。

弘治十二年六月十五日。<sup>⑦</sup>

此碑今已不存，但1958年文物普查时还在，北京图书馆留有拓片，额书篆体“敕谕”二字，碑文楷书（图一）。这通御制碑，撰写者是弘治皇帝，碑文中的内容值得特别注意的有两点：①这里的“先年”指代不明，到底指的是哪一位皇帝？谁赐的寺额？②吕氏为顺天府宛平县香山乡黄村女僧，与陕西吕尼是不是一个人？

针对弘治御制碑中提到的“先年”、吕氏及赐额者为谁，在此做一小考证，因为有的学者据此认为赐额者就是弘治皇帝，其实不然。

有一块皇姑寺碑至今没有引起人们的重视，那就是立于嘉靖四年（1525年）二月的《敕赐顺天保明寺碑记》碑（图二），此碑上半部文字漫漶不清，借高倍



图二 明嘉靖四年“敕赐顺天保明寺碑记”

放大镜文字依稀可辨，抄录如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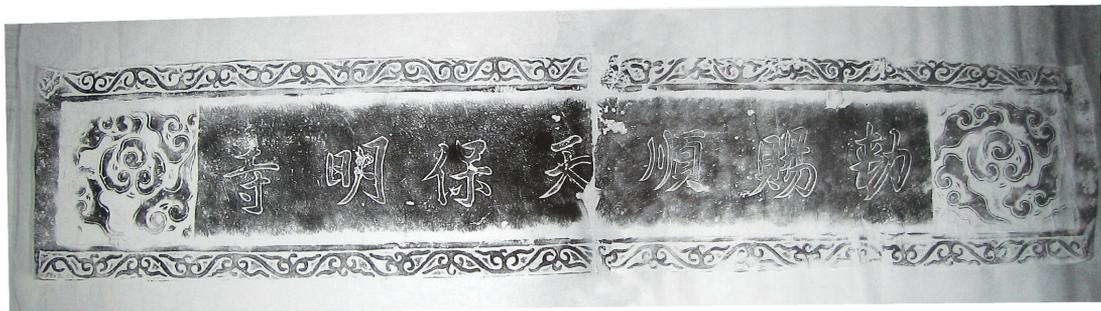
敕赐顺天保明寺碑记

阜成门外香山乡黄村有寺名曰顺天保明，盖自正统年间女僧吕氏创造，营置田地，起盖寺宇。于成化年间因请寺额，伏蒙宪宗皇帝降敕，命之□□曰：‘朕惟佛氏之教，自西土流传中国已久，上以阴佑皇度，下以化导群迷，功德所及，幽显无间，是以崇奉之者，遐迹一焉。顺天府宛平县香山乡黄村吕氏，自正统年间于此置买田地六顷七十六亩，起盖寺宇一所，朝夕焚修，至是奏乞寺额，并蠲免粮税，特赐额曰顺天保明寺，蠲免地亩、粮草。仍颁敕护持之。凡官员军民诸色人等，自今以往，毋得侵占田土，毁坏垣宇，以沮坏其教。敢有不遵朕命者，论之以法。故谕。’后吕大阐祖风，功□□□于弘治二年四月初一日午时忽无疾而卒。其弟杨氏名妙金者亦颇行洁，承师之迹，事闻于朝。先□司礼监太监陈公于弘治十一年十二月初八日，传奉孝宗皇帝□旨，黄村寺已故道姑吕氏，

置买地土并路北两处房屋，还都赏与他徒弟杨氏妙金等管业，该衙门知道，钦此。”又该司礼监太监李荣，于弘治十二年六月初五日传奉：“孝宗皇帝圣旨，黄村寺已故女僧吕氏□□寺额，□还与□徒弟女僧杨氏，该衙门知道，钦此！”仍颁□特□□□□□之时□户□□书佛经，即中郑焯钦尊并行礼工二部，顺天府将原额地土、房屋等项仍给管业。又蒙礼部□□□□住持□□□□□还与□□□□□□岁久无传，尝叩其功德主发心，立石坟前，征予以记其实，垂诸永久。因记其师吕氏，乃陕西（下缺十几个字）九年十一月十一日寅时蚤脱尘俗，于此著称。后之人欲知其始末之由，请视□□□□□□□□□□□□□□□□土房屋，复其杨氏住持等项明文，兹不复赘，具载其后。

嘉靖四年岁次乙酉十二月吉日。④

仔细分析这两块碑的碑文，发现很多新内容：尽管此碑立于嘉靖四年，但其中提及的宪宗敕谕的旨意与弘治十二年碑文中的敕谕内容如出一辙，为享有蠲免粮等特权的御敕，且特意声明是“仍颁敕护持之”，与弘治皇帝敕谕碑文中“今仍与其徒弟女僧杨氏居住管业，颁敕护持之”的意思相近，一个“仍”字涵盖了二者都是因袭先帝的意思，表示宪宗皇帝是继承其皇父英宗的衣钵、孝宗皇帝是继承乃父宪宗皇帝的遗志未加改变而已，嘉靖皇帝即位之初也是认可的，立碑就是一个明显的例证。那么是否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这两块碑文中相同的部分就是《帝京景物略》中所云“殿悬天顺三道手敕”的内容呢？如果能找到有关天顺三道手敕的记载，这个问题就会迎刃而解。然而，不管上述论断是否成立，但至少从侧面证明了一个观点：顺天保明寺额不是孝宗赐的，从“于成化年间因请寺额”这一句看应该是宪宗赐的寺额，这与《帝京景物略》《长安客话》《日下旧闻考》《京城古迹考》等文献记载中的英宗赐额似乎相



图三 “敕赐顺天保明寺”额拓片

抵触。笔者揣测可能反映的是两码事，英宗赐额只是手敕，就是有文字而无实物，而宪宗所赐的寺额恐怕就是现存于皇姑寺的“敕赐顺天保明寺”的石额了<sup>⑨</sup>（图三）。此额近年出土于皇姑寺藏经楼基址，汉白玉石质，长220厘米，宽48厘米，厚约15厘米，中刻“敕赐顺天保明寺”七字，每字14厘米左右。寺额从“天”字处断为两截。上下边框刻缠枝花纹，左右刻四合云头。寺额无落款。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两块碑中屡屡提到的吕氏和陕西吕尼是否为同一人？前文所引《帝京景物略》记载“尼跌坐以逝”，“后殿祀姑肉身，跌坐愁容，一媪也。万历初年，像未饰以金，顶犹热尔。姑着绣帽，制自宫中”。《京城古迹考》记载：“……陕西吕尼，叩马谏而死。及复辟，肉身不毁，乃塑而建寺焉。”两处文献都反映了吕尼建寺前已死，但死的方式不大一致。《长安客话》和《日下旧闻考》均没有提及吕尼的生死。弘治御制碑中提及吕氏买地建寺乞额等，徒弟杨氏继承管业，具体年代不明。《敕赐顺天保明寺碑记》尽管缺失了不少文字，但基本不影响文义，前后对照得知黄村吕氏就是陕西吕尼，于正统年间买地盖寺（此时应称黄村寺），为该寺的第一代住持，“于弘治二年四月初一日午时忽无疾而卒”，庙产由徒弟杨氏继承，是为第二代住持。

《明故顺天保明尼姑院尼师第二代住持金西白杨氏墓表铭》<sup>⑩</sup>也证实了这一点。碑

文记述杨氏俗名杨妙金，是宛平人，10岁即拜吕尼为师，她活了81岁，圆寂于嘉靖九年（1530年），从中可推算出她生于正统十四年，在十岁那年即天顺三年（1459年）入黄村寺跟随吕尼学佛，由此可以断定吕尼在正统十四年拦驾时并没有像《帝京景物略》说的“跌坐以逝”或者是《京城古迹考》说的“叩马谏而死”，应该是以嘉靖四年立的《敕赐顺天保明寺碑记》中记载的“于弘治二年四月初一日午时忽无疾而卒”为准。也正是由于她的圆寂，杨妙金继承其衣钵，成为皇姑寺第二代住持。为了本寺的利益和庙产得到新皇帝的认可，杨妙金费尽心机再次请托皇室人员，于是得到了弘治十二年的御制碑，孝宗也像宪宗一样因循其祖父的成制而拟定了碑文内容，颁旨明令严禁各色人等侵占皇姑寺田产，从此吕尼创下的偌大的庙产基业得到杨妙金悉心接管和来自朝廷的强大保护，皇姑寺有了稳固的靠山。这也从侧面反映了明朝中叶土地兼并的严重。

如此看来，虽然敕赐顺天保明寺在老百姓眼里是荣名显赫的皇姑寺，有着高贵的身世，似乎不可一世；但在住持该寺的尼姑们心里，什么都明白，吕尼不是真正的皇姑，万一将来某个皇帝不认可了怎么办？所以只要新皇帝一登基，尼姑们就急着讨要皇封，为的是拿到一把尚方宝剑，来遮世人的眼，否则谁还看得上这个不是朱姓的皇姑呢？在封建社会中，皇权大于一切，有现任皇帝的亲口御封就是金

字招牌，这就是皇姑寺与别的寺庙的不同之处。不仅如此，皇姑寺的住持女僧们还极其洞悉世情，攀住了至高无上的皇帝还不算，借佛教名义普度皇宫内院中的芸芸众生，有崇佛的后妃公主，也有佞佛的太监公公们，再有皇亲国戚、达官贵人，盘根错节，互为表里，为的是牢牢站稳根基，传诸永久。看看现存的两口铜钟上近两千人的助缘人名号，太后、公主、国公、太监都有，就能想见皇姑寺初建时的繁荣鼎盛<sup>①</sup>。

### 三、嘉靖毁佛期间皇姑寺因两宫太后庇护幸免于难

嘉靖皇帝庙号世宗，在位45年，认为佛教有伤风化，异常溺信道教，幻求长生之术。在道士的怂恿和蛊惑下，登基后极力限制佛教发展，效仿历史上“三武一宗”（指北魏太武帝拓跋焘、北周武帝宇文邕、唐武宗李炎、后周世宗柴荣）大肆毁佛，罢斥僧尼，多次下令毁京师寺院。嘉靖元年（1522年）三月，纳工部侍郎赵潢之请，谕令拆毁京师内外一切佛寺、尼庵。当时在京师内外的最有名的古寺，如大能仁寺、大慈恩寺、天宁寺等，均遭破坏和拆毁，连名刹潭柘寺也不能幸免于难，皇姑寺自然也处在那场劫难之中。其中，京西皇姑寺最让嘉靖皇帝头疼，为此与两宫皇太后展开了长达十几年的拉锯战。

嘉靖帝毁佛汰尼的命令一下，顺天府立即执行，皇姑寺也在被毁之列，但由于是太后娘娘的香火院，没入官府的地产很快还回，已见《敕赐顺天保明寺碑记》中，“口土房屋复其杨氏住持等项明文，兹不复赘，具载其后”<sup>②</sup>。这是嘉靖四年之前的第一次交锋，寥寥数语道出了皇太后的胜利，太后们无疑是出面进行了干涉，否则顺天府怎会归还已经查没的土地房屋？

嘉靖皇帝对此很不甘心，因为他一心崇奉道教，佛教和佛寺是他的眼中钉。嘉靖六年（1527年）十二月初九日，礼部

尚书方献夫呈请将年老无归不能婚配的尼姑全部安置到皇姑寺居住，同时还以孝宗所建为理由，请求保留皇姑寺。但嘉靖帝执意不从，谕令全部拆毁。皇姑寺住持杨妙金使出撒手锏，和众尼姑急忙找到宫中的内线，通知她们的后台两宫太后——世宗之母慈仁皇太后和世宗皇伯母慈寿皇太后出来说情。平时两位太后矛盾很深，但在保护皇姑寺上却空前一致：慈寿皇太后认为该寺属于自己的丈夫孝宗敕建，僧尼之祖有顺天保明、奉天开极之意，坚决不能毁掉，颁懿旨保寺；慈仁皇太后认为先祖的命令不好违抗，再说当时信佛的还有不少先朝的妃嫔和皇亲国戚，对违抗祖先遗命和违背众说的做法，慈仁皇太后也不得不慎重从事，于是也下懿旨不要拆毁。这样，皇姑寺才得以幸存。太后的干预扰得皇上寝食不安，妥协之余只得与阁臣诉苦。《万历野获编》记载：“皇姑寺在京师西山，不知所始。嘉靖六年丁亥，上谕辅臣杨一清云，前有旨下部，谓尼僧与僧道不同，而尼僧寺与僧寺道观又不同。今因桂萼奏毁尼寺，已行下矣。今若皇姑寺仍留，是不去其根也。乃旨出之后三四日，不知何人哀奏两宫。皇伯母见谕，以皇姑寺为孝宗所建，似不可毁。圣母亦以孝宗为言，盖小人进祸福之言，故两宫一时传谕。次日圣母又谕欲建一寺，即将此寺与我亦好。盖此寺乃皇亲内宦供给布施，必有请告之者矣。按世宗此旨，已洞见宫掖隐情。”在两宫太后的坚决请求下，独断专行的嘉靖皇帝不得不遵从懿旨，作了让步：“既而圣谕又下，辅臣杨一清等曰，慈训两颁，宜即顺命。但惩恶务去本，方免后患。今将此寺房留于无归僧尼暂住，只着终身，不许复引其类，其祖宗时所赐敕额追回。”<sup>③</sup>庙虽保住了，但前几位皇帝敕封的护身符，即寺额是要追缴的，此招更阴毒。皇帝这么颁布了敕谕，下面怎么执行就不好说了，至今皇姑寺仍存有“敕赐顺天保明寺”石额，充分说明当时皇上的命令没有得到如实执行，

推测可能是两位太后暗中周旋的结果。

嘉靖帝的本意不仅要追回寺额，而且还想为皇姑寺改名：“是时上又下密谕阁臣曰：朕又将有意此寺额名之意，并告卿知。夫顺天保明者，明是我国朝号，此言尼僧之祖，能顺圣祖奉天开极。此惟皇天命之，何待后日以一妖尼能保大明也哉？又云皇姑者尤不好听，言我皇家之姑也。当时此寺云敕赐，不云敕建，便可见非祖宗本意也，故朕深嫉之，因与卿密知之。”<sup>④</sup>看样子嘉靖皇帝对此寺额极为不满，认为寺名与皇命天授相犯，皇姑名字不好听，想乘机捣毁寺庙。不幸这一密旨又遭泄漏，又惊动了他的皇伯母慈寿皇太后和他的母亲慈仁皇太后。两位皇太后表面上顺从了世宗，就在皇姑寺原来名字的基础上加了“道院”的名号，并以玺书加以肯定。《敕赐顺天保明寺碑记》曰：“太后重其道气，不胜延想，重赐以玺书，特加道院。”<sup>⑤</sup>这个擦边球打得好，大出世宗的意料，让世宗只好不了了之。在两宫太后的全力保护和皇姑寺住持杨妙金的精心策划下，最终皇姑寺保住了寺名，有嘉靖十二年重铸的青铜佛钟（即黄村寺钟，图四）为证，上面赫然写着：“大明嘉靖十二年三月二十一日奉懿旨重造。敕赐顺天保明寺”，而且还有两宫太后的牌位<sup>⑥</sup>。

此钟正好重铸于嘉靖毁佛后期。从大钟铭文看，此钟为懿旨重铸，也就是说奉了太后的命令。皇太后们不但传谕，而且为防止毁寺事件的再次发生，慈寿皇太后（即明孝宗的张皇后，明世宗的皇伯母）联合其兄弟昌国公张鹤龄、建昌侯张延龄、其女永淳长公主，慈仁皇太后（嘉靖皇帝的生母）也加盟，将天顺六年（1462年）黄村寺钟重新集资翻铸，等于为皇姑寺又加了一道保险。钟铭上那么多皇亲国戚姓名列在其中，使奉命去毁寺的兵卒们望而却步。最终皇帝也无可奈何，他怕背上“不孝”的恶名。靠两宫皇太后和这口铜钟，皇姑寺堂而皇之地躲过了那



图四 皇姑寺明代“黄村寺”钟

场灭顶之灾。皇姑寺第二代住持金西白（即杨妙金）的墓铭也证明皇姑寺的敕封名称未变，碑立于嘉靖十一年（1532年）<sup>⑦</sup>。如此，第二次交锋两宫太后又大获全胜，此后皇姑寺到明朝灭亡未遭厄运。

这里有必要说说两位皇太后的身世。慈寿皇太后张氏，于成化二十三年十月被立为孝宗的皇后，与孝宗情深意笃，后宫三千宠爱集于一身，四年后诞下太子也就是后来即位的武宗，张皇后的权力和宠爱达到了无以复加的顶峰，他的父亲张峦被封为寿宁侯（弘治五年张峦卒，长子张鹤龄袭封，嘉靖二年晋封为昌国公）。可是物极必反。武宗的身后无子一下把他母亲慈寿皇太后从高高的宝座上拉了下来，命运从此发生了逆转。接替武宗入继大统的是孝宗侄子、兴献王的儿子朱厚璫，是为世宗，尽管慈寿皇太后的名号仍然存在，但是身份却成了皇帝的伯母，后宫权力也在一夜之间转移到了世宗母亲慈仁皇太后蒋氏的手里。世宗自然是向着自己的亲生母亲，对有恩于自己的这位皇伯母百般刻薄，并对慈寿皇太后的两位弟弟昌国公张

鹤龄、建昌侯张延龄下入大狱，作为姐姐顾念手足情深，慈寿皇太后为此多次哀求世宗网开一面，均无果，她的晚景甚是凄凉，这是后话。之前就在世宗刚即位，“大礼仪”之争和上尊号的过程中，慈寿皇太后已经无意中得罪了慈仁皇太后，随后两人隔阂日益加深。但是，恰恰在保护皇姑寺的问题上，两人意外地达成了统一战线，弄得世宗骑虎难下。看样子，慈仁皇太后不像儿子那样一门心思斋醮炼丹、笃信道教，而是十足的佛教徒，从她消除前嫌下懿旨保护皇姑寺、并打算把皇姑寺要过来以及后来与慈寿皇太后联手重新翻铸铜钟就能充分说明这一点。

对于皇姑寺得到两位太后保护这个事实，在《明故顺天保明尼姑院尼师第三代住持张氏墓志铭》（图五）中有所反映，皇姑寺的后代住持并不讳言内廷的支持，她们在张氏的墓志中写道：“……朝廷重之，故于其师徒颁玺书而护持之，至于公侯贵戚锦衣都督及太监莫不闻风而仰德也。今上登大宝，嘉靖改元，革汰尼寺，师所住寺节蒙两宫太皇太后及三宫，后推师之德，计闻于上，加以尼姑院号而孤存之，在可见师之道口口有过于人也。”<sup>⑧</sup>这第三位住持“讳善聪，慧堂其号也，姓张氏，祖贯山东济南府乐陵县人”，生于景泰八年（1457年），卒于嘉靖二十六年

（1547年），师从第二代住持金西白杨妙金，对皇姑寺的发展亦有功劳，和她的师父一道巩固了皇姑寺的庙产。墓志所言既挑明了寺庙从一开始就拥有坚固的后台和内廷的拥趸，又不失时机地抬高了寺庙及住持的政治地位。

事实上，世宗的毁佛运动也没有得到后代皇帝的支持，他之后佛教卷土重来、东山再起，发展更益壮大：“此旨既下，其后因循至今，又八十年矣，尼僧之增日多，宣淫日甚，檀施亦日益不费矣，盖其根株俱在内廷。以世宗英断，尚不能铲除，况后世乎？自丁亥后又十年，而霍文敏为南礼卿，首逐尼僧，尽毁其庵，金陵一片地顿尔清净。霍去而尼复集，庵复兴，更倍往日矣。”<sup>⑨</sup>真乃一语道破天机，内廷就是皇姑寺的根基，就是皇姑寺的擎天保护伞。

#### 四、隆庆六年李太后率皇亲国戚虔心护寺

大钟寺博物馆除了前文提到的黄村寺钟外，另有一口与皇姑寺有关的铜钟，人们习惯叫它为保明寺钟（图六），铸造于明隆庆六年（1572年）十月，体高118厘米，钮高29.5厘米，口径94厘米，重402千克，青铜材质。钟钮为双龙头蒲牢钮，

龙头相背向下。钟肩呈弧形，饰莲瓣花纹十六朵。钟体由三道弦纹将钟分为上中下三部分，并布满铭文。钟身上所铸铭文中全部为捐资铸钟者的名字，“天地三界十方万灵真宰，敕赐顺天保明寺住持法林、归永、圆忠……”，捐资为首者是“大明慈圣皇太后李氏”，下面铸有太师成国公朱希忠、太师定国公徐、锦衣卫



图五 明故尼师聪慧堂张氏墓志铭及志盖



图六 皇姑寺明代“保明寺”钟

左都督朱希孝以及锦衣卫信官15人名字、“司礼监掌印太监冯保”“内府各衙门太监等官”，钟款为“隆庆六年十月吉日造。”<sup>⑥</sup>

此钟铭文来头不小，出资铸钟的上自皇太后、太师、大太监冯保等人，中有锦衣卫官员，下至涿州东关匠人、一般信徒。有这些皇亲国戚、中贵权宦做皇姑寺的后盾，皇姑寺可谓固若金汤，大钟具有无上威慑力，保护皇姑寺从隆庆、万历朝直至明末逢凶化吉，香火鼎盛。

这里的慈圣皇太后李氏就是号为孝定慈圣皇太后的李太后（1545~1614），涿县（今北京通县永乐店地区）人，明神宗生母。自幼聪慧机敏，善于记忆，尤其喜好书法。嘉靖二十九年（1550年），蒙古俺答劫掠通州，她随父李伟到京城躲避。嘉靖四十年（1561年），以良家女子入选为裕王朱载堉妃。次年，生一子即后来的万历皇帝朱翊钧。嘉靖帝死后，裕王登基，建号隆庆，元年（1567年），母以子贵，进为贵妃。六年，朱翊钧即皇帝位，七月尊其生母为慈圣皇太后。李太后非常崇信

佛教，在宫中因做梦菩萨授《九莲经》而自号“九莲菩萨”。北京与她有关的寺院有万寿寺、慈寿寺、拈花寺（明代为千佛寺）、长椿寺、皇姑寺、八宝山护国寺等。其中位于海淀区八里庄的慈寿寺就是李太后出资建的，《万历野获编》把它列为“京师敕建寺”<sup>⑦</sup>条里，内有永安寺塔，俗称玲珑塔、万寿塔。李太后教子严厉，又希望江山长久永固，因此，在她的刚十岁的儿子登基为天子的关键时刻，她领衔信徒1700多人捐铸了一口铜钟，就是明隆庆六年的保明寺钟。由于捐助人的特殊身份，这口钟的重要作用就可想而知，同时也使得保明寺更是声名远播，招徕更多的尼姑、信徒，香火盛极一时。

在这口钟上还有以大太监冯保为首的各宦官衙门首领人数41人和锦衣卫信官15人。宦官和锦衣卫在明朝中后期的权力和地位不容忽视。万历年间，神宗经常身居内宫不理朝政，冯保为司礼监掌印太监，内倚李太后，外接张居正，手中权力极大，张居正改革实行“一条鞭法”还是在他和李太后的大力支持下进行的，其他衙门的太监都以他为马首是瞻，他阿谀李太后出资铸钟，别的太监争相效仿，纷纷捐助，都是有头有脸的。锦衣卫是皇帝的亲信和耳目，负责侦察和揭发大臣的一举一动，十足的特务机构，和宦官互为表里、无所不能，对明代的政治、社会影响极大，他们的加入无疑提高了皇姑寺的身份和地位。

## 五、康熙皇帝顺应民意重修皇姑寺并改额显应

明末皇姑寺惨遭兵燹，清朝统治者入关未久，对待皇姑寺，善于加以利用。康熙皇帝听闻民间对皇姑寺的种种说法，觉得可以利用宗教笼络民心，于康熙五十年由朝廷出资重修皇姑寺，竣工于康熙五十八年（1719年），并改寺名为显应寺，御笔亲书寺额、对联和碑文。



图七 康熙御制《敕建显应寺》门额拓片

重修后的皇姑寺规模可观，《京城古迹考》云：“今查寺共五层。入山门，钟楼二楼。前殿天王，圣祖赐榜曰显应寺。大殿观音，赐榜曰水心柏子。联曰：片石孤云窥色相，清池浩月照禅心。后殿吕祖，即吕尼肉身，赐榜曰杖泉花雨。联曰：月在上方诸品净，心持半偈万缘空。院前御制碑文二座。”<sup>②</sup>主殿为吕祖殿，供奉祖师吕尼。清代皇帝非常重视思想上钳制百姓，康熙唯恐“顺天保明”的寺额勾起民众对前明王朝的怀念甚至反叛，便借重修之机堂而皇之地将寺名改成了“显应”，寺额为“敕建显应寺”，康熙御笔，加上那些御制各殿对联的用意，无非是让皇姑寺尼姑们安分守己，为统治阶级在思想上钳制百姓服务。

皇姑寺现存有显应寺石额（图七），质地为大青石。额面呈长方形斗状，边框凸起，中心凹下。上下边框为浅浮雕“二龙戏珠”，衬以祥云。额心石刻双钩楷书“敕建显应寺”五个大字，“显”字上方为“康熙之宝”篆字印章<sup>③</sup>。至此，皇姑寺的政治地位更上了一层，由明朝的“敕赐”（皇帝御赐寺庙名称）变成了清朝的“敕建”（皇帝出资修建），成了名副其实的皇家寺庙。

康熙御制的两通石碑，满文、汉文

各一通，原树在吕祖殿前西侧，“文革”期间被人为推倒埋在地下，近年出土后树在吕祖殿东西两侧。《日下旧闻考》录有康熙御制的显应寺碑记全文：“都城之西有佛舍一区，创自前明中叶。虽历加修葺，而岁月浸久，复毁于火，旧观既替，香界就荒，非所以崇象教、广禅悦也。朕以古刹胜因，宜规整饬，爰发帑金，鸠材董役。经始于康熙五十年十二月，落成于五十八年正月。不卑不侈，栋宇一新。答士庶敬信之忱，慰缙衲皈依之愿。用锡嘉名，颜为显应。盖以慧炬祥光，无微不显，慈云法力，有感必通。泽万品于真源，耀十空于宝智，同圆妙果，长稔福田云尔。”<sup>④</sup>

可是，老百姓不明旧里，仍旧称其为皇姑寺。《日下旧闻考》记载：“今显应寺左有屋数椽，尚悬保明寺额，内为女僧吕氏莹。莹前有嘉靖四年敕赐碑，载吕氏陕西西安豳州道安里王寿村人，碑后并刻有像。”<sup>⑤</sup>康熙御笔亲封后，也深知吕尼等住持和皇姑寺在百姓心中的地位，没有强行取缔，仍旧允许供奉、祭祀吕祖（吕尼、吕菩萨），原保明寺寺额依旧悬挂在殿堂门上。

此后，皇姑寺成为人们游玩的名胜古迹，和西山著名的弘教寺（今海淀区法海



图八 修缮后的皇姑寺观音殿

是西黄村小学的旧址，现隶属文委，石景山区文物研究所在此办公。2006年起，市、区政府投资两千多万元、三次修缮，已恢复了山门殿、药师殿和部分配殿，观音殿（图八）、吕祖殿等得到修缮，皇姑寺如今旧貌换新颜了。

寺）、潭柘寺（门头沟区）、圣感寺（今石景山区八大处六处香界寺）等并列。清《帝京岁时纪胜》载：“至于游览之地，如西山妙峰、弘教、圣感、潭柘、显应、西域、戒坛、香山碧云、法海、卧佛等寺，极称名胜。岁之四月，都人结伴联镳，攒聚香会而往游焉”<sup>⑥</sup>。引文中“显应”就是前明的皇姑寺。文人墨客也经常游赏皇姑寺，并留下了不少诗文。

清乾隆朝开始，皇姑寺的庙会规模非凡，远近闻名。香期为农历四月初一到十五，和金顶妙峰山的庙会同期，主要是到吕祖殿焚香礼拜吕菩萨（吕尼）。初一开山门，初八“佛诞日”，香客云集，人山人海，煞是热闹。除附近各村信徒外，多数是来自京东八县（旧时称谓，指通州、三河、香河、安次、武清、宝坻、蓟县、宁河八个县）的香客，除了拈香祈福、拜吕菩萨外，还有风味小吃、各种农具、日常用品等物资交流。这种兴盛一直延续到清末和民国，是原石景山地区四大庙会（指石景山碧霞元君娘娘庙会、八宝山碧霞元君娘娘庙会、天泰山慈善寺庙会、西黄村皇姑寺庙会）之一。

新中国成立后，尼姑还俗，庙会停办，塑像流失。皇姑寺一度用于办学，曾

①(明)刘侗、于奕正：《帝京景物略》卷五《西城外》，北京古籍出版社，2001年，第215页。

②景爱：《京西皇姑寺明代石刻丛考》，《出土文献研究》第七辑，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第381—391页。

③⑪⑬⑯⑰⑲⑳于孜：《皇城的晚钟》，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212—217页。

④(明)蒋一葵：《长安客话》卷三，北京古籍出版社，1982年，第60页。

⑤⑳㉑(清)于敏中等：《日下旧闻考》卷九十七，北京古籍出版社，1983年，第1617—1619页。

⑥㉒(清)励宗万：《京城古迹考》，北京古籍出版社，1981年，第20页。

⑦⑧⑨⑩⑫⑬⑭⑮⑯⑰⑱《北京市石景山区历代碑志选》，同心出版社，2003年，第12、90、91、118、122页。

⑬⑭⑰⑲⑳(明)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二十七《释道》，中华书局，1959年，第685—686页。

⑱《明故顺天保明尼姑院尼师第三代住持张氏墓志铭》，2013年出土于皇姑寺院內，现存石景山区文物研究所。

⑳(清)潘荣陛：《帝京岁时纪胜》，北京古籍出版社，1981年，第19页。

（作者为石景山区文化委员会研究馆员）

# 北京房山孔水洞金代摩崖题记新考

马 垒

房山区地处北京市西南部、华北平原与太行山脉交界地带，是北上草原与南下中原的重要通道，特殊的地理位置使这一地区积淀了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多山的地理环境为古代石匠在崖壁之上摩刻造像、题记提供了天然的物质载体，摩崖石刻就是这一现象的重要反应，其可以不用费时费力凿刻石碑，简单易行，借助山石崖壁就近刊刻，使石刻上的内容在社会上广泛并长久地流传。因此，不同朝代、形式各异的众多摩崖石刻散存于深山沟谷地带。因常年暴露于野外，受人为和自然因素的破坏较为严重，有些摩崖石刻已经漫漶不清甚至亡佚不存，及时对其进行研究整理已显得刻不容缓。

万佛堂孔水洞为大房山名胜，在大房山东北，是我国罕见的自隋至民国延续多个朝代的造像集中地，现存碑刻、摩崖石刻、佛造像、古寺庙、古塔等多种形制文物群体。古时常有探险者举篝火探之，莫究其源，隋称“仙人玉堂”，金泰和中，有桃花自洞流出，俗呼为孔水洞。洞内现存隋、唐摩崖造像、隋代摩崖刻经及金大定乌林答天锡摩崖题记。2015年11月，正值孔水洞枯水期，笔者随古碑刻研究专家张云涛老师自万佛龙泉宝殿下方一券洞进入孔水洞深处探查，看到了金大定摩崖题记，并进行了详细调查（包括测量尺寸、文字拓印，高清拍照）。题记刻字面长48厘米，宽37厘米。现存55字，竖刻共9行，满行7字。字体为楷体，长、宽均3厘米。金大定摩崖题记现存于孔水洞中隋代摩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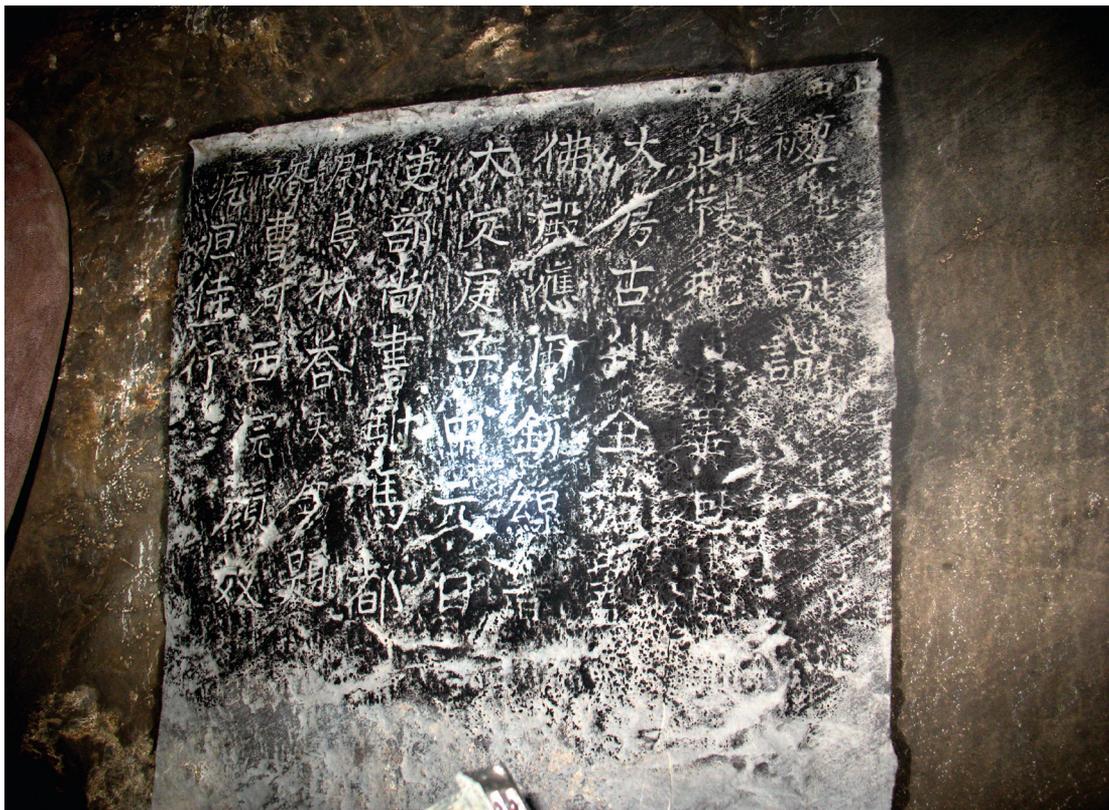
刻经西侧，依山石随意刊刻（附图），自右向左竖刻，其中右边竖行1、2行与隋代摩崖刻经西侧小字重叠。其左上角刻有经人工凿刻凸出崖壁表面的隋大业佛经发愿文。因题记常年浸泡于水中，且洞中幽暗潮湿之故，以往学者对题记释文是基于对客观实物的主观判断，因此不同的观察者对刻文的认识也不尽相同，但学者经过努力已释出数十字，实属不易。本文试图在其他学者已发表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依据更为清晰的拓本和高清照片，对题记进行重新整理。参考吴梦麟《北京万佛堂孔水洞调查》<sup>①</sup>（简称“吴文”），周峰《房山万佛堂孔水洞金代题记》<sup>②</sup>（简称“周文”），伊葆力《房山孔水洞金代摩崖题刻探赜》<sup>③</sup>（简称“伊文”），《北京辽金史迹图志》载《房山孔水洞金代摩崖题刻》<sup>④</sup>（简称“志文”），杨亦武《房山孔水洞万佛堂》<sup>⑤</sup>（简称“杨文”），《北京地区摩崖石刻》载《乌林答天锡题刻》<sup>⑥</sup>（简称“石文”）的研究成果，对刻文释文，做进一步解读，供学者深入研究参考，并请批评指正。

金大定摩崖题记录文：

書詣」山陵祀事畢迴遊」大房古刹  
全施蓋」佛殿應用釘線峇」大定庚子中元  
日」吏部尚書駙馬都」尉烏林答天錫題」  
婿曹河西完顏奴」疙疸侍行

## 一、题记释读

（1）“书诣”。二字与东侧隋代摩



附图 乌林答天锡摩崖题记

崖刻经的西面重叠。经文刻字隐约可见“上为西方被”，二字不见吴文、周文、伊文、志文、杨文、石文释文。“书，箸也，从聿者声”<sup>⑦</sup>著于竹帛谓之书。“诣，候至也，从言旨声”<sup>⑧</sup>因此“书诣”指刻于摩崖上之文字总称。

(2) “山陵”。“山陵”指埋葬金代皇帝及诸王的大房山金皇陵。吴文、周文、伊文、志文、杨文、石文均释作“山陵”，本文无异。大房山金陵的营建始于贞元三年（1155年）三月，“乙卯，命以大房山云峰寺为山陵，建行宫其麓”<sup>⑨</sup>。

“山陵，虏人都上京，本无山陵。祖宗以来，止卜葬于护国林之东，仪制极草创。迨亮徙燕，始有置陵寝意，遂令司天台卜地于燕山之四围。年余，方得良乡县西五十余里大洪山曰大洪谷曰龙喊峰，冈峦秀拔，林木森密。至筑陵之处，亮寻毁其寺，遂迁祖宗、父、叔改葬于寺基之上，又将正殿元位佛像处凿穴，以奉安太祖

旻、太宗晟、父德宗宗幹，其余各随昭穆序焉。惟亶被杀，葬于山之阴，谓其刑余之人不入。”<sup>⑩</sup>海陵王命损毁九龙山下旧寺，迁太祖、太宗、德宗及梁王改葬于旧寺基址之上，经过大金国几代帝王的营建，形成了以九龙山太祖陵区为中心，环布凤凰山诸陵、连泉顶东峪之裕陵及道陵、诸王兆域、陵区行宫等规模庞大的陵寝建筑。

(3) “祀事毕”。意思是按规定举行的山陵祭祀之礼完结之后。《说文解字》：“祀，祭无己也，从示已声。”<sup>⑪</sup>“事，职也。从史之省声。”<sup>⑫</sup>“毕，田罔也。从聿，象毕形微也，或曰由声”<sup>⑬</sup>，吴文、周文、伊文、杨文、志文均释作“北垂口”，石文释作“北陲口”，虽“垂”与“陲”字略有差异，但周文、伊文、志文及杨文均在文中提到孔水洞为陵区北界。经过笔者对照拓片及高清照片能够清晰分辨出是“祀事毕”3字，而非“北垂”，更不可能是金陵

北界了。

(4) “廻遊”。“廻”同“回”，动词，作迂回环绕之意。“遊”作游览，表达了作者完成繁杂祭祀之礼后，内心的放松以及对大房山自然美景的欣赏。吴文、周文、伊文、志文、杨文、及石文均未释。笔者入洞考察发现题记下方一狭窄空隙内堆砌大量沟纹砖，遮挡了摩崖下方部分文字，将砖石移开后，题记下方文字得以显现，与下文连读为“廻遊大房古刹”，词义通顺。

(5) “大房古刹”。泛指分布于大房山一带的佛教寺庙，这里专指“万佛堂孔水洞”，又如立于连泉禅寺遗址的大明嘉靖八年（1529年）刻《重修大房山古刹连泉禅寺碑记》，即指连泉禅寺为大房山古刹。吴文、周文、伊文、志文、杨文及石文均释作“大房古刹”。与上文连读为“廻遊大房古刹”，意思是游览大房山古刹万佛堂孔水洞。

(6) “全施”。有全部施助之意。即完成了对佛寺的布施。表达留题者对佛祖的虔诚。佛教中施助方法有多种形式，最常见有捐钱与施食。吴文、周文、伊文、志文、杨文及石文均释出“全”字，“施”字未释。其中伊文还就此做了说明，“‘大房古刹全’则极言大房山佛教建筑之多。古刹泛指古时所建寺庙，但在这则题咏中，应主要指以唐时所建的龙泉大历寺为主的一批隋唐及辽代寺院。”<sup>⑥</sup>作者将“全”字理解为众多佛寺，实为误读，应与下文“施”字连读。

(7) “蓋佛殿”。“蓋”同“盖”，有造、翻盖之意。即修建大历古迹万佛龙泉宝殿。吴文、周文、伊文、志文、杨文及石文均释出“佛殿”2字，“蓋”字未释。

(8) “应用”。“启用”之意。《说文解字》：“应，当也。从心雁声。”<sup>⑦</sup>“用”动词，可施行也。意思是整修万佛堂以供使用。吴文、周文、伊文、志文、杨文均释出“应用”2字，石文释作“应口”。

(9) “鈺”。此字周文、伊文、杨文、石文均未释，吴文释作“𠄎”字，志文释作“钱”字，结合拓片及照片，此字左边“金”笔画十分清晰，右边笔画不清，尚不能推定为何字。

(10) “线”。《说文解字》：“线，缕也。从糸戔声”<sup>⑧</sup>此字在拓本及照片上清晰，可确定，但字意颇为难解，结合上、下文，“线”上一字“鈺”，字意不明，“线”下一字为“岿”，显然与“线”字无关，而是承接下文“岿大定庚子中元日”，即事件发生的准确时间。吴文、周文、杨文均释作“线”字，志文及石文未释，而伊文称：“其中‘佛殿应用线’一句不通，‘线’字录文可能有误，待考。”<sup>⑨</sup>笔者通过入洞考察并对照拓片，证实“线”字无误。

(11) “岿”。名词，通“时”，意为时期，多见碑刻中的年代落款处。此字吴文、周文、伊文、志文、杨文、石文均未释。与下文连读为“岿大定庚子中元日”当是留题者游万佛堂孔水洞之具体时间。留题者交代完事件后以名词“岿”字做开端表示事件发生时间，即题记刊刻年代。

(12) “大定庚子”。“大定”为金世宗完颜雍年号。“世宗光天兴运文德武功圣明仁孝皇帝，讳雍，本讳乌禄，太祖孙，睿宗子也。……丁未，大赦，改元大定。”<sup>⑩</sup>“庚子”为干支纪年。因1161年金世宗登基，改元大定，是年辛巳，终于1189年，按六十甲子后推期间的“庚子年”只有一个即1180年，即大定二十年，南宋淳熙七年（1180年）。吴文、石文与笔者释文相同为“大定庚子”，周文、伊文、志文、杨文均释作“大定廿年”，应予纠正。

(13) “中元日”。即农历七月十五日，俗称鬼节。“中元节，原为道教节日，后演变为以祀祖祭鬼为主的民间岁时节日，俗称‘七月半’‘鬼节’，有些地方称为‘烧纸节’。中元，指中元地官诞辰，其日定为七月十五日，称地官赦罪之辰。……七月十五又是中元又是佛教盂兰

盆节，为佛道共有的宗教节日。”<sup>⑩</sup>中元日这一天留题者完成了祭陵活动后，又游览了大房山古刹万佛堂孔水洞。依金陵祭祀规制，凡“祭辰、元日、七月十五、冬至、寒食”必举行祭祀活动，同时，皇帝派遣使、副使、礼直官、读祝官以及献官等官员参与祭祀。吴文、周文、伊文、志文、杨文及石文均未释出“中元日”3字。

(14) “吏部尚书”。金代官职名，尚书为吏部中所设官职，而吏部属金代最高行政机构六部机构之一，设有尚书、侍郎、郎中、员外郎等官职。据《金史》载：“吏部，尚书一员，正三品。侍郎一员，正四品。郎中二员，从五品。员外郎，从六品。”<sup>⑪</sup>，吏部主要执掌文武百官的选授、勋封、考课、出给制诰等。吴文、周文、伊文、志文、杨文及石文均释作“吏部尚书”。

(15) “驸马都尉”。用以称帝婿，尚公主者例授此职。刻文中提到参与主持皇陵祭祀大典者，身为驸马都尉，足证身份的特殊。据志文《房山孔水洞金代摩崖题刻》一文：“‘驸马都尉’，本为内侍官的一种，多由内戚允任，后皇帝女婿例加此号，非实任官。”<sup>⑫</sup>吴文、周文、伊文、志文、杨文及石文均释作“驸马都尉”。

(16) “乌林答天锡题”。乌林答天锡，《金史》无传，但在《乌林答晖传》与《后妃·世宗昭德皇后传》中有关于此人的零星记载。上文中提到的“吏部尚书、驸马都尉”自然是乌林答天锡所任之职。今河南汝州香山寺及山东济南灵岩寺的碑石摩崖中均有此人题记。孔水洞中的这处金代摩崖题记对于乌林答天锡的记载弥补了文献不足。吴文、周文、伊文、志文、杨文、石文均释作“乌林答口题”。其中周文、伊文对释出的“乌林答口口”做了深入考证，认为是“乌林答复”。又据《房山孔水洞金代摩崖题刻》一文载：“考题刻者为世宗之婿乌林答复”，而文中又

称：“乌林答复在世宗大定一朝的29年中，有22年的时间可以将‘驸马都尉’之号入衔。在本传列入的官衔中，没有题刻中‘吏部尚书’之职，这是史传遗漏还是题刻者另属他人？”<sup>⑬</sup>说明文中作者对题刻者是否真的就是“乌林答复”仍持疑问。

(17) “婿”。“婿”同“壻”。丈夫、夫婿。特指“乌林答天锡”的尊贵身份，为皇族婿，公主之驸马。《说文解字》：“壻，夫也。从士胥声。诗曰：‘女也不爽，士贰其行。’士者，夫也。读与细同。壻或从女。”<sup>⑭</sup>吴文、周文、伊文、志文、杨文及石文均释作“婿”。

(18) “曹河西”。应与下文“完颜奴疙疸”连读，但尚不知其是否指代地名或职官名。吴文、石文释作“曹河西”，周文、伊文、志文、杨文均释作“曹何西”。

(19) “完颜奴疙疸”。“完颜”为女真姓，“完颜汉姓曰王”<sup>⑮</sup>，此人史籍未载，无考。吴文释作“完颜口疙疸”，周文、伊文、志文、杨文及石文均释作“完颜口疙疸”。考“完颜”姓氏，为金代女真国姓，皇族姓氏，据《大金国志》载：“其姓氏，则完颜谓王。”<sup>⑯</sup>

(20) “侍行”。即陪同尊长出行之意。“侍，承也，从人寺声。”<sup>⑰</sup>意为完颜奴疙疸作为侍从，与天锡一同来到万佛堂孔水洞，其身份低于乌林答天锡。吴文、周文、伊文、志文、杨文及石文均释作“侍行”。

## 二、关于金代驸马都尉“乌林答天锡”

该处摩崖题记的第7行第2~7字清晰地刻着“乌林答天锡题”6字，是此次调查的重要发现之一。乌林答天锡在文献中记载并不多，仅在《金史》与《金史纪事本末》中有关于此人的部分记载。另外在今河南省汝州香山寺、山东省济南灵隐寺的碑石中存有此人题记。

乌林答天锡，姓“乌林答”，为女真姓，“汉姓曰蔡”<sup>①</sup>，“其先居海罗伊河，世为乌林答部长，率部族来归，居上京，与本朝为婚姻家。”<sup>②</sup>“以后兄晖子天锡为太尉，石土黑后授世袭猛安。上谓天锡曰：‘朕四五岁时与皇后订婚，乃祖太尉置朕于膝上曰：吾壻七人，此壻最幼，后来必大吾门。’”<sup>③</sup>可知乌林答天锡本是明德皇后兄乌林答晖之子，其所任“太尉”为“三公”之一，正三品<sup>④</sup>。又据《金史》载：“诏以晖第三子天锡世袭纳邻河猛安亲管谋克”<sup>⑤</sup>。“猛安谋克”为统领女真氏族部落的军事长官。

大定十一年（1171年），刑部侍郎乌林答天锡作为金朝使者出使南宋，贺孝宗生日。《金史纪事本末》：“金使乌林答天锡来贺，会庆节要孝宗降榻问金主起居帝不许，天锡跪不起，宰相虞允文请帝还，内令使者明目随班上寿……”<sup>⑥</sup>。

《资治通鉴续纪》关于此事记载更详，“（乾道七年）九月壬戌，金尚书刑部侍郎乌林答天锡来贺上生日会庆节，要上降榻问金主起居。上不许，天锡跪不起，侍臣错愕失措，虞允文请大驾还禁中，且使知阁门事王抃谕之曰，大驾既兴，难再御殿，使人来且随班上寿。天锡沮退。癸亥，会庆节，随班入见。”<sup>⑦</sup>可知贺宋皇帝事件，反映了金的强势与南宋的软弱。

孔水洞金代题刻中提到乌林答天锡在大定二十年曾任吏部尚书驸马都尉。可知其必是金朝大定年间某位公主的驸马。今河南省汝州香山观音禅院内存有金代石碑一通，即著名的《重建汝州香山观音禅院记碑》，立于大定二十五年（1185年），俗称“唐国公主碑”。此碑文物价值极高，为香山寺四大名碑之一。碑文记述唐国公主与驸马乌林答天锡对佛法的理解，称香山观音禅院为观音菩萨道场，屡出灵验事迹，唐国公主自幼具有佛性，且为帝王之女，与观音身世相符。乌林答天锡任河南路统军使时与唐国公主至香山寺礼佛，看到殿宇堂阁及僧房被火焚，圣像

颓败，不禁哀伤惋惜，遂召集四方捐资出钱，重兴香山观音禅院大悲观音菩萨道场。

碑文曰：“越大定二十四年春，天子东幸旧国，以唐国主婿、大兴府尹、驸马都尉、奉国上将军乌林答天锡，移授河南路统军使。”<sup>⑧</sup>大定二十四年（1184年）世宗皇帝东巡幸故国上京会宁，唐国公主夫婿乌林答天锡，转任河南路统军使。天锡到任之后，才能得以施展，革旧兴新，使统军司衙门各项事务井然有序。平时注重学习汉地文化，亲察军事防务。这对皇族夫妻访遍当地名胜古迹，奉佛参拜。碑文落款曰：“奉国上将军、河南路统军使、驸马都尉、上护军、广平郡开国侯食邑一千户食实封一百户乌林答天锡，皇女唐国公主建。”<sup>⑨</sup>此时天锡已不再担任吏部尚书，而是移授河南路统军使。

除此碑外，今山东省济南市灵岩寺千佛殿外的东石堰内嵌一通金代石碑，且保存完好。据《北京图书馆藏中国历代石刻拓本汇编》载：“唐国公主祈嗣施资颂，各2896，金大定十五年五月十五日刻。石在山东长清。拓片高44厘米，宽69厘米。僧惠才撰，正书。”<sup>⑩</sup>碑文记载唐国公主与驸马都尉同入灵隐古刹朝拜礼佛，祈福求子。文曰：“皇女唐国公主并驸马都尉镇国上将军行大理卿同入寺朝礼……大定十五年五月望日，监寺僧宗旨立石。”<sup>⑪</sup>文中虽未说明驸马都尉为何人，但据文献记载尚唐国公主者，一为徒单思忠，二为乌林答天锡。“思忠通敏有才，颇通经史……尚皇弟二女唐国公主……大定元年十月，拜殿前左卫将军，二年，加驸马都尉，卒。”<sup>⑫</sup>可知，徒单思忠卒于大定二年（1162年），而此碑立于大定十五年（1175年），此时唐国公主的第二任驸马应为乌林答天锡，亦可得出孔水洞金代题记中，大定二十年乌林答天锡尚唐国公主。

孔水洞内现存的《金大定乌林答天锡摩崖题记》连同河南省汝州观音寺内的

《重建汝州香山观音禅院记碑》、山东济南的《唐国公主祈嗣施资颂碑》均反映出乌林答天锡及唐国公主喜欢游览名山大川，参禅礼佛，二人对佛教笃信至深，表明金代皇族对佛教的崇信与狂热。综合以上石刻史料，我们有如下收获：首先对研究摩崖题刻者“乌林答天锡”生平履历极为重要，弥补了文献不足。其次，纠正了以往学者关于摩崖题记题刻者的错误解读。许多学者以往对释出的“乌林答□□”认为是“乌林答复”，如今真相重现，水落石出，题刻者应为金世宗帝婿、唐国公主之驸马都尉“乌林答天锡”。

在大房山众多的名胜古迹中，乌林答天锡能选择来此游历，绝非偶然。万佛堂孔水洞坐落于山水秀美的大房山脚下，自隋代始即受朝廷重视，至金代成为“大房山古刹”。金人笃信佛法有超度亡魂的神奇功效，又可使当朝统治者得到心灵抚慰，对于巩固皇权统治有积极作用。同时，上层的支持与参与无疑是金代佛教发展的有力动因。佛教信徒在助缘善施后往往镌名于石以垂后世。佛教寺院作为佛教物化的表现，在金代上层阶级中具有特殊作用，祈福攘灾、追福报恩。人们信奉佛教、从事各种信仰活动往往是企图通过对佛教的信仰来满足自身现实需求，达到消灾降福的目的。供养善施、建置藏经，供

给僧侣道粮是世俗信徒又一常见信仰方式，上自皇室贵胄，下自庶民百姓多参与其事。佛教信徒无论僧俗，更多的则是通过诵经焚香的基本持戒或捐资祝缘的经济援助等侧重实践、较易操作的信仰方式与佛教建立联系。乌林答天锡作为一名虔诚的佛教徒在完成对金陵祭祀后，顺便游览了附近的名胜古刹，施资礼佛，留题记事，以求佛法护佑陵寝永固，国运昌兴。

### 三、结语

综合以上分析，该题记属于记事类摩崖，因孔水洞幽暗寒冷，题记随地下水势而沉浮，以往学者在已录错误刻文基础上进行了错误解读，因此对录文的准确公布是进行深入研究的重要基础。其意义有以下几点：1. 更正题记内容，纠正前人录文错误。作为金中都建立后留存至今的一则重要金石文献，在纠正前人错误解读录文的同时，应将重新校对后的原文进行补录，意在还原历史真相。学术问题只能在学术讨论中求同存异，让时间和实践去裁判。对古代石刻文字的公布与研究，应本着学术严肃的态度，谨慎、客观、真实，而不应盲目裁定，特别是对拓片的利用应在石刻文字的学术研究中发挥其不可替代的价值，为文字的研究提供更多原始资

附表 乌林答天锡任职情况

时间	职务	资料出处
大定二年（1162年）	太尉	《金史》卷六十四
大定十一年（1171年）	尚书刑部侍郎（正四品） 驸马都尉（正四品）	《资治通鉴续纪》
大定十五年（1175年）	行大理卿（正四品） 驸马都尉（正四品）镇国上将军（从三品下）	《皇女唐国公主并驸马都尉入寺祈福求子碑》
大定二十年（1180年）	吏部尚书 驸马都尉（正四品）	孔水洞《金大定乌林答天锡摩崖题记》
大定二十四年（1184年）	大兴府尹（正三品） 驸马都尉 奉国上将军 移授河南路统军使	《重建汝州香山观音禅院记碑》
大定二十五年（1185年）	奉国上将军（从三品上） 河南路统军使（正三品） 驸马都尉（正四品）上护军 广平郡开国侯 食邑一千户 食实封一百户	《重建汝州香山观音禅院记碑》

料。2. 弥补文献中对乌林答天锡记载的缺失, 丰富了历史信息。题刻者系皇帝之婿, 当朝皇族贵戚, 体现了金代统治阶级对佛教的崇信。3. 题记对金陵祭祀制度的反映。内容涉及金代帝王陵寝祭祀制度, 题刻中提到“山陵祀事毕”与“中元日”, 印证了文献中对大房山陵“中元日祭”的记载, 是石刻资料对文献的印证与补充。

①吴梦麟:《北京万佛堂孔水洞调查》,《文物》1977年第11期。

②周峰:《房山万佛堂孔水洞金代题记》,《文物春秋》2003年第6期。

③伊葆力:《金代碑石丛稿》,中州古籍出版社,2004年。

④梅宁华:《北京辽金史迹图志》,北京燕山出版社,2004年。

⑤杨亦武:《房山历史文物研究》,奥林匹克出版社,1999年。

⑥北京石刻艺术博物馆:《北京地区摩崖石刻》,学苑出版社,2010年。

⑦⑫(汉)许慎撰,(宋)徐铉校定:《说文解字》,中华书局,1963年,第65页。

⑧(汉)许慎撰,(宋)徐铉校定:《说文解字》,中华书局,1963年,第53页。

⑨(元)脱脱等:《金史》,中华书局,1975年,第104页。

⑩宇文懋昭撰,崔文印校证:《大金国志校证》,中华书局,1986年,第596页。

⑪(汉)许慎撰,(宋)徐铉校定:《说文解字》,中华书局,1963年,第8页。

⑬(汉)许慎撰,(宋)徐铉校定:《说文解字》,中华书局,1963年,第83页。

⑭⑰伊葆力:《金代碑石丛稿》,中州古籍出版社,2004年,第39页。

⑮(汉)许慎撰,(宋)徐铉校定:《说文解字》,中华书局,1963年,第217页。

⑯(汉)许慎撰,(宋)徐铉校定:《说文解

字》,中华书局,1963年,第275页。

⑰(元)脱脱等:《金史》,中华书局,1975年,第121、123页。

⑱胡孚琛:《中华道教大辞典》,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第1530、1531页。

⑳(元)脱脱等:《金史》,中华书局,1975年,第1220页。

㉑㉒梅宁华:《北京辽金史迹图志》,北京燕山出版社,2004年,第224页。

㉓(汉)许慎撰,(宋)徐铉校定:《说文解字》,中华书局,1963年,第14页。

㉔(元)脱脱等:《金史》,中华书局,1975年,第2896页。

㉕宇文懋昭撰,崔文印校证:《大金国志校证》,中华书局,1986年,第586页。

㉖(汉)许慎撰,(宋)徐铉校定:《说文解字》,中华书局,1963年,第164页。

㉗(元)脱脱等:《金史》,中华书局,1975年,第2897页。

㉘(元)脱脱等:《金史》,中华书局,1975年,第1519页。

㉙(元)脱脱等:《金史》,中华书局,1975年,第1521页。

㉚(元)脱脱等:《金史》,中华书局,1975年,第1217页。

㉛(元)脱脱等:《金史》,中华书局,1975年,第2620页。

㉜(清)李有棠:《金史纪事本末》,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第115页。

㉝吴海京:《资治通鉴续纪》,中国文史出版社,2013年,第517页。

㉞㉟大定二十五年立《重建汝州香山观音禅院记碑》,碑现存于河南省汝州香山观音禅院。

㊱㊲北京图书馆金石组:《北京图书馆藏中国历代石刻拓本汇编》第46册,中州古籍出版社,1989年,第120页。

㊳(元)脱脱等:《金史》,中华书局,1975年,第2622页。

(作者为门头沟区文物管理所馆员)

# 太行山东麓地区汉代城址调查简报

徐 超

近年来，随着社会经济的飞速发展和城市化进程的不断加快，越来越多的古文化遗址正遭受破坏，古代城址作为历史文化遗存的重要组成部分，亦因自然与人为因素逐渐消失于历史的长河之中。沧海桑田，曾经繁华辉煌的古代城市逐渐衰败成无人问津的断壁残垣，除少数隐约可见的建筑台基外，城市原有的古代建筑遗迹已基本消失殆尽。而那些用于军事防御的城墙却因建筑庞大、结构坚固，依旧屹立在最初的地方。这些城墙因而成为古代城市的标志和象征，它们不仅饱含可供相关学科研究的历史信息，而且能够用来作为发展文化旅游产业的物质基础。不过，如何在经济社会大发展的新形势下，妥善保护好古代城址并将之充分利用，使得文物保护与经济发展互利共赢，仍是今天亟待解决的大问题。为了对现存古城址有着更全面、清楚的认识，以便进一步的保护与开发，2014年，北京市文物局正式确立了“京津冀汉代遗迹调研”课题。2015年，北京市大葆台西汉墓博物馆结合自身科研情况，对京津冀地区的部分汉代城址的地表遗迹进行了较为详细的调查、测量工作<sup>①</sup>。现将部分调查情况简报如下：

## 一、部分汉代城址调查情况

今天的京津冀地区在汉代属于冀州、幽州之地，是汉王朝人口、赋税大区和对外军事防御重地。据《汉书·地理志》记载，西汉有郡（国）城 103个，县级城

邑1587个。其中，京津冀境内有11郡、7国（占总数的1/6以上），202县（占总数的1/8以上），县治以上的城市222个。郡城和国都有：邺、邯鄲、巨鹿、元氏、清阳、广平、真定、卢奴、信都、乐成、浮阳、涿、代、沮阳、渔阳、平刚、蓟和阳乐<sup>②</sup>。东汉地方建制沿袭西汉，只是对郡、国、县、道进行了局部调整。据《后汉书·郡国志》载，京津冀境内置有10郡、6国，129县。郡城和国都有：邺、邯鄲、元氏、卢奴、信都、乐成、涿、沮阳、蓟、渔阳、土垠、南皮、瘳陶、代、蔚县等<sup>③</sup>。如此众多的城市存在，充分说明京津冀地区在汉王朝政治版图中的重要性，同时也为今天的遗址调研和保护工作带来了较大难度。基于以上原因，截止到目前，“京津冀汉代遗迹调研”课题有选择性的对位于京津冀地区南北大道上的汉代城市做了一个初步调研。

众所周知，交通的进步、发展是文明交流和城市发展的基础和标志，也反映出城市辐射范围的大小。便利的交通体系，对于促进因政治、经济、军事据点而存在的城市的发展至关重要。桓宽的《盐铁论》在论及天下名都“燕之涿、蓟，赵之邯鄲”之所以能“富冠海内”时首要原因就是其“居五诸侯之衢，跨街冲之路也”，即交通便利<sup>④</sup>。

《史记·货殖列传》载：“然邯鄲亦漳、河之间一都会也。北通燕、涿，南有郑、卫”，又载：“燕亦渤、碣之间一都会也，南通齐、赵，东北边胡。”<sup>⑤</sup>

这条沟通邯郸、燕、涿的“邯郸广阳道”<sup>⑥</sup>，西靠太行山脉，处诸水上游，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就已存在<sup>⑦</sup>，后又经秦代大规模的驰道修筑，及至汉代，已成为太行山东麓最重要的南北大道。两汉时期，散布于“邯郸广阳道”上的郡（国）城就有邺、邯郸、元氏、真定、卢奴、涿、蓟等，其余县邑更是众多。因此，我们首先对散布于“邯郸广阳道”上的汉代城市进行了调研，具体考察了讲武城、邯郸城、邺北城、易阳城、柏人城、柏畅城、鄗城、宋子城、东垣（真定）城、九门城、灵寿城、曲逆城等城址。笔者将主要城址由南向北分述如下。

### （一）讲武城遗址

讲武城遗址位于京津冀地区的最南端，河北省磁县讲武城镇境内。遗址东靠107国道，南依漳河，西挨南水北调中线引水渠，北距磁县县城约10公里，京广铁路从其东北角斜向穿过。1957年，为配合京汉铁路复线工程建设，河北省文物管理委员会曾对其做过调查<sup>⑧</sup>。与1957年调查时的情况相比，现存城垣的城墙豁口在不同程度上被人为扩大，南墙东端残垣已不可见，北墙还被新开1个豁口，但总体上城墙保存较为完好<sup>⑨</sup>。讲武城城垣版筑而成，呈方形，现存城墙残高5~8米，基宽12~15米，夯土层厚8~13厘米。城址西墙、北墙保存相对完整，东墙只保留了北部一段，南墙被漳河冲毁，无明显遗迹。西墙全长1387米（西墙南端坐标：N36° 16.054'，E114° 19.496'；西墙北端坐标：N36° 16.767'，E114° 19.724'），有豁口5处，由南向北分别长19米、101米、35米、163米、68米。北墙全长1315米（北墙西端坐标：N36° 16.767'，E114° 19.724'；北墙东端坐标：N36° 16.755'，E114° 20.614'），有豁口6处，由西向东分别长18米、29

米、79米、2米、38米、194米。东墙全长421米（东墙北端坐标：N36° 16.755'，E114° 20.614'；东墙南端坐标：N36° 16.532' E114° 20.560'），有豁口1处，长13米（图一）。

讲武城，是汉代京津冀地区“邯郸广阳道”的最南端。据《后汉书·郡国志》记载，魏郡诸县中有武城县<sup>⑩</sup>。《水经注》亦载：“漳水又东迳武城南”<sup>⑪</sup>。民国《磁县志》又说：“讲武城，在县南二十里漳河北岸，与东行五里临漳县邺镇之铜雀台东西相望，为魏武帝练兵之所。”<sup>⑫</sup>据我们走访所知，当地村民间口耳相传此城是魏武帝曹操演武练兵所筑。但是，实际上讲武城即是汉代的武城县，唐时就被废，到了宋代已被讹传为讲武城<sup>⑬</sup>。

### （二）邯郸城遗址

汉代邯郸城是在战国赵都邯郸大北城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据考古发现，大北城平面呈不规则长方形，南北长4880米，东西宽3420米<sup>⑭</sup>。由于大北城地处因沁河等河流向东冲击形成的冲积扇上，越往东淤积层越厚，除西城垣有少量遗址露出地面之外，其余大部分城墙都被埋在地下0.2~8米的深处<sup>⑮</sup>。而西城垣残留至今的也只剩下一组南北向紧靠城垣的夯土建筑基址群和一段名为“王郎城”的城墙<sup>⑯</sup>。民国《邯郸县志》载：“王郎城。在城西



图一 讲武城遗址北城垣

三里许，世传汉光武帝讨王朗平其城。今久废无考。”<sup>⑩</sup>实际上，“王郎城”只是大北城西城垣中段的一段地面城墙残址。其位于邯郸市复兴区建设大街西旁，基宽16~34米、残高3~12米，现存城墙又分为两段，靠东一段长315米（东端坐标：N36° 36.897'、E114° 27.579'；西端坐标：N36° 36.862'、E114° 27.372'），靠西一段长145米（东端坐标：N36° 36.842'、E114° 27.278'；南端坐标：N36° 36.786'、E114° 27.230'），中间被居民楼所阻断。“王郎城”现已建成王郎城遗址公园，但保护状况不甚良好（图二）。

### （三）易阳城遗址

位于河北省永年县西阳城乡北阳城村、东阳城村附近，107国道西侧，洺河北岸的台地上，距县城西偏北7公里左右。光绪《永年县志》载：“易阳故城，



图二 邯郸城（“王郎城”）遗址



图三 易阳城遗址

即临洺城，汉置。《名胜志》：临洺故城在治西五十里。”<sup>⑪</sup>《中国文物地图集》叙述易阳城“平面呈长方形，北城垣长1343米，西城垣长1076米，南城垣长1750米，东城垣长1227米”<sup>⑫</sup>，但如今，该城只残存一段长21米、东西向的城垣（东端坐标：N36° 50.141'、E114° 26.742'；西端坐标：N36° 50.139'、E114° 26.727'），其余已不可见，城墙破坏严重（图三）。

### （四）鄯城遗址

位于河北省柏乡县固城镇境内，107国道东侧。据1986年调查发现，该城平面近方形，边长约1500米，基宽7米，残高1~5米<sup>⑬</sup>。但现今鄯城只残存两段城墙：一段是位于西南角5米长、4米多高的南墙残垣（N37° 34.728'、E114° 42.889'）；另一段为东墙（北端：N37° 35.283'、E114° 44.049'；南端：N37° 35.253分E114° 44.048'），在

鄯城东北方向，长62米、残高1~4米左右。关于鄯城，民国《柏乡县志》载，“汉兴，置鄯县，属常山郡，城在今治北二十二里。（旧志）常山郡有鄯县，鄯在今柏乡县北二十二里，有故城镇，榜曰古鄯城，其旧城已废，遗址尚存。周围十余里，俗云古莽城，误也”“在县治北二十里本春秋晋鄯邑。光武帝即位于鄯南，改名高邑，为冀州刺史治所。北齐移县治于房子……今名固城镇是也”<sup>⑭</sup>。据此可知，此遗址即是汉代鄯城遗址，但破坏严重（图四）。

### （五）柏畅城遗址

位于河北省临城县东柏畅村南200米处，距县城7公里左右。康熙《临城县志》载：“柏畅亭，在县西十五里，《水经》载泚水东经柏畅亭即此。汉封侯取此为名。柏畅城，在柏畅亭南，相去里许。按《汉书·王子侯

表》，武帝封赵静肃王子终古为侯，取柏畅为名。此即其封国，今城废，遗址犹存。”<sup>②</sup>柏畅城北临泚河故道，西依乱木水库，建于台地之上。平面呈长方形，南北长600米，东西宽约420米<sup>③</sup>。城垣夯土筑城，现存城墙基宽15米，残高1~7米，夯土层厚4~8厘米。柏畅城北墙、东墙已消失无迹，西墙和南墙还保留一部分，城墙东南角(N37° 26.049'、E114° 25.593')亦可见。西墙现存400米左右(南端：N37° 26.038'、E114° 25.294'；北端：N37° 26.275'、E114° 25.309')，南墙现存280米左右(西端：N37° 26.034'、E114° 25.312'；东端：N37° 26.055'、E114° 25.498')，西墙北段和南墙东段的顶部都被人为推平，开垦成农田。总的来说，城垣破坏严重(图五)。

#### (六) 宋子城遗址

位于河北省赵县东北18公里处，韩村镇宋城村境内。该城平面呈长方形，东西长700米，南北宽500米。城垣夯土筑成，宽6~10米，残高1~7米，夯土层厚约4~6厘米。现有城垣(东北角坐标：N37° 50.642'、E114° 53.912'；东南角坐标：N37° 50.367'、E114° 53.938'；西南角坐标：N37° 50.345'、E114° 53.508'；西北角坐标：N37° 50.616'、E114° 53.483')断续尚存，其中东墙保留四段，由北向南分别长51、39、4、26米；南墙保留四段，由东向西分别长18、24、64、51米；西墙保留两段，由南向北分别长107、92米；北墙保留三段，由西向东分别长56、2、28米(图六)。

据光绪《直隶赵州志》

载：“宋子故城。在州北三十五里，本战国赵邑。《史记》燕王喜四年，栗腹伐赵，赵王自将偏军随军至宋子，又秦灭燕，高渐离匿作于宋子，即此。



图四 郾城遗址南城垣



图五 柏畅城遗址西南角



图六 宋子城遗址东城垣

城址尚存。”<sup>⑧</sup>汉高祖八年（公元前199年）封许惲为宋子侯，汉景帝中元二年（公元前148年）废除宋子侯爵，降为县，属巨鹿郡，王莽时期曾改称宜子<sup>⑨</sup>。因此，该遗址应是汉代宋子城遗址。

### （七）曲逆城遗址

位于河北省顺平县东南12公里高铺镇北城乡境内。该遗址西挨界河，东靠107国道和京广铁路线，北接保阜高速，处于大王村、子城村周围的台地上。城址平面近方形，边长约为2500米。城垣夯土筑成，夯层7~12厘米，基宽11~24米，残高2~8米。西城垣已经消失不见，东、南、北城垣还各自保留一部分。其中南段残垣（东端坐标：N38°47.776′、E115°13.119′；西端坐标：N38°47.823′、E115°12.861′），长382米，中间有一因道路建设而开凿的6米长豁口。东段残垣（南端坐标：N38°47.615′、E115°14.108′；北端坐标：N38°47.751′、E115°14.150′）分为两段，一段长87米，另一段长133米，两段间距38米。北端残垣（西端坐标：N38°48.948′、E115°13.061′；东端坐标：N38°48.921′、E115°13.204′）由四段城墙组成，由西向东分别长3、65、2、37米。该城城垣破坏严重，尤其是北端城垣多毁于建筑占地（图七）。

《中国文物地图集·河北分册》称



图七 曲逆城遗址南城垣

该城址为“子城城址”，并根据考古资料分析，“该城址的年代约在东周至汉代时期”，但并未说明此为何城<sup>⑩</sup>。从残存的城垣可以推断，边长约2500米左右的城垣，在古代社会绝非默默无闻。而当地村民口耳相传，此城多与“大王”有关。不过，民国《完县新志》却记载到：“曲逆旧城。在今县治东南二十里，即大王、子城村之周围土城是也。《左传》齐国夏伐晋，取逆畴。酈道元以为即曲逆。汉高帝七年，击韩王信，自代还过曲逆曰：‘壮哉县，吾行天下多矣。惟见洛阳与是耳。’《汉志》张晏曰：‘濡水于城北曲故曰曲逆。’后汉章帝改其名曰蒲阴。今案旧城较今城实大有半倍。倘属今城，高帝必无壮哉之欢，且曲逆河正在大王、子城之北，非在今县城之北也。大王、子城村之为曲逆旧城也决矣。”<sup>⑪</sup>综合上述情况，可以确定此城址当是汉代的曲逆城。

## 二、城址保护现状及受破坏原因

通过长时间的实地走访和勘探调查，我们发现以上述城址为代表的太行山东麓南北大道上的汉代城址总体上受损严重，保护状况很不乐观。尤其是在改革开放以来的三十多年间，这些延续千年的古城墙在经济建设的大背景下急剧消失。很多城址，如易阳城、郾城、曲逆城等在几十年间即被成段的毁坏，萎缩成现今的几段城墙，而像真定城等城址就连残垣断壁都已无法可见。个中原因不得不引人深思，笔者试析如下：

### （一）以河流因素为代表的自然因素对于古城墙的破坏

风霜雨雪水流等自然因素时刻都对城墙进行着侵蚀破坏，它们是社会发展缓慢时期城

墙最主要的破坏因素。主要包括：构成城墙的岩石、土壤与大气、水及生物接触过程中产生物理、化学变化而原地形成松散堆积物的风化作用破坏；墙体在风霜雨雪的长期侵蚀下强度降低导致开裂；城墙顶部和城墙的裂缝处生长的植物及寄生的动物对于墙体的破坏。诸如此类的自然力破坏都存在于京津冀汉代城址之上。然而，京津冀汉代城址的城墙破坏中有一个尤为突出的特点即：河流因素。京津冀地区所在的华北平原在古代社会有众多发源于山西高原、太行山脉的河流。在我们所调查的汉代城址中，很多城址都是依河而建。河流既能解决城市用水，形成便利的水运交通，同时也为城市提供了绝佳的军事防御。然而，在漫长的岁月里，流水侵蚀和河水泛滥却成为了城址安全的重大危害。以保存较为完好的讲武城城址为例。其西、北、东三面城墙皆可见，唯独南面城墙因漳河泛滥和流水的长期侵蚀，毁坏严重。1956年还能在东南角看到一段残垣，如今连这段城墙也被漳河冲走。讲武城南边因漳河形成了一个明显的冲击河道（图八）。而在着重调研的其他城址中，也存在类似情况：邯郸城址的大部分城墙都埋藏于沁河等河流的冲积扇下；易阳城的南城墙湮没于洺河之中；柏畅城的北部毁于泚河；曲逆城北、东、南城墙亦可见，西城墙却消失在界河的河水里。

### （二）农村生产生活和城市建设对于城垣的破坏

随着我国步入工业化社会，大规模建设以及生产水平提高后生活方式的转变，人类活动的破坏逐渐成为城墙受损的最重要原因。尤其是在改革开放之后，经济社会发展和城市化

进程加快的背景下，人们为了一己之利、一时之利，忽视对文化的保护、传承，不断破坏或蚕食城墙，使得城址快速消失。我们在调研城址过程中，从故老口中听到最多的就是从前城墙有多长多高，而我们所见的却是残存城墙多短多矮甚至了无踪迹，让人唏嘘不已。笔者以为，造成此种现象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

在农村，主要是因为农业生产生活的需要。其一：宅基地取土和烧砖之用。汉代城墙都是夯土版筑而成，且经过千年风吹雨打，土质结实坚固。因而成为华北平原上的农民盖房时夯实宅基地的极佳材料，有的还把房屋直接建在城墙之中（图九）。更有甚者，以此土烧砖谋取经济利益。易阳城、鄆城、宋子城和曲逆城都因



图八 讲武城遗址南部的漳河故道



图九 曲逆城城墙中的房屋

此遭到大段破坏。其中又以易阳城最为典型。据当地老农回忆，20世纪70年代易阳城西段和北段城垣还清晰可见，高3~4米，后来村民取土盖房，紧挨着北城垣处还建起了一座砖厂，就地取土。就这样，仅仅30年的时间，延续两千年的汉代易阳城就只剩下今天的短短一截。其二：扩大耕地面积之需。位于野外的汉代城址周边一般是农业耕地。但农民为了扩大耕地面积或方便劳动往来，挖掘蚕食城墙。还有的农民直接在城墙耕种，如柏畅城。该地地处山区，耕地面积较少，不少农民直接在城墙上种植玉米（图一〇）。长此以往，城墙逐渐变矮变平，直至消失。其三：因乡村道路建设随处开挖城墙缺口。这种现象在我们走访的所有城址中随处可见（图五、图七）。

在城市，对于城址破坏则来得更加猛烈直接。前文提到，位于太行山东麓南北大道上的汉代城市既多且大，但我们在实地调查中发现，汉代城址在河北南部农村地区遗存较多，而在河北中北部城市较为集中地区则很难发现，只找到一处——位于石家庄市北郊的东垣城遗址。该城址位于河北省石家庄市北滹沱河南岸的台地上，北隔石太高速公路与滹沱河相望。西起东古城村东，东至南高营村、北高营村南，北城垣被滹沱河冲毁，南至桃园村北。城址平面呈长方形，南北长约5公里，东西宽约3公里，总面积约15平方公里，城墙为夯筑，夯层厚度9~12厘米<sup>⑧</sup>。但在城市化浪潮中，此城城垣已大部被平，仅存的少量城墙也在新的城市遗址公园计划中被推掉，现如今只剩下一块徒有虚名的文物保

护碑屹立在新建的住宅楼下（图一一）。

### （三）遗址公园开发与维护的若干问题

近年来，随着国家与社会各界对于文化遗址的越发重视，城市化建设中逐渐流行建设依托古文化遗址的城市休闲公园，越来越多的遗址公园进入到人们的生活当中。我们在进行京津冀汉代城址调研中也接触到不少的遗址公园，但是这些遗址公园开发与维护中还存在不少问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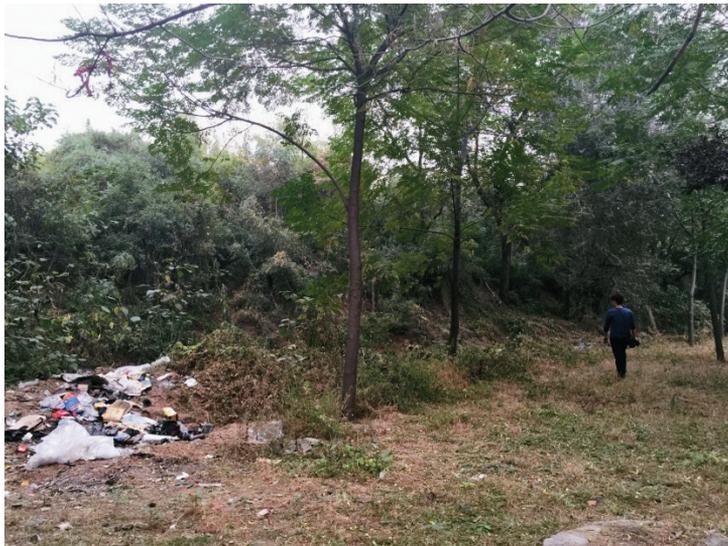
遗址公园开发前的困难。比如讲武城遗址，此城是京津冀地区保存较好的少数几个汉代城址之一，具有很高的文化产业开发价值。从当地村民得知，该遗址早已被纳入当地的区域开发，规划建设成城址高尔夫球场，但因涉及大规模的拆迁问题



图一〇 柏畅城城墙上的玉米地



图一一 东垣故城遗址



图一二 王郎城遗址公园中一角

京津冀地区位于太行山东麓“邯郸广阳道”上的汉代城址的现状作了一个概要说明，并从文物保护角度对各个遗址加以简单分析。未能在本文中加以阐述的太行山东麓地区的汉代城址仍有不少，但是仅对“邯郸广阳道”上的汉代城址做调研就能发现京津冀地区汉代城址保护状况的严峻性，因此急需有关部门、社会各界加以重视和进一步保护。

而处于两难阶段，反而使城址因长期保护目标不明确，迟迟得不到有效性、科学性保护。

遗址公园开发中的先拆后建。上文提到的东垣故城遗址即是一例。此城城墙本就在大规模的城市建设中萎缩，而残留的几段城墙却毁于东垣故城遗址公园的开发。虽名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但我们在调查中只看到新建的住宅楼以及杂乱的建筑和生活废弃物堆积之中的文物保护单位。料想遗址公园当是在周围商品房开发完毕后，再于住宅区中间建设公园。此种先拆后建的遗址公园开发，对于文物保护的积极意义不大。

遗址公园建设后的维护问题。位于邯郸市市区的王郎城遗址公园，当是充分利用了文化遗产价值建成了一座小型城市休闲公园。但是与北边相去几里的赵苑公园相比，全方位开放的王郎城遗址公园保护状况却不甚良好。由于缺乏专人维护和规章制度，遗址公园城墙下成为了附近居民生活垃圾堆放处，而城墙上面杂草丛生、随处可见垃圾及粪便。原本作为市民休闲娱乐的遗址公园却成为了脏乱差的城市垃圾场（图一二），反差之大，令人深思。

限于篇幅，本文只是有选择性地对

①主要是利用GPS定位器、激光测距仪、RTK实时动态控制系统等工具对地表残存的城垣遗址进行测量；采集遗物；走访前贤故老，获取相关资料。

②本文采取的西汉县数取自《汉书》卷二八《地理志》所载汉平帝元始年间的县数，中华书局，1962年，第1523-1674页。

③《后汉书·郡国志》，中华书局，1965年，第3385-3554页。

④（汉）桑弘羊撰，王利器校注：《盐铁论校注》卷一《通有第三》，中华书局，1992年，第41页。

⑤《史记》卷一百二十九《货殖列传》，中华书局，1982年，第3264-3265页。

⑥王子今：《秦汉交通史稿》，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28-30页。

⑦史念海：《春秋以前的交通道路》，《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0年第3期。

⑧河北省文物管理委员会：《河北磁县讲武城调查简报》，《考古》1957年第7期。

⑨1957年调查时步测西城墙豁口有5处，由南向北分别长7、20、30、5、55米；北城墙豁口有5处，由西向东（第4豁口没有数据）分别长10、15、25、30米。参见河北省文物管理委员会：《河北磁县讲武城调查简报》，《考古》1957年第7期。

⑩《后汉书》卷二〇《郡国志二》：“邺有故大河。有溢水，有汗水。有汗城，有平阳城，有武

城。”中华书局，1965年，第3431页。

⑪（北魏）酈道元注，（民国）杨守敬、熊会贞疏：《水经注疏》卷十《浊漳水》，江苏古籍出版社，1989年，第931页。

⑫（民国）黄希文等纂修：《中国地方志集成：河北府县志辑·民国磁县志》第五章《古迹》，上海书店出版社，2006年，第20页。

⑬河北省文物管理委员会：《河北磁县讲武城调查简报》，《考古》1957年第7期。

⑭国家文物局主编：《中国文物地图集·河北分册（下）》，文物出版社，2013年，第751页。

⑮关于邯郸城的城墙的地下勘探发掘情况详见乔登云、乐庆森《赵都邯郸故城考古发现与研究》，《邯郸学院学报》2005年第1期。

⑯由北向南依次是：“铸箭炉”（N36° 37.617′、E114° 28.220′，高9米）、“皇姑庵”（N36° 37.557′、E114° 28.206′）、“梳妆楼”（N36° 37.429′、E114° 28.138′，高10米）、“插箭岭”（N36° 37.291′、E114° 27.781′，高8米）。

⑰（民国）杨肇基修，李世昌纂：《中国地方志集成：河北府县志辑·民国邯郸县志》卷三《地理志·古迹》，上海书店出版社，2006年，第425页。

⑱（清）夏诒钰纂修：《中国地方志集成：河北府县志辑·光绪永年县志》卷十三《古迹志》，上海书店出版社，2006年，第61页。

⑲国家文物局主编：《中国文物地图集·河北分册（下）》，文物出版社，2013年，第812-813页。

⑳国家文物局主编：《中国文物地图集·河北分

册（下）》，文物出版社，2013年，第714页。

㉑（民国）牛宝善修，魏永弼纂：《中国地方志集成：河北府县志辑·民国柏乡县志》卷一《疆域·沿革》《地理·古迹》，上海书店出版社，2006年，第389、409页。

㉒（清）夏诒钰纂修：《中国地方志集成：河北府县志辑·康熙临城县志》卷一三《古迹志》，上海书店出版社，2006年，第61页。

㉓刘龙启、李振奇：《河北临城柏畅城发现战国兵器》，《文物》1988年第3期。

㉔（清）孙传栻修，王景美等纂：《中国地方志集成：河北府县志辑·光绪直隶州志》卷一《輿地志·古迹》，上海书店出版社，2006年，第332页。

㉕《汉书》卷一六《高惠高后文功臣表》，第588页，中华书局，1962年；同书卷二八《地理志上》：“巨鹿郡，秦置……宋子，莽曰宜子。”中华书局，1962年，第1575页。

㉖国家文物局主编：《中国文物地图集·河北分册（下）》，文物出版社，2013年，第527页。

㉗（民国）彭作楨修，刘玉田等纂：《中国地方志集成：河北府县志辑·民国完县新志》卷一《疆域志下·古迹》，上海书店出版社，2006年，第239页。

㉘国家文物局主编：《中国文物地图集·河北分册（中）》，文物出版社，2013年，第1页。

（作者为北京市大葆台西汉墓博物馆助理馆员）

# 白塔寺藏文款明代释迦牟尼铜镀金造像年代及风格初探

孙 涛

在北京市白塔寺“藏传造像艺术展”内展出了一尊明代释迦牟尼铜镀金造像，此尊造像不仅造型生动，风格秀美，雕刻精湛，体量高大，而且还带有藏文款识，记述了此尊造像的铸造时间和施资铸造者，在我国现存的明代藏传金铜造像中较为罕见，令国内外学者和观众驻足长观，赞叹不止。笔者就此尊造像的现状和题材、造像的风格特征以及造像藏文刻款所蕴含的历史信息，试作初步探讨。

## 一、造像的现状和题材

此尊造像（图一）通高115厘米，由红铜分体铸造，然后用插榫固定，再在表面镀金。释迦牟尼佛头饰右旋螺发，高耸的肉髻居于头顶正中，肉髻之上安置牟尼宝状顶严；面相方正，眉如弯月，双目垂视，鼻直适中，双唇微合，具有藏族人民的显著特征，同时亦展现出佛陀的庄严与慈悲；肩部宽阔，腰部纤细，躯体柔软匀称，造型端庄大方，具有藏传造像的鲜明特点；上身着袒右肩袈裟，袈裟轻薄贴体，袖口宽大飘逸，衣纹婉转流畅；左手手指微翘，结禅定印于腹前，右手手掌自然下垂，中指微触地面，结降魔印于右腿膝盖之上；下身着材质优良的僧裙，僧裙的衣褶在双足下结成繁密规则的扇形；双足足心向上，双腿互盘结跏趺坐。通观整躯造像，造型生动，工艺精湛，领口、袖



图一 白塔寺藏文款明代释迦牟尼铜镀金造像

口、裙摆都篆刻有精美华丽的装饰图案，手心、足心还铸造出栩栩如生的法轮印迹，尤其是体量如此巨大，在存世的明代藏传金铜造像中极为少见，堪称明代藏传金铜造像珍品。

佛祖左手结禅定印，右手结降魔触地印，保持着禅定证悟的坐姿状态，此种形象源自于佛祖在菩提树下彻悟道谛前，战胜魔王波旬及魔众的重要事迹。佛祖降魔证道为佛祖一生八大重要事迹之一，佛教教义还规定了每年的腊月八日为释迦牟尼佛成道纪念日，僧侣和佛教信众会严备香烛、鲜花、茶果、珍馐等供奉佛祖。而展

现佛祖成道的金铜造像也在各时期、各地域均有大量遗存，为金铜造像最为常见的题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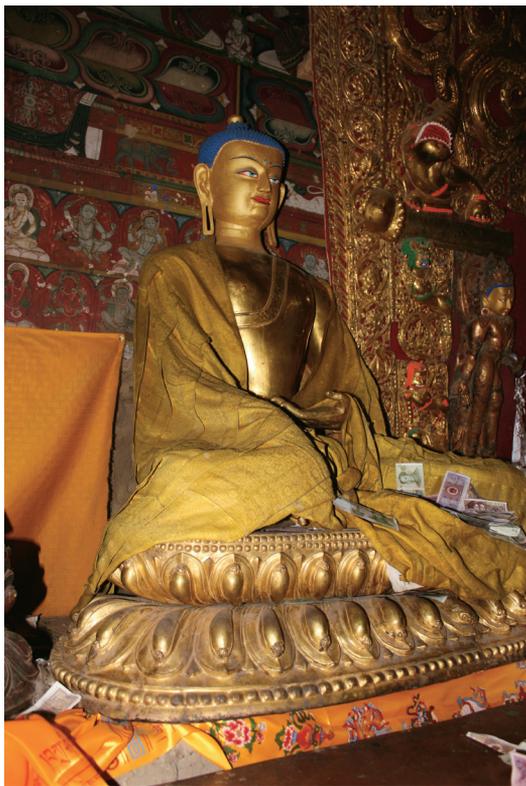
## 二、造像的风格特征

白塔寺这尊藏文款释迦牟尼铜镀金造像造型舒展大方，躯体结构匀称，带有鲜明的尼藏造像风格特点，应属于15世纪中前期西藏中部地区金铜造像的范畴，铸造地点很可能是拥有丰富人力物力的大型寺院。其依据有以下四点：

其一，白塔寺藏文款造像头顶宽平、眉部尾端上翘、鼻梁挺直呈鹰钩状、嘴唇肥厚、躯体壮硕、四肢粗壮、指头末端内卷包住指甲等造像特征明显因袭自尼泊尔造像艺术，萨迦南寺措钦大殿的释迦牟尼佛造像和夏鲁寺收藏的金铜佛造像就是尼泊尔造像艺术在藏区的代表作品，在这些造像上都能发现类似的特点。但白塔寺藏文款造像同萨迦南寺造像（图二）和夏鲁寺造像（图三）相比，明显具备更多的藏中地区造像艺术元素。双目不再上挑，趋于平直；下颌不再尖削，变得圆润；五官位置更为合理，而不是整体偏下，凸显宽阔的额部；加大了鼻部与嘴部的间距，显露出人中部位；头部比例变小，躯体比例开始趋于正常比例，更为符合人体的实际情况；不再突出肌肉力度的表现，肌体变得柔软，手脚刻画更为生动。另外，此尊造像头顶正中有圆柱形肉髻，在与藏传造像艺术有联系的造像风格中，克什米尔风格偏重于塑造较大较平缓的圆形肉髻，东北印度帕拉造像艺术喜欢更具装饰化效果的高耸片状发髻，中原汉地造像艺术肉髻起伏极为平缓，尼泊尔造像艺术则较多采用与此尊造像类似的高耸圆柱形肉髻，以表现佛祖的庄严和相好。早期藏传佛祖造像的肉髻位置多数居于头顶后部，明显受到外来造像艺术的影响。进入13世纪后，藏民族的审美意趣逐渐融入，肉髻位置逐渐前移，最后固定于头顶中部。这一切表



图二 萨迦南寺中的释迦牟尼佛像



图三 夏鲁寺藏释迦牟尼铜镀金造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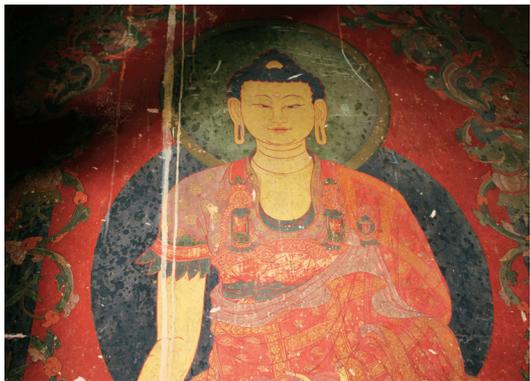
明此尊造像融入了较多藏地造像艺术元素，更为符合明代15世纪西藏中部地区的造像艺术特点。

在始建于1427年的江孜白居寺中，大殿内造像（图四）与白塔寺藏文款造像的艺术风格非常近似。不论是更趋藏化的面部刻画，还是匀称又不失柔软的肌体塑造，都在白塔寺此尊造像上得到了完美表现。因此，白塔寺这尊佛造像应与白居寺内的佛造像属于同一时代的雕塑作品。

在兴建于1464年的贡嘎曲德寺中，其壁画中的佛陀形象（图五）在造型上也类似于此尊造像，但面相更为长圆，躯体更为消瘦，自然写实之风逐步展现，尼泊尔艺术元素进一步被削弱，西藏本地艺术元素得到进一步增强。从明代藏传造像



图四 白居寺中的佛像



图五 贡嘎曲德寺壁画上的佛像

艺术的发展来看，西藏本土造像艺术在15世纪下半叶开始爆发，逐渐取代了早期以尼泊尔造像艺术为主的造像艺术表现形式，这些变化在贡嘎曲德寺的壁画上得到印证。而在更晚一些的，铸造于1495年的扎塘寺大成就者金铜组像（现存于敏珠林寺，图六）上能够看到尼藏造像艺术的影子，但如同现实人物般的雕塑风格，流畅生动的身姿展现，完全是西藏本土艺术爆发后的造像作品，与白塔寺此尊藏文款造像有了本质上的变化，也从侧面印证具有更多尼泊尔造像艺术特征的此尊藏文款造像应早于15世纪下半叶。

其二，白塔寺藏文款造像上身着袒右肩袈裟，下身着僧裙，僧服轻薄贴体，凸显出肌体轮廓，如同汉地造像中的“曹衣出水”，这一表现僧服的形式来自于早期印度造像艺术，从现存于世界各大博物馆中的马土腊风格造像、笈多风格造像、帕拉风格造像乃至尼泊尔风格造像上，都能见到类似的僧服表现手法。但与仅在袖口、脚踝处刻线表示身着僧服的萨尔纳特风格相比，此尊造像明显受到了汉地造像注重写实衣纹刻画的影响，在僧服的多个位置以凸出的棱线表现衣纹的叠压褶皱和承接转合，力求表现出佛祖禅定冥思时的庄严法相。尤其是腿部僧裙衣纹以三条弧度不一的曲线刻画出人类盘坐时的瞬间状态，令人观之仿若真实再现。

此种衣纹表现手法应是模仿自明代永宣宫廷造像（图七），只是在衣纹的转折



图六 敏珠林寺内的大成就者造像



图七 拉萨大昭寺藏明永乐四臂观音铜镀金造像

关系和立体构造上，明代永宣宫廷造像更加生动、贴近现实。明代永宣宫廷造像主要用于赏赐西藏上层僧侣，为朝廷推行的“多封众建”的宗教笼络政策服务。由于永宣宫廷所铸造像造型秀美、风格雅致，备受当时西藏僧俗的追捧，其模仿作品也层出不穷，涌现出一批雕塑大师，如来乌群巴大师就因为铸造的造像与明代永宣宫廷造像难分伯仲，而被世人誉为“来乌群巴利玛”。

西藏造像艺术自元朝以后，汉藏交流日益频繁，汉地造像艺术元素开始逐渐影响藏传造像艺术。如近期开始被世人了解的元大都风格造像，其艺术风格就带有很明显的汉地元素，如方圆的脸庞、平直的五官以及汉地的衣纹刻画。15世纪后，随着明朝宫廷的颁赐，越来越多的汉地造像作品出现在藏族雕塑大师面前，汉地造像艺术元素也更多地被应用于藏地金铜造像之上。尤其是15世纪下半叶以后，西藏本土造像艺术开始走向巅峰，其艺术流派的工艺大师或多或少都受到了汉地造像艺术

的熏陶，使得汉风更为炽盛，衣纹结构越来越复杂、层次越来越多、褶皱越来越程式化，从写实性开始向装饰化逐步转变。

再观白塔寺此尊藏文款造像，其僧服表现明显受到了15世纪初期模仿汉地造像艺术风潮的影响，舍弃了传统的萨尔纳特表现手法，转用立体写实的衣纹表现僧袍的自然状况。但刻画手法略显稚拙，衣褶更为平面化，立体度不够，部分衣纹的承接关系较为生硬，其铸造者应是对汉地造像艺术有所了解，但技艺尚属融合阶段，还不能运用自如。在白居寺大殿和吉祥多门塔的造像中，类似的衣纹表现大量出现，都是以平面化的褶皱展现衣服的婉转接合，以生硬的曲线棱条突出衣纹的叠压关系。偏早一些的夏鲁寺造像虽然也出现了一些衣纹的层叠，但萨尔纳特风格的衣纹形式仍占据绝对主流。而在贡嘎曲德寺的壁画中，明代宫廷造像的衣纹样式已大量被运用，衣褶婉转流畅，手法自然纯熟，非是此尊藏文款造像可相比。可见，白塔寺藏文款造像应为汉地造像艺术初兴的14~15世纪藏传金铜造像。

其三，白塔寺藏文款造像的僧服上还镌刻有精美纹饰，图案华丽，工艺精湛。其纹饰可分为三种主要图案，即四叶稻粒纹饰（图八）、缠枝团花纹饰、七政八珍（图九）及黄财神纹饰（图一〇）。僧服边缘的四叶状图案，其叶片形状颇似稻粒，与13、14世纪佛造像僧袍边缘的稻粒纹饰近乎一致。只是13、14世纪佛造像的稻粒纹饰多呈八字状（图一一），白塔寺藏文款造像的纹饰则变成四叶状，应是在13、14世纪稻粒纹饰的基础上演化而来。

缠枝团花纹饰的中心为三瓣花瓣包裹花心，如同牟尼宝珠形状，最外围有些为绽开的多个花瓣，有些为边缘多曲的花瓣，并有缠枝莲茎将团花连接。此种缠枝团花纹饰兴起于后弘初期，随着尼泊尔造像艺术越加注重装饰华丽化，使此种纹饰盛行于14~15世纪的西藏中部地区造像和绘画艺术作品中。在夏鲁寺壁画和白居寺



图八 白塔寺藏文款造像上的四叶阴刻图案



图九 白塔寺藏文款造像上佛教八宝图案的拓片

壁画（图一二）上此种纹饰均有出现，尤其是边缘多曲的花瓣样式在白居寺壁画中可谓随处可见。16世纪之后，随着西藏本土造像艺术占据主流，写实风格成为造像的首选样式，这种更具装饰化的缠枝团花图案逐渐消失，被更贴近实际的花卉纹饰所取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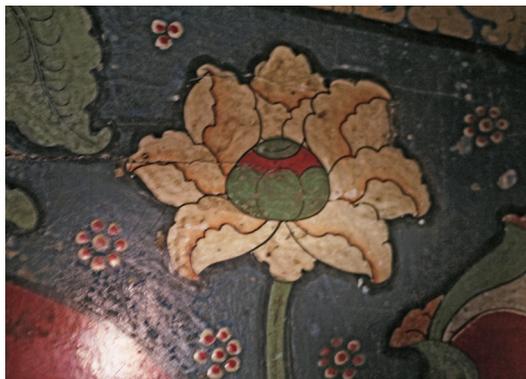
另外，在僧袍团花图案中，还依次绘制缠枝莲托轮王七政宝、佛教八珍宝及黄财神等具有实际宗教寓意的法器和神灵纹饰。其中佛教八珍宝为藏族特有的排列习惯，比如长与瓶相连、鱼和盖相接，随着汉藏艺术的交融，后期更多采用轮、螺、伞、盖、花、瓶、鱼、长的汉地偏好排列顺序。黄财神的图案出现于左肩背后处，财神束高发髻，戴华丽五叶冠饰，面庞方



图一〇 白塔寺藏文款造像上的黄财神和团花阴刻图案



图一一 白塔寺藏13世纪释迦牟尼铜镀金造像上的八字形稻粒纹饰



图一二 白居寺壁画上的团花图案

正，面容寂忿，毛发、胡须刻画十分细腻，躯体比例匀称，非晚期的短粗身材，下身着长裙，衣纹飘逸婉转，背后有法座式样的背光。整尊造像全身比例合理，肌体自然写实，背后的法座状背光在15世纪西藏中地区的壁画中也经常出现。可见，白塔寺藏文款造像的纹饰为15世纪早期的常见图案。

其四，白塔寺藏文款造像全部为红铜材质，最底下有连接底座的榫卯。在莲座缺失的情况下，已高达115厘米，如配上标准仰覆莲花座，将高达150厘米以上。且此尊造像并非站立像而是跏趺姿态的坐像，宽度也达到100厘米，铸造这样一尊巨大的金铜造像所耗费的红铜将达到惊人的数量，更别提镀金所需要的金子及其他各种辅助材料。众所周知，西藏不是红铜产地，其制作佛像所需大部分的红铜要靠购买，没有巨大的政治实力和超群的财力是无法铸造此尊金铜造像的。

在铸造工艺上，此尊造像也堪称精湛，全像采用分体铸造、榫卯连接，再在外层镀金。从造像内部观察，连接处连接非常紧密，榫卯十分稳定坚固，并没有出现一般分体造像的连接处不紧密、榫卯变形、连接不牢固等问题，从外表看如同一体铸造，可见铸造工艺之精良。

其篆刻工艺也非常精细，在很狭小的空间内刻画了多种图案（图一三），且篆刻表面为佛像躯体，起伏不平，而图案仍能表现如此精准，细部也一丝不苟，令观者对雕塑大师赞叹

不已。如黄财神图案在很小的区域内，将须发表现得纤毫毕现；七政宝图案中将军宝、国王宝、王后宝仅凭阴线刻画，就能一眼辨清，非大师级技艺无法达到。由此，可断定此尊造像绝非一般寺院所能出资铸造，而应是由具有大量财力物力的大型寺院聘请能工巧匠方可完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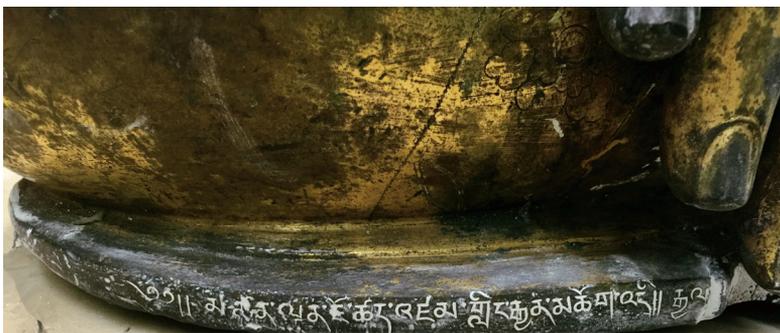
### 三、造像的藏文刻款

除了造像艺术风格的判断，在白塔寺此尊造像的底部，还阴刻有藏文款识（图一四），记述了造像的铸造年代和施资者，为我们判断此尊造像的艺术风格、铸造年代和铸造地点提供了有力依据。

藏文刻款阴刻于造像最底下与底座相连部分的立面上，依据藏文文法规范，为偈颂形式，共分为八句，每句九个词汇。由于造像残损，其中第二句缺失第二至第五



图一三 白塔寺藏文款造像上篆刻的法轮图案



图一四 藏文款造像上阴刻铭文的局部

个词汇，其余词句保存完好。其译文为：

具佛相世界庄严之此像/为杰……钦  
贝桑波的/以法相随好严饰之本尊/由大菩  
萨索南坚赞制作/无比（造像）于牛年落  
成/此吉祥尊像令佛法弘扬/愿此像施主及  
无量众生/速速得证无上菩提果位。

由于西藏地区在古代受限于地理环境、政治、宗教等原因，人民普遍受教育程度较低。因此，在许多造像的铭文中，都会出现错词、病句，如发音相同的词汇被错误使用、句子存在语法表达错误等。从此像的铭文刻书来看，用词规范、书写准确、雕刻精细，绝非一般人员所能制作，证明此尊造像应出自于大型寺院。

在铭文的第四句和第五句中，分别叙述了此尊造像的施资者和铸造时间。

通过上文对白塔寺藏文款造像艺术特征的归纳和分析，此尊造像展现了更多的15世纪中前期西藏中部造像艺术特征，与白居寺造像应归属于同一时期。在此时期内，能够符合身属大型寺院并且具有绝对话语权、调动大量人力物力财力铸造巨大佛像以及法名为索南坚赞的高僧，最为符合的就是帕竹噶举派高僧索南坚赞。

根据西藏史料记载，索南坚赞父名达波释迦仁青巴，母名思纳仁青仲，共育有六子，长子即为明史上著名的阐化王扎巴坚赞，索南坚赞为第五子，于藏历火虎年（1386年，明洪武十九年）出生。据传，他是一个睁着眼睛睡觉的孩子，幼时心思聪明、勤敏好学，师从众多高僧大德学习诸种密法，并很快就能精通。同时，他还召集众多对佛教哲理通达的人士共同研习经义，并专心修行。在不懈的努力之下，他得到了完全证悟，能对过去所学的所有经教一阅而皆通晓<sup>①</sup>。

索南坚赞在他32岁时，担任了丹萨替寺寺主一职，并任职到他49岁圆寂<sup>②</sup>。在此期间，纳塘寺的大堪布珠巴喜饶，将纳塘主寺和各支寺全部供献给他。在金厄·索札巴圆寂的法会后，达隆法王握着索南坚赞的手说道：“启请你登上此座，

为了噶举派，目今达隆寺的寺主除你堪任外实无他人。”说后当即撒赞颂吉祥的花朵，百拜顶礼。就这样由这位修行自在师主持了达隆寺<sup>③</sup>。

同时，这位高僧还是格鲁派创始人宗喀巴大师的嫡传弟子。在宗喀巴大师的众多弟子中，索南坚赞被称为担任寺主的三大弟子之一<sup>④</sup>。

另外，1432年阐化王扎巴坚赞圆寂后，对谁接任座主一职，诸官员争论不休，最后由索南坚赞确定扎巴迥乃继任帕竹座主，“此话谁也不敢违背”。“新木虎年的正月二十二日，京俄仁波切死于贴寺”。随后，帕竹爆发内乱，史称“虎年大乱”<sup>⑤</sup>。

由此可见，索南坚赞身处帕竹政权最为兴盛的时期，不仅是帕竹政权朗氏家族的嫡系成员，还是能决定政权重大事务的权力者，同时还长期担任几座大型寺院的寺主职务，完全能够调动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进行佛寺、佛塔和大型佛像的修建和铸造。他出资修建寺院和造像的记载，也在各种史料中屡有发现：西藏的芒卡尔雪贡寺就由京俄索南坚赞创建，寺院落成后宗喀巴大师亲自开光。后成为泽当五供寺的分寺，故称“雪贡五供寺”<sup>⑥</sup>。在索南坚赞46岁时，用珍宝建造了一座佛塔，其中的佛像也较其他佛像更为美妙<sup>⑦</sup>。

在藏文刻款中提到此尊造像完成于“牛年”，也能在索南坚赞的生平中找到契合的时间节点。上文提到索南坚赞在其46岁时，即公元1431年，开始在丹萨替寺建造一座法王灵塔。从现存的丹萨替灵塔照片来看，每座灵塔体量十分巨大，其上的佛像数量繁多。根据黄春和老师的研究统计，灵塔周边的佛像少则2900余尊，多则达到3000余尊，且材质优良、工艺精湛，因此灵塔和金铜造像绝非短时间能够建造完成，其时间跨度必然很大。索南坚赞圆寂于公元1434年，且是正月内圆寂，所以，此灵塔和金铜造像应是完成于1432年或1433年，尤以1433年的可能性更大，

而1433年正是藏历第七绕迥水牛年，符合刻款年代的描述。

铭文的第二句虽然缺少四个词汇，但通过藏文语法规则和上下文关系可判断此句描述了一位高僧，这位高僧在修法时的本尊为此尊造像所展现的佛教神灵。这位高僧的名字应为“杰……钦贝桑波（藏文转写为rgyal'……chen' dpal' bzung' po）”，中间缺少4个词汇。“贝桑波”一般单独构成修饰词汇，意译为“吉善贤”，常用于法名的末尾，在一些文献中“贝桑波”会忽略不写。而“杰”后缺失4个词汇，并以“钦”收尾，显然，“杰”在这段铭文中，应是与其他词汇组成表示尊敬的修饰词汇，同“贝桑波”一样对人物法名的判断直接影响不是很大。而在此段赞颂偈语中，描述了索南坚赞依据这位高僧所修持的本尊铸造了此尊造像，显然这位高僧应为施资人索南坚赞尊敬的长辈，而以“杰”开头的藏语词汇中，“杰瓦（rgyal' pa）”多用于对长辈的尊称，为“佛尊”的意思。而余下的4个词汇，按照藏族取名的习惯，应为这位高僧最为通用的名号，因此，“钦”应为高僧名号的关键词。而以“钦”为结尾用于法名的藏语词汇并不多，最为常见的为“仁钦（rin' chen）”，意译为“至宝”的意思。上文提到京俄索南坚赞的父亲名叫“达波释迦仁钦巴”，而在其他的文献中其名字为“释迦仁巴”<sup>⑧</sup>，结合两个名号的异同，以及“达波”和“巴”在藏语中多为尊称，而非名号组成成分，因此，索南坚赞的父亲可称为“释迦仁钦（xia' kya' rin' chen）”。而“释迦仁钦”即符合以“仁钦”为结尾，字数也

与缺字数相符。如果第二句补全为“杰瓦释迦仁钦贝桑波（rgyal' pa' xia' kya' rin' chen' dpal' bzung' po）”，语境与全文内容完全吻合，且语法也没有错误。据此，第二句所描述的高僧为索南坚赞的父亲释迦仁钦的可能性极大。

综上所述，此尊造像带有鲜明的尼藏造像艺术元素，以近乎完美的造型和艺术魅力展现出15世纪西藏中部地区的金铜造像艺术特征，对研究和鉴别15世纪中前期西藏中部造像艺术的整体风格和艺术风貌具有重要意义。同时，依据对藏文刻款的研究和分析，此尊造像极可能是由帕竹噶举高僧、丹萨替寺寺主京俄索南坚赞于公元1433年亲自主持铸造完成，这为总结15世纪中期帕竹噶举的政治、宗教活动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证据，也为丹萨替造像艺术的研究打开全新探索方向，具有极其重要的历史和艺术价值。

①③⑦ 拉科·益西多杰编译：《藏传佛教高僧传略》，青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161-162页。

②⑤（明）班钦·索南查巴著，黄颢翻译：《新红史》，西藏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61-62页。

④（清）第悉·桑结嘉措著，许德存翻译：《格鲁派教法史——黄琉璃宝鉴》，西藏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86页。

⑥（清）第悉·桑结嘉措著，许德存翻译：《格鲁派教法史——黄琉璃宝鉴》，西藏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86-187页。

⑧王森：《西藏佛教发展史略》，中国藏学出版社，2002年，第284页后附表一《帕木竹巴世系表》。

（作者为白塔寺管理处馆员）

# 首都博物馆藏慈寿寺及永安寿塔 发现造像初步研究

刘 丞

2013年前后，首都博物馆（以下简称首博）在整理北京市文物研究所移交文物时，将一共九尊发现于北京慈寿寺永安寿塔的造像分别登入国家文物大账，定三级品。笔者通过对其入库凭证等资料的查看，翻阅历年简报及出土报告，并没有发现有关这几尊造像的出土资料，仅在《北京出土文物》<sup>①</sup>一书中发现了这九尊造像的图版说明。在书中，这九尊造像均标明为海淀区慈寿寺塔出土，年代为明代，名称依次为铜鎏金武士立像、铜鎏金武士立像、铜鎏金捧印武士立像、铜鎏金武士立像、铜鎏金武士立像、铜鎏金武士立像、铜鎏金托塔天王立像、铜鎏金文臣坐像。笔者对这几尊造像的身份以及制作年代进行了初步考证，试图补全文物信息。

根据造像题材分类，我们可以将这九尊造像分三类。其中一类为天王像，如

图一（带座高36.5厘米）、图二（高34厘米）、图三（高34厘米）、图四（高46.5厘米）；一类为武士像，如图五（高36厘米）、图六（高37厘米）、图七（34.5厘米）、图八（35.5厘米）；一类为文官像，如图九（高45厘米）。在展开分析之前，我们来了解一下这九尊文物的出土地点——北京慈寿寺及永安寿塔。

## 一、慈寿寺及永安寿塔

史料记载“慈寿寺去阜成门八里，圣母慈圣皇太后所建，盖正德间大钊谷大用故地。”<sup>②</sup>“出宫中供奉金，潞王、公主、宫眷、内侍各捐汤沐”<sup>③</sup>，“委太監杨辉董其役”<sup>④</sup>。“经始于万历四年二月至六年仲秋既望落成”<sup>⑤</sup>，“外为山门、天王殿，左右列钟鼓楼，内为永安寿塔，



图一 铜鎏金天王像



图二 铜鎏金天王像



图三 铜鎏金天王像



图四 铜鎏金托塔天王立像



图五 铜鎏金捧印武士立像



图六 铜鎏金武士立像



图七 铜鎏金武士立像



图八 铜鎏金武士立像



图九 铜鎏金文官像

中为延寿殿，后为宁安阁，旁为伽蓝、祖师、大士、地藏四殿，繚以画廊百楹，禅堂方丈三所。又赐园一区，庄田三十顷食僧众，以老僧觉淳主之，中官王臣典领焉。”<sup>⑥</sup>可见，慈寿寺及永安寿塔，由万历皇帝的亲生母亲慈圣皇太后出资修建，始建于万历四年（1576年）二月，至万历六年八月十五日（1578年9月16日）落成，地点在阜成门外八里处。

如上文所述，慈寿寺的寺庙布局与一般汉传寺庙无异，都是“伽蓝七堂制”的模式。在乾隆年间，励宗万在考察京师古迹时对慈寿寺内的景物进行了更加详细查探：“今查：寺共五层。山门、金刚二，东、西列钟、鼓楼，次天王殿。殿后为塔，塔前角亭二：列韦驮、龙王像。塔后角亭二：观音碑一，鱼篮碑一，俱万历年建。殿供三世佛，旁列阿难、迦叶二尊，罗汉十八尊，俱铜像。殿前东、西碑二，

亦万历年建。其配殿二：东为壮缪，西为达摩。殿后为毗庐阁，阁上为毗庐佛，阁下为观音阁。前配殿东亦观音，西则地藏。东西画廊百间。由中仪门入，为弥陀殿；由东仪门入，为慈光阁，则九莲菩萨画像存焉，由西仪门入，则铜像观音阁也”<sup>⑦</sup>。

可惜，光绪年间的一场大火使得慈寿寺沦为废墟，仅存了寺中的永安寿塔（图一〇）。史料记载：“入山门即有窳堵波，高入云表，名永安塔，华焕精



图一〇 慈寿寺中的永安寿塔

严。”<sup>⑧</sup>窣堵波是佛塔中的印度塔的一种形式，为梵文stūpa的音译，在中国泛指佛塔。而名曰“永安塔”而不是永安寿塔，阎崇年认为这应为《万历野获编》的作者沈德符的省略所致。《长安客话》也记载到：“其宝塔巍峨截薛，不但为京师冠，暮钟初动，神灯倒垂，普照八极，焰摩匪遥，佛光可接。”<sup>⑨</sup>当时京师比较高的塔应为妙应寺的白塔，塔高约为51米，而永安寿塔建成后，塔高达56.5米，加之其坐落在小山丘之上，感官上比白塔寺高了许多，因此有了“京师冠”的说法。关于宝塔的形制，周肇祥在《琉璃厂杂记》中特别提到了永安寿塔：“塔十三层，摹影天宁，精丽过之。基以上作神兽负重状，间以石中嵌佛像。左右侍佛各像一，取梵经故事，以方砖雕造，环列古茂，如武梁祠汉画。每段有天王像，为界画，而额其端字已脱落。上为铜造莲瓣形，莲上布石栏，八面有门扉，涂朱，环涂金。天王守护威猛骞动如生，额曰永安万寿塔。云气缭绕之，更上始为层矣。土人盗塔下砖，近周以垣。”<sup>⑩</sup>其中提到的“摹影天宁”中的“天宁”就是指北京著名的辽代佛塔——“天宁寺塔”。永安寿塔与天宁寺塔的形制相仿，都是密檐式实心砖塔，塔身十三层，是北京的重要历史标记。

由此可见，慈寿寺及永安寿塔作为京城著名寺庙建筑，有着极高的历史和艺术价值，现今仅存的永安寿塔，更是因其外形玲珑挺秀，被人们亲切地称为“玲珑塔”，成为了京城著名的景观之一。

## 二、慈圣皇太后的崇佛活动

关于这座寺庙建造的原因，阎崇年先生在《慈圣太后与永安寿塔》一文中进行了分析。他认为此寺修建的原因表面上是如张居正《敕建五台山大宝塔寺记》所述：“我圣母慈圣宣文皇太后，欲创寺于此，为穆考荐福，今上祈储，以道远中止，遂于都城建慈寿寺以当之。”<sup>⑪</sup>用于给穆宗

祈冥福、给万历祈子嗣。而深层次的原因则是慈圣皇太后为了抬高身价，自诩九莲菩萨。这也说明了慈圣皇太后乃至明代晚期的皇廷对于佛教信仰是极其重视的。

佛教自嘉靖年间毁佛运动之后，至万历年间，才开始它的复兴之路，慈圣皇太后正是这条道路的最重要的开拓者。《明史》记载这位皇太后道：“顾好佛，京师内外多置梵刹，动费巨万，帝亦助施无算。”<sup>⑫</sup>可见此举也得到了明神宗皇帝的大力支持。《酌中志》曰：“神庙在宥，孝侍两宫圣母，琳宫梵制，遍峙郊圻；丹篆梵文，无远弗届。”<sup>⑬</sup>正是由于慈圣皇太后及神宗皇帝的推动，佛教信仰在明代晚期开始复兴，佛教造像艺术也重新焕发了新的生命。

## 三、慈寿寺永安寿塔出土造像

### 1. 天王像

慈寿寺塔发现的四尊天王像，根据题材正好符合佛教中四大天王的组合形式。元代沙啰巴所译的《药师琉璃光王七佛本愿功德经念诵仪轨供养法》中记载：“东方持国大天王，其身白色持琵琶，守护八佛东方门……南方增长大天王，其身青色执宝剑，守护八佛南方门……西方广目大天王，其身红色执罽索，守护八佛西方门……北方多闻大天王，其身绿色执宝叉，守护八佛北方门。”<sup>⑭</sup>前文所示，万历年间慈圣皇太后曾经修建过多座寺院，时至今日，大部分寺庙已经损毁，寺内供奉的佛像也不得而知。所幸万历年间修建的千佛寺及其供奉的佛像一直保存至今，使得我们有机会将这两个相同建造时期发现的造像进行比较。千佛寺为“万历九年孝定皇太后建”<sup>⑮</sup>，“铸毗卢世尊一，坐莲花宝座，而千佛旋绕四向，若朝者然，铸十八罗汉、二十四诸天，及塑伽蓝、祖师、天王等像，各请置如法”<sup>⑯</sup>，后来这座千佛寺在“雍正十一年奉勅重修，赐名拈花寺”<sup>⑰</sup>。这座寺庙一直没有对外开

放，但是寺内供奉的佛像却已经被奉至他处。其中二十四诸天中的十八位到了白塔寺内，而四大天王现存于法源寺内<sup>⑥</sup>。那么我们就可以将法源寺存的四尊同样为天王题材的造像与永安寿塔造像进行比对，来明确后者这几尊天王的身份及其制作时代。

如图可见，图一一为多闻天王像，慈寿寺塔出土的造像中未见与其形制相仿的天王像；图一二为广目天王像，与图三中的天王造像相仿，图三天王像左手持宝珠，右手握螭龙（有的地区也做胃索）的形象应为广目天王；图一三为增长天王像，与图二中的天王造像相仿，均右手持宝剑，故图二应为增长天王；图一四为持国天王，与图一中的天王造像类似，怀抱琵琶（已失），左上手上举握琵琶琴柄，右手掐指撩拨琴弦。另外，我们还可以通过天王前面衣袍侧摆的方向进行其摆放位置的判定，由此来确定造像身份。如图一持国天王像和图二增长天王像的衣袍侧摆方向一致，应为放在同一侧的缘故，这也符合汉传寺庙中四大天王的摆放顺序，西北为多闻天王，西南为广目天王，东北为持国天王，东南为增长天王。两组天王像从细部比较，头上均为佛冠，身穿甲冑的样式均为明代常见的山文甲，脚面均佩戴明代特有的卫足装饰，胸部的束甲绊及腰部帛带的打结方式也是一样的，衣袍边缘的花瓣形制和刻画上都极为相似。另外在

慈寿寺发现的持国天王像足下踩的山形台座也是明代常见的天王像底座。结合慈寿寺塔的建造时间，我们可以确定这三尊天王像也应为万历朝早期制作。

余下的一尊托塔天王像，明显有别于其他三尊天王像。首先从尺寸上看，其他三尊天王像均高约34厘米左右，而这尊托塔天王像为46.5厘米。其次这尊托塔天王尽管头冠、甲冑样式上都与其他三尊相似，但是其细节的刻画却远不如其他天王像生动、传神，如甲冑及衣袍的局部刻画、飘带的灵动性上以及手部刻画精细程度和写实性上就明显不如其余三尊。尤其是身材比例上也有所失调，与明代晚期汉地那些头大身短的佛像异曲同工。因此，笔者认为这尊托塔天王像的制作年代应晚于其他三尊天王像。关于“托塔天王”这个定名，并不是很准确，容易与小说作品中的李靖形象混淆，更为准确的称呼应是“多闻天王”或“毗沙门天”，卢弘正在《兴唐寺毗沙门天王记》中记载“毗沙门天王右手持兵钩，左手持宝塔，因能摧群魔、护佛寺”<sup>⑦</sup>，这也说明手托宝塔的形象也是多闻天王的形象之一。将其定名为“多闻天王”后，这一组四个天王像就可谓齐全了。结合这尊多闻天王的前面衣袍侧摆与出土的广目天王方向一致这一个细节，笔者推测，或许由于原配的多闻天王像遗失或损坏后，导致后世重铸或重寻了一尊多闻天王像以将四大天王的供奉形式



图一一 铜多闻天王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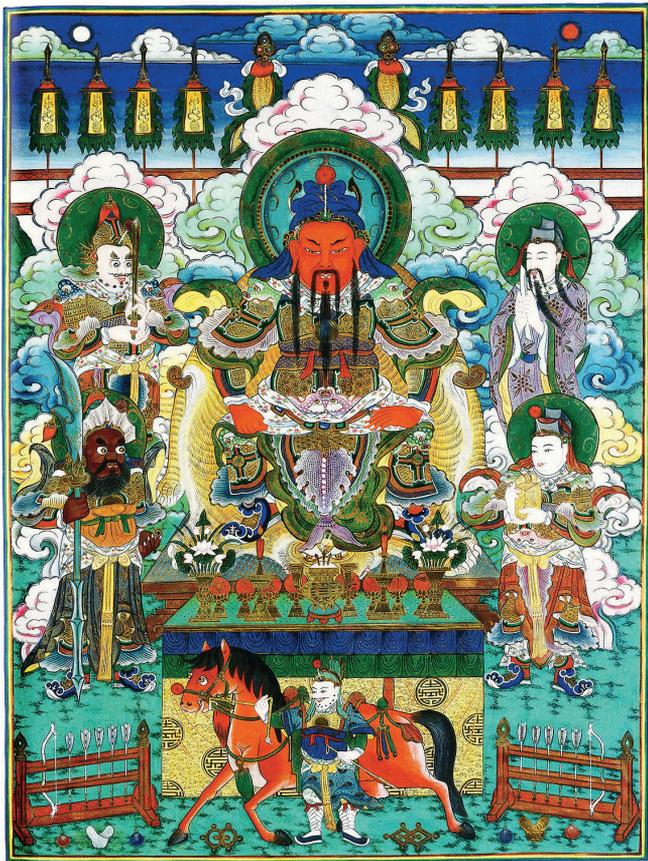
图一二 铜广目天王像



图一三 铜增长天王像



图一四 铜持国天王像



图一五 雍和宫藏关帝唐卡

补全。

## 2. 武士像及文官像

这组造像中有四尊武士像。四尊武士像的风格基本统一，体量相当，均高约36厘米左右，身上以外披锦袍为主，甲冑着于内。风格上看，这几尊武士像与同寺发现的天王像的造型极为相似，尺寸相当，做工流畅自然，人物比例匀称，面部生动写实，应为同时期制作的造像。通过简单图像分析，可以初步得出图五和图六这两尊造像的身份，应为关平和周仓。图五这种双手捧印的武官多为关羽义子关平的形象特征，图六符合常见的关羽麾下大将周仓虬髯、头戴檐帽，手握关羽青龙偃月刀的形象，这二人的形象在民间极为普遍，较好辨认，在此不做赘述。但是其余两尊并不多见的武士形象和一尊文官像的身份却不好确定。因为已经确定了关平和周仓

的身份，所以笔者试图通过关公崇拜组合的研究，来推断其他三尊造像。由五人组合而成的关羽崇拜，多为关羽、周仓、关平、赵累、王甫这组人物搭配。这个组合在清代以后的关帝庙中随处可见，如福建东山关帝庙、广西桂林恭城武庙等地，至今都是关羽端坐中央，两旁侍立关平、赵累、周仓、王甫。这一组合还见于雍和宫所藏的一幅关帝唐卡（图一五），图像正中为关羽，他左后方站立的是王甫，左前方为关平，右后方为赵累，右前方为周仓，前面是一个牵赤兔马的马倌。

依这样的图像对剩下的三尊造像进行辨识就清晰了许多。首先可以判定其中一个穿着品级明显较低的一位武官像（图八），他左手持物类似马鞭（残缺），而右手高举，头略上扬，似做牵马状，应为马倌。无独有偶，在目前北京白云观内的文昌殿门前有一尊与此件武官像造型相同的造像，其定名为“魁星”（图一六）<sup>⑨</sup>。

此像原为白纸坊附近的三教寺所藏，后经文物主管部门批准移到了白云观保存，一共有22尊。根据相关封藏和史料记载，三教寺是万历年间皇后为皇太后祈福所建，因此这批造像同慈寿寺的造像一样，均为万历年间。通观这批造像的风格，也与来自慈寿寺的造像基本一致，这为判定这批慈寿寺造像的年代提供极为可靠的依据。但是众所周知，魁星多为独占鳌头的点斗形象，从没有过此种样式出现，结合殿内供奉的孔子和朱熹的形象被人广为质疑这一因素，将马倌定为“魁星”或为宗教仪轨的需要，并不科学准确。

而另一位站立的武官（图七）颌下留须，腰间佩剑，双手平举捧持笏板（已



图一六 白云观文昌殿前魁星像

失)。造型样式和衣貌特征均与周仓、关平相仿，应为关羽之部属。根据《三国志》和《三国演义》的记载，结合民间信仰，关羽常见的部属为赵累、王甫和廖化，根据《三国演义》述说，赵累随关羽败走麦城，之后被斩。王甫得知关羽死后，自杀殉义。廖化被孙吴俘获后，诈死回归蜀汉，担任先锋。如前文所提，赵累和王甫经常和关羽共同供奉，或与他们与关羽共同赴死有关。在山西解州的关帝庙中还修有部将祠，供奉赵、王二人，其中赵累为武将形象，王甫为文官形象。那么此像极有可

能是武将赵累。

最后这尊文官像（图九），它的体量是这组造像中最大的，高为45厘米，结合关羽供奉组合的需求，运用反向推理的方法，笔者发现这尊文官造型的形象就是组合中的主尊——关羽像。最主要的证据都集中在此尊造像的面部特征上。关羽的样貌特征中最为后人所熟知就是其美髯及丹凤眼，《三国志·蜀志·关羽传》中记载诸葛亮给关羽的信中，称马超“未及髯之绝伦逸群也”，陈寿也说“羽美须髯，故亮谓之”。至此以后的，各种小说、戏剧中均将关羽“美髯公”的形象加以夸大，雕塑、绘画等艺术作品更是依照文本还原其“美髯”的形象。而“美髯”的样式也有虬髯到三络，再到长髯的变化之说<sup>⑤</sup>。此尊文官像正好符合关羽三络长髯的特色，同时我们用著名的关羽题材绘画作品、明宣德年间宫廷画家商喜所绘的《关羽擒将图》（图一七）<sup>⑥</sup>。进行比对，也可以发现此尊文官像胡须样式与画中关羽是完全一致的。再看此像紧蹙眉头、凤眼细眯的形象，与常见之关羽形象更是如出一辙，一模一样。

笔者通过与首博收藏的一尊乾隆时



图一七 故宫博物院藏《关羽擒将图》



图一八 首都博物馆藏乾隆时期关公像

期关公像（图一八）比较，发现二者的面部特征几乎完全一致。只是这个谦卑、温顺的文官关公形象与我们常见威武霸气的武圣关公所表现的气势有所不同。笔者认为，正是这种不同的气势反映出此尊造像或为万历初年所建造。根据史料记载，关羽在明嘉靖十年（1531年）的封号还是“汉寿亭侯”，直到万历十八年（1590年）才加封为“协天护国忠义大帝”的尊号。这就说明，到万历后期，关羽地位得到跃升，奉为帝君，出现了后世常见的头戴王冠、身穿王袍的关帝形象。所以慈寿寺中有这样一个低调做派的关公造像也合乎关羽地位改变的历史状况，可以作为其为万历初年制作的辅证之一。将历史人物穿着官袍供奉于寺庙的传统，在万历朝并不是仅此一处。前文提到了白云观文昌殿的“孔子”和“朱熹”，有学者考证应为“诸葛亮”和“文天祥”<sup>⑧</sup>，笔者也同意这一观点，这也为关公身穿官服的形象提供了一个宫廷造像习惯的依据，还反映了明代“三教合流”意识形态在宗教艺术领域的表现。

这种五人的关公崇拜信仰的造像组合，笔者还未在其他资料中发现。常见的关公崇拜信仰的组合多为如雍和宫所示的五人组合，或将王甫和赵累换为王灵官和

张林而成的五人组合<sup>⑨</sup>。如果慈寿寺的这批造像未有遗失的话，这种组合样式也为研究关羽供奉仪轨提供新的研究方向。

### 3. 关于万历时期的宫廷造像风格

众所周知，明代造像在嘉靖以后有所衰落，大部分佛造像的比例失调，形成了“头大身短”的造型。但慈寿寺出土的这几尊造像，除了前文提到的托塔天

王像外，其余的造像却是身材比例匀称，表情生动，举止自然。这应是受到了明代初期永宣宫廷造像风格的影响。明代的宫廷风格源起自永乐和宣德时期，当时的皇帝为了柔化人心，稳定藏区政权，敕封了诸多法王，又安排宫廷御用监铸造刻有“大明永乐（宣德）年施”铭文的造像施赐给这些宗教领袖。永宣时期的宫廷造像艺术风格融合西藏、尼泊尔和汉地的艺术风格，自成一格，既体现了宗教艺术的繁缛华丽，也凸显出了皇家的大气磅礴，是佛教造像艺术上的巅峰之作。但是在永宣之后，几乎没有见过有同样工艺水准并铭刻铭文的宫廷造像，仅能在明代部分藏传佛教寺庙中发现受此风格影响的造像，如现北京石刻艺术博物馆的金刚宝座塔上具有诸多此种风格的佛像雕塑。在经历了嘉靖抑佛之后，受慈圣皇太后及神宗皇帝崇佛的影响，万历时期的佛教再度兴盛，佛教艺术也迎来较大的发展。藏传佛教在嘉靖年间深受打击，因此万历年间宫廷内信奉的多为汉传佛教，同时由于受到嘉靖时期对于儒道两教崇拜的影响，佛教的发展大量吸收了儒道的精髓，向着三教融合的趋势发展。慈圣皇太后的崇佛活动也明显有着三教合一的特征，如首都博物馆藏慈圣皇太后款识的水陆画中就有着大量儒释

道合流题材的作品，而前文提到的三教寺正是这种思想在宗教行为上的体现。这种宗教信仰内容的变化也影响着佛教艺术的风格形式变化。万历时期的寺庙修建多是由皇家组织督建的，因此寺庙内的造像风格必定是反映了万历时期宫廷的艺术审美风格，虽无宫廷之名，但有宫廷之意。所以，我们通观本文提到的慈寿寺发现、白塔寺现存和白云观现存的万历朝时期造像，从题材的设定、造像服饰的表现手法都凸显汉地佛教的特点，但在人物的身材比例上却遵从了藏传佛教的造像度量经标准进行制作，没有明代晚民间造像多见的那种比例失调、体态臃肿的表现，实为万历时期明代宫廷造像之典范。

#### 四、小结

慈寿寺发现的这组造像是研究北京明代晚期造像艺术风格很好的标准样式。通过研究这些有具体发现地点的造像可以更加明确万历时期早期“宫廷”样式造像的艺术特征，为鉴别明代晚期的造像提供了有力的依据。同时由于这批造像为成组出现，因此为宗教供奉仪轨的研究也提供了很好的实物资料。本文仅对几尊出土造像进行了初步的研究和考证，在资料不全的情况，多加推测，也望知晓这批文物出土具体信息的人员或机构能够将其公布，方便研究者参考。本文不妥之处，还望指正。

①北京市文物研究所编：《北京出土文物》下册，北京燕山出版社，2005年，第576-584页。

②③（清）于敏中等：《日下旧闻考》，北京古籍出版社，1985年，第1611页。

③④⑥（清）于敏中等：《日下旧闻考》，北京

古籍出版社，1985年，第1612页。

⑤（清）于敏中等：《日下旧闻考》，北京古籍出版社，1985年，第1612-1613页。

⑦（清）励宗万：《京城古迹考》，北京古籍出版社，1981年，第16-17页。

⑨（明）蒋一葵：《长安客话》卷三，北京古籍出版社，1982年，第60-61页。

⑩周肇祥：《琉璃厂杂记》，北京燕山出版社，1995年，第163页。

⑪（明）张居正：《张太岳文集》卷三，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第151页。

⑫（清）张廷玉等：《明史》卷一一四《孝定李太后列传》，中华书局，1974，第3536页。

⑬（明）刘若愚：《酌中志》卷十六《内府衙门职掌·汉经厂》，北京古籍出版社，1994，第116页。

⑭台湾财团法人佛陀教育基金会：《大正新修大藏经》第十九卷《密教部二》，1990年，第47页。

⑮（清）于敏中等：《日下旧闻考》，北京古籍出版社，1985年，第875页。

⑯北京图书馆金石组编：《北京图书馆藏中国历代石刻拓片汇编》第五十七册，《新建护国报恩寺千佛寺宝像碑》，中州古籍出版社，1997年，第101页。

⑰（清）于敏中等：《日下旧闻考》，北京古籍出版社，1985年，第876页。

⑱详见黄春和《白塔寺》中记载，华文出版社，2002年，第183-185页。

⑲（宋）李昉等：《文苑英华》卷八一九。

⑳㉓王宜峨：《陶铸永恒：道教神像的塑造工艺与经典造像》，五洲传播出版社，2014年，第231页。

㉔参见泥牛：《关羽的美髯》，《明清小说研究》2003年第4期。

㉕单国强主编：《故宫博物院藏文物珍品大系·院体浙派绘画》，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2007年，第15页。

㉖梅红：《大英博物馆收藏的五幅关帝年画考》，《宗教学研究》2012年第3期。

（作者为首都博物馆馆员）

# 谈非物质文化遗产京西太平鼓的保护

魏宇澄

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定义,非物质文化遗产指被各群体、团体、有时为个人所视为其文化遗产的各种实践、表演、表现形式、知识体系和技能及其有关的工具、实物、工艺品和文化场所。各个群体和团体随着其所处环境、与自然界的相互关系和历史条件的变化不断使这种代代相传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得到创新,同时使他们自己具有一种认同感和历史感,从而促进了文化多样性和激发人类的创造力。

“太平鼓”历史悠久,是一项流行在中国北方的北京、河北、辽宁等地区的民间舞蹈表演艺术。它在历史上几经盛衰,在京西地区已经流传了二三百年的。太平鼓自明代已在北京流传,清初的京城内外,太平鼓极为盛行,明清大量诗文对此有所记录。在清代,太平鼓已传入门头沟地区。历史上门头沟很多村落几乎家家户户都会击打太平鼓。在作为“天朝大国”的清代宫廷中,旧历除夕要击打太平鼓,取其“太平”之意,所以北京也称太平鼓为“迎年鼓”。太平鼓在每年的腊月 and 正月最为活跃,在当地的岁时民俗活动中很吸引人,百姓们击打太平鼓更是对太平盛世、国泰民安的期盼。打太平鼓不仅可以烘托节日气氛,在某种程度上也可以折射出北京地区的节庆习俗(图一)。

太平鼓经过了多代人的口传身授,至今一直保持着朴实无华、健康活泼的艺术特色。现今在北京地区流行的太平鼓集中于西部的门头沟、石景山、丰台、房山等



图一 永定河文化博物馆藏京西太平鼓(素鼓)

地区,由于地理方位的原因,人们习惯地称这种民间舞蹈为“京西太平鼓”。

在这四个地区中,以门头沟的太平鼓最具有代表性。太平鼓作为一种老百姓自娱自乐的民间舞蹈,深入门头沟人民的心中。从区域东部的永定河边到西部的百花山下,几乎每个村子的村民都有打太平鼓的传统,从历史上以采煤业为主的工矿区,到西部以农林为业的深山区,到处都可以听见太平鼓的“咚咚”声,太平鼓是门头沟区在春节前后最普遍的一种民间文化活动。

2006年5月20日,经国务院批准,由门头沟区申报的“京西太平鼓”被列为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2008年,石景山太平鼓、丰台区怪村太平鼓被列为“京西太平鼓”的扩展项目,也列入了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为了与外省市的太平鼓舞蹈加以区别,门头沟区在进行非物质文化遗产申报的时候,特意在“太



图二 永定河文化博物馆藏京西太平鼓

平鼓”的前面，加上了“京西”二字，正式把这种民间舞蹈的名称定为“京西太平鼓”（图二）。

京西太平鼓作为历史悠久的地域性民间舞蹈样式，在新时期得以延续，风生水起，生命力得到新的诠释和升华，应当是有效保护的结果。所谓保护，就是使文化遗产得到传承延续，我们需要采取怎样的措施，如何保护，保护什么，谁来保护，等等。保护是一个长期的过程，这个过程是对文化遗产进一步确认的过程，也是文化进一步传承、发展、创新的过程。对于京西太平鼓的保护在文化传承与创新中的作用，门头沟区的实践工作对我们有所启示。

## 一、开展普查、调研是保护工作的基础

“中国民族民间文艺集成志书”的编撰，是新时期非物质文化遗产抢救与保护工作中令人瞩目的成就，对京西太平鼓的传承、保护有不可低估的示范作用。被誉为“中国文化长城”的“中国民族民间文艺集成志书”，其编撰及普查、研究、出版工作的启动，是我国20世纪抢救与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宏大工程，涵盖了民间文学、民间音乐、民间舞蹈、戏曲、曲艺5个艺术门类的10个领域。

1983年，北京市民间舞蹈集成编辑组董敏芝、阮兰玉和门头沟区文化部门的董秀森、焦志刚等工作人员深入民间搜集、

整理太平鼓艺术，并应用在创作实践中，取得了可喜的研究成果。当时条件艰苦，到各个村落的道路都是土路，汽车不通，他们下乡时乘坐130卡车，将自行车一同带到乡里，然后再骑车下村，深山区的村落分散，有的完全靠步行，每次下乡都要几天再返城。门头沟区具有典型性代表的太平鼓老艺人高殿启、李全友、阎锡青、鲁香林等人参加了这次太平鼓的传授工作。

门头沟文化馆副研究员董秀森曾长期致力于太平鼓艺术搜集、整理、研究。他回忆当年调查时的情景，太平鼓无论是鼓点、套路、绳歌完全没有文字流传，太平鼓的传承全靠口传心授，对保护和传承十分不利。经过整理的门头沟太平鼓被收入《中国民族民间舞蹈集成·北京卷》《中国民间歌曲集·北京卷》中，从口传心授到鼓谱、曲谱、歌词形成书面化。在采访和调查中，工作人员为太平鼓老艺人建档，做了录像，留下了宝贵的影像档案资料。现在的太平鼓，既有文字范本可考，又有音像资料可查。

京西太平鼓的有效保护首先得益于“中国民族民间文艺集成志书”这项工程的开展和实施。《中国民族民间舞蹈集成·北京卷》《中国民间歌曲集·北京卷》的搜集、整理、编撰对太平鼓的传承、保护至关重要，取得了丰硕成果。同时，这一普查、研究工作也促进了各项民间文化的保护工作展开。门头沟区本着对民间文化的重视和爱护，从20世纪80年代起文化部门开展广泛普查、调研工作，收集本地区民歌近400首，民间故事、传说400余个，民间小吃上百种，民间戏曲4种、剧目数十个，民间音乐曲谱100余首，民谣、民谚6000余条，整理记录民间花会16种40余档等。

这一过程培养锻炼了队伍，无论是专业文化工作者还是民间的太平鼓艺人，传承、保护、弘扬的意识得到明显提高，同时激发了文艺工作者的创作热情。1984年，门头沟组织300余人的太平鼓队伍参

加了国庆三十五周年的天安门游行表演；1988年，门头沟400人的太平鼓表演队参加全国农运会开幕式演出；1990年，门头沟800人的太平鼓表演亮相于北京第十一届亚运会开幕式上。

2002年在北京市的支持下门头沟区政府再次拨专款并组织人员对太平鼓以“保护北京民间艺术，打造门头沟特色文化品牌”为主题的挖掘、保护、弘扬工作。2002年京西太平鼓列为北京市民间文化重点保护项目。

无疑，普查工作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重要基础，不仅可获得大量珍贵的文化资源信息、资料，摸清了“家底”，同时为进一步的保护工作创造了条件。门头沟区在对京西太平鼓搜集整理的基础上，加大了对太平鼓文化的理论探讨，多年来召开不同层面的座谈会、研讨会、专家论证会等；20世纪80年代以来京西太平鼓研究成果显著，太平鼓艺术研究、太平鼓文化研究及历史研究的著述不断涌现，分别是董秀森的《京西太平鼓》、魏洲平的《关于太平鼓的有关问题》、梁云龙的《花会中的太平鼓》、李元强、潘慧楼的《京西太平鼓》。

区政府对太平鼓的重视，普查人员在整理、挖掘工作中的严谨态度，原始、详实的资料，为太平鼓的传承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同时理论工作的深入对太平鼓的保护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 二、“申遗”成功是京西太平鼓保护的重要里程碑

2005年京西太平鼓“申遗”工作开始，这一阶段工作的主要特点是门头沟区对京西太平鼓的传承、保护，无论在观念上还是在具体工作中，都已经达到比较自觉和积极的状态。

2005年，国务院办公厅下发了《关于加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意见》（国办发〔2005〕18号），同年，文

化部下发了《文化部办公厅关于开展非物质文化遗产普查工作的通知》（文办社图发〔2005〕21号），北京市人民政府办公厅下发了《关于加强本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意见》（京政发〔2006〕1号），对北京市各区县非物质文化遗产普查工作进行了具体的安排。

在这一重要节点，门头沟区以“申遗”为契机，组织动员上百名调查员深入村镇实地调查采集了数百种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在普查的基础上编印了《门头沟区非物质文化遗产普查项目汇编》《门头沟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论证报告汇编》等，共计40余万字，记录了40项普查项目，23项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其中申报北京市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项目11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3项。这次普查工作不仅对全区宏观性的京西太平鼓生存、发展状况作了调查、梳理，还对全区各村镇太平鼓状况做了详尽了解，进行填表登记。

2005年9月在进一步普查和整理的基础上，门头沟区文化委员会正式提出京西太平鼓申遗报告，申报北京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同时申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此项目在同一年顺利通过专家组的论证。2006年5月20日，经国务院批准，门头沟区申报的“京西太平鼓”被列为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2006年6月10日，京西太平鼓正式入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2008年，石景山太平鼓、丰台区怪庄太平鼓被列为“京西太平鼓”的扩展项目，也列入了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申遗”的成功，使京西太平鼓的保护进一步得到保障，发展有了质的飞跃，可以说是一个重要的里程碑，打上了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烙印，代表中国的民间传统文化走向更为广阔的世界舞台。

自2006年申办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以来，京西太平鼓得到繁荣发展，庆典、展演、庙会、舞蹈比赛、民间交流、国际交流等多层面立体式市场体系已经形成，参



图三 2006年京西太平鼓在首都博物馆表演



图四 1953年太平鼓舞蹈队

加有重大影响的活动是近年来京西太平鼓发展的一大亮点，显示出“申遗”成功活力，真正成为人们喜爱的民间艺术，成为门头沟的一张文化名片（图三）。

门头沟京西太平鼓“申遗”工作的成功，是对以往传承保护工作的一个确认，同时以此为起点，重新审视传承、保护工作中的问题，制定切实可行的措施、更加科学规范的计划，传承、保护工作进入到一个全新的、更高的发展阶段。

### 三、突破表演瓶颈，以创新促进保护

任何非物质文化遗产都是具体人文环境与自然环境的产物，在社会发展和转型中没有创新就会萎缩或消失。因此，对太平鼓的保护也必须主要抓好两点：一是保护。保护首先是传承，传承是保留原来的，不中断，在传承中保护；二是创新。创新不是重新开始，不是抛弃，而是在前人原有的基础上创新，使太平鼓在创新中发展，拓展生存空间和扩大积极影响，增强生命力。这也是时代赋予的任务，单纯的原封不动的保护是消极的保护，是萎缩，不进则退。

京西太平鼓的发展过程既是嬗变的过程，也是在尝试和创新中得到升华的过程。

1953年，西店村老艺人樊宝善组织

队伍参加北京市劳动人们文化宫的演出演员以门头沟煤矿工人为主，舞蹈名称为《和平鼓》。至此，太平鼓从街头巷尾登上舞台，开太平鼓舞台演出之先河（图四）。

1977年，门头沟区聘请东方歌舞团的田农和罗捷书与区文化部门的同志一起研究，从原始太平鼓舞蹈艺术中获取素材，编排了配乐舞蹈《胜利鼓》以表达庆祝粉碎“四人帮”、百姓为之欢欣鼓舞的愉悦心情，这一节目参加了国庆游园的调演并获得成功。

1984年，门头沟区组织300人的太平鼓队伍参加了国庆三十五周年天安门游行表演。这是首次参加大型的广场表演活动，参与人数创历史之最，为以后大型展演活动的人员组织、舞蹈编排取得了宝贵经验。

2006年，门头沟区太平鼓民间表演团第一次走出国门，参加“北京风情舞动悉尼”盛装游行活动，这是北京市组织的宣传北京和2008年奥运会的重大活动。为了适应国外的演出，时任总编导刘向阳对太平鼓的套路和舞蹈重新组合，突出亮点，突出神韵，队员着色彩明快的民族服装，营造喜庆气氛，演出获得巨大成功（图五）。

上述的表演成功，在太平鼓的发展和传承上有重要意义，它意味着太平鼓的突破和创新。首先，突破了太平鼓走向更大舞台的三个瓶颈，第一个突破是将原来适于庭院的太平鼓，既要保留主要套路的



图五 京西太平鼓舞台表演

原汁原味，又要适应于时代的要求，加入现代的舞蹈元素，对于舞台表演、行进中的表演进行了大胆尝试和实践，取得了经验。第二个突破是将原来少数人自发、即兴、自娱自乐的太平鼓，经过改编、创新，通过组织、复制，演变为可以多元舞蹈元素组合、众多数量人员参加的集体舞蹈。第三个突破是通过大胆创新尝试，将带有中国传统韵味和传统程式的曲牌与多元文化有机融合，使太平鼓在不同的国度、不同的语言和不同的文化背景下得到共鸣和认可，走出国门。

我们国家不断走向强大，拥有大国的风范。随着社会的发展，在广场、大街上表演越来越多，在大的场合表演需要大气的效果。经过数次改编的太平鼓大气磅礴、一往无前，体现了中华民族的崛起和复兴，体现了我们对中国梦的追求。

以上问题的突破和解决，实际上是探索、创新的结果，也有利于太平鼓的传承、保护、利用、发展。太平鼓艺术是活态的艺术，一成不变就没有出路和前途。通过创新，太平鼓焕发出新的生命力，不仅是民众参与的娱乐活动，同时已转化为体现民族精神文化内涵的表演，在传播、交流、审美、娱乐、庆典等多方面得到展示和提升，成为具有影响力的民族文化品牌。

传承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基本特点，进化是非物质文化遗产发展的基本规律，任何艺术的发展过程实际是继承与创新彼此融合的过程。传承不是脱离当下，发展

不是抛弃过去，在任何时代背景下，任何艺术形式的继承与发展，一定不是原有的艺术形式的复制与照搬，而是诸多因素的影响下在原有艺术基础上的再创造、再发展、再创新的过程。京西太平鼓成功地将继承与创新、保护与发展巧妙结合、有机结合、成功结合，保证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优秀基因”世代相传，又有利于促进在传承的基础上创新和发展，这应当是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应有的理念。

#### 四、重视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生态环境

民间文化的生态环境保持得好，因而与其相关的民间艺术事项得以生存和延续，这已经被越来越多的人所认识。

京西太平鼓是一项地域性民间艺术，是京西地区民俗文化、地域文化的沉淀。因此，对它的保护不仅仅是艺术形态的保护，还包括它生存的环境依赖。京西太平鼓传承至今，良好的文化空间和氛围不可或缺。

首先，门头沟有悠久的历史、独特的地理环境，及深厚文化背景，使其呈现文化的多元性、兼容性，既有浓郁的地方特色的民俗文化，也有丰富多彩的民间艺术。门头沟素有“民间花会之乡”的美称，百分之八十的村子都有自己的花会表演活动。太平鼓曾经在门头沟地区的近自门城镇、远至妙峰山，以及百花山下的黄塔村、军响村等地广为流传，虽然经历了各种现代艺术形式的冲击，但由于深受民众喜爱，太平鼓依然留存和活跃。

其二，门头沟地处京西山区，长期处于城市的边缘，保留了大量的古村落。这些村落最早在辽代成村，大部分是明清时期的古村落。其中被评为中国历史文化名村的有三个：爨底下村、琉璃渠村、灵水村，还有被评为北京市历史文化古街区的三家店村（图六）。至今，仍然保持古村落风貌的村落有50多个，是北京最为集中



图六 三家店村

的古村落群。这些村落不仅较好地保留了原生态的风貌和历史格局，同时承载着优秀的地域文化和民族文化。这些有形的乡村实体，是传统文化的土壤，对无形的、传统的、原生态的文化极为重要，不仅对保护有益，同时对传承有益。

在具有漫长农耕文明史的中国，古村落是传统社会的重要单元组织。门头沟的古村落因历史原因和地理条件不仅以农业作依托，还有繁荣的煤业、运输业、手工业、商业等，因此其文化遗存是丰厚的，呈复合型。至今，这些古村落既有物态的，也有不可触摸的大量非物质的文化遗存。

古村落是非物质文化遗产得以延续的最重要的文化空间。古村落这一空间格局的延续对沉淀其中的非物质文化的保护、传承极为重要。当前中国乡村社会在现代化大潮的冲击下，正迈入急剧的社会转型中。随着经济的发展，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新农村建设的不断推进，古村落的空间格局面临被打破和调整，如何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已成为我们面临的刻不容缓的课题，皮之不存，毛之焉附？非物质文化遗产所依赖的环境恶化可以导致其遭受侵蚀、甚至失传，已成为不得不正视的现实。

太平鼓在门头沟能得到有效的传承和保护，其重要原因之一即是许多古村落至今仍然保留着与之相辅相成的文化空间。受到人们尊敬的老一代艺人大都生活在农村，在他们的影响下村民自发组成的太平

鼓舞蹈队活跃在民众当中。作为新一代京西太平鼓传承人的高洪伟，门头沟艺术团的骨干演员被视为“团宝”的闫万喜、于德胜、李来水都是来自农村，高洪伟、于德胜来自三家店村，闫万喜、李来水来自琉璃渠村。至今，门头沟太平鼓艺术团的成员一半以上是来自农村的农民。

其三，京西太平鼓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延续至今，始终根植于广大农村的沃土之中，与劳动人民群众的生产、生活密切相关，表达着人们最朴素的情感，寄托着人们的祈愿，其特有的自娱自乐的艺术形式长久地在广大群众中广泛流传。

当今社会虽然来自各个方面的各种娱乐形式丰富多彩，但是太平鼓已经成为人们的精神寄托和生活的一个部分，成为能够自然地架构起人民群众之间感情的桥梁纽带，人们依然对其具有亲切感。这正是民间艺术的魅力。

## 五、小结

历史上太平鼓几经盛衰，命运多舛，在许多地区销声匿迹，但却在京西的很多古村落得以延续，这足以证明环境的重要，足以证明人们的感情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保护的重要。非物质文化的保护是基础，传承是核心，需要以创新促进保护。我们仍然要看到，随着社会的发展，社会文化活动日益繁荣，文化活动项目越来越多，外来文化与新兴文化对传统文化存在着冲击。在进入经济全球化的时代，伴随人们生活方式的改变，非物质文化遗产正面临流失的危险。这些都需要我们充分重视，坚持不懈地做好太平鼓的传承与保护工作，做到太平鼓艺术的可持续发展，想方设法地留住和记忆这些民间文化遗产，重温这些文化对于我们生命的意义。为了今天留住昨天，为了明天记住今天，也成为当代人的历史责任。

(作者为首都博物馆副研究员)

# 圆明园遗址公园大宫门区域 考古发掘简报

北京市文物研究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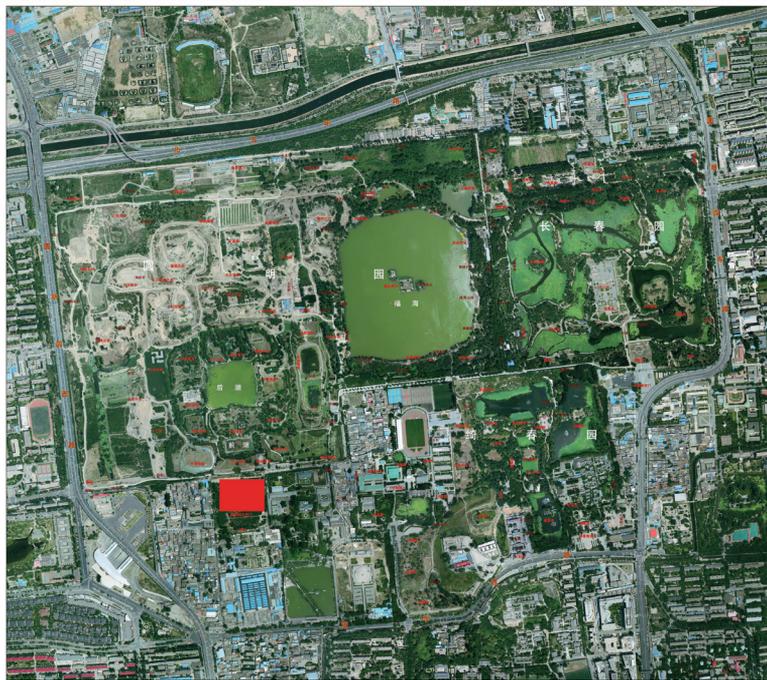
为配合圆明园遗址的保护与规划，经国家文物局和北京市文物局的批准，2013年10月至2015年12月，北京市文物研究所在前期调查和勘探的基础上，对大宫门区域内的部分遗址进行了考古发掘。这一阶段发掘的面积共计3000平方米。

## 一、地理位置与环境

大宫门区域位于圆明园遗址公园的西南部（图一）。其北侧为圆明园遗址公园

的西南段围墙，再向北（围墙内）即是正大光明景区；西侧为一亩园社区；南侧是西静园公墓；东侧为停车场，与福缘门路相连。此次发掘主要集中于大宫门区域的北部。

该区域在圆明园遗址公园的围墙之外，属于开放的、公众可自由出入的场所。地势平坦，地表种植有大量树木。此外，在该区域内的北部埋藏有电缆和水泥管道。



图一 大宫门区域位置示意图

## 二、发掘方法和地层堆积

圆明园大宫门区域的占地面积大，遗址分布广，考虑到考古工作的长期性和延续性，我们在发掘前对该区域进行了整体布方，每个探方均为10米×10米。

发掘区内的地层堆积较为简单，呈水平状分布。根据土质、土色和包含物的不同，可分为两大层。

第1层为现代垫土层，厚0.75~1.80米，土质较松，土色呈黄褐色。覆盖整个发掘区。

内含青花瓷片、砖块、琉璃建筑构件残块、三合土块等。

第2层为现代填土层，厚0.25~0.55米，土质较硬，土色呈黑褐色土，覆盖整个发掘区。内含石块、白灰渣、砖块、灰陶瓦片以及少量琉璃建筑构件残块。

第2层下叠压清代建筑遗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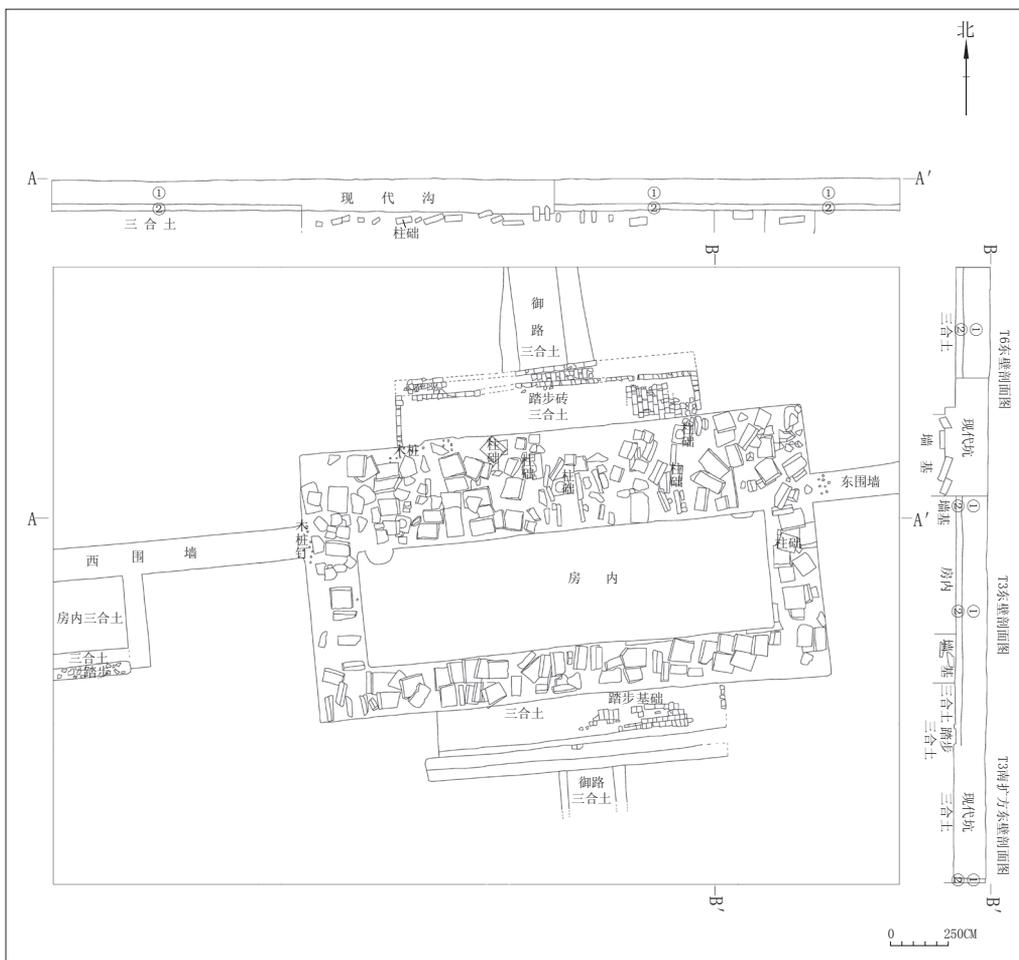
### 三、遗址的形制与结构

主要清理出了大宫门、西朝房、出入贤良门（二宫门）、东转角朝房遗址以及御河遗存等。

#### （一）大宫门遗址

大宫门遗址位于发掘区的南部，主要包括大宫门基址、踏步基础、御路

基址、围墙基址和右门基址等（图二，照片一）。大宫门基址平面呈“回”字形，东西通长22.20~22.30米，南北宽11.60~11.70米。中部为土芯，是大宫门室内地面的基础。根据土质、土色的不同，可将土芯分为上下两层，上层为黄土，下层为黑淤土。土芯平面为长方形，东西长17.80米，南北宽4.90米。土芯的四周为基槽。基槽内尚存大量石板，因遭后期扰动和破坏，无法确定原位。石板下是柏木地钉，地钉的直径为0.07~0.10米。大宫门基址内未发现礅礅遗存；残存的青石柱础数量较少，且已经移动，因此无法推定其柱网结构。石板为长方形，长0.55~1.25、宽0.25~0.71、厚0.20~0.41米。共出土柱础石7件，其中



图二 大宫门遗址平、剖面图



照片一 大宫门遗址航拍

6件位于北部基槽内，1件位于东部基槽内，均遭后期扰动，不能确定原位。柱础石平面为正方形，边长0.70~0.80米，厚0.30~0.40米。

大宫门基址外南、北两侧的正中分别为踏步基础。踏步基础南北相对，平面呈长方形，均用青砖错缝铺砌而成，保存状况较差。其中，北侧踏步基础东西长13.20米，南北宽2.75米；南侧踏步基础东西长13.10米，南北宽3.25米。青砖长0.44、宽0.21~0.22、厚0.08~0.10米。青砖下面为三合土。

踏步基础南北两侧的中部为御路的三合土基址，保存状况较差，呈中间略凸、两侧稍低的弧形，其中北侧御路基址宽2.45~2.50米，清理出4.20米；南侧御路基址宽2.10米，揭示出2米。御路基址分别向南、北两侧延伸，具体情况有待于进一步考古发掘。

大宫门基址外偏北的东西两侧各有一道呈东西走向的围墙基槽，且围墙基槽与大宫门基址内的基槽相通。围墙基槽宽1.40米，深0.45~0.50米。揭示出的东侧基槽长3.75米，西侧基槽长15米。东侧基槽的西端残存三列柏木地钉，地钉的直径为0.05~0.08米。围墙基槽分别向东、西两侧

延伸，具体情况有待于进一步考古发掘。

大宫门基址的西侧7.10米处为右门基址。右门基址平面为长方形，东西通长5.60米，南北残宽3.70米。右门基址的中部为三合土地面，东西长3.70米，南北宽3.10米。右门基址的东西两侧各有一道基槽，宽0.90~0.95米；北

侧与围墙基址相连接，已被破坏；南侧残存青砖砌筑的踏步基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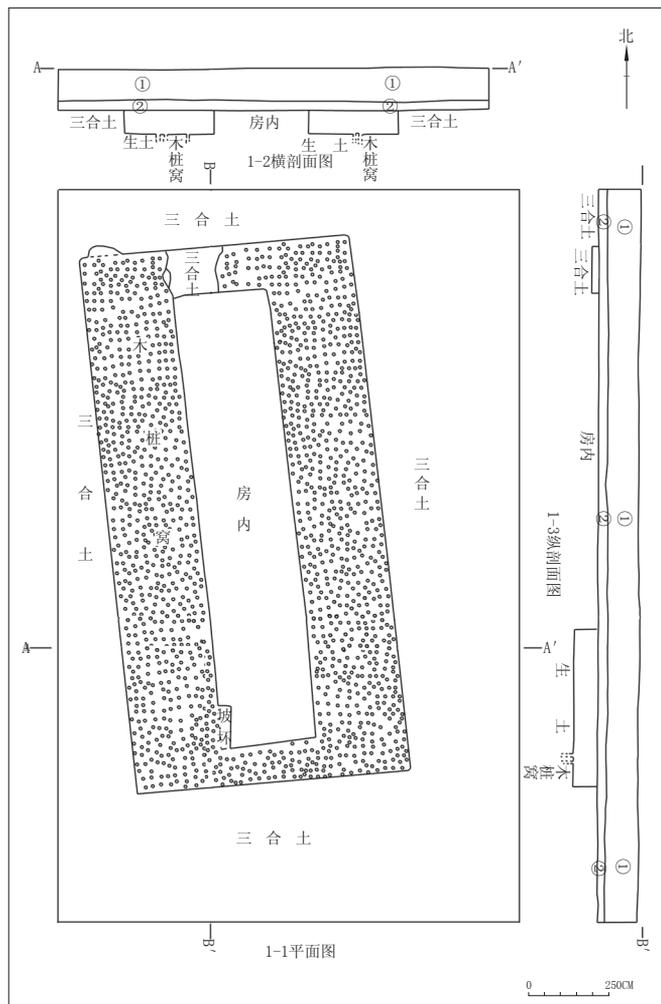
### (二) 西朝房遗址

西朝房遗址位于大宫门基址的西北部(图三；照片二)。西朝房遗址平面呈“回”字形，南北通长17.60米，东西宽8.90米。中部为土芯，是西朝房室内地面的基础。根据土质、土色的不同，可以将土芯分为上下两层，上层为黄土，下层为黑淤土。土芯平面为长方形，南北长14.80米，东西宽3.10米。土芯的四周为基槽。基槽内仅存少量柏木地钉。在基槽内的西北部清理出少部分三合土遗存，东西1.60米，南北1.50米。从三合土遗存的断面上看，可以分为两层，均厚0.17米。由于后期破坏严重，未发现礅礅遗存和柱础石，因此无法推定其柱网结构。地钉的直径为0.05~0.10米。

### (三) 东转角朝房遗址

东转角朝房遗址位于大宫门遗址的东侧，主要由朝房基址、墙基和排水道遗存组成。受现状道路和大量树木的限制，仅发掘了东转角朝房遗址的南、北两部分(图四、图五；照片三、照片四)。

东转角朝房的南部基址平面呈“回”字形，南北长8.75米，东西宽4.85米。中



图三 西朝房遗址平、剖面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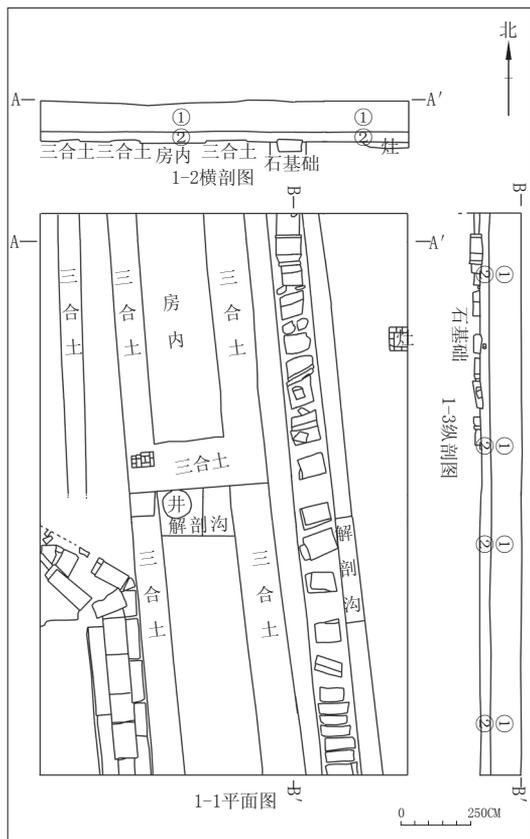
部为土芯，平面呈长方形，南北长7.10米，东西宽2.40米，是室内地面的基础。土芯的东、西、南三面为三合土基础。基址的南侧有两个相对的礅礅遗迹和遗存，其中东南角的礅礅仅存白灰遗迹，东西长0.65米，南北宽0.55米；西南角的礅礅保留有一层青砖，东西长0.75米，南北宽0.50米。青砖长0.24、宽0.12、厚0.05米。东转角朝房的南部基址向北仍有延伸，应可与东转角朝房北部基址的西端转折部分相连接。在东转角朝房南部基址的东侧发现了一道南北方向的墙基。此次揭示出的墙基南北长20米，东西宽1.35米，与东转角朝房的南部基址平行。墙基的底部为黑淤土，立柏木地钉，上面砌石块，



照片二 西朝房遗址航拍

其上再铺一层石板。该墙基向北仍有延伸，应可与东转角朝房遗址北部的墙基B段相连接；墙基向南也有延伸，具体情况有待于进一步考古发掘。在东转角朝房南部基址的西南侧清理出了一条排水道遗存，南北长9米，东西通宽1.85米，内部宽0.60~0.70米。排水道的底部铺三合土，两侧立石板，上面盖石板。排水道的南部为南北走向，北部向西转弯。排水道遗存向南、向西均有延伸，具体情况有待于进一步考古发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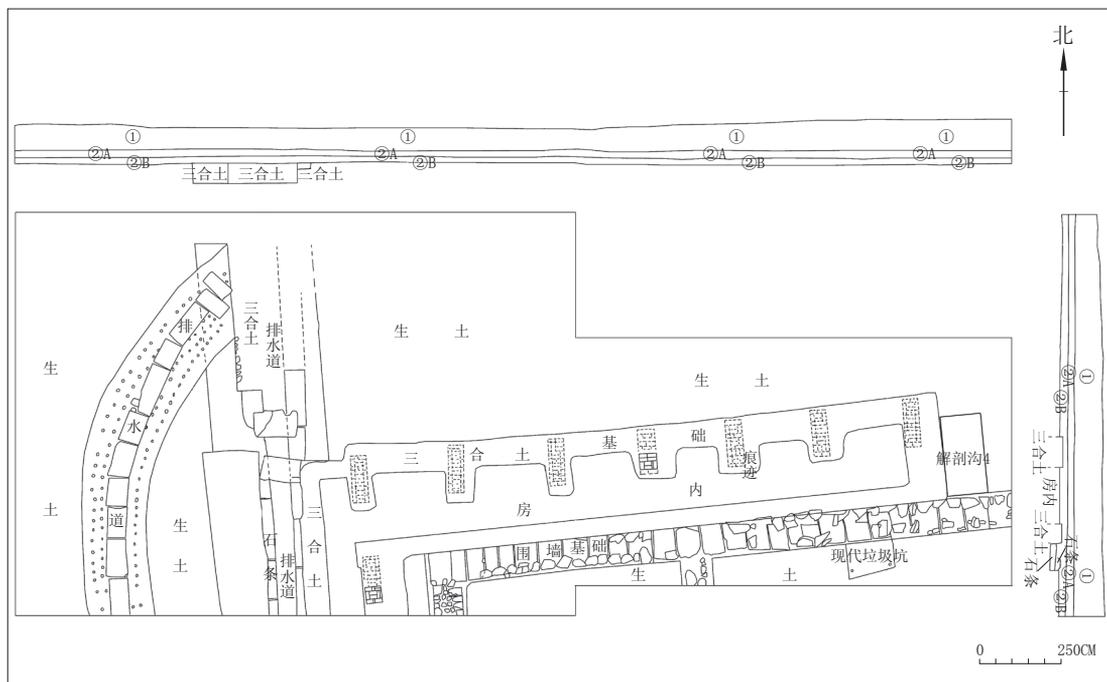
东转角朝房的北部基址平面呈“L”形，可以分为两段（A段和B段）；其相对位置是，A段位于东北，B段位于西南，两段于西北部呈直角相连接。A段基址平面呈“回”字形，为东西方向，通长20.70米，南北残存宽度为3.40米，中部为土芯，四周是三合土基础。三合土基础北侧的表面上残存7个礅礅遗迹和遗存，因此，可将这段基址分为6间。以三合土基础包围的土芯计算（因无法以柱础中心点之间的距离来计算），每间东



图四 东转角朝房遗址南部平、剖面图



照片三 东转角朝房遗址南部航拍



图五 东转角朝房遗址北部平、剖面图



照片四 东转角朝房遗址北部航拍

西1.35~2.30米，南北1.80~2.10米。其中，从东向西的第三间西侧的礅礅遗存南北长1.40米，东西宽0.55米，保留有一层青砖。青砖长0.24、宽0.12、厚0.05米。B段基址为南北方向，揭示出的长度为5米，东西残存宽度为3.30米。其东南角的三合土基础上残存1个礅礅遗迹，南北长1.50米，东西宽0.50米。B段基址向南延伸，应可与东转角朝房的南部基址相连接，具体情况有待于进一步考古发掘。

在东转角朝房北部基址的南侧清理出了一道墙基。该墙基平面呈“L”形，可以分为两段（A段和B段）；其相对位置是，A段位于东北，B段位于西南，两段于西北部呈直角相连接。墙基底部为黑淤土，立柏木地钉，上面铺石板，石板上再砌石块。墙基A段东西长18.80米，南北宽1.10米，与东转角朝房A段基址平行。揭示出的墙基B段南北长2米，东西宽1.05米，与东转角朝房B段基址平行。墙基B段向南侧延伸，应可与东转角朝房遗址南部的墙基相连接。墙基A段向东侧仍有延伸，具体情况有待于进一步考古发掘。

在东转角朝房北部基址的西侧清理出了两条排水道

遗存，其中一条排水道位于东侧，另一条位于西侧（照片五）。此次揭示出的东排水道为南北方向，平面呈长方形，长12米，东西通宽1.50米，内部宽0.75米，深0.50米。东排水道底部为三合土，两侧立石板，上面铺石板。此次揭示出的西排水道平面呈弧形，由南端转向东北，南北长12米，东西宽2.10~2.30米。西排水道仅保留有底部遗存，底部为黑淤土，立柏木地钉；中部铺砌石块和石板，两侧仅存地钉。地钉的直径为0.03~0.12米。这两条排水道的南部基本平行，东西间隔最宽处为2.10米；而西排水道的北部打破了东排水道，是否最终合为一条，尚不能确定。这两条排水道遗存向南、北两侧均有延伸，具体情况有



照片五 东转角朝房遗址北部的排水道

待于进一步考古发掘。

#### (四) 御河遗存

御河遗存位于大宫门遗址的北侧、出入贤良门(二宫门)遗址的南侧。御河遗存主要由河道、泊岸、水闸和桥基四部分组成。河道与泊岸的走向一致,大体为东西方向,与圆明园的围墙平行。河道内的堆积较为简单,上层为黑色淤泥,中层为黄色细泥沙,下层为较大的沙石颗粒和卵石。泊岸的结构大体相同,即由内向外(以临近河道的一侧为内侧)分三部分砌筑。内侧部分用石板砌成,保存完整的局部由下至上共有四层,其中下面三层的石板之间用“银锭锁”(或称细腰)加固(照片六);最底层石板的下面以柏木地钉和石块、砖块为基础(照片七);而最上面的一层石板(地袱)雕凿较为精细,用来安放栏杆。中部为青砖错缝砌筑的金刚墙,平面宽度为0.60~0.90米。外侧部分为三合土,平面宽度为0.75~1米;从断面上看,可以分为八层,每层的厚度为0.10~0.13米。受到一条东西向地下电缆



照片六 银锭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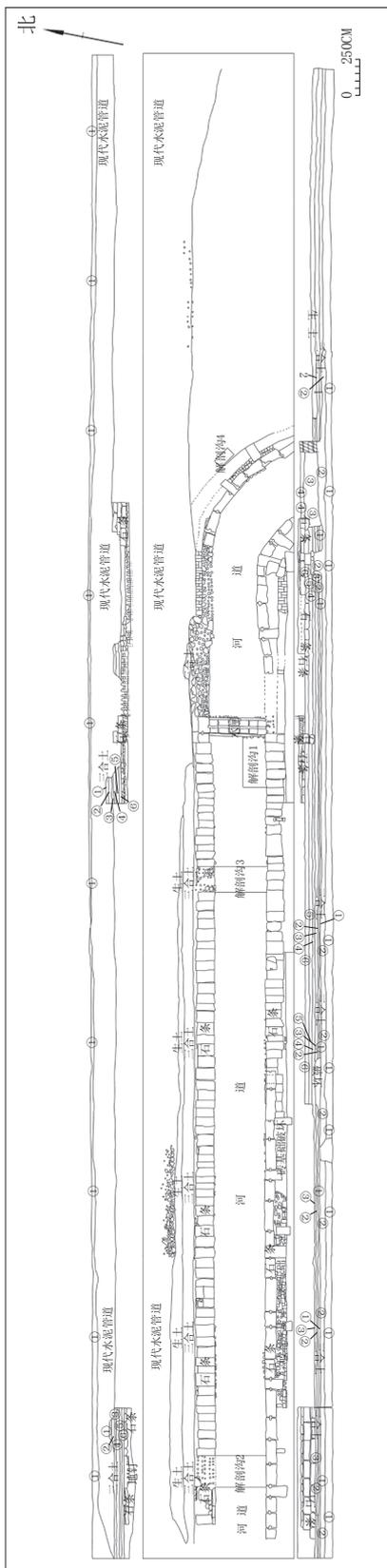


照片七 御河遗存泊岸的柏木地钉

的影响,考古发掘出的御河遗存被分为两段(A段和B段),A段东西长73米,B段东西长59米(图六、图七;照片八、照片九)。其相对位置是,A段位于西北,B段位于东南。河道的宽度为2.20~3.80米。

在御河遗存A段的中部偏东清理出了一处水闸基址(照片一〇)。水闸基址为南北向,东西宽1.30米,南北长3.80米。水闸基址由石板砌成,两端为闸墩,仅存一层石板,中部有凹槽。铺底石为一层石板,直接铺砌于地钉上;中间的6件石板平铺,中部有一道凹槽;东西两侧的石板立置。在铺底石的东、西边沿外各有一排柏木桩,起防护和加固基础的作用。

御河遗存的中部为石桥基址,与大宫门、出入贤良门(二宫门)、御路基址在一条南北向直线上。石桥基址东西长18.40米,南北宽11.80米。石桥基址主要由三部分组成,分别为泊岸北侧的青砖基础、河道内的铺底石和泊岸南侧的青砖基础。泊岸南、北两侧的青砖基础形制相同,平面为梯形,东西长16.10~18.40米,南北宽4米。河道内的铺底石分为三段(由西向东依次为A段、B段和C段),可知对应着三座石桥。石板为一层,南北方向平铺,石板下为柏木地钉、砖块和石块;铺底石的边沿外有一排柏木桩,起防护和加固基础的作用。铺底石A段南北长2.25米,东西宽2.40米。A段的南北两侧分别有三个砖砌基础,间距0.60~0.95米。铺底石B段南北长2.20米,东西宽5.02米。B段的南侧有四个砖砌基础,东西向排列,间距0.95~1.35米。铺底石C段南北长2.25米,东西宽3.03米。铺底石A段与B段、铺底石B段与C段之间,各有一段没有石板,将铺底石分割开来。铺底石A段与B段之间南北长2.40米,东西宽2.60米,其北侧临近泊岸处立三根木桩,南侧临近泊岸处立四根木桩。铺底石B段与C段之间南北长2.40米,东西宽2.55米,其南、北两侧临近泊岸处各立四根木桩。木桩的东西间距为0.45~0.60米。木桩



图六 御河遗存A段平、剖面图

露出河道的高度为1.20~1.25米（照片一一）。

柏木地钉的直径为0.06~0.10米。柏木桩的直径为0.14~0.16米。砌筑金刚墙的青砖长0.44、宽0.21、厚0.10米。银锭锁为铁质，锈蚀较为严重，长0.20、宽0.08、厚0.05米。砌筑石桥基础的青砖长0.42、宽0.21、厚0.09米。

#### （五）出入贤良门遗址

出入贤良门（二宫门）遗址位于御河遗存的北部。受到地上围墙、地下电缆和管道的影响，此次主要发掘了出入贤良门基址的南、北两侧。出入贤良门基址东西残长20~20.50米，清理出六个东西向排列的砖砌礅墩和青石柱础的南部，可知其面阔五间。出入贤良门基址的底部为三合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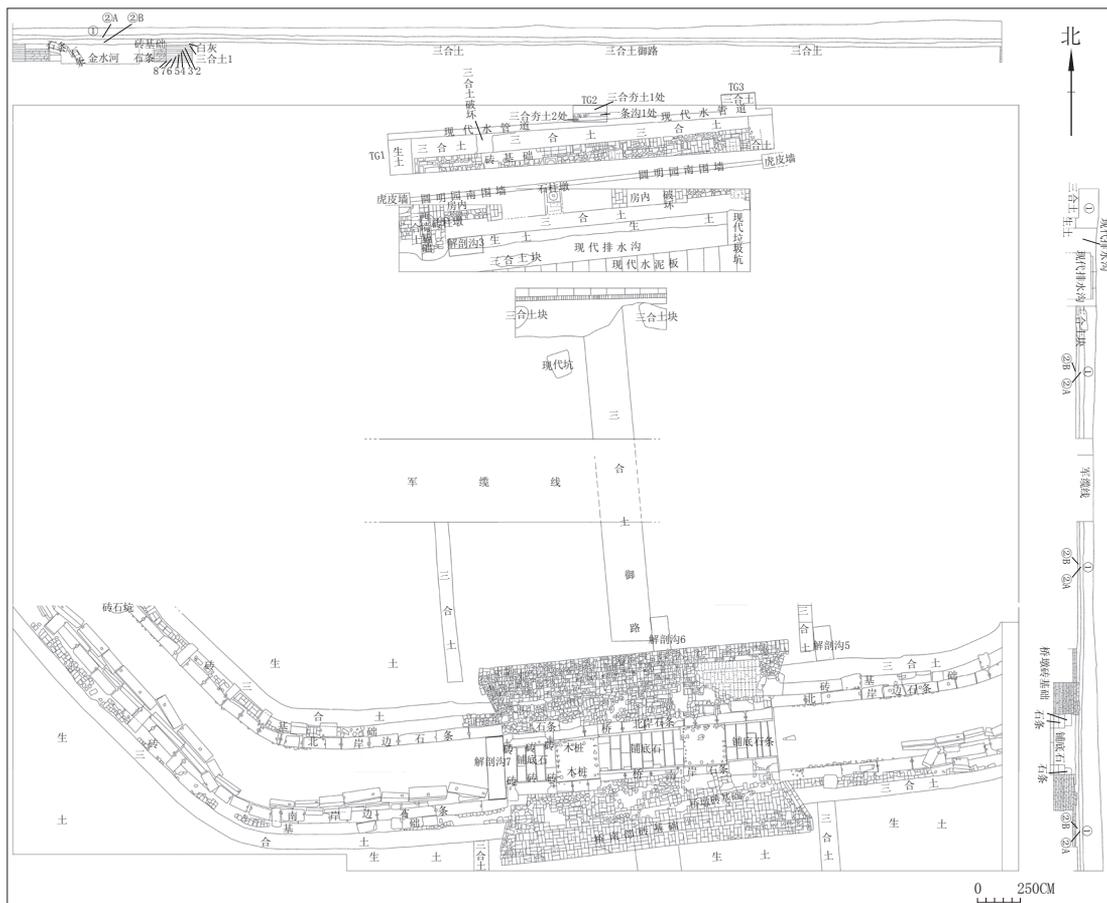
### 四、相关文献记载和图像资料概说

圆明园是清代皇家园林建筑，现存大量的文献记载和图像资料，这对于我们了解、认识和研究此次大宫门区域内考古发掘出的遗址的年代、布局、功能、性质、使用等方面，具有重要作用。

#### （一）文献记载

圆明园始建于康熙四十六年（1707年），初为皇四子胤禛的藩邸赐园。此时，大宫门区域尚未修建。雍正继承皇位后，圆明园成为皇家园林，随之开始了大规模兴建。“始命有司酌量修葺，亭台丘壑，悉仍旧观。惟建设轩墀，分列朝署，俾侍值诸臣有视事之所。构殿于园之南，御以听政。”<sup>①</sup>至迟于雍正三年（1725年），大宫门区域正式建成<sup>②</sup>。

关于大宫门区域内建筑的分布和格局，《日下旧闻考》记载是最早、最为详细、系统且可靠的文献之一。“园内为门十八，南曰大宫门，曰左右门，曰东西夹道门，曰东西如意门……”<sup>③</sup>大宫门是圆明园的正宫门，为南向门殿五间。其东西



图七 御河遗存B段、出入贤良门遗址平、剖面图



照片八 御河遗存A段航拍



照片九 御河遗存B段航拍



照片一〇 御河水闸遗存



照片一一 铺底石和木桩

分设左门、右门。大宫门前设东、西朝房各五间。东、西朝房的外侧分别为东、西转角朝房。东转角朝房为宗人府、内阁、吏部、礼部、兵部、都察院、理藩院、翰林院、詹事府、国子监、銮仪卫，及东四旗各衙门值房。东夹道内为银库，又东北为南书房，东南为档案房。西转角朝房为户部、刑部、工部、钦天监、内务府、光禄寺、通政司、大理寺、鸿胪寺、太常寺、太仆寺、御书处、上驷院、武备院，

及西四旗各衙门值房。西夹道之西南为造办处，又南为药房。大宫门正南为大影壁。出入贤良门俗称二宫门，位于大宫门北，为南向门殿五间。其左右有顺山值房各五间，为各部院臣工入值候旨之所。东、西各设一座罩门，东罩门为各衙门呈递奏折之处，俗称奏事门；西罩门为茶膳房太监人等出入之处。出入贤良门前有御河，形如弯月，中间修建石桥——贤良桥三座。在出入贤良门外、大宫门内亦有东、西朝房及转角朝房。直至咸丰十年（1860年），大宫门区域内的建筑除了小规模的、局部的、必要的

修补之外，没有发生过大的改变。据此，可以断定，建筑的整体布局和相对位置没有变化，同时建筑的基址部分也没有大的改动。

咸丰十年（1860年）十月六日，英法联军入侵圆明园，大宫门区域被法军占据，并遭到严重破坏。同治十二年（1873年），慈禧太后和同治皇帝重修圆明园，大宫门区域是其中的工程之一。至次年停工时，大宫门及左右门、出入贤良门等基

本重修成型。这是大宫门区域自建成后所经历的一次最大规模修建，也是大宫门区域的最后一次修建。根据刘敦桢先生的研究成果<sup>④</sup>，可以断定，这次重修没有改变建筑的整体布局，但是对建筑的地下基础应有所改动。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北京，大宫门区域又毁于兵匪之手。

我国木架建筑地上的、可见的部分主要由台基、柱梁和屋顶构成，相应的地下基础部分则不可见；前者的修、换往往不会对后者产生重大影响，也就是说后者的稳定性更强。而此次大宫门区域考古主要清理出的就是建筑的地下基础部分。据此，结合上文所述，以建筑地下基础部分的变动和建筑的增减为标准，可将大宫门区域内建筑的兴废大致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雍正建成后直至咸丰十年，增建或重修的情况较少，处于一个较长时间的稳定期；第二阶段，咸丰十年至光绪二十六年，因人为破坏而进行了重建，建筑的地下基础部分也应有所改动；第三阶段，光绪二十六年八国联军入侵直至新中国建立前夕，大宫门区域再次遭到人为破坏，其建筑的地下基础部分并没有改动。

## （二）图像资料

现存圆明园的图像资料较多，主要

可以分为图绘和烫样两大类，前者为平面图像，后者属于立体图像。其中，关于大宫门区域，公开发表的主要有《圆明园四十景》<sup>⑤</sup>中的《正大光明》和一些因设计、修建需要而绘制的图档。《正大光明》至迟于乾隆九年（1744年）就已完成，是现存图绘中年代最早的资料；其中所画的相关建筑主要有出入贤良门（二宫门）和东、西朝房，御河与石桥（照片一二）。图档资料主要有：北京故宫博物院藏1704号圆明园地盘图，是迄今唯一一张全面反映盛时圆明园风貌、记录乾隆、嘉庆、道光三朝圆明园变迁史最完整的档案<sup>⑥</sup>。底图绘于乾隆四十年（1775年）至四十二年（1777年）之间，持续修改至道光十一年（1831年）<sup>⑦</sup>。中国国家图书馆善本部藏《圆明园河道泊岸总平面图》，样式雷排架043—1号，绘制于乾隆中晚期，嘉庆早期进行局部修改。法国巴黎吉美博物馆馆藏圆明园格局全图，是流失国外的唯一一幅圆明园全园图，也是目前所知唯一一幅记录同治重修工程的总图<sup>⑧</sup>。

## 五、相关认识和探讨

第一，此次发掘出的遗址，主要是大宫门、西朝房、出入贤良门（二宫门）、



照片一二 圆明园四十景——正大光明

东转角朝房遗址以及御河遗存等，在空间分布、相对位置、平面形制等方面，大体与文献所记、图像所绘相吻合。

第二，大宫门基址和西朝房基址由于后期破坏严重，其柱网的分布状况并不清楚，只能依据文献和图像资料得以确定。东转角朝房北部基址的柱网分布较为明确，与文献和图像资料相吻合。但是其南部基址的柱网分布尚不明确，则需进一步考古发掘。

第三，从所发掘出的基址的结构、做法来看，围墙基址主要是由柏木地钉、石块和石板构成（如东转角朝房基址外侧的墙基）。木架建筑的室内基础主要是三合土；其中，重要建筑的立柱砌墙部分的基础（基槽）由柏木地钉、石块和石板构成，如大宫门基址；而次要建筑的立柱砌墙部分的基础（基槽）则由柏木地钉、石块和三合土构成，如西朝房、东转角朝房基址。排水道遗存主要由三合土和石板组成，其底部或筑三合土，或铺石板。御河的泊岸主要由石板、金刚墙和三合土构成，这与紫禁城内外河道泊岸的作法相同；有桥、水闸的部分，在相应的河道内才有铺底石作为基础，并用以加固。

第四，御河中部的石桥——贤良桥，《正大光明》中所画为一座，《日下旧闻考》等文献中所记是三座，而图档中所绘也并不统一。根据考古发掘出的桥基有三处铺底石，则可初步断定石桥为东西并排的三座。另外，据《竹叶亭杂记》记载：“贤良门外有河，河有桥，式如弓背。上看箭，鹄设于桥西河边，射者立桥北，北向而射。每发矢，上右顾以视其中否。岁己亥将桥拆平……”<sup>⑨</sup>此事发生于道光十九年（1839年）。此说是否确凿，还有待进一步考证以及对考古资料的进一步分析。

第五，此次发掘只清理出了部分围墙和道路的基址，因而其分布、走向、连接等具体情况，仍需进一步考古发掘。此次发掘出的3处地下排水设施，弥补了文献和图像资料的不足，但是其整体分布、具

体走向、坡度、与圆明园内部及与御河的联系等情况尚不清楚，仍需进一步考古发掘。

①（清）于敏中等：《日下旧闻考·国朝苑囿》卷八十，北京古籍出版社，2001年，第1322页。

②《雍正帝以母服未满暂不驻蹕圆明园事》，《圆明园》，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第8页。

③（清）于敏中等：《日下旧闻考·国朝苑囿》卷八十，北京古籍出版社，2001年，第1324页。另可参考徐珂：《清稗类钞·圆明园》第一册，中华书局，1984年，第164、165页。

④刘敦桢：《同治重修圆明园史料》，《圆明园》第1册，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7年，第124-128页。另可参考《奕谿等奏为择吉供梁折（附红单）》《总管内务府勘估园工钱粮折》《总管内务府奏请钦派大臣勘估园工钱粮折》《总管内务府奏请钦派大臣勘估园工折》《恭修正大光明殿等工程暂领银两呈》《恭修大宫门等工程领银两呈》《堂谕司谕档》，《圆明园》，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第642、652、677、705、707、709、1070、1127页。

⑤文中指现藏于法国国家图书馆的彩色绢本《圆明园四十景》。此外存世的还有沈源、孙祐所绘《御制圆明园图咏》，张若霁手绘《圆明园四十景图》等，其中以彩色绢本《圆明园四十景》的年代最早。可详参梁宪华：《故宫藏〈御制圆明园四十景诗〉》，《紫禁城》1999年第4期；贺艳：《圆明园图像史料辨析》，《圆明园学刊2008》；郭黛姮：《〈圆明园四十景〉图的价值》，《圆明园学刊2015》，上海远东出版社，2015年。

⑥端木泓：《圆明园新证——乾隆朝圆明园全图的发现与研究》，《故宫博物院院刊》2009年第1期。

⑦郭黛姮、贺艳：《圆明园的记忆遗产——样式房图档》，浙江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122页。

⑧王其亨、张凤梧：《法国巴黎〈圆明园地盘全图〉考辨》，《中国园林》2009年第12期。

⑨（清）姚元之：《竹叶亭杂记》卷一，中华书局，1982年，第5页。

执笔：孙 勳 张中华 曹孟昕  
照相：刘建国  
绘图：朱爱娟

# 首都博物馆存储系统架构研究

王 萌

首都博物馆（简称：首博）数字化工程是全馆的专业应用、日常业务办公的基础平台，同时也服务于向公众提供多媒体展示。在首都博物馆数字化工程建设中，我们建设了文化遗产和博物馆信息集成应用体系，涵盖了文化遗产和博物馆信息的采集、加工、管理、存储。这一完整体系的建立为博物馆的展览收藏、学术研究、行政管理、观众服务提供了一个一体化、完整、高效的服务平台和服务工具。当今博物馆发展要求数字化系统的技术性和质量指标应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应从传承文化遗产的角度，力求符合博物馆数字化的科学理念，充分体现博物馆数字化最新模式，使首都博物馆具备北京地区文博行业信息枢纽的独特地位。所以，做好首都博物馆数据存储系统的架构工作对首都博物馆业务运行来说是极其重要的。

我们注意到，首都博物馆目前复杂的网络情况和繁重的业务需求，已经给系统的运维与管理带来较大的压力，亟须改进。目前的存储架构将带来存储资源的更多浪费和重复投资，所以需要采用新的网络存储工具与虚拟化技术来满足当前的业务运行。

## 一、关于网络存储技术

如所周知，IT系统中产生的数据必须存储起来，以便在进一步处理时可进行访问。在IT环境中，用来存储数据的设备被称为存储设备。但是，这些设备的容量非

常有限，数据的可恢复能力也非常有限。所以，IT系统中需要使用更为专业的存储系统，如磁带、外部磁盘阵列等。一个大型的IT系统通过数据中心为整个系统提供集中的数据处理能力。数据中心保存和管理着大量的数据。首都博物馆也不例外。在博物馆中，图片、音视频等媒体资料及文物信息会被经常查阅和使用。所以，架构一个能支持快速访问和大容量的网络存储系统就显得日益重要。

### （一）网络存储结构

网络存储技术（Network Storage Technologies）是基于数据存储的一种通用网络术语。网络存储结构大致分为三种：直连式存储（DAS：Direct Attached Storage）、网络存储设备（NAS：Network Attached Storage）和存储区域网络（SAN：Storage Area Network）。每种存储方式都有自己的优点和缺点。

#### 1. 直连式存储（DAS）

DAS（Direct Attached Storage）是一种存储器直接连接到服务器的架构。这种结构适用于服务器数量较少的环境。就博物馆而言，适用于中小博物馆或业务系统单一的博物馆。但是，它也可作为大型博物馆的SAN和NAS的辅助。

#### 2. 网络存储设备（NAS）

NAS（Network Attached Storage）是一种采用直接与网络介质相连的特殊设备实现数据存储的机制。NAS提供服务器整合的优势，消除了对多个文件服务器的需求。它通过文件级的数据访问和共享，提

供存储的整合。NAS适用于那些已经建立了基础网络，需要大量的磁盘空间共享文件的博物馆。

### 3. 存储区域网络 (SAN)

SAN(Storage Area Network)是指存储设备相互连接且与一台服务器或一个服务器群相连的网络。它提供一个专用的、可靠性高的基于光通道的存储网络，SAN允许独立地增加它们的存储容量，也使得管理及集中控制（特别是对于全部存储设备都集群在一起的时候）更加简化。SAN性能好，但有局限性。SAN连接的设备数量和设备间的距离都受限制。

SAN真正综合了DAS和NAS两种存储方式的优势。SAN方式使博物馆可以得到一个具有不同寻常的扩展性的存储网络。SAN还可以提供快速数据访问。利用SAN方式，完全可实现存储的集中管理，从而能够充分利用那些处于空闲状态的空间。所以，SAN更适合像首都博物馆这样的大型综合性博物馆。

#### (二) 存储虚拟化技术

为了实现数据的集中管理与存储，可以通过虚拟化技术解决，虚拟化可以分为如下几个方面：

(1) 虚拟网格存储技术，无须关心存储放在哪里。

(2) 虚拟扩展技术，无须关心使用哪种存储。用户只需要访问主存储即可，根本不用关心其他的存储需要有什么样的访问规则。

(3) 存储内部虚拟化，无须关心数据保护与分布的细节。用户的任务就是把磁盘交给它，它负责搞定一切。

## 二、首博存储现状分析

首都博物馆是一个大型综合性的博物馆，总建筑面积63390平方米，办公区楼层7层，涉及信息点约500个，基础网络完善。另外，首都博物馆于2005年开展的数字化博物馆工程建成了一个集办公、保

管、研究、陈列的重要专业应用以及为公众提供多媒体展示应用于一体的基础软件平台。首都博物馆数字化建设围绕博物馆的保管、研究、陈列三大基本功能，将文物信息为主的各种信息形成数字化资源。数据分类有文物信息、电子行政档案、业务资料、图书系统、电子期刊、图片、视频、多媒体资料、邮件、系统文件等。用户通过各应用系统进行访问，映射到后台就是从存储设备上调取数据。多业务系统决定了需要多个服务器，同时对应多个存储系统。首都博物馆的存储系统基于多种异构存储设备，应用压力很大，且主机数量多、类型丰富，安装的操作系统和应用也各不相同。

#### (一) 首都博物馆的数据特点

数据类别多、数据量大，增长迅速。这些数据若以文件的形式零散的存放，不能有序地组织，检索困难且不易管理。这需要有智能存储系统来对数据进行存储、管理和调用。

##### 1. 数据类别多

博物馆是征集、典藏、陈列和研究代表自然和人类文化遗产的实物的场所。博物馆有责任对那些有科学性、历史性或者艺术价值的物品进行分类，是为公众提供知识、教育和欣赏的文化教育的机构、建筑物、地点或者社会公共机构。博物馆是非营利的永久性机构，对公众开放，为社会发展提供服务，以学习、教育、娱乐为目的。我国博物馆的类型可划分四大类。即：社会历史类、自然科学类、文化艺术类和综合类。首都博物馆是兼具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双重性质的博物馆，涉及范围广泛，也就意味着数据类别多。

博物馆的数据资源包括数字化的文物档案、扫描图片、实物照片、电子出版物、音视频资料、政府文件等各种各样的人文与科学数据资源。其存储媒介已不限于印刷体，它包含文本、声音、图像、影视等多种媒体形式，数据类型复杂。近年来，随着越来越多的技术如虚拟技术、三

维技术的应用与发展,博物馆的数据类型会越来越多。

首都博物馆的数字资源有结构化数据和非结构化数据。其中,绝大部分为非结构化数据。主要包含电子文档、图像资料、视频资料、音频资料等。

### 2. 数据量大

一个大型综合性博物馆的藏品数量必然多,都是以几十万件计。通过对藏品进行数字化登记,藏品信息的数量必然会比藏品多。当为一件藏品进行描述的时候,必然会对藏品的大小、材质、来源等进行记录,并为藏品进行拍照或扫描留档。一件藏品一般会对应十几或几十条数据。所以,当藏品数字化工作完成后,有关藏品信息的数据量会非常大。并且,博物馆的藏品数量会随着收集的进行,越来越多。

首都博物馆展厅面积大,为展览而设的多媒体设施多且分散,这些多媒体设施播放内容都根据其所在位置的不同而各不相同,所以需要进行后台集中管理。这些设施的播放内容都是存放在集中存储系统中。这就要求首都博物馆存储系统对多媒体设施后台能够提供有力的支持。

首都博物馆的各种数据信息,如扫描文档图像、照片、演示文稿、语音和视频片段等多媒体资料将持续增长。随着藏品数量的增长,跟藏品相关的信息也将持续增长下去。现在我国博物馆的数据量不仅来源于有形的藏品,随着近年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传承越来越重视,记录非物质文化遗产也是综合型博物馆的一个任务。这些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记录手段就是以数字短片的形式进行。我国蕴藏着深厚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需要记录下来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数量非常多。随着时间的推移,存储信息的度量单位必将由MB、GB转向TB,并即将向PB转变,博物馆存储的数据已达到了海量规模。

### 3. 增长迅速

近几年来,博物馆数字资源呈几何级数增长,媒体资料是博物馆数据资源的重

要增长点。由于科技的进步,摄像、摄影设备精度也越来越高,生成的数字文件也越来越大。以首都博物馆为例,一张文物的数字照片大约为60MB。若是扫描的字画等类文物的图像,每平方米可达到800MB。长度为16分钟的数字短片大小约为8GB。如是,高清图像的数字短片,则1分钟短片为1GB。每年的数据增量都在6T以上。

目前,正在进行的藏品档案的数字化工作,将会使首都博物馆的数字馆藏迅猛增长。

### (二) 首博网络存储情况分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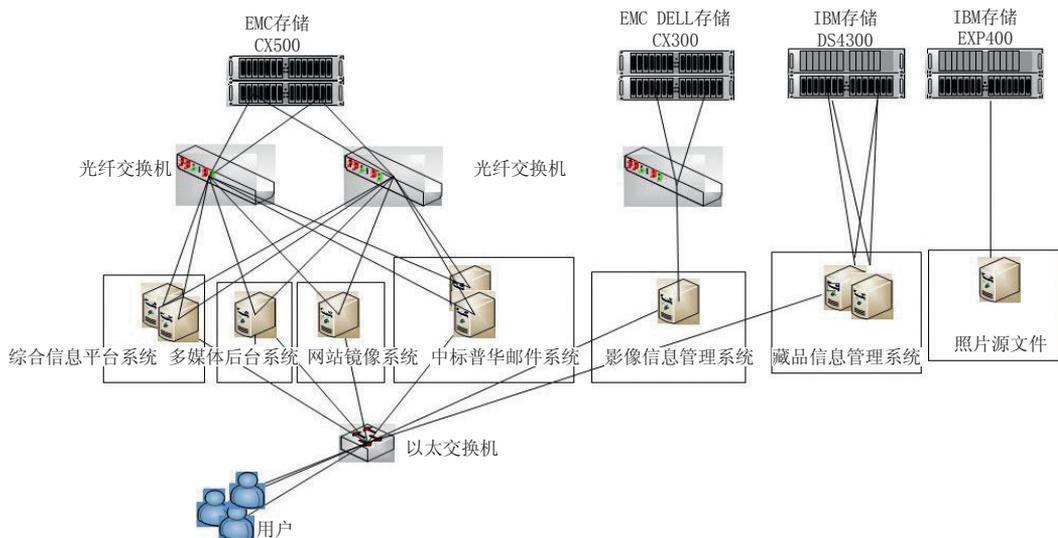
首都博物馆的数据特点,导致每年存储需求量也较多,这些现状决定了首都博物馆主机数量及类型多,要求存储系统能够提供非常好的兼容性,能够将主机各应用系统接入;应用系统和操作系统差别很大,要求存储系统必须提供统一的数据保护方案,简化方案的部署和维护;存储设备比较多,难以将现有和新增的存储设备进行统一的管理、配置,难以满足数据保护和存储应用、业务扩展需求;不同厂家产品特点各不相同,管理难以互通,资源不能共享,存储资源利用不够科学,长此以往将带来存储资源的浪费。希望通过建设能够实现对后端存储资源进行集中统一分配管理,能够在线扩展存储容量和应用,能够平滑升级存储数据保护层次。

目前,首都博物馆的存储系统是基于多种异构存储设备的架构,应用压力很大,且主机数量多、类型丰富,安装的操作系统和应用也各不相同(图一)。由于建设初期没有考虑统一的存储系统架构,随着系统的使用及设备的发展导致出现此种情况。这就决定了首都博物馆网络存储系统及数据的管理难度很大,升级很复杂。

## 三、方案整体描述

### (一) 实现目标

通过深入分析,首都博物馆存储系统应满足以下:



图一 首都博物馆本地机房存储结构示意图

(1) 整合全部存储资源，实现存储资源的统一管理，提高存储基础架构的可扩展性和性能；

(2) 实现异构存储资源整合。通过虚拟化架构，将不同品牌、不同型号、不同架构的存储设备整合为统一的存储资源池，只需要关注虚拟化之后提供的逻辑存储资源，而不必关心后端存储的具体形态；

(3) 实现资源按需分配。允许应用程序向用户提供的容量多于在存储系统中实际分配的容量，在满足应用和扩展需求的前提下降低系统的初始投资和整体的运营费用；

(4) 实现存储系统在线动态扩容，以满足博物馆快速增长的存储业务需求，同时部署简单、对现网改动较小；

(5) 实现高可靠的存储应用，能够做到跨阵列存储的数据保护，后期能够平滑扩展为远程容灾，满足首都博物馆今后的业务数据备份、数据抽样分析和软错误故障恢复等需求。

## (二) 总体架构方案

鉴于首都博物馆项目复杂的网络情况和丰富的业务需求，采用存储虚拟化是最好的解决办法（图二）。

在首博机房A和备份机房B同时部署高性能虚拟化设备，以实现总部新增存储和原有存储的整合，充分利用旧，充分保护首

都博物馆原有投资。

在两个机房本地利用虚拟化智能系统的快照功能，按照策略对本地存储生产卷做完整空间快照和优化空间快照，并将完整空间快照保存在阵列上，使业务系统与备份系统分开并方便本地数据快速恢复。

机房A和机房B部署的虚拟化智能系统，利用自身的复制功能，通过线路将生产数据异步复制到远端，该架构支持以后在线轻松升级到应用级容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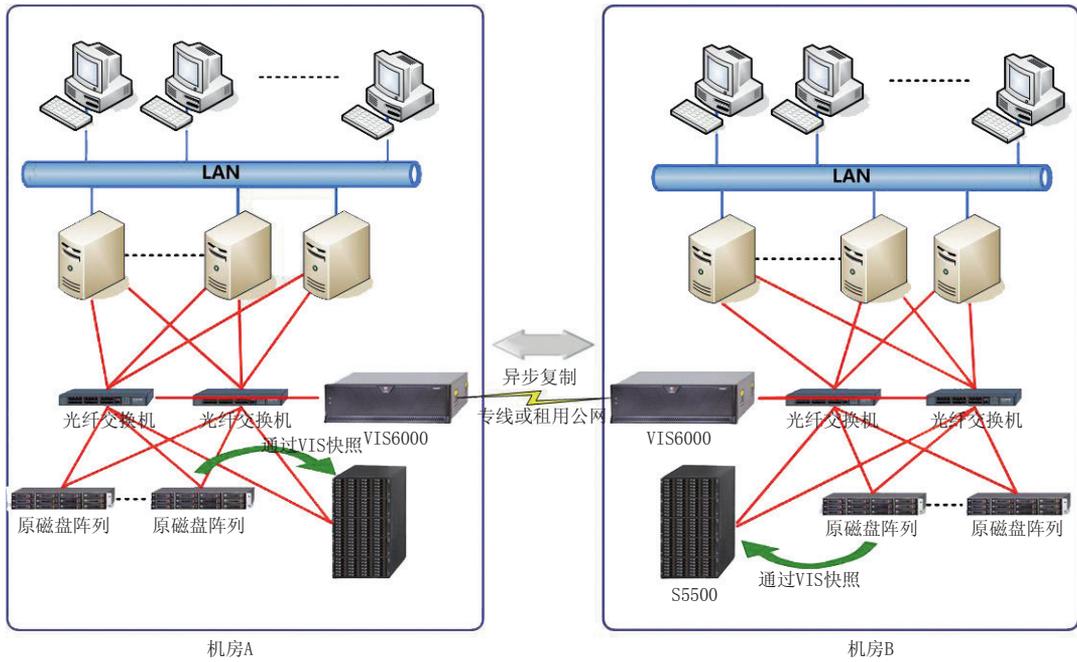
## (三) 本地方案整体描述

在首博本地机房光纤SAN环境中部署一台智能虚拟化网关，实现对后端EMC以及IBM不同型号设备的统一管理；并考虑到存储系统的扩展性，需要新增加磁盘阵列对本地机房的存储资源进行扩充（图三、图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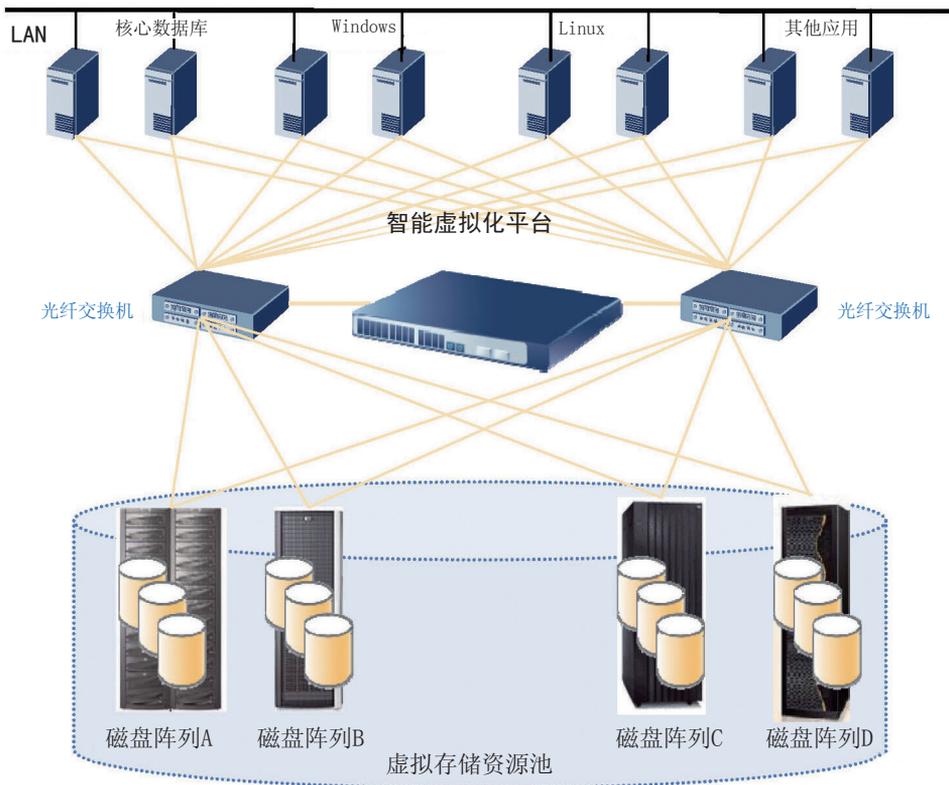
新增存储部署后，确保连接到所有光纤交换机上的前端业务系统都具备访问新增存储的链路环境，将来需要分配容量和扩容时，直接在存储上新增硬盘空间进行分配映射，而不需要改变网络连接。

满足新增SAN存储和虚拟化网关后的光纤接入需求，和现有的光纤交换机共同构成新的SAN存储区域网络，并将原有采用DAS直连的IBM存储设备也接入到光纤交换网络，考虑到今后的扩展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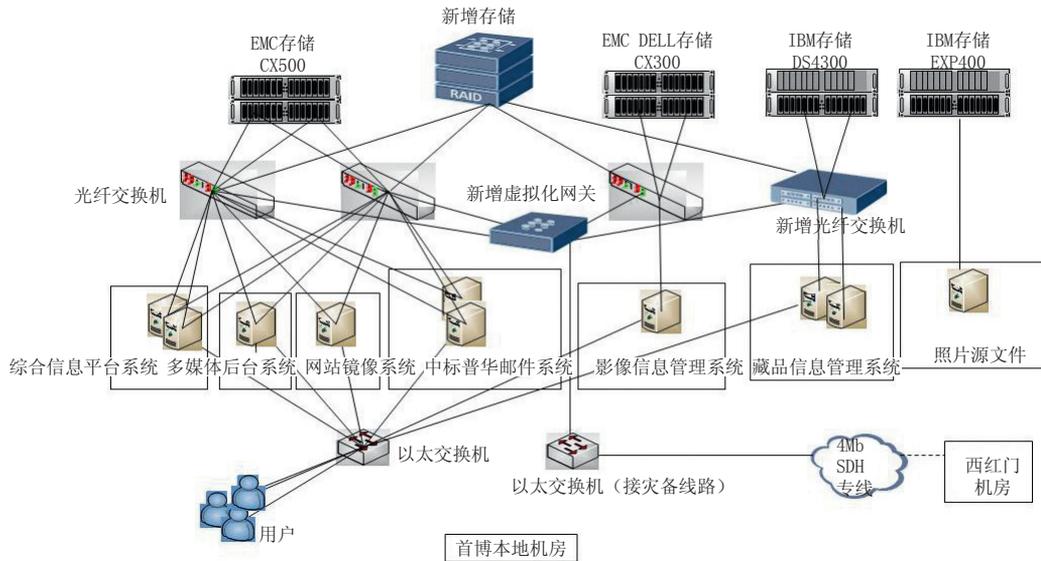
本地部署一台虚拟化网关，以光纤



图二 首博存储系统架构总体示意图



图三 机房存储资源的扩充



图四 改造后的机房存储示意图

链路旁路接入SAN网络内的光纤交换机上，对SAN后端的存储进行卷虚拟化，屏蔽存储设备的差异，使新增存储和原有存储资源融为一体，方便对现有业务存储空间进行扩容。虚拟化网关部署后，不需要在业务主机端和后端存储安装任何插件以及程序，只需要改变原存储空间到主机的映射链路，将其映射到虚拟化网关即可，主机对后端存储的直接访问路径变为主机-网关-存储，不会对现有数据安全产生影响。

此外，虚拟化网关部署后，还可以提供两个功能：首先，通过虚拟化网关的数据迁移功能，将存储数据从旧存储设备在线迁移到新存储设备，迁移过程不导致业务中断；其次，通过自身的远程复制功能，实现数据从主机房向备份机房的灾备复制。虚拟化网关自带ISCSI接口，通过千兆网络交换机接入到4M-SDH容灾专线。

智能虚拟化设备的存储虚拟化是基于存储网络的虚拟化，仅需要部署在目前数据通路的旁路上即可，即旁路接到目前的光纤SAN交换机，并不对现有存储网络进行较大的改动，此设备的部署亦不会造成整个首博信息系统的大规模长时间停机。智能虚拟化设备为应用层提

供了一层虚拟的“卷”的逻辑设备，来屏蔽异构存储设备的差异，并通过虚拟出的逻辑卷的管理，克服硬件设备的物理局限性和差异性，使逻辑卷可以跨越多个物理磁盘以及不同厂家的磁盘阵列设备。另外，智能虚拟化设备能在系统处于活动状态时动态配置磁盘存储空间并进行存储资源的扩容。

首都博物馆目前主机数量多、类型丰富，操作系统和应用也各不相同。智能虚拟化设备具备非常好的兼容性，不但可以支持UNIX、Windows、Linux等主流操作系统，而且可以兼容VMware、Hyper-V、Citrix XenServer等主流虚拟机软件。智能虚拟化设备可以完成对于博物馆目前所有阵列的统一管理以及统一数据保护，大大简化了网络架构，提升了工作效率。博物馆原有阵列常常需要分散管理，耗费较多人力和精力。部署完智能虚拟化设备以后，可以实现多台阵列的统一管理，节约了管理成本，简化了管理难度。

智能虚拟化设备通过一系列保障技术，能够使虚拟化后的数据与虚拟化之前的数据状态保持一致，这就避免了虚拟化过程中复杂的数据迁移和恢复过程，不仅大大简化了虚拟化的实施，而且减少了系

统的停机时间,提高了业务的连续性。

智能虚拟化设备能够在线扩展存储容量和应用,博物馆新增存储阵列或者未来新增业务主机都可轻松加入现有网络,实现系统平滑升级。

同时,智能虚拟化设备还可以提供丰富的数据管理功能,这些功能可以适用于智能虚拟化设备管理的所有存储系统。主要可以提供的软件特性列举如下:

(1) Thin-provisioning自动精简配置功能。

(2) 高级的数据复制功能:利用同步复制、异步复制和周期复制功能跨多种存储系统复制数据,实现同城或者跨越城市的远距离容灾解决方案。

(3) 高级的远程镜像功能:利用远程镜像功能,可实现基于FC通道的同步远程容灾解决方案。

(4) 数据快照功能:可创建数据的多个时间点快照。当发生软件程序导致的数据损坏、病毒破坏、意外删除及其他人为误操作引起的数据丢失或错误时,可“回滚”到合适时间点快照来快速恢复数据。每个时间点的快照可以独立成卷,以用于备份、测试、决策支持和脱机处理。

#### (四) 方案效果及优势描述

##### 1. 异构设备的兼容性好,整合功能强大

通过部署虚拟化平台对存储的虚拟化,可以轻松实现跨异构阵列的管理,生产阵列没有必要是同一型号、同一厂家的。同时,对主机操作系统、数据库、文件系统格式兼容性也很高。这对于后续的存储、主机系统的扩容非常有利。

虚拟化技术可跨越不同磁盘系统,完全不依赖于磁盘系统的品牌和型号。后期还可以利用此智能虚拟化设备实现远程容灾,可以保留在任何时候自由、灵活地选择磁盘系统的权利。

对于主流的磁盘阵列(FC/ISCSI),虚拟化平台都可以将其整合成为统一资源池,简化网络的架构。

##### 2. 不影响主机性能

存储虚拟化是基于网络层实现的,无须在主机端安装虚拟化软件,因此不会影响主机的性能。

##### 3. 可靠性高

智能虚拟化设备中所有关键部件都是冗余配置的,不会出现单点故障。其控制器采用了集群技术,双机双活工作模式。可以实现故障切换,也可进行负载分担。

4. 虚拟化设备出现故障,可以快速恢复原有网络

智能虚拟化设备通过专利技术,可以保障容灾设备出现故障以后,快速恢复到客户原有网络,提供业务连续性。

##### 5. 方案整体扩展性强

新增的主机和新增的存储设备都可以很方便地接入现有的网络,为今后网络的扩容以及升级提供了极大的便利。

##### 6. 易操作,方便管理,易维护

智能虚拟化设备可提供中文图形化管理界面,在一个界面上可以管理多台设备,大大提升了管理效率。

如果任何器件发生故障,都可以在线进行更换。系统将会提供完善告警机制,实时监控设备运行状态,故障信息可以在告警页面上实时查看。

## 四、结论

随着社会的发展,传统的博物馆正在向现代化博物馆迈进。在这个过程中,博物馆数字化系统的建设必不可少。博物馆数字化系统中,建设好存储与备份系统对整个博物馆事业的发展将起积极作用。

要建设好一个大型综合性博物馆的存储与备份系统,应根据综合性博物馆的数据特点选择合适的存储与备份系统。

根据首都博物馆网络实际情况,利用该技术建设首都博物馆存储虚拟化集中管理平台非常符合首博的现状,首博存储架构应采用SAN网络存储技术及虚拟化技术。

(作者为首都博物馆馆员)

# 银盐黑白历史底片的数字影像采集方法

董 帅

随着信息技术、网络技术的不断发展，数字影像的影响已逐渐渗透到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博物馆作为信息社会中一个不可缺少的机构，是重要的信息传播场所。通过建立数字化信息博物馆，强化博物馆各项功能，将其馆藏资源和研究成果传播到世界各地，为世人所知、所用，是现代博物馆不可推卸的责任和使命。数字影像的运用在博物馆数字化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中国国家博物馆为了早日成为国际领先、国内一流的综合性数字博物馆，一直在不断地努力探索着。

## 一、我国博物馆数字化发展现状

我国博物馆早在上世纪90年代就已经开始了博物馆数字化建设的探索。但现阶段成规模的数字化博物馆数量在全国却不是很多。造成这一局面的原因主要在于观念陈旧和资金、人才的匮乏。大量的历史、艺术类博物馆面临资金的压力和复合型人才缺乏的困惑，同时由于博物馆藏品数据的沉淀性，即大量的数据基本不存在更新的问题，每年仅有少量的增加，通常一次建设常年使用，故而缺乏系统更新、维护的动力；加之藏品数字化工作成本高、专业性强等因素，导致商业信息采集公司缺乏对文博事业投入的热情。随着信息化社会的到来，改变博物馆原有的工作方式变得越来越重要。数字影像的高质量

采集与使用为博物馆的工作和管理提供了全新的方式。利用好数字影像搞好博物馆信息化建设，提高文博行业的管理水平，是未来博物馆发展的必然选择。

## 二、博物馆中使用数字影像的优点

随着数字技术的不断普及完善，数字影像的优势日益明显起来。

(1) 数字影像采集更方便、更准确。数字技术的运用省去了胶卷的准备与安装，拍摄效果可以随时观察、调整；

(2) 大幅度提升工作效率。数字化采集省去了胶卷的冲印时间，使得成批采集高质量数字影像成为可能；

(3) 影像利用更方便、更安全。数字影像可以根据不同的使用需求而生成不同大小、尺寸、格式的数字文件，保证使用者不会越权使用影像资源，同时先进的数字水印技术保障了图片的版权信息；

(4) 便于大规模集中、整合资源；

(5) 便于规范地存储、管理资源；

(6) 传输更迅速。借助便利的网络，数字影像可以快速传递到千里之外，促进信息资源共享和国际化；

(7) 建立观众与博物馆之间的互动关系，数字影像的广泛使用改变了博物馆旧的参观条件，观众可以在更加舒适的环境中认真欣赏博物馆多元化的展示内容，进而与博

博物馆建立更良好的互动关系。数字化信息网络的应用让博物馆取得了飞跃性的发展，人们只要通过网络连接，就可以随时随地浏览网页，获取所需的藏品信息。

### 三、数字影像应用的必要性

随着时代的发展，数字影像越来越广泛地应用于新时期的数字化博物馆的文物收藏管理、展览制作、学术研究、社会教育、网站展示、出版印刷、法律文书、广告以及图片零售等各个方面。可以说任何一项业务工作都无法离开数字影像的支持，它强化了博物馆的各项功能。充分管理好、利用好相关的影像资源对促进博物馆业务工作的开展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它不仅仅是完成博物馆社会职能的重要因素，更可为博物馆带来可观的经济效益。

高清晰数字影像的采集是数字博物馆最基础的资源建设工作之一，是全馆数字化工作的基础，具有战略意义，其工作成果对文物保护、研究、展览、宣传等博物馆日常工作都有极大的促进作用。

### 四、中国国家博物馆的数字化建设

中国国家博物馆（简称：国博）2003年建馆时，拥有60多万件文物，经过国博人的共同努力，2015年第三次文物普查之后，文物总量达到了240余万件。随着中国国家博物馆改扩建工程的顺利完成，“数字国博”项目已被提上议事日程。“中国国家博物馆藏品管理系统”项目将要在一个世界领先的，稳定可靠、高效、完善的网络环境中，逐步建起一个涵盖博物馆各项业务工作，全面整合的、可共享的数字资源库。在此基础上，建立一个能够充分满足公众需求的，全方位、多层次、跨平台的文化展示平台和一个能够保障中国国家博物馆各项业务高效运行的综合平台，向世界宣传和弘扬伟大的中华文明。

在“数字国博”的数据资源建设中，数字影像的广泛应用意义重大，是“数字国博”项目的基础性工作。高清晰数字影像资源的采集与管理不仅在当下可以促进中国国家博物馆的各项工作，也影响到中国国家博物馆未来长远的发展和文化事业的进步。

为适应博物馆数字化发展的要求，目前我馆已开始积极使用高清数字设备采集银盐黑白历史底片，利用科学准确的数字技术对以胶片形式记录的影像资源进行保护、研究，满足对外交流的需求。

### 五、中国国家博物馆银盐黑白历史底片数字化采集工作

国家博物馆收藏了约16万张银盐黑白历史影像资料，藏品数量仅次于新华社，居全国第二。黑白历史底片是博物馆藏品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真实地记录了过去的历史，是独一无二、不可再生的宝贵资源。因此如何保存和利用好这些珍贵的影像资源就显得尤为重要。

#### （一）银盐黑白历史底片的来源

中国国家博物馆馆藏的黑白历史底片来源广泛，大致可分为捐赠者捐赠的原版底片和从早期出版物上翻拍下的底片两大类。来源多样造成底片规格众多，常见的规格有：4×5、6×9、6×6、6×4.5、135毫米、16毫米电影胶片及不规则修剪后的底片等。

#### （二）为什么要进行底片的数字化采集

利用数字技术，我们可以很方便地对数字化扫描得到底片的数字影像文件进行修复，还原那些受损、有瑕疵的底片的本来面貌，从而保证博物馆未来工作中黑白历史底片的正常使用。将扫描后的原始底片存放在恒温恒湿的储藏柜中，这样就可以在不影响正常业务工作的前提下，减少原始底片的使用频率，从而最大限度地保护这些珍贵的影像文物。

对这些传统资料进行数字化整理、采集和保护，不只是为人类保存下这些宝贵

的文化遗产，建立世界共享的信息平台；更重要的是通过我们的保护，可以使后人也可以看到前人真实生活状态的影像。因此，历史黑白底片的高清晰数字扫描是目前国家博物馆数字化采集的重要任务。

### （三）馆藏底片影像资源的保存现状

第一，由于底片材质的特殊性，使得保存工作异常困难。在影像采集工作中发现由于底片拍摄时间久远、流传过程复杂、保存条件不稳定等多种因素影响，使部分历史底片已出现涂层老化变质、底片破碎、断裂和缺失等现象，部分底片甚至发生了霉变现象。

第二，日常工作中对这些“濒危底片”频繁地使用，更加大了底片损坏的概率。

第三，黑白历史底片受当时科学技术、拍照条件、环境的不同和摄影者摄影技术不同等因素的影响，其影像质量也不一样。底片出现反差过大或过小、曝光不足、曝光过度、同一张底片曝光不均等现象，影像质量差异极大。为保证这些质量较差的黑白历史影像资料的正常使用，就需要对每张图片进行调整与修复。但修复这些数量庞大的数字影像是一件难度极大的工作，需要制作者投入极大的精力和耐心。可以说我们的工作任重而道远。

### （四）中国国家博物馆数字化影像采集的设备

2007年，中国国家博物馆开始使用哈苏X5底片扫描仪（以下简称X5扫描仪）进行底片的数字化采集工作。X5底片扫描仪是瑞士生产的专业底片扫描仪。它具有配件模块化、扩展能力高、扫描速度快、对应底片类型广泛、图像色彩还原度高、扫描软件功能完备等特点。符合现阶段我馆数十万张黑白历史底片的数字化信息录入和

图片修复工作的要求，为今后我馆的数字化建设和管理工作提供了保证。

在录入设备上采用苹果图形工作站和Eizo显示器进行数字影像的加工和处理。苹果Mac pro 工作站是苹果的专业级图像处理工作站。其系统具有性能稳定、安全度较高、图像处理速度快、色彩还原准确等特点。显示器采用Eizo S2410W，该款显示器色彩还原真实，可覆盖所有印刷色域。通过校色工具可对R、G、B三个通道分别进行调整，实现图像真实色彩的完美还原。

### （五）影像采集的标准操作流程

在八年多的工作实践中，笔者总结了使用X5扫描仪扫描的一些技巧。运用这些技巧，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和更高的工作效率。

#### 步骤一，底片预览扫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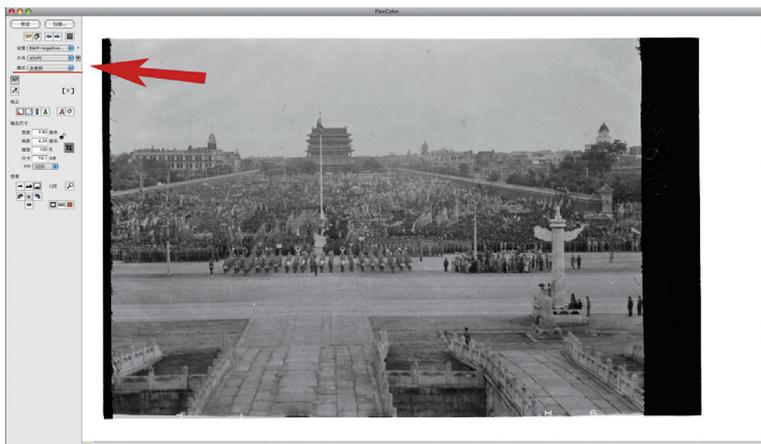
将需要扫描的原始黑白底片装入对应型号的片夹中进行预览扫描，圈定扫描范围。

步骤二，正式扫描前先对底片进行反差、对比度等数值进行调整：

在正式扫描前，通过扫描软件对底片的反差、亮度、饱和度等选项进行调节。通过对比，可以看到通过前期调整的方法可以最大限度降低后期图像处理软件对影像数字文件的损坏。以下是对比实例：

#### 例1：未经前期调整的影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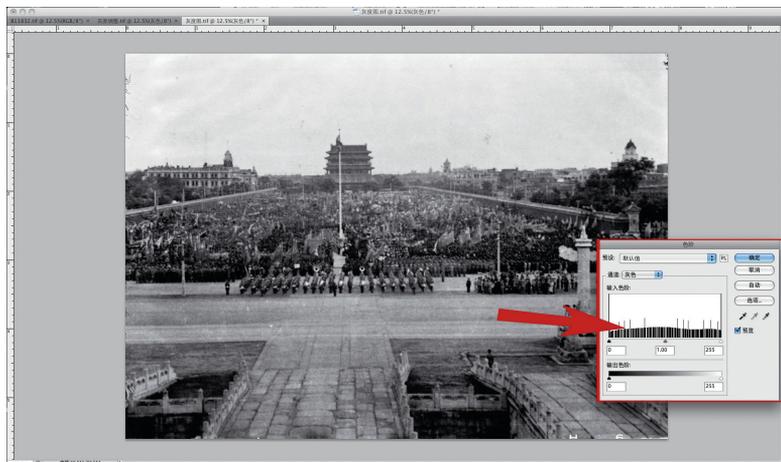
如图一，通常情况下，直接对底片进行不经任何前期调整，得到的影像呈现对比度不足，层次较少的特点。



图一 不经任何调整的原始影像

如图二，将得到的数字影像放在Photoshop中对色阶、亮度、对比度进行调整，虽然最终取得到了较为理想的视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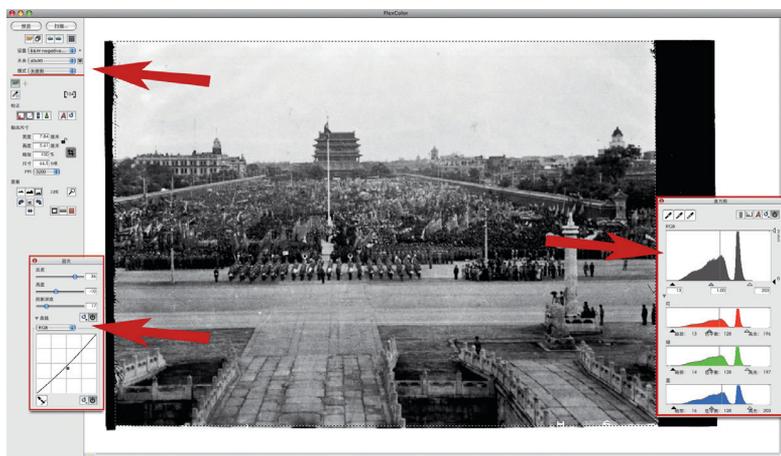
效果，但通过软件的色阶数据图显示数字影像信息实际上已经遭到了损坏。我认为这样的影像不符合博物馆馆藏原始影像资料储存的标准。



图二 虽经photoshop调整，但信息已遭破坏的影像

例2：经过前期调整进行扫描得到的影像

如图三，通过预览扫描发现底片存在反差和对对比度较少的问题后，在正式扫描前，利用X5的扫描软件先对影像的反差、对比度等数值进行适度调节，得到满意的效果后，再进行正式扫描。



图三 利用X5的扫描软件调节，再进行扫描

如图四，在Photoshop中观察数字影像，得到的结果是和例1中最终得到的影像相比，虽然取得的视觉效果基本一致，但通过扫描前调整的方法，影像的数字信息未受到损坏（图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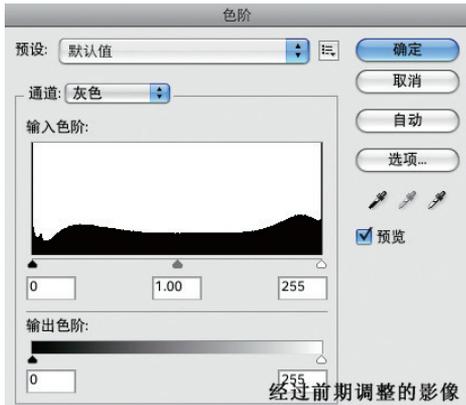
步骤三，使用RGB模式对黑白底版进行扫描：

对取得更高质量影像的无止境追求是每一位专业从业人员永恒的目标。以上面所述的扫描流程为基础，我们对黑白底片的数字采集进行了进一步的探索与研究。

创新采用黑白底片标准（B&W negative standard），RGB模式的新方法进行扫描。在工作中，我们发现此种扫描方法与原始灰阶扫描相比，底片层次还原更丰富，生成文件量更大，可以取得更好的效果，更适合黑白历史影



图四 先调整再扫描的数字信息未破坏



图七 灰度扫描后得到94.1MB的影像文件



图五 调整前后的影像对比

像文物基础大数据存储工作的需要。以下  
为对比试验：

例3：使用传统灰度模式扫描黑白底片扫描

如图六，采用黑白底片标准（B&W negative standard）、灰度模式，调整

反差、对比度等数值后进行扫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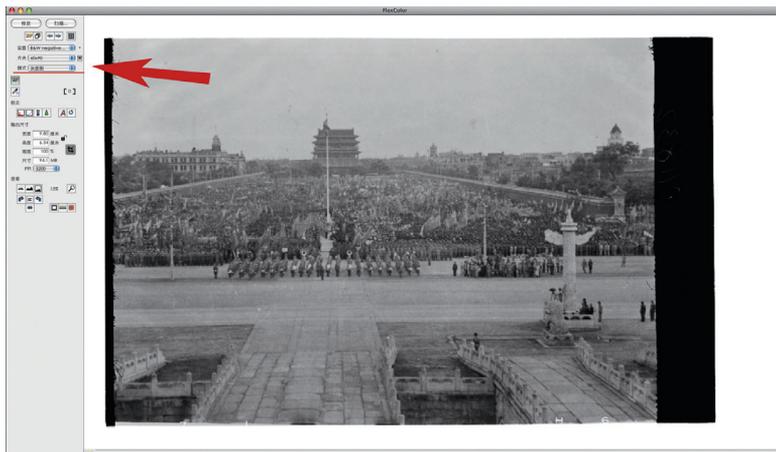
如图七，扫描得到的最大影像的文件量为94.1MB。

例4：使用RGB模式进行黑白底片扫描  
如图八，使用黑白底片标准（B&W negative standard），变为RGB模式进行扫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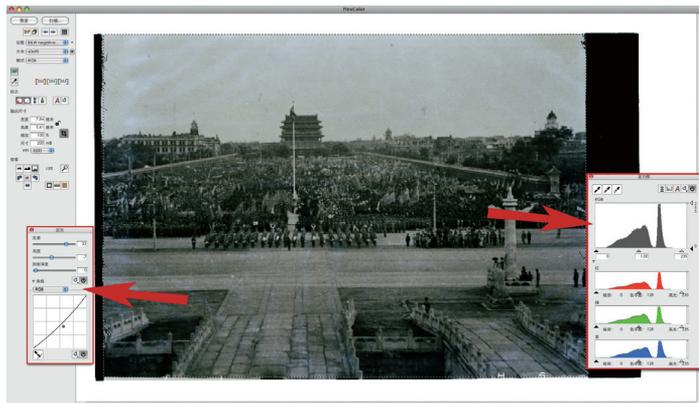
如图九，扫描前调节反差、亮度等数值，使图像获得更理想的效果。

如图一〇，RGB模式扫描生成的数字影像，由于使用彩色模式，扫描保留了更多黑白模式中没的色彩层次信息。但底片RGB扫描后表面会伴有眩光出现。

如图一一，将得到的影像在Photoshop中进行去色处理，RGB模式所产生的眩光也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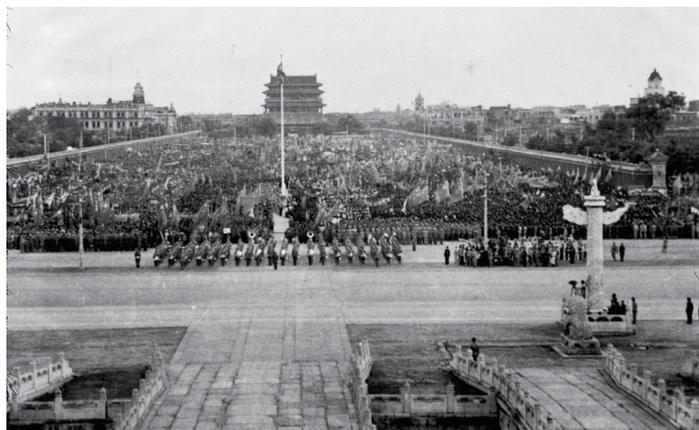
图六 采用黑白底片标准、灰度模式，调整反差、对比度等数值后进行扫描



图九 扫描前调节反差、亮度



图一〇 使用RGB模式扫描生成的数字影像



图一一 将得到的影像在photoshop中进行去色处理

之消失。获得的文件量为200MB。RGB模式扫描得到的影像与灰度扫描的相比，可以更多地保留原始底片的灰阶层次，灰色过渡更加柔和自然，层次更丰富，文件量更大。我们认为此种扫描方式的效果更理想，是在原有扫描方式基础上的新发展。

步骤四，正式扫描：

选择适合的分辨率，设置存储路径，生成正式数码影像文件。

步骤五，后期影像修复调整：

通过后期图像处理软件对照片表面的划痕、霉斑等损伤处进行数字化修复。

步骤六，编号储存：

将数字影像标注原始底版的影像编号，以方便日后的查找与使用。

## 六、小结

当今摄影正处于传统胶片与数字摄影的过渡阶段。使用科学化的数字影像采集方法，在正式扫描前对影像进行反差、对比度进行调整的方法，能够最大限度避免后期图像处理软件给文物数字影像带来的损坏。使用RGB扫描模式替代传统灰阶模式扫描，可以采集到影像的更多层次，获得更大的文件量，可以满足我们绝大多数展览与画册的图片要求，取得了较好的效果，为今后银盐黑白历史底片的数字化采集提供了一个良好的解决方案。这些操作技巧不仅适用于哈苏扫描仪，相同原理也适合于其他不同品牌的扫描仪。

成功往往在于发现和改进普通工作中被忽视的细节。灵活运用我们的专业技术将工作细节做好，才能使那些珍贵的

银盐黑白历史照片更好地保存下来，让更多的后人看到与研究，完成一名博物馆人应尽的使命。

(作者为中国国家博物馆藏品保管二部摄影室副主任)

# 周经《荷塘芦雁图轴》隐含信息 分析研究

武望婷 潘 宁 彭淼淼 侯妙乐 马 燕 任静怡

高光谱成像技术将光谱技术与成像技术相结合，同时实现了图轴画面和图轴中物质光谱的“录入”，具有非接触、波段多、分辨率高和“图谱合一”等优点，有效地克服了传统古字画调查的缺点，为文物的保护工作提供了新的视点。高光谱成像技术非常广阔的波谱覆盖范围，且可获取丰富全面的古字画影像信息，使得古字画信息的精细表达成为可能。通过对高光谱影像的处理分析，可以提取出肉眼不可见或不宜察觉的隐含信息，并对视觉模糊的画面部分进行增强，同时通过光谱匹配对颜料进行识别，为图轴的鉴定、修复和保护提供依据。

数字正射技术，在保证古代字画大小不变形的情况下，还确保了字画信息的丰富度和真实性，是一种古代字画数字化的有效的现代技术手段。基于可见光数码照片生成的数字正射影像是对该图轴目前状态的数字留存，完整地呈现出该图轴在拍摄时期的视觉效果，实现了字画信息的“录入”。

《荷塘芦雁图轴》是一幅纸质作品图轴，为清朝画家周经所作，墨色沈厚，笔力苍浑，具有珍贵的考古价值和文化价值。然而，在长久保存过程中，纸质画心受到自然环境和人为保护不当的影响，老化严重，且出现了残缺、褪色和污损等。对字画系统地进行数字留存和信息挖掘，在文物保护、历史文化传播和历史文化研

究等方面都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和意义。

## 一、数字正射图数据采集及处理

数据正射影像数据的采集：数字正射影像的生成包括外业采集和内业处理两部分。字画的外业采集由数字相机拍摄，其拍摄站点一般围绕字画一周设立，照片数量由字画的大小决定。在拍摄过程中，尽量保持垂直拍摄，照片重叠度约80%。拍摄完成后，准确记录拍摄站点的位置及顺序，并测量记录字画感兴趣区域的尺寸，用于正射影像的准确定标。

数据正射影像数据的处理：同传统的摄影测量方式不同，数字摄影测量所处理的原始影像是数字影像。必须用高精度的扫描仪将原始的摄影测量所获取的像片扫描成数字影像文件。因此，数字影像实际上是一个灰度矩阵表达为空间上的灰度函数。在数字影像式的基础上，对齐照片，完成数字影像的相互定向，然后对完成定向的影像数据通过后方交会的方法完成影像间密集点云的建立，并在此基础上生成网格，然后对生成的网格数据进行纹理贴图，通过实测的古代字画的实际尺寸添加控制点，完成古代字画影像的正射影像图。

经过数字正射影像图信息数据的采集及数字正射影像图的预处理和模型的建立，我们建立了《荷塘芦雁图轴》的数字

正射影像图(图一)。

## 二、病害信息提取

病害现状的调查对字画的制作及工艺、修复材料的筛选、修复工艺、工作量等具有决定性的影响,对字画病害信息的提取和分析传统上主要利用透明方格法和CAD法,这两种方法会耗费大量人力,且效率较低。本文所使用的基于数字化特征的字画影像对字画进行病害区域的提取技术,实现病害的信息种类、所占比例等的分析,对于字画病害的修复有着极为重要的现实意义。

首先,我们基于字画专家的意见和建议,有区别地建立古字画病害符号库和字画系符号库。其中字画符号库大概有30种病害,基本可以涵盖字画常见病害类型。首先实现病害符号的建立、入库。在此基础上,应用建立好的符号库对每种病害进行分门别类的统计与分析。

由于周经《荷塘芦雁图轴》破损严重,病害区域分布广泛且琐碎,病害分析时只勾绘出其中所占面积较大的污渍和残缺。其效果图如图二。

对每种提取的病害信息,可以利用



图一 《荷塘芦雁图轴》数字正射影像



图二 周经《荷塘芦雁图轴》中病害勾绘示意图

现有软件进行病害信息的统计分析。周经《荷塘芦雁图轴》画心部分的总面积为7116.05平方厘米。其中污渍部分所占比例为8.1%,残缺部分的病害所占比例为49.1%。其统计信息见表一。

表一 周经《荷塘芦雁图轴》病害信息统计

名称	病害类型	编号	面积	占比例(%)	个数
周经《荷塘芦雁图轴》	污渍	02	57.64	8.1	28
	残缺	07	346.58	49.1	87

备注:

1. 所有单位为厘米和平方厘米。
2. 周经《荷塘芦雁图轴》画心部分的总面积为7116.05平方厘米。
3. “编号”为病害在《馆藏纸质文物病害图示符号》中的编号。
4. “占比例”是指有病害区域面积除以整个画心面积的比率,以千分之一为单位。

### 三、高光谱成像技术

#### (一) 高光谱成像系统介绍

本高光谱成像系统共含有1200个波段，波段覆盖可见光、红外线，波段覆盖范围广，波谱信息丰富。

主要是用型号为VNIR400H（400~1000nm波长）的高光谱成像相机（图三）和THEMIS-T-FPS2500（1000~2500nm）高光谱成像仪（图四）获取高光谱数据影像。它将自动扫描器、光谱仪和图像传感器完全整合为一体并且经过精确光谱矫正。这种相机在完全二维成像模式下操作，也可以降为常规的推扫系统的状态，用于遥感监测。相机覆盖400~1000nm光谱范围，相机做了降噪处理，重约4.3磅（1.95千克）。采用了一种能够使入射光狭缝和光谱分光器在焦平面上精密协调移动的专利设计。

#### (二) 高光谱成像仪数据获取

周经《荷塘芦雁图轴》共拍摄400~1000nm光谱范围内的高光谱影像24景，约占空间65G，1000~2500nm光谱范围内的高光谱影像51景，约占空间



图三 VNIR400H



图四 T-FPS2500

3.14G。在数据采集过程中，VNIR400H系列高光谱成像仪拍摄环境尽量要在多幅采集过程中保持一致，THEMIS-T-FPS2500高光谱地面成像仪采集字画信息数据时，尽量避免使用白炽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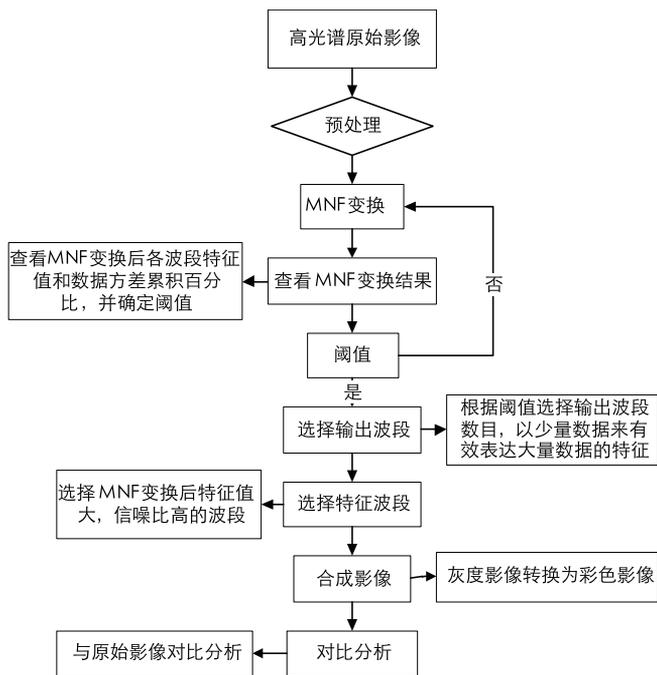
### 四、高光谱影像数据分析

#### (一) 隐含信息发掘

高光谱技术主要是利用成像光谱仪在不同的光谱范围内得到目标物体空间影像信息的同时获得其较为连续的光谱信息。高光谱数据除了具有众多的波段数，各个波段之间的间隔也比较小。因此，在多个不同的波谱范围内影像的波段数量可从几十个扩展至几百个，与传统的多光谱技术相比，它可为影像中的每个像元提供比较窄的波段信息，并且这些波段信息是较为连续的，这不单单意味着波段数量的增加，同时也增加了对目标的空间描述信息，丰富了目标的数据源。由于高光谱影像光谱信息量大，连续性较好，波谱间隔较窄，因此相邻波段间会具有一定的信息重复，不可避免地造成了数据的冗余。这给数据的处理和解读都带来了一定的困难。在数据的处理过程中，当影像波段的数量成数量级增加扩展的时候，数据的分析量较大是处理过程中不得不面对的严峻问题。因此在处理中要通过软件计算并删减冗余信息，在尽可能保证信息完整的情况下提炼出古字画的主体信息。

为了有选择地突出某些感兴趣信息，并且消除或降低一些其他无关的信息，我们需要利用图像增强的手段来达到这些目的。图像增强是数字图像处理的基本方法之一，具有重要的实用价值。对提取的图像信息进行增强处理，其目的是采用一些技术手段或有效算法提高图像的清晰度，改善图像的目视效果。在这其中应用到的图像增强算法以最小噪声分离（MNF）变换为主，其处理流程如图五所示。

#### (1) 数据预处理，包括辐射校正和



图五 高光谱成像仪拍摄示意图

几何校正。将图像的灰度值数据转换为反射率数据，同时去除仪器噪声；

(2) 对校正后的高光谱图像进行最小噪声分离变换 (MNF)，变换后各波段特征的有效性确定阈值，输出特征值较高的波段；

(3) 对MNF变换后的输出波段，进行目视解译，判别各波段的有效特征；

(4) 对含有感兴趣特征的波段进行假彩色合成，有效地突出目标要素；

(5) 将增强影像与原始影像或可见光照片对比分析，发现隐含信息。

## (二) 隐含信息分析

通过对周经《荷塘芦雁图轴》的高光谱数据进行分析，并与可见光照片比对，共发现其画内总共存在6处隐含信息，分别为印章部分、芦雁的脚掌部分、草地部分、污渍覆盖部分和两处技法信息。

印章部分：受到老化和污渍影响比较严重，印章区域的内容难以区分，通过数据处理，增强后波段的灰度影像，重现出印章内容，两处印章的增强效果如下图六、图七所示。

脚掌部分：芦雁脚掌部分的颜色发生了淡化，使脚掌轮廓变得模糊不清。通过数据处理，并选择合适的波段假彩色合成，增强了芦雁脚掌部分的信息。对于上下两处脚掌部分的增强效果如图八、图九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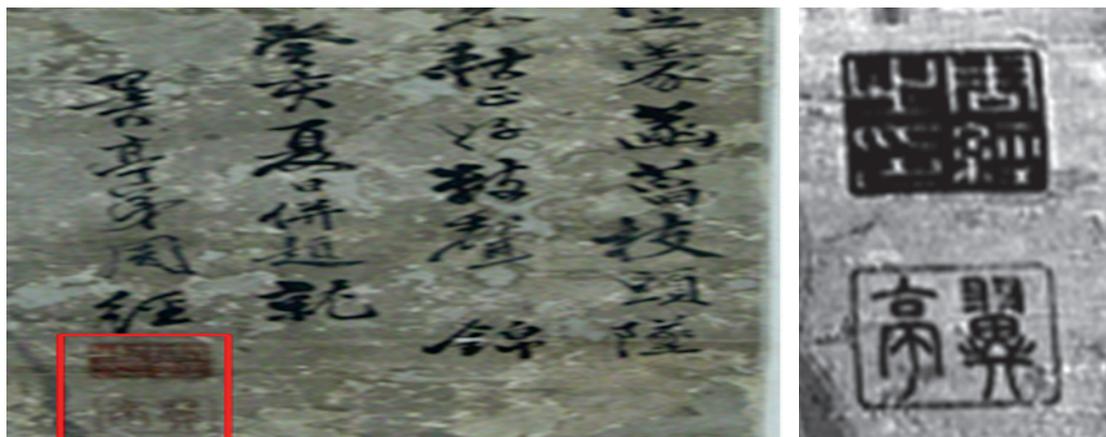
图八、图九所示。

草地部分：草地部分由画家用蓝色颜料进行了点缀，由于本来颜色就很淡，随着时间的推移，很多地方都难以看清。并且与墨色画在一起，容易被人忽视。通过处理，增强后影像可以凸显淡蓝色颜料的部分，并通过假彩色合成表现出蓝色笔迹与墨色笔迹的相互关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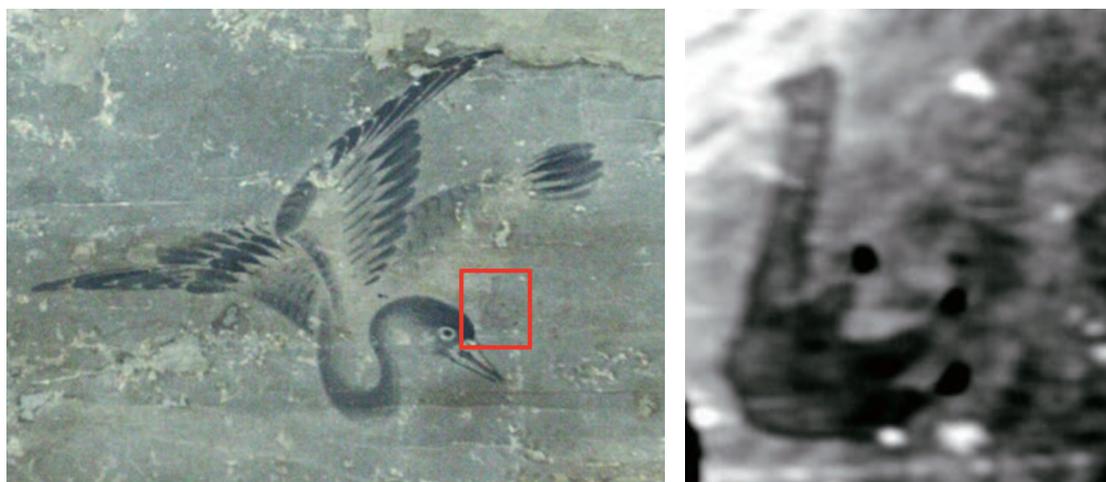
区域1为芦苇根部，在增强后的灰度影像中高亮部分突出显示了可见光照片中不易察觉的小草信息，假彩色合成影像表达了小



图六 右上角印章可见光照片 (左) 和增强后影像 (右)



图七 左下印章可见光照片（左）和增强后影像（右）



图八 上方芦雁的可见光照片（左）和脚掌区域增强后影像（右）



图九 下方芦雁的可见光照片（左）和脚掌区域增强后影像（右）

草与芦苇的相对位置关系。区域2为下方芦雁右侧的小草区域，在可见光照片中，黑色的小草轮廓清晰，而蓝色小草相对模糊。在增强后灰度影像中，黑色线条突出显示

了原画面中的蓝色笔迹，而假彩色合成的局部放大图突出显示了原黑色和蓝色小草的相对位置关系，如图一〇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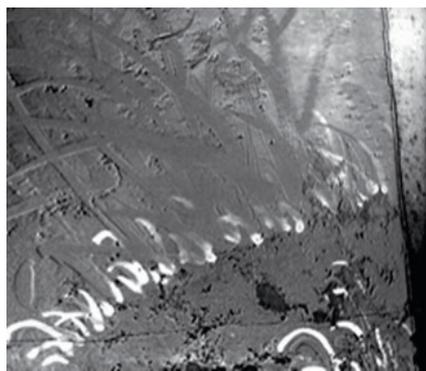
污渍覆盖部分：该画受污渍损害严重，



区域1照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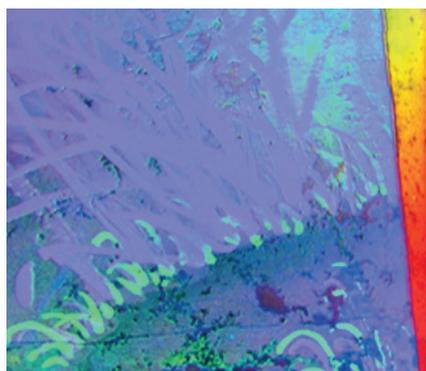
区域2照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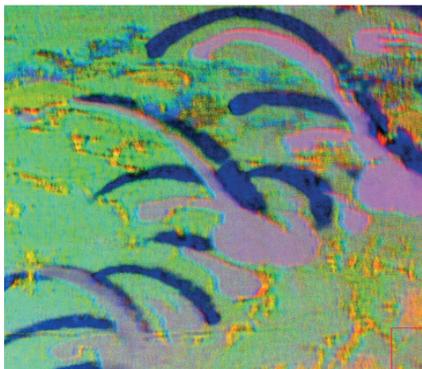
区域1增强后灰度影像



区域2增强后灰度影像



区域1假彩色合成影像



区域2假彩色合成影像局部放大图

图一〇 草地蓝色颜料区域增强效果对比图

其中一朵荷花的花心部分被污渍覆盖，模糊了其原本的绘画笔迹。通过高光谱数据处理还原了污渍覆盖部分的原始面貌，其效果如图一一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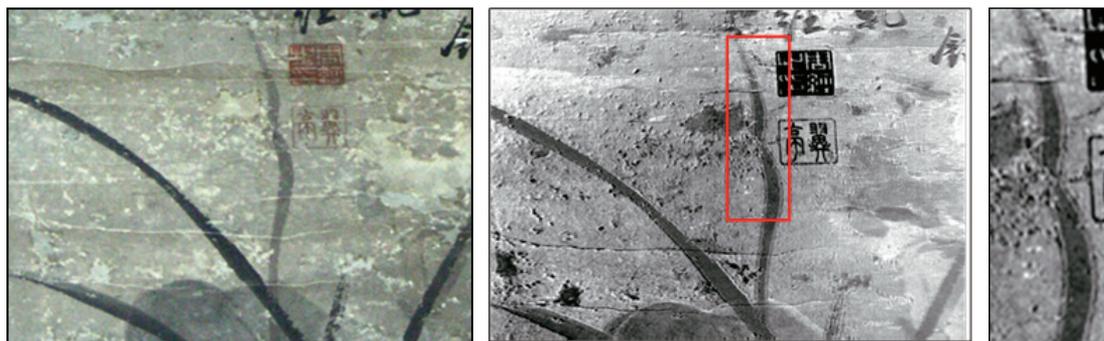
技法分析：  
技法信息是字画鉴定时需考虑的主要因素，通过高光谱数据分析可以发现一些目视解译难以察觉的技法信息。在周经《荷塘芦雁图轴》中共发现两处技法信息，分别为宿墨信息和技法信息。

其中区域1为宿墨信息，其效果如图一二所示。

在处理后的灰度影像中，红色标注区的芦苇叶轮廓呈现出明显的8字形，并且出现了类似于宿墨的边缘效应，



图一一 污渍区域可见光照片（左）、增强后影像（中）和局部放大图（右）



图一二 区域1可见光照片(左)、处理后影像(中)和处理后影像局部放大图



图一三 区域2假彩色影像(左)和可见光照片(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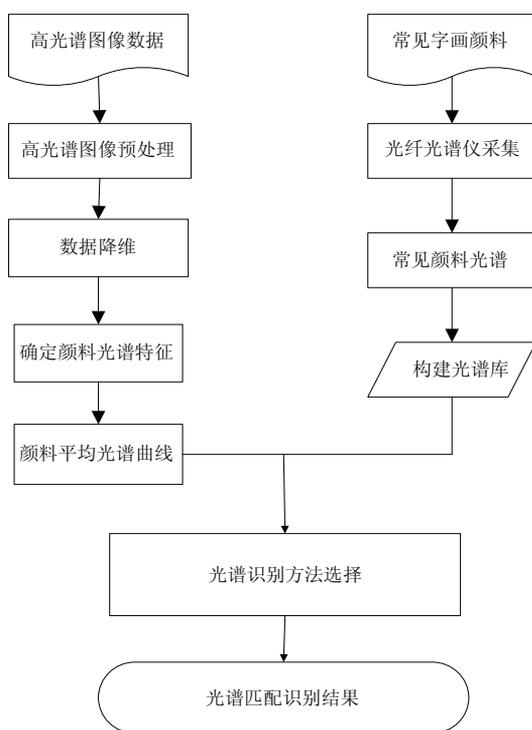
但是在可见光照片和目视效果中并没有明显的宿墨的表现特征。

区域2为落笔层次信息，其效果如图一三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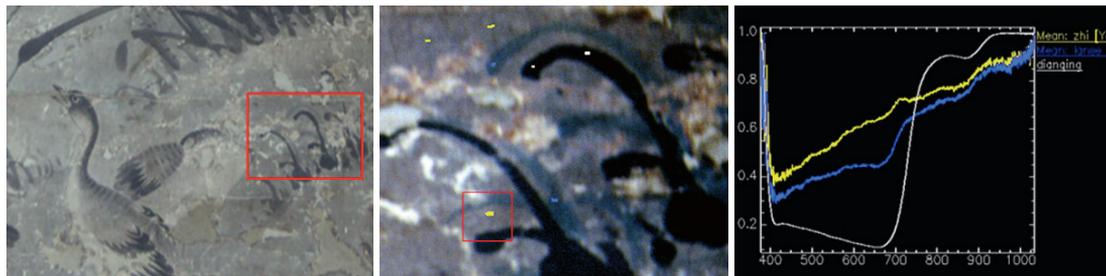
对区域2的高光谱影像进行处理后，黑色标注区域明显增强了三条芦苇叶的边缘信息和层次信息，较为连续的上层线条判断为最后的笔迹，断开的下层线条为较前的落笔。图中三条叶子的笔迹，按照判断出的落笔顺序做出标记。其中线条1的颜色在目视效果下墨色较浅，可以看出在三条叶子的最下层即最先落笔。而线条2和线条3的颜色均比较浓，目视情况下较难判断落笔顺序，在处理后的影像中可以看出线条3较为连续，处在最上层，从而认为是最后的落笔。

### (三) 荷塘芦雁图颜料分析

颜料识别作为鉴别颜料的一种重要手段，其技术路线主要是利用图像光谱曲线与已建立的字画光谱库中的颜料进行匹



图一四 颜料光谱识别技术路线



图一五 蓝色颜料光谱采集区域（左）和感兴趣区分布（中）及纸、蓝色颜料和靛青的光谱曲线（右）

配，以得分最高的光谱作为最终颜料识别的结果。其基本原理见图一四。

周经《荷塘芦雁图轴》中颜料以墨为主，辅以部分其他颜色作为点缀。其中在画中的右下角，即芦苇的根部附近点缀有蓝色颜料，取部分感兴趣区作为样本来分析。其光谱曲线和分析结果如图一五。

在图一五右图中，黄色曲线为周经《荷塘芦雁图轴》中画心纸的光谱，蓝色曲线为感兴趣区蓝色颜料的光谱。通过光谱角填图、光谱特征匹配和二值编码匹配三种匹配方法的结合，与光谱库的纯净颜料比较，蓝色颜料匹配的最优结果为靛青，其光谱曲线即图中所示的白色曲线。由图中可以看出，蓝色颜料与靛青有相同的吸收位置，但吸收深度不同。通过与画心纸的比较，可以认为蓝色颜料区光谱为纸和靛青光谱的混合。即蓝色颜料判断为靛青，又名靛蓝或花青，植物性颜料，其化学成分为 $C_{16}H_{12}ON_2$ 。

## 五、小结

清朝周经《荷塘芦雁图轴》整体破损严重，且含有大量的污渍和修补痕迹。利

用数字正摄影像技术和高光谱成像技术，实现了目前状态下的数字化数据留存，包括图轴影像和物质光谱两部分。其中数字正摄影像等比呈现了该图轴的可视化效果，并在此基础上勾绘和统计出了该图轴的主要病害区域。高光谱影像“图谱合一”，呈现出不同波长处图轴的可视化灰度影像和影像中没点的光谱曲线。通过对高光谱影像的处理分析，发现了视觉模糊和肉眼不易察觉的隐含信息共6处，并识别出图轴中蓝色颜料为靛蓝。

基于数字正摄影像技术和高光谱成像技术的古字画分析系统，不仅实现了《荷塘芦雁图轴》的信息留存，而且分析出了目视解译和其他方法不易获取的隐含信息，为书画的鉴定、修复和保护提供重要依据。

致谢：感谢烟台博物馆高爱东馆长和闫旭东主任给予本工作的大力支持。

（作者分别为首都博物馆副研究馆员、北京建筑大学硕士研究生、首都博物馆职员、北京建筑大学副教授、首都博物馆职员、首都博物馆职员）

# 景行行止话师缘（三）

姜舜源

## 一、“破家值万贯”——闲话生平

与单老相处得久了，无话不谈，而不仅限于工作、业务、学术。逐渐地自己也成家立业了，慢慢体会到，很多话是他老人家人生历练的结晶。有时置办家当，就想起他解释“破家值万贯”。他说：“老北京人说‘破家值万贯’，不是说家里的东西真的值万贯，而是你若要再置办这些东西，就得很多钱。比如一把破煤铲子，一分钱也不值，可若是去买一把新的，就要好几块钱。”他是地道老北京，从旧中国一路走来，人生穷通利达、生活贫富变幻体会独深。

单老一生总的说来比较清贫，但用自己的话说，也曾经有过钱。在旧中国，他最开心的时候是从进入故宫博物院至“卢沟桥事变”之前，也就是南京国民政府接收后，故宫博物院第一个发展繁荣时期。那时故宫博物院直隶于国民政府即中央政府，而不是行政院，更不是教育部，视同政府机关。院长易培基是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会议成员、农矿部部长，官级高于政府部长级。易院长月薪是400银元，古物、文献、图书三馆馆长和秘书、总务两处处长月薪300银元，科级月薪200银元。单老说他做到科长，月薪200银元。在北师大代课拿50银元，写稿赚外快大约又是50银元。他拍拍他那并不肥胖的肚子，说：“一个月300大洋，那真叫阔！”他说那时的货币购买力，大致说来

一块银元可以买一袋50斤的洋面，或是一丈洋布。他雇一位“包月”洋车五块大洋，以车代步，车夫也心满意足，这五块大洋养活一个三口之家问题不大。

“挣这么多钱有没有买房买地呢？”因为我知道他住的一直很紧迫，不禁心生疑问。单老说：“有啊，我在地安门旧鼓楼大街路东置了一座宅子。可是日本鬼子进城后给占了，做了宪兵队驻地。”日本帝国主义投降后可以要回来吧？“本该是啊，可是又被国民党军队做了兵营。”那国民党逃跑了，总该物归原主吧？单老说：“别提了。我去一看，早就一把火烧了！”

令人惊讶的是，他在叙述这些事的时候，并无伤感之情，好像在说一件与自己不相干的事情。我们惋惜之余，又想起他有没有存点钱。他说，当然有啦，“可是日本投降后，我到银行一取，都是纸币（法币）了。从此之后就得了‘不治之症’——穷病。接下来的你们该知道，就不必我分说了！”

单老由此说起他的家庭。他在家中弟兄之间排行第二，从小过继给二大娘。长大了，二大娘给他娶妻，并生下儿子。按宗法制度，这是二大娘的孙子。这时他的母亲如梦初醒，原来自己的儿子生下孩子却只能是人家的孙子。于是母亲决定也要给儿子娶个妻子，将来就有了自己的孙子。但单家并非官宦之家，没有纳妾的想法。还是请他的岳母亲自出面做媒，把自己姊妹家的女儿嫁过来，言明是明媒正娶

的二房，而非侧室。这表姊妹二人相互帮助，一生从未红过脸。八九十年代，故宫老干部追时髦，银婚纪念、金婚纪念、钻石婚纪念不时搞起来，邀请单老同贺。单老说：“我们是铁婚。我们三口子够铁！”

## 二、彭真市长任命书

单老于1987年卸任副院长，转任顾问，我们在一起的时间就更多了。基本上，每天早上上班后，他先在院办公室我的办公桌前为他准备的椅子上坐上半小时，然后大家各行其是。有时半下午，事情告一段落，或者是他老人家来了，或者是我找他。日久天长，无话不说，单老那些底细我也知之甚悉。他说在老北京话里，这叫做“托底”。他常说：“一天看不见神武门就难受。”所以直到1998年去世前一个月还在上班。

说他“卸任”副院长，单老勉强接受；说在任免通知上是“免职”，老人家就大不以为然。可能是在他看来，干部犯了错误才被免职。那是1988年北京博物馆学会编辑出版第一部《北京博物馆年鉴》，院方指定我撰写故宫博物院简史和历年大事记，在历任院领导一项，就遇到这样的问题。最后是把单老写作“改任顾问”。其他老领导也很在意行文提法，有一位对老干部科同事说，接到小姜的查询电话后，一夜没睡觉；还有叫子女拿出当年周总理签发的任命书的。

比较起来，还是启功先生来得洒脱。启先生任中央文史研究馆副馆长时，馆长是萧乾。有人说两位模样有点像。有一次当面查证启先生，启先生说：“我告诉你：把启功的脸压扁了，就是萧乾；把萧乾的脸拉长了，就是启功。国家提拔文史馆的干部，就是挑这样品种的。”说您老人家眼睛、眉毛真是像您的老祖宗雍正皇帝画像的模样，启先生就更不自我感觉良好了：“都是贼眉鼠眼的！”

大约是1994年前后，不知为什么，单老对当初任副院长及改任顾问的事忽然上心起来。1961年北京市市长彭真任命他为故宫博物院副院长的任命书，他一直珍藏着，有一天拿来给我看。单老说，1958年7月27日到1962年4月24日3年多，故宫博物院下放北京市管辖，归口市文化局领导。他提拔担任副院长在1961年3月6日，是彭真市长任命的。因为提拔任命干部，单老有两位夫人的事自然一同上报。单老说，彭真市长亲自拍板：历史原因形成，不作为问题。

## 三、生前商定的挽联

单老逐渐步入暮年，也变得主要是大家照顾他。最后几年上班，是他的女儿单嘉筠陪护他。我们几位他身边的人，有时也以“老爷子”指称他。但记忆里，他在早些年，在尽可能情况下，对同事们很关照。记得是北京古代建筑博物馆开馆的时候，单老带着我去参加开幕式。开幕式完了，主人家留他吃饭。单老说：“我院里还有事。”主人家殷殷挽留，说：“您的事情看能否稍迟再办。秘书、司机我们也有安排。”单老这才留下。回程路上单老说：“我怎么能抛下你们，自己留下吃饭呢？”

据嘉筠事后告诉我，单老在北京协和医院去世的当天上午，她本来是回故宫拿支票办理出院手续的，单老也已下床。她临走前，老爷子指着病床说：“我就死在这个床上？”其实那是高寿老人自己的直觉。可是年轻人没有经验，说我们这就出院啦！于是坐上103路电车回故宫。不一会儿，BP机就传来医院要求速回的呼唤，再回病房，已是回天乏术。

在单老晚年，大约是1996年某一天，忽然谈到挽联。我说您老人家别介意，百年之后我送您的挽联是：“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这时就请故宫

的书法家王中平兄，以颜书恭楷写了，献在他的灵前。

单老不是“壮士”，也不会“威加海内”。但凭他在历史学、档案学、古建筑等学术界的贡献、名望和地位，他足够“壮

士”，称得上“威加海内”了。当日单老拍拍胸脯，颇有些自负，欣然接受了。

（作者为中国国家博物馆学术研究中心研究员）

# 读《文物背后的抗战故事》有感

吴梦麟

2015年底的民意调查十件大事中，关于举行“九月三日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和活动”成为最深入民心的大事，可见党中央决策的英明与果断。抗日战争带给中国社会无法磨灭的历史烙印。而其间能保留下来的各类和各级抗战遗址、遗迹和遗物都是对这段历史最为真实和直观的实证，在我国丰富的文物中占有重要的地位，是中国人民心目中最神圣的文化遗产，承载了极其深刻而强烈的社会情感，同时也具有重要且明确的社会功能，做好抗战文物的保护和利用工作就尤为具有突出的现实意义了。这也是对2014年2月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决议设立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和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的落实，在重视和保护抗战文物的过程中，宣传和建立档案十分必要，让民众尤其是年青一代要铭记屈辱和苦难，振奋精神，以实际行动为我国美好的明天尽心尽责。这里想介绍北京市文物局主编、北京燕山出版社为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的重点出版物《北平抗战实录》中的《文物背后的抗战故事》一书。

本书首先在序言中开宗明义地将北平在抗日战争时期的形势和地位等做了简明阐述，论道“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是中国人民反抗日本帝国主义野蛮侵略的正义战争，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是近代以来中国反抗外敌入侵第一次取得完全胜利的民族解放战争。北平军民掀起的抗日风暴，是这场反侵略滔

天怒潮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还历述了“从‘九·一八’事变后声援东北同胞到‘一·二九’抗日救亡运动的兴起，从1933年长城阻敌到卢沟桥事变掀开民族抗战的大幕，具有光荣及爱国传统的北平人民始终站在抗日救亡运动的最前线。1937年7月29日北平沦陷，但具有古老历史和光荣革命传统的城市，迎强虏不退，靠同心渡洗劫”。八年沦陷时期，北平民众坚持敌后抗战。在华北始终高举抗日民族解放的旗帜，在今天北京所辖的门头沟、房山、密云、延庆等地，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八路军等开辟了平郊抗日根据地，成为华北抗战的重要战略支点和晋察冀边区的屏障和护卫，也是八路军战略反攻、挺进东北的堡垒阵地。

与此同时，本书还结合北平城的特殊地位，讲述了北京城内的地下抗日活动从未停止过的历史，生动地展示出北平民众杀敌、锄奸、向根据地输送人员、筹措和运送物资、进行统战和情报搜集等工作，有力地支持和配合了抗日战争，更有成千上万的北平儿女奔赴抗战前线，参加对敌作战和抗日武装，驰骋沙场，为国捐躯。许多百姓献出财产和亲人，这些可歌可泣的英雄诗篇，热血与铁骨，铸就了一个不屈的北平。为此，北京燕山出版社藉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之际，不失时机编辑了这套丛书，配合了政治形势，是突出政治的表现。笔者则以丛书中《文物背后的抗战故事》作为阅读感想，简单表述一下老文物工作者的一点体会和收获。

《文物背后的抗战故事》一书单独成册，并为该丛书中有重要内容和颇具吸引力的读本。

该书共列四个篇章。

第一篇章以“岂曰无衣？与子同袍——侵略与抵抗”为题目。章内列九个子目，如“赵登禹墓前追思英烈”“宛平城头忆烽火，卢沟桥上闻狮吼”“闻名遐迩的二十九军大刀与大刀队”“黑山扈战斗纪念碑”等。

第二篇章以“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日军的暴行”为题目。章内列11篇，如“故宫铜缸见证侵略”“硝烟下的文物大迁徙”“郑振铎抢救稀世孤本”“在日军铁蹄下涅槃的‘北大红楼’”“人性的光辉永远闪耀——房山教堂惨案再回首”“长辛店侵华日军吃人狼狗队”“天坛与日本1855细菌部队”等。

第三篇章以“千里刀光影，仇恨燃九城——人民的怒火”为题目，章内列13篇，计有“‘一个人’的抗战——白塔寺罗德俊手书”“谁说书生百无一用——爱国师生的抗日救亡运动”“奔马——抗战时期徐悲鸿先生的真实写照”“绝世名伶梅兰芳”“白石老人与《七鸡图》”“凄美青衣泪 铁血赤子心——程砚秋故居”“西四北报子胡同8号——一处鲜为人知的抗战见证地”“石景山铁厂抗战事琐记”“正阳门箭楼为抗日救亡打开了一扇窗”等。

第四篇章“每一颗子弹，消灭一个敌人——反击与曙光”。共收录13篇，计有“巧除日军——马家堡火车站事件”“忆马灯背后的抗日英雄陆平”“‘小白龙’白乙化”“北京的‘奥斯维辛’——炮局监狱”“人民第一堡垒——焦庄户地道”“抗战中的军民鱼水情——记萧克将军的碗”“八年终挫不义师——太和殿日军投降”等。

我这里仅仅做了些简单的择录，就可清楚地看出编辑本书的良苦用心和倾注的大量工夫。

首先，在几个醒目的大栏目下，又较多角度地将抗战八年中北平的城内、城外、前线、后方、各个层面的人物和事件都以具体的故事做了诠释，让读者从笔端中了解甚广，具可读性，尤其能引起年轻读者的兴趣，经深思后能触及心灵、得到一些启迪。

关于该书的定名也很妥帖，开宗明义将文物的特殊性交代清楚。并充分展示出了文物的价值、特点和其衍生出的深刻意义，使人们在不太了解文物的前提下，让人产生研读和愿意亲睹文物的想法，同时也会引起有关部门要做好发掘文物价值和利用的思考，紧跟中央关于保护和利用的新精神，让文物发挥出其他学科不可替代的作用。

该书章节分明、内容充实，还采用了较多的历史照片和文献档案，图文并茂，再现了昔日的情景，解读了英雄人物高尚情操。当徜徉在那些饱经沧桑，甚至劫后余生的遗址、遗迹、遗物之间时，产生见景生情、催人泪下、触及灵魂的效果。

我已在北京从事文物工作55年了，经历的事情众多，虽然主要工作是文物考古和文物保护研究方面，但过去只要单位有任务也必须服从组织决定。比如1965年为纪念“一二·九学生运动卅周年”，首都博物馆和文物工作队就一起搞过展览，1965年又筹办“抗日战争史展”。当时我有幸参加了征集文物和讲解工作，书中提到的一些事件和人物也有些了解。如1961年国务院公布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时，全国180处，北京就占18项，可见其工作量之大。当时以“卢沟桥及宛平县城”为重点勘查项目，文化部派罗哲文先生指导工作，除了测绘、记录外，还很注意查阅档案、访问重要知情人等，如廿九军的高层领导张克侠、何基沣，甚至宛平县城居民等，当时我还做了访问记录，可惜在“文革”中丢失，他们的亲身口述真真切切，使我们对日寇侵略痛恨之极，可以在建立“四有”（即对保护单位要做划

定保护范围和影响范围、安排保护机构或保护人、树立保护标志和建立科学档案)时特别不用日寇借题发动“七·七事变”时在宛平县城北假说丢失一士兵挑起事端的“一文字山”，改用我们的称谓即大枣园，并列入影响范围内(该书中仍称“一文字山”应是硬伤，我已向出版社申明)。勘查中特别注意寻找抗战遗迹如宛平县城东门北侧的弹痕、卢沟桥上的伤痕等。这样在进行该处重要文物的调查研究时增加了一些抗战元素。1962年文化部文物局在西安召开了专题汇报会，卢沟桥及宛平县城作为试点项目，将工作成果提交会议，得到好评，使古老的卢沟桥增加了革命的色彩。

又如在搞“一二·九学生运动”展览时，我们访问了平西、平北等郊县抗战时广大学生积极投身革命的亲历者，百姓说“王亢眼中有枪子”，白乙化为革命捐躯的壮烈牺牲精神感人泪落，每当带领观众站在墓碑前时，一起受到一次革命的洗礼，对中国爱国青年高尚品德油然而敬。

1965年2月开始筹备“北平抗战”展时，我有幸参加文物征集工作，与学近代史的梁旭毅先生一起着手到近郊的长辛店二七机车车辆厂、南口车辆厂、琉璃河水泥厂等处调查访问征集活动。当听到二七厂党史办同志讲述日寇为让日军受伤后能及时得到输血的目的，让中国工人身上佩戴一个小牌，牌上注明血型，其挖空心思的作法让人痛恨。又如在场内专辟一块地，建狗屋，让狼狗撕咬中国工人。其灭绝人性的行为令人发指，怒火烧中天。可惜当时已不见狗屋，只能远指当年的地点。如若今日仍遗存该是多么重要的侵华实证啊！可幸的是该书中也收录了关于狗屋的文章。南口车辆厂也是北平的一座大厂，日寇对中国工人施加蹂躏，在厂门口设打卡机，若有不顺眼的就遭到痛打，致使工人惊若寒蝉，一件小小的打卡机见证了这段历史，我记得当时征集到了珍贵的物证。另外，我们也极注意资料和照片

的搜集，从琉璃河水泥厂征集到不少的照片：工人们无衣无食，身披水泥袋，干着牛马一般的强劳动，让后人看到先辈们在黑暗的抗战八年中承受了多少苦难，照片就是铁证。可惜正当我们全力以赴地搞这次特展时，却因“文革”的原因而宣告结束。如若征集到的文物仍保存，应及时整理、展示。另一件事就是2015年7月7日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曾就一件珍贵文物——白塔寺罗德俊手书的保护进行了郑重报道，手书真迹在抗战馆被陈列，让观众看到一份北平普通民众的呐喊。当我听到此消息，又把我的思绪拉回到1978年10月(10月1日还是2日记不清了)。回想1976年7月28日唐山大地震后波及北京，许多古建筑遭到不同程度的震损，尤其坐落在西城的白塔岌岌可危，我们都心急如焚，这时总算盼来了国家文物局拨款开始修缮事宜。正当我10月1日国庆节在家休息时，工地传来了在塔顶发现一批文物的消息，其中有乾隆十八年(1753年)敬装的佛教文物，还有其他一些不太起眼的民国年间的纸币等，工程队(房修二公司古建队和北京市文管处白塔修缮办公室)决定不参与清理文物，由赵迅、洪欣和我一起登塔清理，在塔顶天盘一处不起眼的缝隙中发现了这份手书，它长26.5厘米，宽18.5厘米，纸张因年久风雨侵蚀已经泛黄，但字迹清晰可辨，仔细阅读后我们认为其价值不可小估，顿时收好保护。当著名漫画家李滨声先生得知此发现后还多次在政协上提案保护。我也积极奔走呼吁，为保护这份珍贵抗战文物尽了心。在抗战胜利70周年纪念日时能展现给观众，使我得到欣慰，并撰文讲述事情经过和价值。

以上几件往事和书中的一些专文有了互补的作用。作者们以充沛的情感，以故事的形成，娓娓道来，更具可读性。如“赵登禹墓前的追思”“闻名的廿九军大刀队”“长辛店侵华的滔天罪行”“焦庄户的地道”等。

我没有笔下生花的能力，但当我捧

起这本书就爱不释手，一桩桩、一件件文物背后的故事都感染着我，希望该书能成为北京市民、莘莘学子和青少年的必读之物，牢记那段苦难历史，激励人们前进。

当然该书还有些不足和瑕疵，实际上抗战的题材广泛和感人，还有一些鲜为人知的事件、人物亟待发现和记录，遗存也应尽早保护，如门头沟区王家山的“人墙”、卧佛寺樱桃沟内民先队的“保卫华北”刻石。门头沟马栏村《挺进报》和平西抗日根据地的遗址、刻石，延庆大海坨某地日寇挖掘的无人区壕沟以及百姓送郎

上战场的英雄行为，甚至外国朋友为八路军运送药物等多方面的史实和遗存应继续寻找。另外博物馆中收藏的抗战文物和等待征集的文物也应重视，要为子孙后代留下一些珍贵遗存，这个课题是无止境的，“背后的故事”可继续出版。

感谢编委会的立意和出版社的精心操作，希望项目的策划及负责人李满意和责编陈雪、王梦楠等出版人不要停下脚步，因为读者等待着其他“背后的故事”能问世。

（作者为北京石刻艺术博物馆研究员）

# 一部深入浅出、雅俗共赏的 博物馆学著作

——《博物馆变迁：博物馆历史与功能读本》评介

尤 李

美国学者爱德华·P·亚历山大（Edward P. Alexander）和其女玛丽·亚历山大（Mary Alexander）撰写的博物馆学著作《博物馆变迁：博物馆历史与功能读本》（下文简称《博物馆变迁》）的中译本在2014年由译林出版社出版。该书由陈双双翻译、陈建明主编，被评为“2014年度全国文化遗产十佳图书”<sup>①</sup>。

《博物馆变迁》系一本探寻博物馆发展脉络和使命的综合性、通论性著作。该书对博物馆的历史和功能进行了宏观性概述，展现出近代以来六大类博物馆（艺术博物馆、自然历史和人类学博物馆、科学技术博物馆和科学中心、历史博物馆、植物园和动物园、儿童博物馆）的发展史及博物馆的五大功能（收藏、保护、展览、阐释和服务），资料翔实，叙事清晰。

其一，该书的内容来源于实践经验总结，它所列举的一些案例对博物馆的藏品征集、文物保护、日常管理、陈列展览、社会服务等工作具有借鉴意义。如本书对美国的历史房屋建筑、历史古迹及其保护措施的具体阐述，彰显政府、民间志愿者、专业人士和妇女的作用，如何采用新的方式来保护古建筑、保护历史街区等<sup>②</sup>，这些经验有利于国内文物保护和博物馆实践工作借鉴。另外，此书在第一部分《历

史》中谈及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与意大利政府签署协议，同意归还馆内的一部分原本属于意大利的艺术品，但作为交换条件，意大利则会提供其他古代文物的长期借展<sup>③</sup>。这种互利的处理方法对我们追讨流失到海外的流散文物（如圆明园流散文物）具有启迪。

其二，此书在论述中非常强调博物馆针对公众的通识教育功能，探讨现代博物馆如何处理好学术研究、陈列展览和通识教育之间的关系。特别是该书在第二部分《功能》中对博物馆“阐释”的具体表述，包括博物馆举办的讲座、论坛、研讨会、艺术表演等，各类面向公众的出版物，均围绕着博物馆如何满足观众的需求、兴趣，获得公众支持的主题<sup>④</sup>。此部分对“博物馆行业”的具体讨论，涉及当代博物馆是神庙，还是公众论坛？当代博物馆的重心是公共服务，如何采用新技术吸引公众<sup>⑤</sup>？显然，这些论述围绕着当下学界讨论的热点问题——“公众考古学”展开。近些年，由“专家考古学”走向“公众考古学”的呼声愈益强烈，甚至有专家提出：“公众考古学”乃考古学在新世纪的安身立命之本。曹兵武先生指出：公众考古学绝不仅仅是考古学传播和考古学知识普及，它涉及更广泛和更深层

面的问题，比如：考古学的学科结构，考古学与社会、与大众、与文化遗产保护的关系，考古学的学术规范与学术伦理等，总之，这是一门关于考古学如何在当代世界安身立命和持续发展的重要学问<sup>①</sup>。曹兵武先生对普及考古学知识、发展公众考古学提出了几点建议：考古学家将普及考古学知识当成一种社会责任和义务身体力行；加快对考古资料的消化和发表；不断探索考古知识转化和普及的形式和方法；同时注意社会的反馈，与公众互动<sup>②</sup>。那么，在由“专家考古学”走向“公众考古学”的过程中，博物馆应当在其中扮演怎样的角色？如何更好地实现“神庙”与“公众论坛”的统一，增强教育功能？这些值得我们深思。

其三，本书能够发挥“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的作用。博物馆及博物馆学均为近代以来传入中国的“舶来品”。该书作者从自己的学术背景和工作环境出发，所叙述之内容全为欧美博物馆运行的情况，对国内博物馆管理者和专业研究人员了解海外博物馆的发展历程、已有的经验十分重要，有利于中国博物馆的工作人员和决策者从中吸取有益的经验，将之运用于博物馆工作的实践。难能可贵的是：在每章节的末尾，作者均列出详细的参考文献，给读者提供了可供追溯的学术信息，方便专业学者以此为索引，去查找相关学术论著。当然，这些参考文献亦全是欧美的博物馆学论著，对想了解欧美博物馆学研究状况以扩展视野、推动本国博物馆学研究和博物馆建设的中国学者来讲，无疑有所助益。

其四，该书在概述博物馆历史时，将《儿童博物馆》专门作为一节来叙述，包括儿童博物馆的起源、美国著名的儿童博物馆的运行情况、儿童博物馆的变化发展、儿童博物馆的影响、面临的挑战<sup>③</sup>。一方面，儿童博物馆是中国博物馆建设和发展中的一个薄弱环节，本书所提供的简要而系统的信息对中国在新的时代建设和

发展儿童博物馆非常重要。另一方面，在当今学术界，关于“儿童史”的研究方兴未艾。《博物馆变迁》中对儿童博物馆的叙述以及列出的相关参考文献<sup>④</sup>，对学者研究“儿童史”也将有所裨益。

其五，该书在每章节的末尾专门书写“挑战”部分，皆是围绕本章主题而提出的问题，启发人们进行思考和讨论，作出相应的变革。如本书论及举办特展已经成为美国艺术博物馆获得资金支持的最重要手段，尤其是大城市里的艺术博物馆。然而，现在大多数博物馆举办的特展却呈现出一种病态。博物馆如何在举办特展时展示其自身的核心使命？<sup>⑤</sup>资金对博物馆这样的公益性机构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可是如何把握好一个度？还有，工业化和机械发展推动了人类进步，绝大多数科学和技术博物馆都颂扬和崇拜机器，没有包含与环境保护相关的内容，应该如何看待科学和技术给地球带来的巨大影响<sup>⑥</sup>？某些历史博物馆的陈列展览存在把历史过度简单化、让历史显得枯燥乏味的问题<sup>⑦</sup>，博物馆工作者如何采用大众喜闻乐见的方式与观众分享最新研究信息，并展示错综复杂的历史？如何将技术融入儿童博物馆的触摸式、互动式展览？儿童博物馆的重心是为儿童阐释展品和标本，还是为其提供引人入胜的互动活动<sup>⑧</sup>？这些都是发人深省的问题。

其六，该书还提及：在全球主义背景下，世界越来越小，网络对博物馆的展览展示、博物馆之间、博物馆与其他组织机构之间的互动交流已经产生革命性影响<sup>⑨</sup>。国内一些博物馆学者也提出：在互联网构建的社会行为环境中，博物馆需要重新定义博物馆用户的价值，构建新型的博物馆与公众关系<sup>⑩</sup>。不过，自近代以来，各国的博物馆建构一套想象的权力传承的谱系，成为民族国家的政府统治权威的标志<sup>⑪</sup>。因此，《博物馆变迁》中的这段论述其实还隐藏着对当今社会的一个重大命题的认识，即，“全球

化”与“民族主义”的关系。曹兵武先生这样阐释在新世纪作为“文化殿堂”的博物馆：“博物馆更倾向于被视为一种综合性的社区文化中心，是当今城市生态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全球化的形势下，博物馆被认为是不同民族、地域文化认同的名片，是不同地区与社区人们的由藏品的物质链条缔结的、贯通古今的、精神空间的物质结构与庙堂建筑，是一种新型的科教教堂。”<sup>①</sup>毋庸赘言，在当今世界，“全球化”与“民族主义”乃是影响世界格局和国际关系最强大的政治和社会力量。实际上，在全球化趋势日益深入的背景下，民族国家的地位和作用也在加强。那么，新时代的博物馆如何更好地展示这两股力量之间的互动呢？这需要专业学者和博物馆工作人员作出回应。

最后，书末附有《附录一·职务翻译对照表》<sup>②</sup>和《附录二·机构组织翻译对照表》<sup>③</sup>，对普通读者和专业学者了解博物馆的相关职务和世界知名博物馆的机构组织十分有用，甚至可以方便地按图索骥进行检索。

约而论之，本书文字流畅、通俗易懂，不仅是博物馆从业人员的入门教材、重要参考书，而且也适用于对博物馆或文化事业感兴趣的大众，真可谓“深入浅出、雅俗共赏”，十分值得一读。

---

① 《2014年度全国文化遗产十佳图书评选获奖图书》，《中国文物报》2015年6月12日，第6版。关于该书，有学者撰写过书评，如尹凯：《变迁之道：试论博物馆历史与功能——兼论〈博物馆变迁：博物馆历史与功能读本〉》，《东南文化》2015年第3期。笔者切入的角度和论述的重心与尹文不同。

② [美]爱德华·P·亚历山大（Edward P. Alexander）、玛丽·亚历山大（Mary Alexander）：  
《博物馆变迁：博物馆历史与功能读本》，译林出版

社，2014年，第135-139页。

③ 《博物馆变迁：博物馆历史与功能读本》，译林出版社，2014年，第51-52页。

④ 《博物馆变迁：博物馆历史与功能读本》，译林出版社，2014年，第295-300页。

⑤ 《博物馆变迁：博物馆历史与功能读本》，译林出版社，2014年，第314-332页。

⑥ 曹兵武：《考古与大众》，《考古与文化续编》，中华书局，2012年，第116页。

⑦ 曹兵武：《考古与大众》，《考古与文化续编》，中华书局，2012年，第119页。

⑧⑨ 《博物馆变迁：博物馆历史与功能读本》，译林出版社，2014年，第180-200页。

⑩ 《博物馆变迁：博物馆历史与功能读本》，译林出版社，2014年，第53页。

⑪ 《博物馆变迁：博物馆历史与功能读本》，译林出版社，2014年，第114页。

⑫ 《博物馆变迁：博物馆历史与功能读本》，译林出版社，2014年，第144页。

⑬ 《博物馆变迁：博物馆历史与功能读本》，译林出版社，2014年，第198-199页。

⑭ 《博物馆变迁：博物馆历史与功能读本》，译林出版社，2014年，第332-333页。

⑮ 宋向光：《互联网思维与当代公共博物馆发展》，《中国博物馆》2015年第2期。

⑯ [美]本尼迪克特·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著、吴叡人译：《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5年，第167-171页。

⑰ 曹兵武：《文化遗产与都市化、全球化时代的文化建设——兼谈文化遗产相关学科及博物馆在文化传承和创新中的作用》，原载《中国文物报》2004年8月6日，此据曹兵武《文物与文化：曹兵武文化遗产学论集》，故宫出版社，2013年，第123页。

⑱ 《博物馆变迁：博物馆历史与功能读本》，译林出版社，2014年，第363页。

⑲ 《博物馆变迁：博物馆历史与功能读本》，译林出版社，2014年，第364-381页。

（作者为北京市圆明园管理处副研究员）

# 北京市文物局2016年二季度 文博事业大事记

**4月6日** 根据市委宣传部《关于北京市第六批转制文化企业认定工作的通知》要求，经市文物局研究，确定推荐首都博物馆文化发展有限公司为转制文化企业。

**4月8日** 河北省保定市委常委、副市长曹蕾和副市长闫立英一行到访首都博物馆，就保定市政府与首都博物馆开展京津冀文化交流与合作进行会谈，并签署框架协议。市文物局党组成员、副局长于平参加协议签署。

**4月7~8日** 市文物局信息中心组织局属单位70余人参加信息化工作培训。本次培训内容包括：信息化建设总体规划及相关政策解读、信息化服务传播、博物馆影像资源采集与建设和网络化办公及网报网审应用系统使用。

**4月11日** 北京收藏家协会召开换届大会。首都博物馆副馆长齐密云当选会长。

市文物局与北京海关举行移交会，依法完善罚没文物的管理，建立了长期紧密的联合机制。此次会上，共移交涉案文物5377件，并委托首都博物馆代为接收保管。

**4月13日** 依据国务院关于取消一批行政审批、职业资格许可和认定事项的文件精神，市文物局取消了“拍摄馆藏文物批准、拍摄市级以上文物保护单位审批、制作考古发掘现场专题类和直播类节目审批”3项行政审批，并取消了“考古发掘领队资格”许可。

**4月14日** 国家文物局在京召开2016年度全国省级普查办主任工作会议。会上，市文物局汇报了我市第一次全国可移动文物普查成果，全市339家国有可移动文物收藏单位，申报文物总数1326万余件。其中，已采集藏品总数386.3万余件（套）、696.8万余件；已登录藏品总数261.7万余件（套）、562.6万余件。

**4月17日** “传承华夏史篇·文博志愿先行——庆祝北京文物安全保护志愿服务行动志愿者日大型全市宣传活动”拉开帷幕，10家媒体对活动进行了报道。

**4月19日** 市文物局根据国家文物局印发的《关于发布2014—2015文物行政执法十大指导性案例的通知》和《关于2015年度文物行政执法与安全监管工作情况的通报》，对各区县明确提出要求，认真组织学习有关案例，研判执法工作面临的形势，加大巡查和执法力度，落实文物安全责任，借助社会力量推动文物行政执法工作。

**4月25日** 北京市委、市人大、市政府、市政协四套班子领导，到首都博物馆参观“五色炫曜——南昌汉代海昏侯国考古成果展”和“王后 母亲 女将——纪念殷墟妇好墓考古发掘四十周年特展”。参观后，市委书记郭金龙主持召开市委理论中心组学习，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李伟传达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对文物工作的重要指示和全国文物工作会议精神；市文物局党组书记、局长舒小峰汇报了全市文物

保护管理有关工作，提出贯彻落实意见。郭金龙书记做重要指示。

市文物局工会第三届第四次代表大会在孔庙和国子监博物馆举行。会上学习了《北京市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会法〉办法》；通过了2015年度工会工作报告、经审报告和2016年度重点工作计划、工会经费预算报告；对局系统优秀工会工作者、工会积极分子进行了表彰。

**4月26日** 科学出版社与首都博物馆、天津博物馆、河北博物院共同建设《博物院》杂志签约仪式在首都博物馆举行。杂志将通过中央地方合作、馆际合作模式，共同在文博实践中落实“京津冀协同发展”国家战略，努力打造服务国家战略的文博研究与文化传播平台。

**4月27日** 由市文物局制定的北京市地方标准《文物建筑修缮工程施工控制规范》（DB11/T1327-2016），经过北京市质量技术监督局批准发布，将于2016年8月1日起实施。

**4月28日** 根据市科委要求，市文物局向局属各博物馆下发了《关于做好2015年度北京地区全国科普统计工作的通知》，要求各单位做好相关工作。

市文物局组织局属单位完成了2016年度北京市社会科学基金课题申报，共申报8项，分别为：局图书资料中心韩建识“北京市文物局图书资料中心藏珍稀碑帖整理和研究”、北京古代建筑博物馆董绍鹏“清代方志中地方先农坛史料汇编”、北京市古代建筑研究所李卫伟“北京四合院建筑空间与比例尺度研究一期”、大葆台马立伟“文化志愿者激励保障机制研究”、张继华“赫拉克勒斯：从希腊到中国的传播”、首都博物馆杜莹“北京地区不同类型博物馆对培养青少年探究思维的研究”、北京市文物研究所孙劭“元大都的历史、考古与文物”和北京市文物研究所尚珩“环渤海地区唐代墓葬的考古学研究”。

**4月29日** 局机关党委组织召开市文

物局2016年党建工作和党风廉政建设工作会议暨“两学一做”动员部署大会。

国家文物局审查通过了《故宫保护规划》《大高玄殿文物保护规划》。

市文物局工会获得北京市总工会2015年度工作考核“工会工作标兵单位”，获得10万元奖金；全国总工会和北京市总工会分别授予“首都博物馆讲解组”“工人先锋号”荣誉称号。

**5月3日** 市文物局向全市文博系统印发《关于做好2016年文博系统安全工作的意见》，要求各有关单位加强文物安全责任、安全隐患排查治理两大体系建设，坚持“科技兴安”展览，不断提高文物安全工作水平，坚决杜绝重大文物安全事故。

**5月4日** 市文物局团委组织局系统80余名团员青年赴怀柔区河防口长城，开展以“感受文物保护成果，增强文博青年担当”为主题的“五四”青年节主题活动。实地了解了河防口长城修缮保护情况，亲身感受首都文物保护工作成果。

**5月5日** 市文物局完成对北京市古代钱币展览馆地下文物库房及设备更新工程验收工作，该地下库房于2013年7月受大雨侵袭，通过对库房的升级改造和对相关设施设备的更新，现已恢复了安全保管文物的能力。

**5月5~6日** 市文物局局长舒小峰陪同全国政协文史学习委副主任卞晋平一行，就“京津冀协同发展中的历史遗存保护和利用”在京专题调研，先后实地调研了密云蟠龙山长城、古北口城关、通州燃灯塔、潞河中学和大运河森林公园。

**5月9日** 市文物局召开2016年北京地区“5·18国际博物馆日”新闻通气会，发放新闻素材及安排接受采访，共邀请27家媒体参与报道。

**5月11日** 作为2016年北京地区“5·18国际博物馆日”活动之一，由业内专家、学者参加的“创造博物馆里的文化景观——通过案例谈博物馆的社会功能与发展”主题研讨会在首都博物馆召开，

千龙网对主题研讨会进行全程直播。

**5月15日** 第十三届（2015年度）全国博物馆十大精品陈列展览推介会在呼和浩特市举行，由首都博物馆和瑞士日内瓦艺术与历史博物馆合作举办的“日内瓦：时光之芯——瑞士钟表文化之源”展览荣获“国际及港澳台合作奖”。

**5月21日** 市文物局局长舒小峰参加王安顺市长在宝塔寺主持召开的现场办公会，专题研究解决佛教协会办公场所相关问题。

由市文物局、首都博物馆共同承担的“基于无损检测技术的中国古玉鉴定研究”课题，在北京市科委完成课题验收与结题工作。该课题共完成首都博物馆馆藏玉器及史前齐家文化玉器、商代妇好墓出土玉器等102件（套）、总计211件玉器的研究检测工作，将逐渐建立出土玉器文物、高仿品玉器科技检测数据库。

**5月30日~6月3日** 市文物局在首都师范大学举办第十五期北京地区文博系统专业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培训班。培训以京津冀文博事业发展、北京历史发展、区域文化产业发展等为主要内容，共有110余名学员参加培训。

**6月7日** 市文物局召开专项巡视工作动员会，安排部署市委第八巡视组专项巡视有关工作。市委第八巡视组成员、市文物局领导班子和卸任局级干部、各部门和相关单位负责同志参加会议。会议由局党组书记、局长舒小峰主持，第八巡视组组长尚延华对专项巡视的意义、任务、方式方法等问题做了说明并提出工作要求，舒小峰局长代表市文物局做表态发言。

**6月8日** 国家文物局在市文物局组织召开“北京市文物拍卖市场调研座谈会”，国家文物局局长刘玉珠、副局长关强、市文物局局长舒小峰、副局长于平、国家及北京市文物拍卖行业协会会长、部分拍卖企业负责人参加调研。座谈会上，与会领导就解决目前文物拍卖行业存在问题和困难提出了意见和建议，刘玉珠局长做了重要讲话。

**6月11日** 北京市以“让文化遗产融入北京现代生活”为2016年文化遗产日主题，在全市各区举办活动50余项。主会场圆明园推出了“北京市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成果展”“遗产日解读——让文化遗产融入北京现代生活”两大展览，并启动“走进文化遗产，共享中华文明”徒步走等主题活动。

**6月26日** 首都博物馆春季两大特展“五色炫曜——南昌汉代海昏侯国考古成果展”“王后 母亲 女将——纪念殷墟妇好墓考古发掘四十周年特展”圆满落幕。两大展览自3月开展以来分别接待观众42.25万人次、34.82万人次。

**6月27日** 全国政协常委、副秘书长、九三学社中央常务副主席邵鸿，全国政协常委、九三学社中央副主席赖明等九三中央调研组一行到昌平十三陵调研“明十三陵地区整体性保护情况”。座谈会上，调研组听取了市旅游委、市文物局、昌平区政府等单位的工作汇报。

**6月** 市文物局科研成果出版项目《新日下访碑录（石景山卷、门头沟卷）》一书，荣获2015年度全国“优秀古籍图书奖”二等奖。

# 征稿启事

《北京文博》创刊于1995年，由北京市文物局主办、北京市文物局图书资料中心承办，为文博领域学术性出版物，每年出版四辑。设有“考古研究”“北京史地”“文物研究”“博物馆研究”“文献资料”等固定栏目。

2016年是“十三五”规划的开局之年，根据北京市“十三五”期间重点文物工作安排，除以上固定栏目外，《北京文博》还欢迎社会各界针对“西部西山文化带”“东部运河文化带”“北部长城文化带”等三个文化带的研究撰写稿件，以繁荣北京市文博事业和促进文博界的学术交流！

## 稿件要求：

1.稿件内容应符合本刊所设置栏目的主题，立足北京及周边地区，涵盖全国，围绕文博工作、学术研究等展开，重点反映文物、博物馆、考古、史地民俗、民族宗教、古籍文献等领域的新发现、新成果、新观点。

2.文章标题要恰当、简明，并反映文章的中心内容；正文字数应控制在8000~10000字，在表述上做到主题明确、结构合理、论据可靠、要言不烦。

3.文章中所引用的文献应是正式出版的图书、期刊、会议论文集等，内部刊物、研究生学位论文、网络文章请慎重使用。

4.注释为尾注的形式，格式为“作者（编者、译者）+著作名称+出版社+出版年份+具体页码”。

5.稿件所配图片能达到印刷要求，尽量使用原创图片，非原创图片要注明出处，并配以相应文字说明。

6.投稿请务必注明作者单位、职务（职称）、联系方式及确切通信地址。

7.可将稿件电子版发送至：bjwb1995@126.com。也可邮寄纸质稿件至：北京市东城区府学胡同36号《北京文博》编辑部（100007）。

## 注意事项：

1.本刊已被《中国学术期刊网络出版总库》及CNKI系列数据库收录，凡《北京文博文丛》发表的文章，作者文章著作权使用费与稿酬由本刊一次性给付。

2.请勿一稿多投，如果作者在投稿3个月后仍未收到编辑部处理意见，可以改投他刊，但须告知本刊编辑部。

3.作者应保证对作品拥有合法的著作权。本刊不承担由于作者的著作权纠纷所带来的任何连带责任。

《北京文博》编辑部